

獻給仍然活着的和已經犧牲的志願軍

獻給我的妻瑪格麗特

獻給約塞和博比

## 序

本書作者目前的通訊處是匹茲堡阿勒根尼郡立監獄。他住在有着灰色高圍牆和花崗石城壕的一所地牢裏面。鋼鐵大王和煤油大王們竟把這所地牢當做我們時代一位工人階級領袖的正式的家。

美國勞工史上充滿了英勇無比的男男女女，他們不辭一切地獻出他們的一生，去改善他們的階級弟兄的生活。一些光輝的城市冠上他們的名字的這一天終將來到的，其中一個傑出的名字將是史迪夫·奈爾遜。

因為奈爾遜正是那樣的一個人，暴君們便判決他在監獄的圍牆裏面度過他的餘年。單是爲了他藏有觸犯當局的書籍，他們便強行把他判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二十年徒刑。殘酷的法庭記錄上是說明了這一點的。曾經有一個時期，宗教法庭的法官們爲了那一種罪行把人們綁在火刑柱上燒死。今天，在賓夕法尼亞，那一種罪行的名稱便叫做「危害治安」——危害治安，便要被監禁二十年，爲的是藏有在匹茲堡公共圖書館的書架上也可以找得到的書籍，這是一個圖書館員在審訊中作證時說出的。

這一個傑出的人曾經寫過一本傑出的書。這本書中對人生和人類生活的深刻的洞察力，是作

爲戰鬥的無產階級之一員的作者所具有的特色，他對人類的熱誠的關懷照耀着本書的每一頁，像匹茲堡夜晚的煉鋼爐中放射出的光芒。

在他的這本書付印的時候，他又站在被告席上，受到又一次的起訴，這一次訴狀是賓夕法尼亞危害治安法案的聯邦的翻版——史密斯法案。不僅如此，自從被捕以後，他就被剝奪了保釋的權利，獄吏們把他投進黑暗的地窖——堅厚的牆下面的地牢裏，給他粗劣的食物。

這是千真萬確的死刑。史迪夫·奈爾遜已經五十歲了。當局預冀他的壽命在他的刑期服滿以前就會告終。但是那些有迫害狂的人要使他們的預冀加倍地可靠，因此他們每天都在拷問他，以便保證他在二十年長期酷刑結束以前就死去。我們正在目擊一種政治階殺的行爲啊。

美國人必須知道爲什麼當局決心要把這個人活埋掉，要阻止他在匹茲堡的街道上和在他所熱愛的煤礦工人的盆地上走着。

史迪夫·奈爾遜是工人階級的兒子，他體現了工人階級的力量。他具有你可以在礦坑口和煉鋼爐前面的人們中間所發現的那種直率的性格和純樸的風度。他了解他們，他們也了解他，熱愛他。他的坦白的眼睛筆直地望着你，並且像他寫的這本書上所表現的一樣，他的眼睛深深地望着你。他的眼睛是閱盡滄桑、飽經憂患的一個人的眼睛。那兩隻眼睛曾經看見過飢餓的兒童，曾經看見過在發生慘禍以後被人從礦坑裏措出來的礦工，看見過從戰鬥的前綫上被運回的英雄們的受傷的軀體。那兩隻眼睛更看見過把生命獻出爲糾正邪惡而鬥爭的那些男女們的英雄行爲。這一個純樸的人也是一個高傲的人，他所引以自傲的就是他的黨，就是產生他的黨的一個階級。黨賦與

這位工人階級領袖一種確信，使他深信勞動者必將勝利。這是使他沉着而勇敢的一種認識，作為他的沉着和勇敢的一個標誌的，便是當他面臨敵人時那種無可比擬的微笑。這種確信使他對壓迫人民的人們、那些監禁他的人們表現了無限的蔑視。他是具有沉靜而深厚的力量的一個人。

史迪夫·奈爾遜是經過一生苦鬥才獲得這種力量的。在他達到選舉年齡以前，他就儼然是一個大人了。在十六歲的時候，他在費列得爾菲亞的一個屠宰場裏做工，推動沉重的大桶並在三十呎高的框架上堆積大塊肉排；一失足就意味着受傷或死亡。他在這裏第一次瞥見生活的真相：這些年都是他的大學時代。他追述在他身旁的一個工人，「一個三十五歲的老年人」，一天悄悄地對這個年輕人說，他「沒有力氣再做下去了，要是場主發現出來，就會把我解僱的」。於是奈爾遜便替那個人爬上框架去（他一生都在替別人爬框架）。然而場主終於發現出來，把那個筋疲力竭的工人解僱了。「這一天是聖誕節，一個仁慈的日子，」奈爾遜追述道，回憶三十多年以前的這一個平凡的悲劇時，他的眼睛就黯淡起來。

史迪夫，一個憤怒不平的年輕人，曾經在工業城費列得爾菲亞的街道上踽踽着，詫異着，提出問題，尋求答案。這些答案是在鋼鐵、汽車和煤礦工業的城市中，在從事同樣艱苦的工作、發生同樣平凡的悲劇的年代裏發現的。於是他做了工會會員，他花費無窮盡的夜晚徵求新會員到工會裏面去。他逐漸確信工廠應當屬於做工的人們，田地應當屬於耕種的人們。

一九二九年開始經濟恐慌，那些飢餓的年頭使他成為全國馳名的人物。作為失業工人的組織者，他的一生是循環不已的救濟會議、被捕、在警察局中被拷打、以及被遊行的工人們爭取到把

他從監獄中釋出。他的勇敢的妻子瑪格麗特敘述那些日子裏一個獨具特色的故事，她說：「記得我看見史迪夫在維爾凱斯——巴列地方和幾百名礦工的妻子兒女們從煤礦公司的軋煤機那裏走下山來。他們手裏拿着空瓶，叫喊着『我們要牛奶』。」於是礦工的家屬們開始得到牛奶，得到成籃的救濟品，而且，多半因為史迪夫所從屬的黨做出了輝煌的工作，失業保險已成爲全國的一條法律了。他真是一個知道怎樣獲勝的戰士。

接着發生了西班牙內戰，這個匹茲堡人聽到了馬德里的呼喊。史迪夫和各國善良的人們一樣，他爲西班牙人民在一九三一年選舉時選擇了一個共和政府而歡欣不置。當選舉結果揭曉時，波旁王朝的最後一個國王亞封索從王位上逃走。反動和進步的潮水瘋狂地打着漩渦轉來轉去。在一九三三年，封建貴族們爬回到王位上去，當一個叫做佛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將軍率領他的外國騎兵對徒手的阿斯都里亞礦工作戰的時候，被塞凡提斯稱做西班牙的「沉默的城市」的街道上染紅了鮮血。成千成萬的男女和兒童們被騎兵的馬刀斬殺；三萬人被投入監獄。他們都是反對帝制和法西斯主義的各黨各派的人們。

一九三六年七月，人民在一次偉大的選舉勝利中奏了凱歌。人民陣綫的政府是一切共和政黨——社會黨人、無政府黨人和共產黨人——的聯合政府，他們同意爲使西班牙實現民主改革的共同目標而撇開他們的歧見。

豪富的貴族們否認人民投票，陰謀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他們的代表們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勾結，這兩個人保證供給他們飛機、武器和金錢。於是他們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發動了進

攻。徒手的羣衆們湧到街道上去制止了賣國賊們的砲火。但墨索里尼把坦克和軍隊運來。希特勒的禿鷹機隊、容克式機隊和梅塞什米特式機隊飛過歐洲的天空到佛朗哥這邊來。這是侵略，也是叛變。

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全世界的保衛自由的志願戰士們傾聽了共和政府求援的呼喊。於是現代的拉斐德們開始越過比利牛斯山脈，組成了國際縱隊。他們來自三十一個國家，來自各個大陸。他們代表了一切反法西斯的政黨。他們的人數雖少，但是他們却成爲鼓舞全世界的一種巨大的道義力量。他們幫助人類警惕法西斯主義對各國（包括我們自己的國家在內）的和平與獨立的威脅。這些志願軍在頗大的程度上鑄成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團結，這種團結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

這本書敘述史迪夫作爲美國志願軍的領袖爲當時西班牙合法政府、爲政府軍而戰的生活。西班牙戰爭中有許多永遠不會湮沒的光輝的故事，雖然許多善良的人們已經死去了。史迪夫·奈爾遜從一個普通的戰士一躍而爲第十五縱隊的中校，這一個縱隊包括來自美國的三千人，其中有一千八百人已經在戰爭中犧牲了。共和政府尊崇這一位匹茲堡人，它在一九三六年馬德里軍事委員會出版的正式第十五縱隊史中有專章論述他。共和政府說：「在最危急的關頭，奈爾遜總是冷靜

而沉着地做出榜樣來提高軍隊的士氣，使他們能够抵擋住最猛烈的砲火。」

我是在有名的貝爾其特戰役以後到前綫去的。我聽到戰士們談論史迪夫，那時他已被法西斯匪徒的槍彈射傷了。他們敘述他的不驕不躁的英勇氣概以及作爲一個上級軍官而堅持和他們共甘苦的精神；而且我明白了爲什麼在那一次亞拉岡戰役中，戰鬥劇烈的火綫上此呼彼應地到處響徹着「莫讓他們打中史迪夫」的呼喊聲，我明白其中道理了。我聽戰士們說到他對他們的福利的不倦的關切，說到他的忘我的精神，說到他以無窮盡的精力去了解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在砲火的閃光中，他們說到他的微笑、百折不撓的愉快情緒以及他對他們的信任，而他們也給他以同樣的報答。

他自己在那一次戰爭中的故事是一篇歷史，也是一篇文學作品。他的作品反映出他對生活、對生活中一切重大情節的卓越眼光；他用一個天生的小說家的藝術手腕再現了現實。書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一如他們先前生活、夢想、戰鬥和死亡的時候那樣。他用一種驚人的簡潔筆調寫了下來，每一個字都像一顆子彈一樣的簡單而明白。雖然這是人們在戰爭中的故事，但這也是一個關於偉大的愛、偉大的了解和對勝利的信心的故事，這一切滲透了全書。雖然西班牙已經在這個戰鬥中、在這個戰爭中失敗了，但作者知道西班牙最後一定會勝利的，爲保衛西班牙而戰的人們和犧牲的人們將要是勝利者。

本書的讀者們將會更容易了解史迪夫今天在匹茲堡鬥爭的史詩，將會體會到何以他在這些次審訊中表現出這樣的力量。這個在貝爾其特作戰的人英勇不屈地、單獨地站在被告席上，而不得

不作自己的辯護人；匹茲堡及其附近的七百個律師中沒有一個人願意担任他的辯護人，雖然他曾經向所有這些律師們都提出過請求。

他是在一個創辦類似民警團的地方組織「美國人與共產主義戰鬥」的審判官的面前受審的，這個組織在起訴以前久已要求逮捕奈爾遜了。對史迪夫起訴的主要證人是首席審判官的同僚，臭名遠揚的政客邁克爾·默斯曼諾，在墨索里尼的大學裏學過法學的一個人。這個主要證人本人就是同一個法院的審判官，他曾領導黑衫黨之類的警察搜查奈爾遜的辦公室，沒收了市上出售的一切書籍和小冊子。審訊是在一種鼓勵人們動用私刑的煽動仇恨的氣氛中進行的。鋼鐵大王和煤油大王們所擁有的每一種報紙一版接一版地對被告施行種種怪誕不經的誹謗。

事情還不止此。奈爾遜在一次嚴重的汽車出事以後受了重傷，躺在匹茲堡的一所醫院裏。就在審訊的前夕他還受到一個歹徒的毆打，那個歹徒手裏揮舞着一枝左輪手槍，大喊着他是審判官所創辦的「美國人與共產主義戰鬥」組織的一員。奈爾遜的一隻折斷的腿還綁在石膏上，他痛苦地從他的病牀上站起，在一個病友的幫助之下奪下了襲擊者的手槍。於是史迪夫在生病、發高燒的狀態中受審去了。審判官拒絕把開庭日期延長一天，一小時，甚至一刻鐘，使得被告不能夠接見一個從紐約來考慮接受這案件的律師。

然而這位在貝爾其特作過戰的匹茲堡人表現了如此的英勇和才能，使這一次審訊成爲美國勞工史上值得紀念的一頁。他知道他是代表美國工人、代表全人類以及代表和平的發言人。

今天，在史密斯法案的起訴之下，他又和具有同樣品質的匹茲堡工人階級的其他四位領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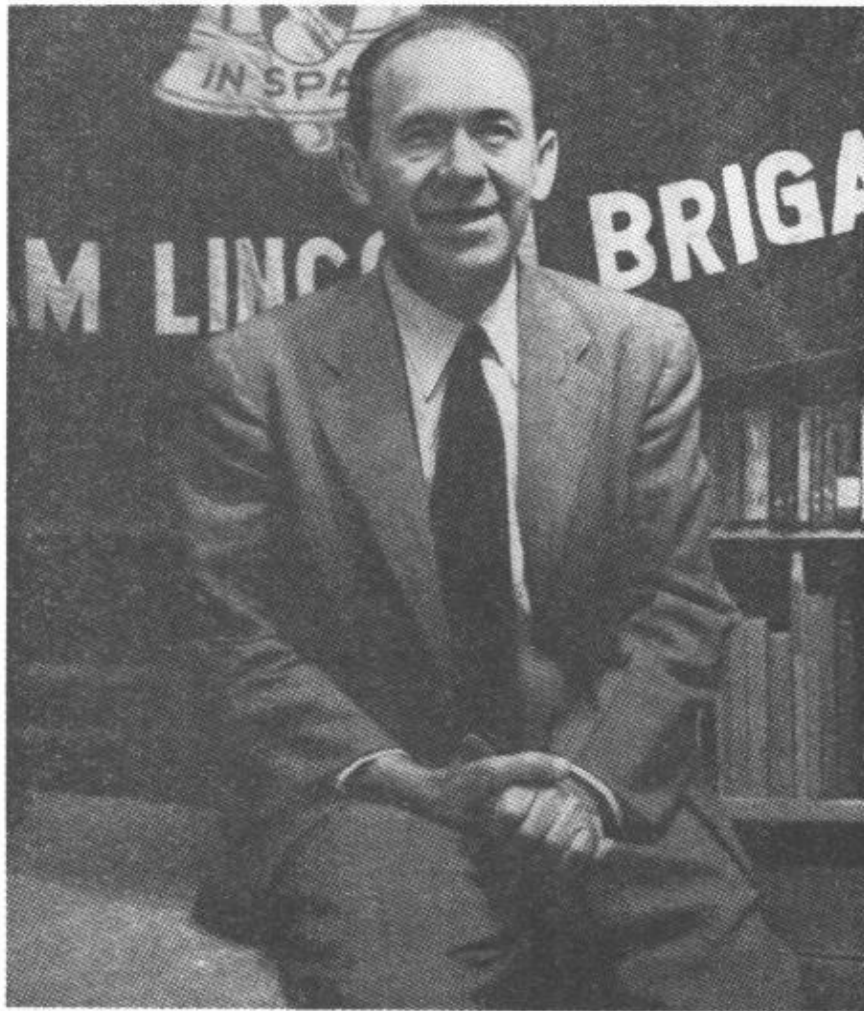
同受審了。當局殘忍地把史迪夫·奈爾遜從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的手裏奪去。我必須用我全身的力量吶喊：他們要殺害史迪夫的生命。只有你們的聲音，人民的呼聲，纔可以把他救出來。我們所有的人，凡是要和平不要原子彈恐怖、要民主不要法西斯主義的人，都和他一同站在被告席上去。

現在請讀這一本書吧：請你親自判斷要被當局活活埋葬的這一個人的才能吧。

約瑟·諾爾斯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日

**出版者附註：**在二月二十日，當這本書付印的時候，史迪夫·奈爾遜已以兩萬美元保證金取保釋放，賓夕法尼亞最高法院同意覆審他的判決書。這一個勝利是全世界千萬人的抗議爭取來的。史密斯法案審訊於二月二十四日在匹茲堡開庭。和奈爾遜一同站在被告席上的是：參加過西班牙戰爭的另一位老戰士伊爾溫·魏思曼；黑人領袖彭·卡里阿瑟斯；工人領袖威廉·艾伯森；「工人日報」記者詹姆斯·陶遜。這五個人都有被判五年徒刑的危險。



史德夫·奈爾遜

STEVE NELSON  
THE VOLUNTEERS  
Masses & Mainstream  
New York, 1953

---

本書根據美國羣衆與主流雜誌社一九五三年版譯出

## 目 錄

序	一
前言	一
旅行家們	七
巴黎的會議	三
同志的審訊	六
海灘上的守夜	六
船	三
藍襯衫和粗棉布	三
克雷普先生和領事	四
監獄裏的人們	五
在法院的一天	五
詛咒日出	六
修道院	六
敗壞風紀的分子	九
通天塔	一〇
南綫	一〇

林肯大隊·····	二二三
在雅拉瑪的戰壕裏·····	二二〇
橄欖樹·····	二二六
帶槍的廚子·····	二三一
夜間圖書館·····	二一六
巴塞羅那的五月四日·····	二一四
在村莊裏·····	二一八
一種破產的理論·····	二一七
怪人·····	二一六
我們進攻·····	二一九
戰鬥中的人們·····	二一七
對士兵仁慈的上校·····	二〇六
奉令撤退·····	二〇九
亞拉岡前綫·····	二三三
「我的媽媽」·····	二二七
不投降，就消滅它！·····	二三三
白被單·····	二四一
戰鬥沒有停止·····	二四三
譯者後記·····	二四四

## 前言

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十二輛警車停在芝加哥機械工人大廈前面，一小隊警察在人行道上佈了崗。大廈裏大約有七百名失業工人，他們正在計劃來一次爭取失業保險和救濟的示威遊行。

下午四點鐘會議結束的時候，警察便關閉了大門，命令每一個人留在原來的座位上不動。後來工人們不得不通過警官的雙重封鎖綫，每個人都受到盤問和搜查。七百工人中有一百一十三名被逮捕，塞到警車裏，然後被車子載到芝加哥偵探總局去，反共隊◎本部也就設在那裏。

幾小時後，有九十九名囚犯獲釋。十四個人被指定要受「特別審問」。在這羣人中，有被我們喚做「小傢伙」的一個十四歲的年輕人；鋼鐵與五金工人工會的領袖喬埃·達賴特；失業工人的黑人領袖奧列佛·勞；國際保衛勞工大會的一位領袖安迪·紐荷夫；一個失業的油漆匠金尼·羅德曼；一個共產黨領袖尼爾斯·克扎爾和我，當時一個失業的工人。

從下午五點鐘到晚上十點鐘，這十四個人都被扔在那間大屋子裏面。

尼爾斯說：「這是準備毆打我們的一個佈置。反共隊的那些工賊們馬上就要來到——他們一

◎ 反共隊 (Red Squad) 係警察局內專門進行反共活動的一個部門。——譯者

定是喝酒吃晚飯去了。今晚上他們需要一些額外的氣力啦。」他嘲笑地說完了他的話。「提防一點，不要被他們的任何提議瞞混住。即使你投降了，你也是免不了要挨一頓揍的！要是他們把我們分裂了，對於我們每個人說來都要慘得多。」

然後有八個探員走進屋子，站到講台上去。我們這十四個人筆直地對着講台，坐在一條長木頭板凳上。八個探員中有七個全是彪形大漢，他們在高高的講台上的桌子後面坐下，解開大衣、背心和衣領，把他們的左輪手槍放在桌子上，眼睛瞪着坐在板凳上的人們。第八個探員巴克爾體格魁偉，兩隻手非常粗大，他站在講台的邊沿，一頂灰禮帽戴在腦瓜的後面。

「他媽的，」有一個人後面說，「他們看去倒不一樣，可是你不能把他們辨別出來。」  
被捕的人望着八張毫無表情的面孔，開始表現出不安來。

尼爾斯說：「放沉着些。那樣他們就沒有辦法啦。」

然後探員巴克爾打手勢招呼另外兩個探員和他一道兒走下講台。他們一句話也不說就走到坐在板凳上的人們跟前，抓住了兩個人，把他們拖出來，使勁推到走廊去，然後關上了門。

不久門外傳出尖叫的聲音。坐在板凳上的十二個人都緊張起來了。

探員巴克爾和那兩個探員又走回來，狡猾地微笑着，用白手帕揩着他們的手。

「你，」巴克爾嚷出來，一個手指頭指着那個孩子，「你這個小猴子！」

「誰？我嗎？」孩子站起來。

「是你——你這個小雜種，到這邊來！」

這個九十磅重、五呎四吋高的十四歲孩子走到講台跟前，站在那裏面對着探員巴克爾，巴克爾還是罵不絕口。這個探員罵來罵去，越罵越得意，他的臉顯得比平時更紅，站在那裏比那個孩子高出半截，把反光燈的一道巨大的刺眼的白光射在他的臉上。

過了一會兒，這個探員用他的大手按着孩子的瘦削的肩膀，狠狠地朝他劈面打了一記耳光。探員巴克爾的大手的這一巴掌像〇·二二口徑的砲彈的聲音那樣的響亮。孩子一聲不響地彎着腰站在那兒。

接着又打了第二記耳光，這一次猛地從耳邊劈來，比第一次打得更厲害了。

「現在你說，你這個小雜種。」探員巴克爾的聲音意味着他要對這個孩子更兇了。「盯着我，你這個小混蛋，快點，盯着我。要你回家到你媽身邊去，呆在那兒不動，你願意嗎？保管我還沒有跟你了結清楚的時候，你就會討厭那些共產黨分子啦。」

突然間，探員巴克爾把孩子的眼睫毛拔了一撮。孩子頓時眼前一片昏暗，痛得叫喊了起來，身子幌來幌去。這時又來了猛烈的一巴掌，把他打得身子轉了個半邊，他的膝頭開始彎下去。

「同志們，鎮定點，」尼爾斯向他的夥伴們說，因為有人已經開始在咒罵，忘記了七個探員正在那裏摸弄他們的左輪手槍。

「你們得留意他們的那一套鬼把戲。我們中間誰先採取什麼行動，誰就會被他們開槍打死。這樣他們就會說是我們先動手毆打的，他們也可以藉口來打我們，逮捕我們更多的人了。」尼爾斯幾乎衝着喬埃的面喊叫出來。喬埃再也不能控制他自己了。「我們怎麼能够坐在這裏什麼都不



管呢？」他質問說，「他們要殺死那個孩子啊！」

「坐下，喬埃。不要做傻瓜，」老頭兒說。「你看他們多高興。他們以爲他們的鬼把戲已經成功了呢。」於是喬埃坐下去，但他仍然在那裏高聲大罵，儘管什麼人都聽得出來。探員巴克爾望着喬埃，咕囁着說：「狗養的，你，混賬王八蛋。」正當喬埃準備向那個特務撲上去的時候，油漆匠大聲囁咕說：「喬埃，紀律！」這時喬埃纔平靜下去，因爲他已察覺到他快要落入他們的圈套了。

探員巴克爾轉過身去對着那個孩子，引人注目地敞開了他的大衣，露出掛在他屁股上的那枝帶皮套的左輪手槍，他站在那裏，昂起了頭，手放在從皮腰帶旁邊鼓起的圓滾滾的肥肉上面。孩子的眼睛看着那枝手槍隨着那個特務的身子在輕輕地擺動着。

「你幹嗎老望着那枝手槍？」他慢慢地問道。

那個孩子站着一動也不動，一句話也不說。

「你幹嗎老望着那枝手槍？」探員巴克爾的聲音放大起來。「你想要那枝手槍嗎？」孩子向那個特務看着，依舊一句話也不說。

那個特務兩隻腿彎下攏在一起，鼻孔裏大聲地出着氣，他的一張通紅的臉伸到孩子的前面。

「你要手槍幹嗎，你這混賬猶太小雜種，要是你真的把手槍奪去？你要用手槍打我，對啦，你要把我打死，你就是要做這樣做……是不是？是不是？」

孩子的眼睛眨也不眨，血順着他的下巴淌下。

「是的，」他用少年的起了變化的嗓子說，停頓了一下又向那個特務喊道：「是的，我要打死

你。」

孩子話裏的每一個字像一顆子彈打在探員巴克爾的身上，他從講台上跳下來，大聲喊着說：「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打死我。」他一面向孩子喊着，一面從他身邊後退，走出了這間大房間，說：「可是你却得不到這枝手槍。」

房間後面的那些人突然放聲大笑起來。喬埃拍着他旁邊人們的脊背，說：「這孩子真有種！這孩子真有種！」

孩子免掉了這天的厄運。那些特務都走下了講台。

當兩個探員把我推進門內另一間房間的時候，只剩下坐在我旁邊的一個人了。他們強迫我坐在一張牙醫用的椅子上，用皮帶把我綁在上面。探員米勒走進房間來。這個人的五個弟兄都在西部作強盜頭子。

米勒轉過身去，慢慢地去掉他的手錶和眼鏡，解下他的手槍袋，把它放在門旁邊的桌子上，門已經被他上了鎖。然後他戴上一副帆布手套，拉出一根裝有青貝把子的鉛頭皮棍。

「原來你就是一個有名的煽動家啊！你不願離開這座城市，是不是？但是無論怎樣你也得給我滾蛋，即使我不得不把你放在一口漂亮的棺材裏送出去！」他用那根帶鉛頭的皮棍朝我的頭上打來。

他很準確地用皮棍打我。打了約莫十五下以後，我扭動着身子猛力一掙，把椅子拉散了，平倒在地板上，裝着失去了知覺。我聽到米勒的助手說：「你最好還是暫時饒了那個婊子養的吧。」

他馬上會離開城市的，這已經够他瞧了。」

於是特務米勒把綁在我身上的皮帶解開，把我從牙醫用的椅子上的剩餘部分完全拖出來，然後對準我的肋骨使勁踢了一腳。我便很快地昏暈了過去。

我甦醒了過來，東倒西歪地站在盥洗室內，用冷水潑着臉。

在我洗好我的出血的頭臉以後，我踱到敞開的窗戶跟前，昏昏沉沉地俯瞰着這一座城市，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我在望着什麼。

當我看見探員米勒站在我的身邊時，我突然神志清醒過來。從那個特務的帶着仇恨的冷笑上我纔知道我不是在做夢。我知道我是落在芝加哥的反共隊的手裏了。我從門一般大的窗戶內望着光亮的地方。

「你幹嗎向窗外望？」米勒的聲音像金屬一樣的板硬。「你想跳下去嗎？我來替你打開窗戶，跳下去，你沒有理由再活下去啦。」他使勁推我。「去，跳下去。爲什麼不跳下去？」

我體會到這個迫害狂者會當真把我從窗口推下去，因此我就使足了勁去擋住他又一次的推動，然後我側着身子迅速地離開了敞開的窗戶。

一小時以後，我坐在電梯前面的水泥地上。別的人們都在周圍的地上躺着。

一個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褲子敞開着，露出很大的傷痕。

齜埃嘴裏流出血，腮幫子上有很深的傷口。那個孩子的眼睛裏也在充血。安德魯的右臉蛋上腫了很大的一塊。羅德曼的黑頭髮上也淤結了血。

五天以後，七萬五千名失業工人舉行了示威遊行，要求救濟和失業保險。喬埃走在示威遊行者的前面。他的精神非常興奮，發表了一篇強硬的演說，痛罵那些霸佔財富而教生產財富的工人陷於飢餓的人們。我們一共有十三個人和家屬一同參加示威遊行。油漆匠尼爾斯·克扎爾帶着他的老婆和十四歲的兒子莫雷一道。奧列佛·勞沒有來得及參加，因為他被打傷了，那時正躺在醫院裏。

## 旅行家們

船預定在夜半開航。瑪格麗特前來給我送行，於是我們去看一看我的船艙。茶房把我的手提箱拿到客艙裏。「先生，只是一件行李嗎？」他問。

「都在這裏了，只是一件，」我說。茶房驚奇地向我瞟了一眼，然後走出去了。我掏出一塊手帕來，擦了一擦我的額頭和手心，我的妻對我笑笑。我說，「我沒有辦法啊，我覺得我的背上好像帶了一個符號一樣，……我們到甲板上去吧。」

我們想在甲板上找到一個靜悄的角落，可就是找不到。最糟糕的是：我們不能談論我們心裏最牽掛的事；我衣袋內的護照已經打上了紅印：「往西班牙無效。」我們不能提到西班牙，不能提到國際縱隊，不能提到林肯大隊。約翰·派克斯已經到西班牙去了，人們在他的家裏替喬埃和我

舉行歡送會；在他被俘和被槍決以前，人們讀過他從西班牙寄來的第一封也是最後的一封信。艾迪在雅拉瑪前綫上陣亡了，「首領」和「瘦長子」失了蹤，還有別的同志們……現在又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我還會看到史迪夫嗎？我還會看到瑪格麗特嗎？

所以我們兩人都目不轉睛地朝對方微笑着，說了一些在丈夫出征的時候夫妻倆所要說的話。「保重身體啊！」我們兩人都說。「我會保重的，你也得保重，」我們兩人都說。「常常寫信來。」「我會寫的，你也得寫。」「把家鄉的情形告訴我，我要知道家鄉的消息。」「替我問候大夥兒。」「告訴傑里，告訴伯德，祝你一路平安。」「保重自己。」「保重啊！」

一個茶房敲着鑼在甲板上走來走去，通知送行的人們到岸上去。瑪格麗特下船走到碼頭上，站在那裏仰臉望着我，我倚在船的欄杆上俯視着她。茶房不斷地敲着鑼。還要有長時間的等待，很長很長的等待哩。我希望船開動。我再也不能多支持一會兒，繼續站在甲板上呆呆地望着瑪格麗特的面孔了。突然輪船的汽笛聲劃破了夜的靜寂，船邊和碼頭邊中間張開了一條縫。站在碼頭上的一羣人都在揮動着他們的手、帽子和手帕。瑪格麗特慢慢地舉起她的手，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我；我也對着她舉起了我的一隻手，一剎那間把我的手指縮成爲一個緊握的拳頭。

喬埃·達賴特在我後面說：「來，朋友。我們去喝一杯吧，這樣你會覺得好過些。」

我們喝了酒以後又回到甲板上來，望着自由神像從我們身邊滑過，漸漸消失在黑暗裏。喬埃說：「再會吧，女士，但願我能再見到你啊。」

我們開始安定下來航行了。

船上約莫有一百人是到西班牙去的。在這一百人中，差不多每一個人在船上都有一兩位朋友。喬埃·達賴特、喬比·杜甘和我都是老朋友，我們三個人中間任何一個人發現另外一個人在船上都是不足為奇的。有三個小伙子從俄亥俄州的礦鎮來的，喬埃曾經在那裏做過一個時期的工，是喬埃要他們到西班牙去的。至於喬比呢，當他在甲板上散步的時候，有兩個肌肉飽滿的年輕小伙子信手向他彈了一下手指表示道好。他們的面孔和粗大而有力的手上帶有青色的斑點，人們會誤認為是炸藥燒傷的，其實這是煤灰留在傷口或者抓破的痕跡上所造成的結果。這些痕跡是一個煤礦工人的烙印。喬比也帶有同樣的斑點。他本人是一個礦工，並且是礦工的後代；他的伯父在一八七六年曾經和被絞死的「摩利麥吉爾社社員」<sup>①</sup>在莫克春克鎮一同受審過。他本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美國海軍中服務，在斯喀巴灣敷設水雷。他是一個老資格。

我向喬比問到那兩個礦工的情形。「他們嗎？嗯，也是旅行家呀，」喬比笑着說。真的，他們都是旅行家，那些年輕小伙子個個肩膀寬大，上衣緊緊地紮在他們的肌肉上。有的人因使用鐵鍬和煤鏟把手上弄得起了老繭；有的人脖子被草原上的太陽晒得通紅；有的人手紋上留着汽車裝配間、煤礦、煉鋼廠、造船廠和火車修理廠的黑灰；有的人帶着熔鋼燙成的傷疤，有的人帶着警察的棍棒打成的傷疤。我們現在是去探望親戚的，或者是去遊覽風景的，不管怎麼樣吧，我們都是

①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煤礦資本家爲了要摧毀礦工間的工人組織，硬說煤礦工人間有一個企圖採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顛覆政府的組織叫應利麥吉爾社 (Molly Maguires)，並且捏造勞工協會和它有聯系。實際上，美國從來沒有這樣一個秘密組織。——譯者

旅行家。

我們簡直絕口不談西班牙。我們避免政治性的談話。喬埃斷定懸而未決的小煉鋼廠罷工事件是屬於非政治性的，除了這件事情以外他就很少講到別的事情。

和我同桌的，有一個波士頓商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一家紐約百貨商店的一位中年的進貨員柏格先生。柏格對政治上的事情很感興趣。四個人談論了許多題目，包括西班牙戰爭在內；但是談到西班牙我就噤若寒蟬。我對自己的謹慎小心引以自傲。但是在上岸時，柏格先生却悄悄地把一個信封塞在我的手裏，並且低聲說：「孩子，祝福你在你所去的地方幸運，」這使我大大地吃了一驚。

信封裏面有十塊錢。

在喬埃的筆記裏寫着：「據報告：一個人批評了他本隊的其他隊員們，說他們呆頭呆腦，不知道怎樣做得像是通常的一般人。他（普）有錢，在酒櫃上和旅行家們做了要好的朋友，這些朋友中間原來有一位是另一隊的隊員。伙伴們認爲普說話的聲音太大又很粗心。於是問題提到委員會來。最後斷定雙方都有錯——一方面太馬虎，一方面太呆板。」

在海上的最後一晚，隊長們檢查了每個人的手提箱，搜查像武器和書籍之類的違禁品。他們沒有發現一件武器，但有大量的書籍，那一晚上很多關於政治和軍事的書籍都被拋到海裏去了。

夕陽下的哈佛爾出現了。海關到了。真正的旅行家們每人有許多行李袋和箱子；而這些「旅行家們」每人只有一隻裝得很輕的手提箱。多麼顯眼！多麼疏忽！可是法國的海關檢查員們對只

有一隻手提箱的人的行李僅僅看了一眼。「Bien, bien, allez, allez.」(好,好,走吧,走吧。)他們半微笑着。那末他們知道嗎?他們一定知道!「Bien, bien, Allez.」那是一種好感啊!

一個法國搬運伙喋喋不休地對他的伙伴談話。喬埃小聲地翻譯出來:「我今天親自扛着李維諾夫<sup>①</sup>的行李袋的!他一定會揭穿英法兩國外交部的虛偽的不干涉政策, *non des non des* (可不是嗎)?」喬埃抓住我的胳膊,把我趕快拉到一邊去,說:「當心點!這人可能是一個挑撥分子!切莫要漏出一個字眼兒。」

一個報攤出現了。在看過船上公告牌上面斷章取義的新聞簡報以後,我們終於看到真正的報紙了。西班牙——西班牙怎樣了呢?法西斯分子們依舊被阻止在雅拉瑪,依舊不能前進一步。這是好的。「康塔布雷亞海」號被俘獲了!這是壞消息,非常壞的消息。自從政府軍的這隻供應船在美國頒佈「中立」法的幾分鐘以前問不容髮地逃出美國以後,我們就悲喜交集地注意着它的航路。一切事情全靠「康塔布雷亞海」號能不能安全到達目的地——也許在我們看來是這樣的,我們忘記了這只是一隻船,其實要使共和國存在下去,非得有幾百隻船開到西班牙纔成。……

我們坐上火車了。我們什麼時候纔吃飯呢?據說吃飯要一塊美金一餐。見鬼,一餐要一塊錢!等我們到了巴黎再吃吧。

巴黎到了……

① 李維諾夫是當時蘇聯的外交部長。——譯者



## 巴黎的會議

辦公室內有一張黃色橡木桌，一把吱呀作響的轉椅和六把直背的椅子。引人注意的是：幾乎完全沒有公文和文件夾，只有一張法國和西班牙的大地圖釘在牆上。派遣英美志願軍到西班牙去並不是用通信方法進行的事情。一個志願軍人賈克·李德（即阿諾得·雷德）不得不在腦子裏處理援助西班牙的事務。

賈克的面孔上表現出他的工作的緊張。他有一種神經質的習慣，喜歡用手搔他那濃密的黑頭髮，而且抽煙已抽到對他有害的程度。

他站在窗前，俯瞰着巴黎的街道。他又燃起一枝煙來。他說：「史迪夫，我們在這兒碰到一種情況，人們數以百計地湧來。都是志願軍。得給他們住、吃，還要把他們運到西班牙去——這一切都得秘密進行。勃魯姆總理對這件『不干涉』的事情看得很認真。他的壓迫一天比一天厲害，法國所有的警探都在搜尋我們。要是有一個志願軍被逮捕，就要坐監獄，被驅逐出境。」

「倘若他的政府在那樣一個問題上讓了步，那末一切都完了。」他接着說，「……人民陣綫是共產黨人、社會黨人、和被他們稱爲急進社會黨的一個黨——達拉第黨——之間正在實行的一個協定。有些領袖們最初不願參加這個協定，只是黨員羣衆逼迫他們這樣做的。」

他狠狠地擦滅着烟捲，說：「右翼人物嚷着說：要是法國支持西班牙，這就等於對希特勒作戰。那便是勃魯姆採取的路綫。倘若他把他的黨從人民陣綫中拖出去，他的藉口就是說共產黨逼迫法國對希特勒作戰。這樣就會破壞了人民陣綫。這樣就會破壞在世界規模上發展集體安全的機會——而這却是放在我們面前制止希特勒的唯一途徑。」

我說：「法國共產黨遭遇到和蘇聯政府所遭遇的一個同樣的問題：一方面幫助西班牙而不讓自己孤立起來，同時又陷於對希特勒和他的跟班們單獨作戰的狀態。」

「當然囉。」賈克又在地板上踱來踱去地說：「這是同一回事情。這是不消說的……法國人民完全願意幫助西班牙。法國人民陣綫，西班牙人民陣綫——他們是天生的盟友。他們一道兒和英兩國聯合起來，就可以制止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

「對的，」我說，「答覆是什麼呢？」

賈克馬上回答說，「英國的保守黨、張伯倫、哈里法克斯、韓德遜那一羣，還有他們在美國國務院中的朋友。勃魯姆正在讓法國做張伯倫的風箏尾巴。你覺得他們會喜歡在法國或其他地方建立人民陣綫這種想法嗎？嘿！他們正準備挽救希特勒哩。在我們自己美國的反動分子和華盛頓方面親法西斯的紳士們的大力支持之下，他們做了很不錯的工作。吉米·鄧恩就是一個例子。要是沒有他們，法西斯主義會有什麼辦法呢？」

他猛地坐到那一隻吱吱呀呀的椅子上去，他的臉突然露出倦容來。他說，「不管怎樣，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就是如此，這裏有好幾百人都在等待着通過。我們要儘早把他們運送出去，可是

我們得謹慎點。我們不能冒着和勃魯姆衝突的危險；我們不能給他一個藉口來破壞我們。所以有些伙伴得等待一個長時期——很長的一個時期。志願軍委員會已經把他們分散掩蔽起來。你曾經聽說過「紅色地帶」嗎？都是巴黎周圍的村子，都是郊外的工人階級區域，這些區域已經選出了共產黨員村長和共產黨村議員。它們正在照顧我們大多數伙伴們——有些人不是我們這一隊的。同時，你碰到過阿克曼嗎？」

「誰？」

「社會黨的阿克曼。他正在和他打算送到西班牙去的五個伙伴逗留在這裏。他來到這裏，指望法國的社會黨幫助他們通過，可是法國社會黨員們連手也不抬。他們不同意志願軍到西班牙去，所以現在阿克曼要求我們的組織幫助他的伙伴們。」

「你說他們有五個人是不是？」我問道。

「再加上阿克曼，但是他不打算留在西班牙。他只是在替別人佈置罷了。」

「你可聽說社會黨人在紐約忙着幹的是什麼嗎？」我問他。「我們打算使他們在援助西班牙的事情上和我們合作，可是被他們拒絕了。他們說他們願意單獨去幹。他們所做的就是在像『民族』和『新共和』這樣的雜誌上登廣告，說：『徵求到西班牙去作戰的志願軍——加入社會黨的德伯斯縱隊！』」

「他媽的！這就是他們幹的事情！」

「可不是！我們的人當然是憤慨萬分的。我們推想社會黨人也只是在作宣傳，根本不想認真

做出一點援助西班牙的事情。登這些廣告純粹是一種挑撥；他們不顧一切地想使國務院壓迫整個援助西班牙的運動。剛才你也告訴我『德伯斯縱隊』只有五個人哩。」

「是的，他們給我們找的麻煩，比我們自己所有的麻煩還要多。他們逗留在咖啡館內，囉囉囉地談個不休。他們和走過的任何人都談話。他們倒不如乾脆佩上符號還好些呢。」

賈克厭倦地嘆了一口氣。「喂，史迪夫，我要請你做一件事情。這裏有一個地址。我希望你今晚到那裏去，對我們的一羣同志們談談話。這一羣伙伴已經在那裏逗留三個多星期了。請把情況和我們遭遇的困難向他們說明一下。」

會議是在一個工會大廈內舉行的。這所大廈的石砌高牆是臨街的，一扇寬大的門通往鋪着卵石、三面都圍着房屋的一個庭院。這裏像一座城堡，一個要塞。在其中一所房屋的一間小房間裏，我發現了要我講話的人們，他們成排地坐在屋子一邊的板凳上等待着。屋子裏面光線昏暗，瀰漫着濃厚的烟草味。那些人我都看不十分清楚，我想大概有七十五個人。

一個矮個兒的伙伴在房間的前方站起來。他說：「同志們，我們現在要聽，呃，這裏這位同志的講話，這位同志是委員會派來對我們講話的。請吧，同志。」我把從賈克嘴裏聽到的話告訴了他們。他們大多數都知道這一切，可是他們都在聽着。

一個有着棕色鬍子、有教授樣子的人站起來，他說：「我想問一聲，可以不可以讓我們知道預計我們能够在什麼時候越過邊界？」

人們都沉默着，急切地、專心一志地等待他的問題的答案。我可以感覺到他們的熱誠在脅迫

着我，但這是我希望避免回答的一個問題。現在既然已經直截了當地提出來，我也只好回答說：「還沒有一定的日期。」

## 同志的審訊

賈克·李德說：「那兒的一羣人在一起挨得太緊了。派一個人去叫他們散開罷。」他不安地向火車站周圍瞭了一眼。「特務比陰溝裏的老鼠還多，我們得小心些。」

那一羣人中要動身的一共有二十五個人，喬埃·達賴特是隊長。其中有些人我在這次開來的那隻船上看見過——例如，喬埃在俄亥俄州就認識的幾個伙伴們，曾經在會議上說話的那個有棕色鬍子的人，還有在會議上看到過的一兩個熟識的面孔。別的人我以前沒看見過，但是可以認出。我們五個人一羣地分散在車站的周圍。這些美國旅行家們大部分都是二十歲左右，戴着平頂軟帽，沒有攜帶行李。都是些優雅的旅行家啊。我們四處站着，既是忸怩不安，又是不舒服，很顯眼地打算做出不顯眼的樣子，大家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同時一律在注意着喬埃。我能和喬埃一同動身，感到非常高興。更高興的是：在巴黎耽擱四天以後就向着邊界移動了。

火車報告員叫喊道：「Du chemin pour (這列火車開往)——這個，那個——A 鎮——!」A 鎮是賈克給我的車票上所提到的那座市鎮。賈克說：「對啦！第十四條鐵路綫！好運氣，好運氣！喬

埃，你現在把一切都弄清楚了嗎？你該知道怎樣料理吧？好了，再會吧！我不久就要到那裏跟你在一起了。」

在喬埃的指示下，這些「旅行家們」神經緊張地跳動起來，開始向火車衝去。他們服從早先的指示，都分散在各個車廂中，兩三個人坐在一間車廂內，很少有五個人在一起的。喬埃跟我找到了一個坐在一起的地方，靠近火車的中段。喬埃心裏充滿了興奮和責任感，又是笑嘻嘻的，又是繃着臉。他一縱身坐在一個位子上，微笑地望着我。「喂，哥兒，我們已經在路上啦！」他興高采烈地說；馬上他又站起來說：「我得去把伙伴們查對一下。火車太擠了。喂，你來幫助我。我打這兒走去。你到前面的幾個車廂去。」

我找着了我們這一隊的四個人，喬埃找着了十九個人，連我們倆一共是二十五個人，一切都安排妥當。我們向着西班牙進發了。

那一夜大家都沒有睡好。大夥兒不斷彼此叮嚀着應該好好地睡一夜，以便走起山路來能够精神飽滿，因為每一個人人都相信第二天夜裏會越過比利牛斯山。可是他們總是興奮得不能入睡。他們玩着紙牌，聊着天。這一天夜裏，那位荷蘭老同志格雷茨跑來對喬埃憤憤地嚷起來。

「我那一個車廂裏的那些傢伙們鬧得一塌糊塗，」他嘴裏濺起唾沫來咕噥着說。「弄一瓶威士忌酒，在那兒又是喝，又是唱——任憑我對他們說什麼，他們完全當着耳邊風。喬埃，你跟他們講講去。」

喬埃跳了起來，怒氣沖沖地喊了一聲，便匆匆地跑去。一會兒他回來了，臉上露出若有所思

的樣子。「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他吞吞吐吐地對我說，「他們一共只喝了半品脫的酒……以前加拿大的警察賴斯利和他的好朋友墨菲，以及一個從俄亥俄州來的叫做波勒的伙伴。他們說他們並沒有胡鬧，只是想玩一會兒。他們馬上就知道格雷茨已經告了他們一狀。我說我不過來查看一下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安排得很好，可是他們不相信我。我想一切都會好的。」

「波勒是你們一隊的人嗎？」

「不，他是一個叫做惠蒂·勃拉凱斯萊的隊員的朋友。因為惠蒂來，他也來了。……惠蒂是一個很好的傢伙。我了解他的家庭。」

天亮時，喬埃看見一個農家女人在火車停下來的一個車站的月台上賣牛奶。他和她談好價錢，然後拿着她的全部牛奶，滿了一大半的一只兩加侖容量的瓦罐得意洋洋地回到車廂裏來了。這時他突然想起一件糟糕的事情。「史迪夫，誰都會曉得我不能一個人喝這麼多的牛奶！我的天，我把馬脚一骨腦兒露出來了！」

那個棕色鬍子的人——已經被起了個綽號叫做「教授」的——極力鼓舞他。「哦，來吧，老大。沒有關係。我看到另外一個車廂裏有幾個瓶子。讓我去把它們拿來。」

把瓶子洗過，裝上牛奶，然後分給那些「旅行家們」。半個鐘頭以內，他們把牛奶都分完了。沒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到了A站，我們下車了，可是下錯了車門。我們焦灼不安地等着火車開出車站，不敢再爬上火車穿到車站的月台上去，因為我們深怕火車突然開走，把我們中間幾個人留在車上。伙伴們都

挺興奮，他們分成五人一小堆地聚在一起，看去像一羣兵士一樣。喬埃和我從這一堆跑到那一堆，叫他們「分散開」！火車開出站了。

一個穿着黃色絨絨衫的人站在月台上，這是賈克·李德事前關照過的。喬埃瞪了兩隻眼望着這個人，用手抓住他的大衣右邊的翻領。這人看到這個暗號以後點了點頭，漫不經心地招呼了一下就走開了。喬埃跟着穿黃絨絨衫的人，我跟着喬埃，「教授」跟着我，然後一個跟着一個。二十五個人拉直成一行，每個人只怕看不見走在前面的人。這些人走在法國一個寂靜的小市鎮的街道上，看去很是叫人奇怪。我們馬上就覺得我們正在暴露自己。於是我們分成兩三個人一小羣，若無其事地在街上慢慢地躊躇着。

穿黃絨絨衫的人領我們到這座市鎮的另外一頭，在那兒一條小小的溪流旁邊有一所古老的石砌的房屋。他突然鑽進門內，我們也跟在他的後面走進去，這時一陣令人喜愛的燉菜的香味撲進了我們鼻內。喬埃和穿黃絨絨衫的人在一起說着法國話。喬埃說：「二個人拿一個盤子，拿一塊麵包和一瓶酒，到廚房去拿燉菜。我們住在這兒的期間由這位同志負責我們的伙食。他說：有什麼埋怨的話都可以對他講出來。」

沒有人埋怨。我們是我們法國同志的來賓，這一點我們知道。即使我們的口糧是麵包和水，我們也是不會埋怨的，何況燉菜又非常可口呢？喬埃在我們吃飯時繼續和穿黃絨絨衫的人談話，並且把他聽到的話傳達到隊裏。「這裏過去是一所貧民院，最近空了，我們的同志們就接收過來，把我們安頓在這裏。這裏的鎮長是我們的一位同志。這一座小鎮除了照料所有的志願軍通過以



外，已經收容了七十五名西班牙難民，並且照料他們。瞧，這裏的同志們要替我們花多少錢哪，所有這些錢都是從他們自己的腰包裏掏出來的！」

他又對那個法國人說話。「喂，同志們！這裏已經有五十個美國人啦！在巷子對面的倉房裏，我們要到那兒去」——說到這裏他的話在嘴裏停頓了一下——「睡覺」。

「睡覺！這是什麼意思？你的意思要我們停在這裏嗎？今天夜裏我們不爬過山去嗎？」

「我不知道。別着急。別的伙伴們已經在這裏呆了四天啦。」

大家都表示反對。喬埃說：「喂，聽我說。他們會儘快地讓我們爬過山去的。倘若我們不得不等上一兩天的話，那是因為非如此不可。在這件事上發牢騷毫無用處。」

我們通過巷子走到一所龐大的房屋前面，這所房屋下面是石頭砌的，二層樓有護牆板。樓下是一個馬廄。我們爬上搖搖幌幌的寬大樓梯到了頂樓，後來成為國際縱隊交通員的柳·布朗列出來迎接我們。「喂，同志們！歡迎你們到反法西斯飯店來。」

「老資格們」都圍攏來歡迎新來的人，並把這地方的擺設指點給我們看。在頂樓的兩邊各有一個圓肚子火爐，於是一個人說：「你們得當心火爐。這地方會像火藥一樣爆炸起來，這裏都是草。」風冷颼颼地從護牆板的寬大的裂縫中吹進來，於是又有一個人說：「夜裏風可冷透頂了，我講老實話。」一捆一捆的草靠牆堆着，於是又有一個人說：「請隨便把草弄來作墊子。牆拐有毛毯，每人一條，也可以把它摺起。這地方沒有燈，天黑了我們就睡覺。」

最初來到的人們已經建立了生活的常規，便立刻舉行了一個聯席會議，由柳把規則說明。他

說：「喂，伙伴們，我們總得極力適應這個環境。我們終歸要碰到比這還要棘手的事情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埋怨……你們會發現住在像這樣的一個地方有很多事情要做。爲了讓事情進行得順利些，我們選出了一個三人的房屋管理委員會。我提議你們大家也選出三個人參加那個委員會。」

三個人被推舉出來了。於是召集了委員聯席會議，會上除了提出其他事情以外，還提議准許一次五個人請假外出，由各隊輪換着，在規定的時間內到市上去逛逛。主席說：「今晚准第二隊的賴斯利、墨菲、波勒、朗迪斯和史密斯的假，好不好？」

前四人都是新來的，這是首先叫他們外出的一个理由。朗迪斯和史密斯都是年輕小伙子，他們兩人是好朋友。喬埃估計墨菲和波勒是有弱點的，他派賴斯利和他們兩人一同出去，因爲賴斯利是年紀較大而有經驗的一個人——據他說，他曾經參加過愛爾蘭的復活節起義——，而喬埃希望賴斯利能够叫另外那兩個人循規蹈矩。

那兩個傢伙是那樣的激動和害怕，簡直難以從他們嘴裏問明什麼，可是喬埃終於把事情問清楚了。那三個人在外邊裝了滿肚子的酒，便亂丟起酒瓶來，警察跑來制止他們，墨菲便用一種柔術抓住了那個警察，把他的手指頭折斷三根，於是警察拔出他的槍對準那三個鬧事的人，把他們抓到監牢裏去。

頂樓上所有的人都圍攏在一起聽着。柳·布朗列一隊的人非常憤慨。柳忿忿地說：「他媽的！我們已經在這兒過了一星期，可是從沒出過一點岔子，你們這一夥人來到的第一天晚上就搞出這麼大的麻煩！」

但是沒有一個人感到像喬埃那樣的難過。

A鎮的黨書記來到了。他是一個容易激動的人，這時已經到了扯頭髮嘆氣的程度。他和喬埃談了很久，可是毫無辦法；黨書記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他認為賴斯利和波勒會被釋放出來，墨菲得留在那裏受審，這樣所有的報紙上都要把這個消息發表出來了。他只盼望那位警察是一個同志。可是誰也不會願意讓他的手指頭被一個醉漢折斷啊！

約莫兩點鐘的時候，賴斯利和波勒來了，兩個人都喝得半醉。他們打算解釋。賴斯利說：「喬埃，我已經盡全力去管束那傢伙了。可是，我跟你講，他真瘋了！沒有一個人能夠對付得了他。」喬埃咬牙切齒，張大了眼睛望着他們，說：「你們這一夥自私自利的豬羅——以後再和你們算這筆賬！」

吃過早飯以後不久，由喬比·杜甘率領的又一批五十個美國人來到了。喬比馬上做了指導委員會的委員。他聽到了墨菲招來的麻煩。他對這件事並不覺得怎樣驚奇；他在巴黎曾經遇到過賴斯利、墨菲和波勒三個人，他早已把他們看透了。

十點鐘的時候，黨書記笑嘻嘻地回來。警察同志已同意不堅持要起訴。墨菲將被釋放出來。過了幾點鐘以後，墨菲來了，警察和鎮長跟他一道走來的。墨菲臉上露出一副神經質似的浮誇的神氣。他喊出來說：「嗨，哈，伙計們！」一走進頂樓，就用手指頭向四下裏彈他的烟灰。喬埃一隊的隊員們都擠在喬埃的周圍，聽他向鎮長和警察說明他們對這件事感到何等的遺憾。他們拍着警察同志的肩膀，和鎮長同志握手。「喬埃，對他們兩人說，他們真是好同志。對他們兩人

說，我們無論如何決不再讓這種事情發生。告訴他們，喬埃！」

喬埃告訴了他們兩人，他們兩人在一陣點頭招呼和互相表示敬意的中間辭別了。

人人都躲開墨菲。當他挨近每一隊時，就受到一陣叱罵：「給我滾開，你這個骯髒的老鼠！」

「還沒有人管我叫過骯髒的老鼠而不挨揍的呢！」墨菲咆哮起來。他開始脫去他的大衣。他繃着臉，眼睛腫起來，變成了紫色，這是給警察揍過的痕跡。賴斯利跳到他的面前，叫道：「墨菲，你這個該死的混蛋！」他鼓起全副力氣對他喊叫着：「墨菲，老實說，即使你是我的頂要好的朋友，不等你動手去打別人我就非得要先揍你一頓不可！」

喬比·杜甘也是一個愛爾蘭人。在他長大的那個煤鎮上，許多人都還說着愛爾蘭的土腔。

「聽我說！」他咆哮說。「你們是一對猴子，你們兩個人，要是不停住你們的貓叫，老實不客氣我要親手把你們的笨腦瓜砸得粉碎，趕快閉住嘴，不准再講話！」

喬埃說：「墨菲、賴斯利，要是你們想用你們的拳頭解決這個問題的話，你們兩人都錯了，

……我提議馬上召集一個會議，把墨菲放在衆人面前審問。」

全體一致贊成這個提議。墨菲吃了一驚，馬上就着了慌。他還想說話，可是喬埃又接着說下去：「首先讓我們來推舉一位主席。」

大家推舉喬比。喬比接受了下來，於是他便在一陣掌聲中當選了。喬埃·達賴特向墨菲說：

「墨菲，大概你從來沒聽說過吧，可是這一次你要受到同志的審訊了。你不是在一個正規軍隊裏，這裏沒有軍事法庭，沒有軍法官，沒有繁雜的條規和軍律。但是這裏照樣是有紀律的。在

這個團體裏面，全體都是反法西斯分子，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是爲了個人的投機到西班牙去的。我們到那裏去是爲了我們共同信仰的一個主義；那一個主義沒有民族的界限。這裏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你是一個愛爾蘭人，或者是一個猶太人，是一個黑人，或者是一個羅馬尼亞人；你既不比別人的地位高，也不比別人的地位低。你在這兒受到我們全體的裁判，倘若我們決定要處罰你，你也只得接受。」

他停住了話，於是喬比接着說：「同志們，在我們開始以前，我要提出一個建議：把墨菲從這個團體內開除出去，把他送回他的本土加拿大去。」

一陣掌聲歡迎這個建議；但是有一個聲音說道：「喂，喬比，你不是違反開會程序了嗎？你是一個主席，你不能提出建議呀！」

「對，一點也不錯。請原諒我。我們在這兒也得有一個真正的議事規則。」於是他一本正經地板起面孔來，說道：「好，有人提出建議來嗎？」

他聽到有人熱烈地重複了他自己的建議，接着是一陣附議的聲音。墨菲的罪行又被人重複說了一遍。柳·布朗列指出：在墨菲來這裏引起一場糾紛以前，他們在A鎮從沒有惹出什麼亂子。

喬比說：「那末有人替墨菲說話嗎？」全場一片沉默。於是喬比轉向被告。「喂，墨菲，這應該給你一個教訓了——這兒竟沒有一個人替你說一句好話！甚至你的朋友賴斯利也不。」

大家都朝賴斯利望着。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大漢子，在他的禿頭周圍有一圈淡紅色的頭髮。

他滿臉通紅，忐忑不安地舐着他的嘴唇。他的伶俐的口才現在不管事了，只是兩隻眼睛還在狠狠

地瞪着墨菲。

一個叫做賈克的從多倫多來的加拿大青年說：「因為這個人是我的同胞，我願意說一說我自己對這件事情的感想。你們說到他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他叫我感到可恥。但是——再給他一個改過的機會吧。」

羣衆喊出了一片抗議的聲音，都叫「把他趕出去」！喬比大聲對他們喊着說：「安靜些！主席是你們選出來的呀！現在把你們的粗魯的話停住，開一個有秩序的會議吧！」他轉過身去對墨菲說：「喂，你不要替你自己辯護嗎？」

墨菲拉一拉他的褲子，揉一揉他的受傷的眼睛。頂樓上非常冷，可是他身上還在出汗，你可以看見汗水在他的臉上發出光來。他把他的兩隻手插進衣袋裏，眼盯着屋椽，然後又盯着地板。他說：「喂，朋友們，受這樣的罪看來叫人比經過一場殘酷的戰爭還要難受。」他停住了話，咬一咬他的嘴唇。「唉，我所能夠講出來的只是：我受到這樣的對待是我罪有應得的。我知道你們的感受。要是你們和我一樣關在家裏，一關就是兩個星期，看不見一個姑娘，沒有一滴酒喝，當你們得到第一個機會時，你們也會飛快跑出去，在外面惹出亂子來的。我不讓一個法國人抓住我，特別是一個警察，我也不管他是一種什麼警察。……朋友們，現在我對你們說啦，我也不是想掃你們的興——」

喬埃制止了他的話。喬埃說：「主席同志，這個傢伙顯然不知道我們在談什麼事。他以為我們關心的是我們沒有請假外出的機會。墨菲，你心裏頂重要的事情就是女人和酒。我們來到這裏並

不是爲了那些事情，墨菲。我們也不願意你來挖苦我們的法國朋友。你究竟把事情弄錯了。」

格雷茨忿忿地說：「他是一個壞蛋。我們坐在火車上一路受到他們的麻煩。喂喂，把他們趕出去！」

最後由柳出來結束了這個局勢。他說：「主席同志，我提議把墨菲判處緩刑，剝奪他的一切權利，一切利益，把他交給一個強有力的隊長，這位隊長須能親自注意到他的認識和發展。要是以後他的行爲還是不能令人滿意，那末我們就永遠把他驅逐出去。」

這個提議通過了。

兩天以後，喬埃的一隊移動了。我們乘汽車到了更靠近西班牙邊境的另一座小市鎮去。喬埃，賴斯利，墨菲，波勒和我，都住在一個法國木匠——一位同志的家裏，他的老婆把我們當做兒子一樣招待。他們對於從美國來的同志們非常慷慨。我們大家一致感激他們的好意。

但是我們要到西班牙去呀。

## 海灘上的守夜

喬埃和別的幾個人在玩紙牌，那個法國婦人在燒飯，這時一個打着皮綁腿的身材細長的年輕

人匆匆地走來。他出人意外地問道：「誰是在這兒負責的？」喬埃站了起來說：「是我。」那個人說：「好，你們這一夥馬上到公園去集合吧。那兒有汽車送你們。你們要動身了。」

喬埃說：「等一下！你是誰？我怎麼會知道這是真的呢？」

那人說：「沒有錯兒，我負責這一個區域。我本來是到西班牙去的，可是因為我會說法國話，就被留在這裏了。我是從魁北克來的……沒有錯兒，同志。你們到公園去吧。」於是他又匆匆地走開了。這時大伙兒只好決定一下：是馬上去呢，還是吃完飯再去。有的人說這樣，有的人說那樣。他們用兩塊麵包夾上一塊乾酪，就拿在手裏吃，一面跑來跑去收拾東西。墨菲把他的短統襪子洗了，不斷地說他的襪子還沒有乾，後來大家向他吼起來，要他千萬不要再談他的襪子了，他才停止。大伙兒都非常興奮。一會兒大家動身了。

我們在公園周圍蕩來蕩去，極力裝出旅行家的派頭，懶洋洋地躺在長板凳上，讀着法國報紙，望着影像。可是我們的手都在出汗。我們心裏七上八下，嘴也感到乾燥。我們斜着眼望着過路的人們。行人中有的人故意露出牙齒來微笑着，有幾個人繃着臉，有的人裝着沒有看到這些美國「旅行家們」，可是當他們走過時，就把右手握緊了拳頭。

經過了長久焦灼不安的時間以後，一輛出租汽車開到公園旁邊停下了。一個戴着黃色便帽的司機很快地從草地上走過來。他用他的右手打了一個手勢，喬埃也回答了一個手勢。於是那個司機用法國話向喬埃說：「你們來五個人跟我一同去。」於是我們走進出租汽車內，司機扳動馬達，汽車從地面上移動開去，便開走了。我們回過頭去，看見另一批伙伴們正在擠進一輛舊旅行



車內。

墨菲從來沒有坐過一輛出租汽車。他說：「朋友，這可好啊！坐上了一輛出租汽車到西班牙去！」

「別做傻瓜。當我們往東駛去的時候，怎麼能夠到西班牙去呢？」喬埃往右一指，地中海就在那邊。

但是並沒有錯。我們已經往南走得非常遠，離邊界非常近了。所以我們又被帶回到一個小埠頭，那兒會有一隻船搭載我們。可是我們不願回到我們來時走過的路上去，因為這樣邊界就離我們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近。沒有一個人有很多的話可說。

過了很久的時間，出租汽車停在一條長長的海灘旁邊。那兒有幾所小房子像夏天的別墅一樣，窗戶都用木板釘上，有一個小小的石碼頭伸到水裏去。我們看見一哩路開外有一個村子，其他什麼都沒有。出租汽車的司機喊着說：「[Cai Cai]（到了！到了！）」他用手作出一個鏟東西的姿勢，要我們下車。這時一陣寒風從寬闊的白色海灘上掠過，把潮水綫上面的遒勁的水草漾起了波紋。太陽現出蒼白的、水汪汪的樣子，風颳走了太陽散發出來的輕微的暖氣。

別的汽車一輛一輛地飛駛而來，到這兒停下，最後，這一夥二十五個人全部集合在海灘上了。每一隊在到達的時候都說着同樣的話：「到底是怎麼搞的？我們此刻停在什麼地方？船在哪兒呀？」喬埃對每一隊都回答說：「船就會開來，別着急。」

可是喬埃看去並不是很自在的。他心裏焦躁不安，屢屢地望着海面。海面上空空地什麼東西

都沒有。風颳得越來越厲害，風裏夾雜着許多細沙，把海灘上人們的眼睛和面孔都刺痛了；風、沙和耀眼的陽光，把他們的眼睛裏弄出淚水來。在那一片荒涼的海灘上，他們是非常惹人注目的；他們像許多燈塔一樣高聳在海灘上面。世界上每一個人都看見他們在那裏，都知道爲什麼他們在那裏。勃魯姆可以從他的巴黎的辦公室中俯瞰到他們，他知道他們是到西班牙去對法西斯匪徒作戰的美國人，並且他要派他的警察跑去逮捕他們。這兒是勃魯姆自己的區域，他的選區。他一定知道在他自己的選區那些光禿的白色海灘上所進行的一切。

比爾·迪默叫喊道，「嗨，哥兒！瞧我找到了一件什麼東西！」他的大手心裏拿着一個破舊的皮球。於是墨菲開始在海灘上跑起來，脫去了他的衣服，喊着說：「嚟呀！扔吧！扔給我，大個兒！」羅伊·洛克特一把抓住站在他旁邊的一個人，用腳把他絆倒，把他推到沙裏去，那個人把羅伊連他自己一道兒拖倒在沙裏，於是他們兩人便扭在一起。別的人也加入了這一場球戲。因爲這一個皮球太輕太破爛，在風裏玩起來非常不方便，於是他們都聚攏在迪默的周圍，望着他把石子塞進皮球裏面，用幾根繩子把它纏起。小弗里德曼拾到一根破繩，開始跳起繩來。一個法國人騎着一輛腳踏車從大路上飛馳而過，兩隻眼睛只顧盯牢了這些跑着、叫喊着和衝撞着的人們，因而車輪也弄得搖擺不定，幾乎把他摔下來。他鼓起下巴，輕輕地拍着他的額頭，大概心裏在想着：這些美國人真是發瘋了啊，他加緊蹬着腳踏車的踏板，胆怯地回頭望了一眼。

## 十二點鐘。

一點鐘。一點半。兩點鐘。喬埃在海灘別墅的走廊上踱來踱去，一面嘴裏哼着，一面磨拳擦掌，睜大了兩隻眼睛望着黝黑而空曠的海面。星星消失在從天空疾飛而過的烏雲後面，驟雨咚咚地打在別墅的屋頂上，一會兒停了，一會兒又下了。在上半夜，燈光曾經從海面上出現過一次，每個人看見了燈光都興奮起來，那位「教授」跑來跑去，豎起了和燈光成爲一條直綫的兩根木樁，嘴裏神秘地咕噥着。「教授」是加拿大的一位採礦工程師，一個細長的、紳士氣的小個子，有一撮潔淨的棕色的山羊鬍子。過了緊張的五分鐘以後，「教授」宣佈：燈光不是朝他們這方面來的，船正在八海里左右的地方朝着東南方移動。沒有一個人懂得他是怎麼會知道的，可是大家都相信他的話。一會兒燈光消失了。

喬埃說：「也許他們找不到地方。也許他們在黑暗中看不見我們。也許他們被出賣，警察把他們關在監獄裏面了……倘若我們在這兒等到早晨，所有的警察都要蜂擁而來追捕我們了。」

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喬埃說：「我得行動起來纔好。應該有人來了。竟然像這樣把我們丟在這裏……聽着，我現在去看一看那些守望的人是不是還在醒着。我要他們守望的，可是——」

「我跟你一道去，」我說。

於是我們沿着海灘走到最後一幢夏季別墅去。喬埃叫道：「沃伊科夫！克蒂斯！」

「有。我們在這兒。」

「你們看見了什麼沒有？」

「沒有。什麼也沒有看見。」

「你們多久以前到碼頭上去看過的？」

「沒有多久。我們再去看一下吧。」我聽到他們在走廊的階石上一跌一滑地走着。幾分鐘以後他們回來了，一面拚命地跑着一面喊叫道：「來呀，伙伴們！大家都來呀！船在這裏！船在這裏等着哪！」

在走廊上睡覺的人們都被踢醒了。每個人都往碼頭上跑去，在柔軟的沙上一絆一跌的，嘴裏興奮地亂罵着，因為船已經在那裏，而他們既不知道也沒有看見船開來。

## 船

這隻船有三十來呎長，船頭和船尾都是尖的，有一根單桅杆和一個一汽缸的發動機。這隻船上配置了兩個矮小的法國漁夫，那兩個人的身體雖然瘦削，但是倒很結實，像猴子一樣的輕捷。

站在碼頭上計算人數的喬埃，是最後上船的一個人。他用一種緊迫而小心的聲調說「Allez!」（走吧！）於是一個船夫從後船口跳下來，原來慢慢震動着的發動機已經加快了馬力。另一個漁夫把當作跳板的木板抽去。水在船尾沸騰起來。我們都感覺到船在我們下面移動着，一條黑色的碼頭和海岸漸漸模糊下去，漸漸消失了。

法國在我們後邊了。我們已經上了船，這船是載我們到西班牙去的。有些伙伴們嚴肅地互相握手，有些人在甲板上跳着，心裏暗自歡喜。他們站在甲板的周圍，盡量不讓第二個水手受到妨礙，那人正在扯起帆，用繩子很神秘地在那兒工作。他們都急切地希望他把他的工作早些做好，因為喬埃曾經向他們說，一旦開船，他就把食物拿來給大家吃。

喬埃用法國話和站在舵柄旁邊掌舵的人交談着。喬埃時時停頓住，把說的話匆忙翻譯出來給大家聽。那隻船把兩位法國同志弄得傷透了腦筋，一個發動機的汽缸不靈了，從清晨開始，他們把這件東西搞了一整天。再加上他們那個村子的村長是一個不友好的、疑心很重的人，曾經派憲兵來觀察他們，而他們又必須使那些憲兵感到滿意。所以他們向美國同志們道歉，請大夥兒原諒他們把船開來得這樣的遲。他們代表他們村子上的同志們向美國同志們致意。他們希望美國同志們知道這隻船是他們村子的黨支部募款購買的，這是法國同志們贈給正在對各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的西班牙人民的禮物。

伙伴們聽到這些話的時候，都說，「好極啦！」「好傢伙，真是了不起。」和舵手離得最近的人們輕輕地拍着他的肩膀，向他行了個敬禮。這隻船象徵了大量的金錢，而這些錢按照少數漁人、鐵路工人、教員、郵遞員、碼頭工人們的收入來計算，是一筆數目驚人的錢呢。大夥兒都曉得這一點。

前艙口射出一道朦朧的光來。另一個水手在下面船艙裏點起了一枝蠟燭，拿出一些麵包，一長條一長條的臘腸，圓圓的乾酪，一串串洋葱，一瓶瓶味道淡的紅酒。他把那些東西放在船艙的

地板上，擱在原來裝這些東西的麻布袋上面。他對從艙口欄板上垂涎欲滴地望着的一圈兒的頭嘻嘻地笑着，打着手勢招呼大家來吃。那個水手從他的皮帶下面取出一把刀子，切下一大塊一大塊的麵包、乾酪、意大利香腸，拿着一只小而扁的長頸酒瓶，從梯子上跳到甲板上來。

喬埃說：「每個人把他願意要的東西趕快拿去。我們得把蠟燭滅掉了。」大家聽了這句話便異口同聲地抗議起來，於是喬埃解釋說：「燭光從板縫裏透了出去。法國巡邏艇可能發現我們。法西斯匪徒也會發現我們。無論誰發現我們，我們都得要坐牢的。大家想想，值得碰運氣嗎？」

大家都沉默了起來，開始冷靜地想到被俘的危險了。「我拿到了我的一份，把蠟燭熄掉吧！」等一會，把酒瓶放到我在黑暗中摸得到的地方。「喂，讓我看一看我的嘴在哪兒。」「蒂尼，趕快，趕快些好不好？你聽到喬埃說的話沒有？」「都安排好了沒有，伙伴們？要吹滅了——撲！」於是整個船艙都沉浸在一片黑暗裏。

弗里德曼說：「喬埃，你問過他我們什麼時候到達嗎？」

「問過。他說他們通常開一趟船要六個鐘頭，可是今晚上要花去較長的時間，因為風開始迎面颳來，他們不能使帆，只能用發動機。」

「那樣我們要到天亮以後纔能到達了！」

「當然囉，」教授冷淡地說，「此刻約莫有三點鐘，再過六個鐘頭就是九點鐘……嘿，當我們駛近西班牙海岸的時候，太陽就會高高地昇到天空裏啦。」

墨菲的聲音蓋過了大家的嘈雜聲。他尖刻地說：「那可好啦！妙極啦！為什麼他們不能讓我

們坐在快艇上，偏要用這樣一隻破舊的平底船呢？」

「對，」蒂尼露骨地諷刺說，「他們應該借一隻遊艇來。也許洛克菲勒會把他的遊艇借給他們。再不然，一隻上好的戰艦也許對你更合適些吧？」

蒂尼的這一番話引起了哄堂大笑，可是墨菲仍舊頑固不化。他說：「一點也不錯。可是大家瞧一瞧，這有什麼意義呢？他們把錢花在木盆一樣的漏船上面，讓我們坐上這樣一隻船，被人俘擄了去。那有什麼好處呢？」

「住嘴！」蒂尼憤怒地叫喊起來。「我敢發誓，要是你再講下去，我就要——你以為倘若他們有一隻較好的船，他們會不讓我們坐嗎？他們已經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和我們大家一樣。法國人，西班牙人，他們不要這種戰爭，不是嗎？戰爭是找到他們頭上的。所以他們就不得不用他們所能得到的一切來作戰。這隻船當然不是頂好的，可是這是他們盡最大的可能得到的東西。你儘這樣嘀咕有什麼意思呢？」

「蒂尼，你對他講的確是實話！」「你說得好！」「把那個蠢才痛罵一頓！」

「來，伙伴們，」喬埃說，「趁我們還可以去上甲板去的時候上去站一站吧。一到天亮我們就不得不蹲到下面去了。」

大家東摔西倒地爬到甲板上，「喂，不要拉我的手！」「下面一個人上來。」「當心，不要把我推到水裏去！」「住嘴，伙伴們，不要吵鬧，聲音會在水面上傳開去的。」

暴風雨已經過去了，我獨自坐在船頭上眺望着閃爍的星光，看見白色的泡沫從船旁邊飛跑了

去。我睜大了眼睛望着右方，打算證實我能够瞥見那隱隱約約的比利牛斯山脈了。我不曉得喬比是不是在比利牛斯山裏，他是不是過去了，他是不是在某一個地方等着船。於是我的主要的心事浮上了心頭：真的沒有辦法早些到達西班牙嗎？有人把事情搞壞了嗎？是不是應該由我自個兒動手來做，而不只是照着別人吩咐的去做呢？我不讓我的不安再發展下去，極力忘却了這件事情，而開始想到瑪格麗特，想到家庭，想到在基地等候着的信件。

東方現出了一片光亮。喬埃叫道：「天亮了。我們得馬上鑽進船艙裏去。」比爾·迪默找到一隻吊桶和一根繩子，從船邊汲出一桶水。他說，他要把身上的沙土洗乾淨。「誰在乎這一點小小的風呢！」說着他就把他的襯衫脫下。他跳進水桶裏，弄得水嘩啦啦地響着，把水潑在他的頭上，赤裸裸的胸膛上、肩膀上。他用一塊肥皂在他的頭髮裏，臉上，脖子上，胸口上，腋下都擦過了。這塊肥皂是淡水的肥皂，放在海水裏就形成一種稠密的黏糊，不透水而且充滿了沙土。比爾亂罵起來：「這東西是怎麼搞的？它不起泡。也擦不上身。」

「教授」作了一番解釋，大家都把兩隻眼睛盯着比爾。他又唉聲嘆氣地罵起來。「誰有一把細齒梳子？」他問，於是便拿過一把梳子來把他的頭髮到處梳了一遍。「瞧，伙伴們。沙土都給梳出來了。你們的頭髮裏也都有這些沙土呀！」

這片光亮越來越擴大了。沒有任何人吩咐，大夥兒都跑進了船艙。由於大家都感到疲倦，不約而同地一律停止了說話，有的人已經睡熟了。



## 藍襯衫和粗棉布

陽光從船舷的縫裏透進來，射入敞開的艙口內。船艙裏面的空氣中充滿了從發動機上散發出來的汽油的氣味，油脂、腐魚、洋葱、小便、發霉的烟草的臭味以及人身上蒸發出來的汗味。伙件們都沒有睡多久，有的人根本沒有睡。他們都是倦眼惺忪的，走起路來一癱一拐，動不動就發脾氣。

小弗里德曼喊道：「啊！我可以看到比利牛斯山啦！我可以看到西班牙啦！」他把他的眼睛貼牢了船板的一個縫隙向外面望着。別的人都興奮地擠在他的身旁，哀求着讓他們也看一看，可是他仍舊貼牢了那個縫隙不放。他說：「你們自己去找一個洞洞吧。這是我的。走開！等我看够了再說。」

知道了他們真正望見了西班牙，在大家簡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他們在狹窄的船艙內嘈嘈雜雜地走來走去，大家同時講起話來，莫名其妙地大笑著。年輕的沃克因為不幸有一個尖聲尖氣的嗓子而被極不公平地稱作「姑娘」，雖然他也沒有別的特徵可以够得上這樣一個綽號。這時他找到了望得見比利牛斯山的第二個洞洞。他故意模仿着雜耍團叫客員招引看客的腔調說：「走上前來，先生們，看比利牛斯山，看西班牙，只要一角錢，只要十分錢，也不過一塊錢的十分之一就可以看

一看啊！」弗里德曼把他的洞縫讓給蒂尼，檢起兩根小棍子，把躺在船艙地板上面的一隻魚桶的桶底翻過來，咚咚咚咚地緊打了一陣子。「噠——噠，噠，噠，噠——噠，」他唱着。「我們到西班牙了！兵士們，排成一行！」

賴斯利向他吼了起來，「兵士們，排成一行，這是怎麼叫的？聽着！」賴斯利站得筆挺，腳跟卡搭一聲碰在一起，使足了勁喊着：「伙伴們，立——正！」

弗里德曼目不轉睛地望着他，眼睛發亮，帶着責備的神色。「得了，賴斯利，」他說，「我們會知道的。」

在上面甲板上，兩個法國同志中的一個把魚網鋪在框架上。他在假裝着補網，也許真是在補網，船艙裏面對船上事情一竅不通的外行們是不能確定的。他有時對船艙裏吵吵鬧鬧的美國人嘻嘻地笑着。接着，突然間他把身子彎在艙口上，用尖銳而激動的嗓子喊着喬埃。

喬埃說：「伙伴們，大家都不准說話，都閉住嘴！嘿，因為——發生了什麼事兒了！大夥兒都別作聲！」

大家馬上靜下來，急促地屏着氣，一面聽着。他們把艙口蓋輕輕地蓋上，頓時船艙裏變成了半黑暗的狀態。他們聽得到外面某處有一種震動得很快的聲音，空氣也受到波動。「這是柴油發動機的聲音，」「教授」低聲地說，「從聲音上判斷，這是一個很大的發動機呢。」

雷伊·洛克從縫口往外面偷看着。「我看見了，」他大聲說。「天，它就在我們旁邊！」那一隻船下面拍打的浪濤衝擊到這隻漁船上面，使它突然震盪了起來。雷伊記起應該用小聲音說話。「這

是隻大船，」他報告說。「這隻船是灰色的。我看不清楚旗子。他媽的這裂縫太小了……它正在停下！」

「心裏放輕鬆點，」我說。「別着急，伙伴們。這也許是不干涉的巡邏艇。大不了我們去坐一會牢。」

突然聽到鏈子轟隆轟隆地從錨鏈孔裏滑下的聲音。喬埃哼了一聲說：「啊，天，他們下錨了！大家都別吭聲，讓我聽一聽他們說些什麼話。」

那位法國同志漫不經心地坐在艙口蓋上，回答着從那隻巡邏艇上向他喊出的問話。喬埃低聲地氣喘喘地翻譯着。「他們向他要證件。另一位同志去拿證件了。」片時的沉默。兩隻船的發動機都停了。除了水拍打着船舷的聲音，擠在船艙裏的人們猛烈地喘着氣的聲音以外，其他什麼聲音都沒有。一會兒從巡邏艇上發出一個人的聲音。便有人問道：「他說的是什麼，喬埃？他說的是什麼？」

「讓我聽一聽！」喬埃小聲地說。「他們要知道船上裝的是什麼貨物。……傢具。法國同志說：傢具。」

「他媽的，」蒂尼喘了一口氣。「聽去就像是他和我們在同一隻船上一樣。」

「他的巡邏艇就靠在我們船的旁邊，」喬埃說。他凝神聽着。忽然他說：「伙伴們，馬上滾到兩邊去！趕快！」

「我們滾到什麼地方去呀？」墨菲發起牢騷來。「我們在這兒已經擠得像沙丁魚一樣啦。」

「閉住嘴，擠進去。擠緊些，同志們！他要那法國同志打開艙口蓋了。」

我們靠緊了船邊擠着，一直擠到船頭那邊去，離開艙口遠遠的。我們注視着艙口，極力屏住呼吸。一會兒一道光綫透了進來。我把頭抬起，看見一頂帶有金色條紋的便帽，一張顎骨很高的面孔，一撮濃密的紅鬍子。一隻手出現了，沉思似地摸着鬍子。艙口蓋又閤上了。

「一切都完蛋了，」喬埃說。他仍舊小聲地說話，伙伴們沒有一個人移動。「他正在奚落我們的同志呢。他說，『好個傢具！』『你在說謊，赤色分子；那是好漂亮的傢具呀！喂，把繩子拿起來，』他說。他們要把我們拖走啦。」

柴油發動機的轟轟的聲音打破了大家恍惚迷離的心情。船艙裏的人們搶着爬起身來，交談着，罵着，叫喊着。這時漁船突然微微傾斜了一下，開始從水裏迅速盪開了去。

「把你們的一切東西都撕掉，」喬埃說。「把所有的文件都撕去。喂，來一個人幫我一手。這裏有已經到西班牙去的幾個伙伴的名單。拿幾張名單去吧，我們得把這些名單吃下肚裏去，要趕快。」

喬埃用法國話朝着甲板喊道：「同志！我們可以把一些東西扔到水裏去嗎？」他聽着。「他們說坐下來不要動。他們得站在那裏把雙手舉起來……我們要被拖到一個法國港口去。喂，史迪夫，遞給我一塊紙糖。」

「那兩位法國同志會要碰到什麼情況呢？」沃克問道。

「跟我們一樣，坐牢。坐牢完了，出來，再開始做同樣的事情。」

蒂尼說：「瞧，史迪夫，我已經把一張紙嚼得稀爛了。現在我還得把它嚥下肚裏去嗎？」

「不。這樣就行啦。把它吐出來吧。」

弗里德曼氣呼呼地叫喊起來：「爲什麼你不早些說？我的一張紙已經吞下肚裏去了。」

喬埃說：「全體同志！不要忘記，我們是美國旅行家！他們審問我們的時候，每個人都要死咬住這句話。」

旅行家！真是了不起的旅行家！這些衣衫襤褸、骯髒的旅行家們，到天亮被捉到的時候原來都擠在一隻漁船的艙底啊！我向喬埃小聲地說：「我們得把說法改變一下啦。現在我們不能再說我們是旅行家了。那是很可笑的。」

「我知道那是很可笑的。可是我們不能擅自來更改這一個決議。」喬埃大聲地說，別的人馬上都來聽，他們的眼睛盯着這兩個被他們當做領導者的人。

「情況已經替我們把決議改變了。那一種說法對於這樣一種情況決不適合。我們應該告訴他們我們是前往西班牙的志願軍。」

格雷茨陰鬱地說：「我很詫異，同志。我們必須遵守決議。同志，這一點你應該曉得。」

「是的，不管一切，我們必須避免國際糾紛，」「教授」小心翼翼地說。「告訴他們我們是志願軍，那簡直要惹起一場可怕的亂子啦。」

弗里德曼說：「我看史迪夫的意見是正確的。巴黎委員會預料不到像這樣的事情。在村子裏說是旅行家倒還可以，可是這兒——」

「教授預料的對，」蒂尼說。「我們不能擅自——天，船停下了，我們糟啦！」

柴油發動機的轟轟的聲音已經停止了。我說，「同志們——」這時我咒罵自己不會預料到此種局面而事先有所準備。自從我們到船上以後，我們就會經想到被俘，擔心過被俘——而現在，在這千鈞一髮的最後關頭，真要被俘的時候，我們還辯論着應該怎麼辦哩。辯論，說服，在我的心頭撞來撞去。可是時間來不及啦。船幾乎一動也不動了。我接着說下去：「同志們，聽着。法國工人會支持我們。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他們怎麼能夠替一羣旅行家辯護呢？」

我知道我的話說得很笨拙。可是很多人都向我點頭表示同意。喬埃猶豫不決地說：「我們當然要變成一羣很古怪的旅行家啦。看去事情可能不致於那樣嚴重——可是仍然——」

艙口打開了。長着紅絡腮鬍子的人往下面望着我們，嘴裏說着話。「他說要我們到甲板上去，」喬埃翻譯說。

我迅速地移動脚步，打算首先走到梯子上去。現在我深信我們不得不採取新的策略來應付這種新的局勢了。

一個聲音說道：「天，我們要說些什麼呢？」

「對他們說老實話！」我回過頭去回答了一句。

漁船靠在巡邏艇的旁邊，巡邏艇繫在木頭碼頭的旁邊。在碼頭的對面是倉庫，在倉庫後面，一個市鎮座落在斜斜地伸到港口去的一個山腰裏。一架繩梯搭在巡邏艇的船邊上，這是一艘法國海軍艦艇。長着紅絡腮鬍子的人用手指着繩梯，我便攀登上去。另外兩個軍官在巡邏艇的甲板上

等着，一個人手裏拿着一個自動計算器。我從船邊走過去時，他把計算器撥得卡搭卡搭地響。另一個軍官搜查我的身上。他指着甲板上的一個地方，叫我站在那裏。別的人來到船上以後就都站在我的旁邊，排成單行。

人們走來聚攏在碼頭上，聚攏在倉庫旁邊的街道上。他們已經看到巡邏艇拖着另一隻船駛進港內。他們都很好奇。也許這兒附近有很多走私的事情。也許他們看慣了巡邏艇在早晨拖着走私的船進來。我俯瞰着碼頭上的人們。他們也目不轉睛地盯着我們，彼此用很低的聲調說着話，望着人們排隊站在政府的船上。

旁觀的人們大多數都是男子。他們越來越多了。差不多所有這些人都穿着藍襯衫和粗棉布衣服。很多人身上都有摺鉤掛在他們寬大的皮帶下面，他們都是碼頭工人。碼頭工人們，漁人們，趕大車的人們——那些穿着藍襯衫和粗棉布衣服的皮肤黝黑的人們，在我看來都是很善良的。

一羣憲兵站在碼頭上跳板下面等着。他們時時朝着站在他們背後的一羣穿藍襯衫的人們望上一眼。紅鬍子也不安心。他不斷地要他的部下趕快，要美國人趕快。

他打手勢要我們到跳板那邊去。穿着藍襯衫和粗棉布衣服的人們往前逼近，向着跳板擠來，想把囚犯們看得清楚些。

我在跳板附近停下脚步，把我的平頂帽從頭上抓去，揮起我的緊握的拳頭，高呼：

「Viva la Republica Española」（西班牙共和國萬歲！）

這時穿着藍襯衫和粗棉布衣服的人們也放開喉嚨，發出怒吼一般的響應：「Viva!」（萬歲！）

成百成千的拳頭高舉起來。喬埃和別的站在我後面的人們也都舉起拳頭喊着。喬埃高喊：「Vive le Front Populaire!」（人民陣綫萬歲！）羣衆響應的聲音在空氣中震盪了開去。一個憲兵跑上跳板，喝叱着拖住了我的胳膊。我跟着他走下甲板的過道，從穿着藍襯衫和粗棉布衣服的人們的行列中穿過去。

我們從這座古老市鎮的卵石路上走往監獄去。孩子們跑到大街上來，婦女們倚着窗口外望，男人們從商店中和小工廠中匆忙地走出來。我們昂着頭舉起拳頭行進，對那些男男女女和孩子們嘻嘻地笑着，一面高呼着：「西班牙共和國萬歲！人民陣綫萬歲！」

## 克雷普先生和領事

大鐵門上的便門猛地打開了，獄吏喊道：「達賴特！」

「什麼事？」喬埃一面聽一面問，便把話翻譯了出來：「美國領事在這裏。他要接見兩個能够代表我們團體的人。誰去？」

有六七個人的聲音回答說：「你和史迪夫去。」

「還有人提出別的人嗎？」

「沒有了——沒有了——就是你們兩個人行了——去吧。」



大門吱呀一聲開了。門和柏平雲監獄的其他部分大致一樣——笨重，古老，腐朽。我們是在登岸的港口的一個擁擠不堪的看守所裏過了一天以後，在昨天晚上被帶到柏平雲監獄來的；那一天，由於我們拒絕回答問題，想不起姓名、地址、旅館、日期——想不起任何事情，因而把當地的警官們氣得口噴白沫、面孔通紅。我們是坐在公共汽車上，每兩個人被鏈子扣在一起來到柏平雲監獄的。在公共汽車上，比爾·迪默解開了把他和羅伊·洛克特拴在一起的手銬，把手銬遞給了大吃一驚的警衛。

這一件事情嚇壞了柏平雲監獄的獄卒們。他們覺得這些美國人真是危險的傢伙！看吧，報紙不是把我們被捕的消息登在頭號標題上，甚至巴黎的報紙也是如此嗎？我們不是曾經煽動文德勒港的碼頭工人起來暴動嗎？而接着就是公然藐視警察，甚至藐視那一區域的行政長官——*par bleu*（天啊），當面罵他是法西斯特務，並且不讓警醫對所有進入看守所的囚犯們照老規矩注射疫苗。

「不，」那些瘋狂的美國人說，「不准你們把你們希特勒的細菌注射在我們的身上。」

領事在典獄長的私人辦公室內等候着。他是一個身材魁偉的年輕人，衣飾整潔，一張紅臉刮得非常乾淨。喬埃和我兩個人有三天沒有修面了，我們吃的也只是發霉的麵包和黑色的半冷不熱的水——那就是咖啡。領事向我們親切地問好。喬埃向領事自我介紹，並且介紹了我，我們兩人 and 領事握了一握手。

「這一位，」領事很斯文地說，「是克雷普先生，監獄的典獄長。」

喬埃和我對那個典獄長瞅了一眼，一句話也不說。領事的臉微微地紅了一些，急忙說：「坐

下，坐下，朋友們。喂，抽一根烟吧。」他遞過火來把我們的香烟燃着，就往後一仰，靠在他的椅背上，很世故地微笑着說：「喂，朋友們，你們也許想不到，可是你們這些人昨天在全世界的報紙上已經上了頭號標題了。」

喬埃說，「好啊，那末現在全世界都知道，在法國政府、佛朗哥以及不干涉委員會之間已經有了充分的合作啦。」

領事看去像是很苦惱的樣子，他不服氣似地舉起他的手，可是在他還沒有說話以前我就搶先說了，我說：「二十五個美國人要到共和西班牙去，被民主的法國政府逮捕了。這時，整團整團的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公開到西班牙去幫助佛朗哥——然而把這二十五個人上了頭號標題的報紙對於那整團整團的人竟然一字不提！」

「我對這件事情一點也不曉得，」領事說。「你們曉得，這終歸不在我的職分以內，」他說，泰然自若地笑着。「我只是來這裏看一看我能够替你們大夥兒盡點什麼力。」

「當然囉，」喬埃說。「我們是美國公民。我們希望根據法律我們有權利得到的充分保護。」

「哦，一定的。不用說……你們當然曉得你們已經違犯法國的法律了。這自然是法國法院的事情。」領事輕輕地咳嗽了一下。他從他的衣袋裏拿出一張摺疊的紙。「事實上，」他說，「我已經收到赫爾國務卿的一封無線電報，他叫我撤銷這個名單上的人們的護照。名單上的所有這些人都在這裏嗎？」他飛快地讀着名單，眼睛盯牢在名單上：「布萊爾，布拉凱斯利，卡彭特，達賴特……」

喬埃聽下去。他豎起眉毛來對領事諷刺地瞰了一眼。領事讀完名單以後，抬起頭來用一副期待的神色望着喬埃。喬埃說：「那末這就是你來給我們的幫助啦。」

領事擺起架子說：「我很抱歉。我倒樂意私人替你們做我能做的任何事情，可是那都是我奉到的命令。」

「看一看這種中立是怎樣實施的，倒也不錯呀，」喬埃說。「擁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反對共和西班牙。」

「政策不是我制定的，」領事惡狠狠地說。「凡是涉及法律的地方，我就沒有辦法。」他站了起來。「你們還有別的話要說嗎？」

「還有一件事。請叫典獄長允許我們寄一封信出去。」

「給誰？」

「給柏平雲人民陣線委員會。」

「你們不需要寫信給他們啦。他們剛才打過電話來。他們已經動身往這裏來了。」

「呀，好極啦！」我叫了出來。喬埃說：「他們的工作做得總算不錯。」領事好像把這句話當作對他的譴責一樣，他怒氣沖沖地對喬埃望了一眼，說：「現在，關於那些護照——」

「我們要保留那些護照，」喬埃說。「它們是我們的財產，我們不願拋棄它們。到我們必須回國的時候，我們就要用到它們啦。」

「聽着，朋友們，在這種事情上找麻煩是沒有益處的。你們要曉得，我們只須通知各地領事

館，就把你們的護照作廢了。那些護照橫豎不會對你們有什麼用處。」

「那是你的事，」喬埃簡單地說。「現在，在你沒有走開以前，還有一件事情。來這兒看一看我們住的牢房。」

領事好像誤會了喬埃的意思。他伶俐地說：「哦，那沒有必要啦。」說着戴上了他的帽子，一頂灰色的，刷得很乾淨，頂上凹得很漂亮的帽子。「我不需要去看別的孩子們啦。你可以把我說的話告訴他們。」

「不是去看那些孩子們，而是去看孩子們住的奇臭的洞穴。來，只花費你一分鐘的工夫。」

「現在我恐怕沒有時間啦。好，再會吧，朋友們。」

「怎麼啦？害怕你受不住惡臭吧？這個地方是世界上最骯髒的垃圾堆。就連豬住在裏面都不合適，且別說人了。」

「哦，可是，我——真的，朋友們，我怕無能為力。」說着他就從外面的一扇門溜走了，典獄長也跟着他一道兒出去。典獄長似乎急欲巴結美國領事館的那位紳士。

我們回到牢房裏，這種牢房在美國監獄裏叫做牛欄。這是六十呎見方的一個房間，在這房間裏，現在連美國人在內一共住了八十個人。地板是用磚塊砌成的，牆壁是用厚厚的灰色石塊砌成的，在靠近拱形屋頂的地方，有兩扇小小的窗子插進牆壁高處的石頭裏面。這個建築物在它變成一所監獄以前分明是被當做宗教上的用途的——也許是一所寺院。

屋內的一邊有一個小小的木頭台，看去像是一個講台，然而不是當做講台用的。喬埃却把它

當做演說者的講台了。美國人都聚攏來聽他的報告，很多爲了政治原因入獄的法國囚犯們也來聽他的報告。一個比利時人把喬埃的報告翻譯出來給法國囚犯們聽，這人穿着一身卡嘰布制服，一條笨重的大褲子像滑雪的褲子一樣束緊了褲腳。

喬埃把我們對領事說的關於中立法和干涉委員會的話告訴了大夥兒，他們都大聲喝采，笑着說：「那樣說得對！」當他報告說人民陣線委員會正在前來援助他們的時候，大家都快樂地叫喊起來。

在這牛欄裏，顯然已經分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集團：一面是政治犯們——美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不論哪一國的人；一邊是刑事犯和小偷們。這兩派人並沒有不友好的表現，他們在監獄的日常事務上是合作的，可是他們經常傾向於分裂。這時那一派「非政治犯們」都聚攏在這間大屋子一邊一只生了鏽的小煤爐附近。三個美國人向他們身邊走去。

一個人蹲在爐子旁邊。這人有四十來歲，皮膚黝黑，衣衫襤褸，瘦得教人害怕。他正在用他的右手去搔他的左胳膊，手裏拿着一件設計出來的東西——一把紮在一起的針，他用他的手在他整個胳膊上慢慢地一上一下地移動着。胳膊上被針刺得肉破血流。一個囚犯用法國話對喬埃說：「跟你現在看到的一樣，他每天都是這樣做的。」

那個蹲在地上的人聽了這句話後便把慢慢移動着的一隻手停了下來，把他的黯淡的、悲戚的眼睛轉過去望着三個美國人。他解開了他的襯衫上的釦子，把他的胸膛露出來對着他們。且不管他們看見了什麼，喬埃早已嚇得倒退了一步，低聲地說出很不敬的厭惡的話來。

「法國同志們說他在這兒已經有兩個月了。」弗里德曼說。「他的病況一天天壞下去。他們曾經請求典獄長把他搬出去，可是沒有結果。」

喬埃皺着眉頭，他又氣又厭惡，臉脹得通紅。他又開兩腿走回到一言不發的美國人身邊去，他們正在呆呆地望着那三個人。「蹲在煤爐旁邊的那傢伙，」喬埃突然說，「他是——是這樣——聽着，要是我們染上那正在腐蝕他的那種病，那末我們都要完蛋啦。也不要再談去西班牙，什麼都完了。」

「那個比利時人認爲這是梅毒，」教授說。「可是我覺得這應該是一種癩瘋病。我曾經看到——」

「不管是什麼病，」喬埃忿忿地喊着說，「我們必得把他搬出去！那人正在垮下去。他快要死啦！」

蒂尼說，「我提議由我們推出代表，馬上去和典獄長商量這件事情。」

大家都同意了。於是喬埃轉過臉去向那個比利時人說：「你們別同志們也都同意嗎？」

「當然。一定同意。我們也曾經抗議過。我們已經試過好多次了。我們願意支持你們採取的任何行動，不過——」比利時人富於表情地聳了一聳肩膀。

喬埃說，「同志們，我們怎樣着手呢？」

「我們首先把門咚咚地敲響。一面進行，一面再想別的辦法。現在我們就來敲門吧。」

於是我們敲門。鐵門反應出劇烈的響聲。便門打開了。獄卒氣得滿臉通紅，他用法國話咒罵

喬埃，要求停止這種騷擾。可是喬埃的臉更紅，氣得更兇，他用三種語言痛罵起來，喊的聲音比獄卒的還要高。獄卒嚇得退了回去。三分鐘以後，代表們又到典獄長的辦公室去了。

半小時以後，我們和典獄長一道回來。那位典獄長穿上他的官職的衣服，大禮服，戴着鑲有銀色條子的制帽。獄卒向囚犯們高喊立正，脫帽，做出一切可以看得見的尊敬的样子，因為柏平雲監獄的典獄長親身走進監獄的一部分來了。喬埃領着典獄長走到蹲在煤爐旁邊的那個不幸的人面前。「打開你的襯衫！」喬埃命令說。他轉過身來對典獄長說：「瞧吧！還需要我多說嗎？」

典獄長望了一會兒。於是他招呼那個病人站起來跟着他走。這時鐵門砰的一聲在典獄長、獄卒和那個病人的後面關上了。牛欄馬上陷入了一片混亂的狀態。各級的和各國的囚犯們都聯合起來慶祝這一次勝利，對於回過頭來望着他們的那個典獄長的一副蒼白的面孔抱着滿不在乎的態度。

## 監獄裏的人們

典獄長無可奈何地把他的雙手往上一揚。「你們是一種什麼人呀？」他叫道。「你，達賴特——你會說話，你好像受過教育，可是你替我們找了好多麻煩。你比我們的刑事犯還要壞許多倍。瞧，你離開你的本國，你到幾千哩路開外來干涉一個外國的內政。爲了要想偷偷地溜到西班牙去，你竟公然違犯法國的法律。既不曉得羞恥，又不懂得謙恭，你對執行法國法律的官吏們，對法國司

法的尊嚴一點尊敬也沒有。你用一種最無禮的方式搥打大門，你提高了嗓子叫喊典獄長，你提出不能實現的要求，你蹂躪我們的紀律，你敗壞我們的常規，你……」他把一隻累乏了的顫抖着的手放在額頭上。「柏平雲監獄從來也沒有碰到過像這樣的事情。從來沒有過。」

「我們並沒有要求把我們丟在這一個瘟疫窠裏，」喬埃堅定地說。「我們不需要向你說明我們的政治見解。我們所要求的只是過得去的待遇。你把八十人塞在不够容納四十人的一間牢房裏，而你的監獄有一半一直都不用，關閉起來省你的事。把它開放吧，讓人們分開住一住。」

「要是我這樣辦去，那末又怎樣呢？那末你會有更多的要求，新的要求！我曉得你，達賴特！接着你就會要求鴨絨被了，是不是？還是你情願乾脆離開監獄，住到最漂亮的旅館去呢？」

「是的，」喬埃說，「我們也需要吃一點好的東西，而不是你給我們吃的這種稀飯。」

典獄長向警衛無力地揮了一揮手。「把他們帶到第二牢房去。」他喘着氣說。「至少他們不再能够帶壞別的囚犯了。」

我們爭取到每天在院子裏多逗留半個鐘頭，利用這時間作體操，並在監獄內僅有的一個水龍頭下面洗衣服。我們已經贏得把那個台下面的髒罐子每天倒空兩次的權利，那個台看去像是演說者的講台，實際上不是的；我們又進一步得到在罐子被拿回牢房以前用石灰和石碳酸把它們消毒的權利。

因此我們的身體也較前好了些，而最重要的是加強了伙伴們的信心和團結的感覺。法國和別的「外國」囚犯們用敬畏和欽佩的心情看待我們。



從第三天起，我們每天收到由人民陣綫委員會送來成籃的食物。從第一天起，人民陣綫的律師格雷哥利先生每天都來看望我們，他正在替我們準備答辯。他是一個能幹而富於戰鬥精神的年輕人，他熱烈贊成他的訴訟委託人所採取的說實話的辦法，他高興有一個機會揭穿「中立」法的偽善和欺騙。他還帶來了香烟，他在我們對典獄長的經常的鬥爭中幫助我們。

在搬到我們的新牢房時，美國人感到了一件遺憾的事情——離開了別的國家的同志們，像阿斯都里亞人何塞就是一個。何塞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人，個兒不高，但身體很結實，非常愛笑，雖然他的深陷的眼睛帶着一個受過深重苦難的人的表情。他曾經當過礦工，水手，漁人，走私販，兵士，各行他都幹過。可是首先他是一個反法西斯戰士。因為他通常有一副自負的神氣，和海盜般的大言壯語，伙伴們都把他叫做「怪人」(El Fantastico)。他便接受了這個名字，並且以此自豪。當我們進入監獄時，他是首先歡迎我們的一個人，並且馬上就孜孜不倦地担負起教我們西班牙語文的任務——雖然他自己不會說英語。他用他的富於表情的手打着手勢，扭動着容易變動的臉來教我們，這一切都行不通的時候，他就把他所說的東西用粗糙的圖畫畫在一塊塊的紙上。

還有麥紐爾，一個皮膚黝黑，身體矮胖的傢伙。他的頭上紮了一根寬大的繃帶，裹住了在烏厄斯加附近亞拉岡戰綫上受到的一個開花彈的傷口。他受傷以後，他的哥哥來把他抬到安全地帶，但是自個兒却被一個法西斯狙擊兵射殺了。射死他哥哥的那顆子彈也穿進麥紐爾的胳膊，傷了他胳膊上的神經，因此他的手指頭就慢慢地萎縮了下去。因為他不能再在前綫上服役了，他便

志願担任嚮導，帶伙伴們通過比利牛斯山。他曾經帶領一批二十五個人從山上經過，其中二十人已經安全地越過了邊界，可是就在這時法國巡邏兵把另外五個人連同麥紐爾一道捉住了。在他敘述這個故事時，一想到那只差幾秒鐘便可以脫逃的情形，他總是要滴下眼淚，使勁地扭他的雙手。「只差三分鐘啊！」他嘆氣說。「再過三分鐘我就會安安全全的了。」

安全，就是說他又可以在一個夜晚，冒着生命的危險，引導志願軍們通過懸崖絕壁，越過一座座白雪皚皚的山峯走到西班牙去了。而現在他却在這兒坐了牢，並且爲這件事情哭泣着……

一個德國人、一個匈牙利人和三個意大利人是和麥紐爾一同被捕的五個人。在美國人到達的第二天，外國同志們發現了一個證據，證明在三個意大利人中有一個人是叛徒，是警探。那個比利時人替他預備了一個符號，上面寫着「暗探！」兩個字。另外一個意大利人故意裝出友好的姿態把那叛徒攔腰抱住，把那個符號貼在他的皮夾克的後面。他把這個符號佩戴了四個鐘頭，直到一名警衛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他。最後他從牢房裏被帶走，以後便永遠再看不見他了。

還有別的政治犯們。一個是法國人，他從戰爭的最初的日子起就駕駛卡車到西班牙去，卡車上裝的是貨箱，上面貼有「農場機器」字樣的籐條。最後，不可避免地，憲兵們追上把他捉住了。

當二十五個美國人站起隊來準備搬到新牢房時，他們向這些外國同志們告了別。這些人都是好人。他們曾經教給美國人一種生火的方法，使每天發下的十磅劣等煤炭可以燒上一整天。他們給雷伊·洛克一個打火機——盛着燒焦的布、一塊火石和一塊鋼片的盒子。一個德國人教小弗里

德曼用陳麵包做象棋的棋子——把它弄濕，捏成形狀，然後放在火爐上烤乾。

新牢房和原來的牢房差不多是一樣的，可是已經有多年沒有住人，因此裏面的臭氣要少些。我們搬進去以後，喬埃馬上就召集了一個會議。

「我們現在住得寬敞多啦，」他說，「也有很多時間啦。看情形我們在這兒至少還要呆上兩個星期，或許還要久些。我們得把我們的時間好好地利用一下，不能老是圍着坐在這裏呀……有什麼提議嗎？」

弗里德曼舉起手來。「有，」他說。「我覺得最好組織一些學習班——一種學校，由不同的人領導開談話會和討論會。我想那一種方式——」

「這是一個提議嗎？」

「是的。」

六七個人同時說起話來。喬埃說，「我們守一點秩序吧。讓我們先決定是不是要有一個學校，然後再討論它的內容。關於我們是不是要有一個學校，還得討論一下嗎？……大家對於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準備嗎？贊成的人請說一聲是。」於是一片聒耳的聲音喊出一聲「是」來。「有人反對嗎？……這個提議通過了。」喬埃指出墨菲、波勒和其他一兩個人既沒有表示贊成又沒有表示反對。他們在一旁觀望，沒有感覺，漠不關心。可是賴斯利却贊成要有一個學校。

這時，在籌備會議上，比爾·迪默當選為膳務員，負責公平分配人民陣綫委員會送來的食物，照料盤碟、飯盒。同時選出了一個室內委員會起草關於日常工作的計劃，並通過了下面的一

個作息時間表：

上午七點鐘：用雷伊·洛克吼叫的方式作為起牀號，他曾經在一個伐木的帳篷中工作，呼喊過「滾起來，要不然就滾蛋」！

七點到八點：整理牀鋪；運動（通稱「體操」）；早餐。

八點到九點：清掃地方，生火。

九點到十點：院內時間——洗衣服，洗澡（裹一塊破手巾把腰繫在水龍頭上去洗），遊戲。

十點到十二點半：上課時間。

十二點半到一點：午餐。

一點到兩點半：遊戲，下棋或其他任何娛樂的時間。

兩點半到三點半：聽講。

三點半到四點半：休息時間。

四點半到六點：遊戲或講故事。

六點到七點：晚餐。

下午七點正：熄燈號（這是監獄內警衛的恩典，他在這時熄燈）。

不可避免地，學校委員會多半處理人事的問題，詳細討論每一個同志的工作，他的才能和缺點，力圖想出辦法利用他們的才能和克服他們的缺點。

學習班快要結束了。最後一天，小個子弗里德曼作關於西班牙經濟地理的講演。那一天，他

和雷伊·洛克在體操時間內留在牢房裏；伙伴們作好體操回來後，發現有一段牆壁已經貼上了報紙，雷伊急切、忙亂而又非常興奮地站在那裏守着。

弗里德曼在全班人的前面就了位。他的一張臉孔堆在一叢長得很厲害的黑鬍子和鬆曲的下海上面，因急切和興奮而脹得通紅。一頁草稿在他的顛微微的手裏抖得颼颼地響着。

比爾·迪默叫道：「喂，你們中間誰來講演呀？坐下，伙伴們！」雷伊狠狠地回答說：「別說話！我們弄了一件專門準備好的東西來……小個子，準備好了嗎？」

「再過一分鐘，」弗里德曼不安地說。「同志們——」他咳嗽了一下。「同志們，我打算講一點西班牙的地理。這也許是有用處的。我——我們稍為準備了一下——盡可能準備了一下——」

雷伊壓住嗓子，嘶啞地說了一句：「你說什麼，一切都準備好了嗎？」

「好啦，雷伊。」

「開始啦，伙伴們！」雷伊用一種得意的姿勢把牆上的紙捲去，露出一幅炭畫的西班牙地圖。「瞧小個子畫的這幅地圖！好看不好看？」

他的臉上閃耀出對小個子的成就感到的驕傲。弗里德曼繼續講課，指點着西班牙的山脈、河流、工業中心、礦區、政府軍和法西斯匪徒所佔據的地帶、農業區域以及農民們生活和工作的情況。這是一次很好的講演。沒有一個教授在大學的一班學生面前能夠講得比他更熱心，更有責任感，更決心把他最大的能力都貢獻出來。大夥兒都在專心一志地聽着。

## 在法院的一天

檢察官和法國司法界的其他官員都體會到他們讓喬埃和我代表美國人發言是失策。他們希望拆散這個團體，然後再一個一個地來對付這些人。個別的審問是在我們入獄的第四天開始的，法官們狡猾地選擇了——他們是這樣想的——第一批受審的人們。

他們把從俄亥俄州來的三個小伙子傳去。這三個人一齊拒絕離開牢房。他們說：「你們把我們帶到哪裏去呀？這是幹什麼？」

典獄長曉得用傲慢無禮的態度對這些瘋狂的美國人產生不出很好的結果。「到塞勒去，到區法庭去，」他解釋說，「到那兒去受初審。命令已經下來了。」

「喬埃去嗎？」

「不。沒有命令他去。」

「不是喬埃替我們翻譯，我們不願意去，告訴他。」

「那兒有一個譯員，是一個官員。相信我，你們可以信賴的。你們的律師也要出庭。」

「律師不會說英語。譯員也不會懂得我們的英語。我們說的是工人階級的英語。我們要喬埃和我們一道兒去！」

典獄長眼睛一溜，望着天。「達賴特，」他懇求說。「叫他們來。作爲男子漢對男子漢，我懇求你，叫他們來吧！那個譯員是一個誠實人。你可以信賴的。就叫他們來吧！」

喬埃說：「孩子們，我料想沒有什麼關係。你們還是去的好。只是要記住：我們不認識在法國的任何人！還有他們想從我們嘴裏知道的是——委員會的名字，路綫和地方。不要把這些事情露給他們！」

俄亥俄州的小伙子們勉強地去了。過了三個鐘頭，牢房的門打開，讓人民陣綫委員會的那個愁眉苦臉的律師進來了。「達賴特！」他叫道。「那些年輕的小伙子，他們不相信我是他們的辯護律師；他們絲毫不願跟我合作。他們什麼也不曉得，他們不曉得他們是從哪兒來的，甚至他們連怎樣簽名也不曉得！法官大發脾氣。最後我問他們，倘若你出庭來担任翻譯，他們願意不願意說話。他們說，那正是他們的願望。他們說，那位譯員說的是『英國的』英語，而他們只懂得『美國的』英語。現在我開着我自己的汽車來到這兒。趁法官還沒有到忍耐不住的時候，跟我一道去吧。」

典獄長臉上帶一副死了心的神氣，就像是不能期望那些瘋狂的美國人改變態度的一個人的神情。此後，喬埃就陪伴着每一批人到塞勒去受審。

塞勒是法院的所在地，在柏平雲西南二十哩左右，在比利牛斯山麓。到法院去的來回路上，伙伴們可以在火車的車窗內望見近在眼前的山巒，距離是那樣的近，近得使他們離西班牙只有幾哩之遙。正像人們必然會談到的一樣，他們徒然地談論着怎樣把警衛制服，怎樣從火車裏面跳出

去，怎樣奪到一輛汽車或機器腳踏車，怎樣一口氣衝到邊境去。離開西班牙這樣近而依然又這樣遙遠，咫尺天涯，教人多麼痛苦啊！

第二天早上（在對付俄亥俄州的小伙子們有過經驗以後），喬埃、我，還有其他兩個人被傳去了。我們都被上了手銬，一根五呎長的鏈子把我們拴着。從監獄到火車站，經過柏平雲的熱鬧而狹窄的街道，我們得足足走上一哩路。由於不准我們修面，我們的樣子看去像是非常粗野的傢伙。可是柏平雲的人民並沒有把我們錯當做刑事犯，時時有一羣一羣的人聚攏來歡迎我們。我們也把「打倒法西斯主義」這個口號叫喊了出來。我們上火車的時候，警衛長說，這是我們最後一次打鎖上步行過去，今後我們就要坐公共汽車或出租汽車過去了。

當我們坐着火車向塞勒駛去的時候，我們凝視着那些山巒。不曉得我們還需要費多大力氣纔能越過山去，也不曉得我們究竟有沒有機會過去啊！

我們到達了法院，在那兒聚集了一小羣一小羣的市民。警察對我們說，我們得等待一會兒，因為法官還沒有來到。我們問他能不能讓我們在外邊太陽下面等待着，他答應了，允許我們在人行道上走來走去。

法院的隔壁有一所房屋，這所房屋有一扇臨街的吊窗，窗戶是開着的。在屋子裏面，一個女人正在忙着拭去一架大鋼琴上的灰塵。她向我們微笑着瞟了一眼，喬埃說這架鋼琴非常漂亮。她回答說，這是一架很好的鋼琴，問喬埃會不會彈。他說他會，於是那個女人馬上向警察說了一聲，要他把我們帶到她的屋子裏，把我們的手銬去掉。那個警察向她必恭必敬地行了個敬禮，服服貼



貼地照辦了。後來纔清楚她是地方警察局巡官的老婆。

喬埃脫去他的大衣，把袖子捲起，在他的一只碩大無比的烟斗裏裝滿了烟絲，把烟燃着以後便坐在鋼琴旁邊開始彈起來。他彈了幾支蕭邦的樂曲，最後彈的是馬賽曲。幾分鐘以內，除了音樂以外他把一切都忘得一乾二淨了。人們開始圍上前來，屋子裏，敞開的窗戶外面，擠滿了一大羣警察和過路的人，還有助理檢察官和別的官兒們。喬埃彈完的時候，他們都一齊熱烈地喝起采來。一個攝影記者跑上去，請求喬埃再在鋼琴旁邊坐下，讓他用鎂光燈替他拍一張照。這件事把喬埃弄得很窘，可是後來證明這樣做倒還不錯，因為第二天地方報紙甚至連反動報紙在內都發表了社評，說這些美國人乍看去好像是變得沒有感情的犯人，却不料是有文化的人。那些報紙並把喬埃在警察巡官的私人住宅內的演奏描寫了一番。他們也和典獄長先前那樣弄得張皇失措，這是他們原先想不到的。

這件偶然的事情也使我對喬埃的性格有了新的發現。我認識喬埃已經很久，可是我一向不知道喬埃是一個天才的鋼琴家。坐在火車上回到柏平雲的時候，我也把這樣的話對他講了。

他把臉轉過去，皺着眉頭。「那又怎麼樣呢？」他大聲大氣地說，「比彈鋼琴重要的事多着哪。」

「你一直在瞞着我們。」

喬埃說：「傻瓜，你以為我喜歡到處炫耀自己，讓同志們曉得我是一個他媽的上等人，像那許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樣嗎？使他們覺得我比任何人都了不起些，因為我有機會學音樂，而他

們就從來沒有這樣的機會嗎？」

我不回答了。關於喬埃的許多事情，我現在都突然明白過來。他的「硬幫幫」的樣子，他的說話的方式——故意的粗俗，故意的不講究文法——那種粗魯在別人身上，比方在蒂尼或比爾·迪默的身上，就會被人不經意地忽略過去的，但是在喬埃嘴裏，就微微有一點矯揉做作的樣子。過去我以為這種可笑的情景是由於喬埃的激烈，由於他的真摯的性格，現在我纔知道喬埃的那種樣子只是一個烟幕，把他認為可恥的一些東西都掩飾起來了，他偽裝得那麼巧妙，甚至像我這樣對他的了解不亞於任何的一個人也從來沒有窺破過。

喬埃向前躬着身子，深深地皺起眉頭來望着窗戶，把兩隻手放在一起搓來搓去。他說，「關於我的許多事情你都不曉得。許多事情我從來都沒有談過。我——你知道，我的老朋友——原是有錢的。說起來，現在還是一樣。我是怎樣一個出身——唉，你可以想像得到的。」他呪罵着，呆呆地望着那一叢山巒。「你知道，遠在一九二八年的時候，我就走遍這個國土。」

「他媽的，你胡說！」

「真的，朋友，我現在老實告訴你。過去我確實是這樣做排場的。頂好的旅館，頂漂亮的飯店，上等的美酒……我記得，就在柏平雲——嘿，別再提起了。也正是爲了那一個緣故，那一天我對那個討厭的典獄長說，對於工人階級來說，什麼都不能算是太好的——他媽的，爲了忍住笑我幾乎把肚皮都脹破了。八年以前，要是我能够看清自己多好啊——在那些日子裏，我的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享樂的生活。這就是我那時候說的。我遊遍了這裏——遊遍了歐洲，就爲了那一

點——而我實際上根本什麼都沒有看見。人民——我不知道有他們存在。拿掌管制動機的作個比方吧，在我看來，他只是火車的一個零件，就像機車、門或者座位一樣。招待員只是善阿諛的僕役。實際上他們也是人類，他們有妻子、家庭和各種問題，他們是活潑的，有趣的，值得去了解——可是這些問題恰好我從來都沒有想到過。想一想吧，千百萬人被我忽略過去，而不知道他們在那裏！就像生活在一個肥皂泡裏面一樣……我告訴你，一想到那些日子我就渾身起雞皮疙瘩！」

喬埃又說：「喂，史迪夫，關於這件事情，請你不要對別的伙伴說起，好嗎？」

「好的，我不說。我總有點覺得有些事情，是什麼事情我不知道。典獄長也有同樣的感覺。可是喬埃，我認爲你不應該——」我選擇了最引起注意的一個字眼，「對這件事情這樣機械。你所做的事情是打算掩飾你的過去，把任何事情都拋棄掉，甚至音樂。那是愚蠢的。你把一些好事情跟壞事情一塊兒丟掉。這一個運動是要參加運動的人把最好的東西獻出來，比方說，得到你的音樂才能。否認這一點，就和否認你的閱讀和寫作的的能力，或者否認你說法國話的能力同樣愚蠢。」

「是的，我開始明白啦。」

「你要明白你這樣做也是冒險的，是不是？我說——唔，以前我還知道另一個人的故事。他是一個教員——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他參加了這個運動以後，馬上就穿上了一件藍襯衫，嘴角裏裝出上裏士氣的口音。他拚命地要裝做個無產階級啦。大伙兒都看出這是假裝的，於是他就及時取消了這種偽裝，不然的話，他就會把他可能具備的一切長處都要喪失了。你拿「教授」作個比方吧，他絲毫假裝都沒有，只是他的本來面目——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他們的確是在開他的玩

笑，叫他「教授」，可是他們却喜歡他，也尊敬他。」

一個星期過去了。兩個星期過去了。兩個星期又兩天過去了。在第十七天上，整個兒二十個美國人都被一道送到塞勒受審去了。

在那一天早上，牢房裏的空氣彷彿都緊張得顫抖了起來。比爾·迪默從他的膳務員工作中已經養成了發號施令的習慣，這時他非常積極地負責籌備工作。他決定使大伙兒在外表上要好看——至少盡可能地好看。他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組織」到了一個保險剃刀片，他使用這個刀片替每個人剪頭髮，剃去頸脖子上和耳朵周圍的毛渣子。他們在前一天已經在水龍頭下面洗好他們的襯衫，現在比爾又動手去熨平那些衣服，至少把衣領和顯眼的地方燙平，方法就是把濕衣服緊貼在火爐的烟筒上面。

「把地板都擦乾淨，你們這些蠢貨！」他叫着說。「我們得把一切都弄得乾乾淨淨的。今晚我們回到這裏來的時候——要是我們今晚回來的話——我們要開一次慶祝會。我們得把一切東西都弄得好看。」

別人都從他那裏感染上了過節的心情。「教授」和俄亥俄州的小伙子們把報紙撕成一條條，浸入用紅磚粉末染紅的水裏。於是紙條微微地現出了淡紅的顏色。可是他們已經盡可能做到使它近於紅色縐紙的飄帶了。他們把他們的飄帶裝飾在牆上，伙伴們都高興得歡呼起來。

只有墨菲和賴斯利不願參加。墨菲對着比爾的歡呼回答說：「我不幹。我不去打掃這個虱子

洞。讓他們僱一個照管房屋的人吧。要是他們不高興，他們可以讓我去，我並沒有要求他們把我放在這裏呀。」

比爾好奇地瞪着眼睛看他。「好，你這傢伙，」他說，「你就做一個虱子吧，要是這樣對你更合適的話。」

伙伴們都記得在港埠的經驗，他們安排在經過柏平雲到車站的路上舉行一次示威遊行。可是警察也學乖了。一輛輛的公共汽車都停在監獄的門口，美國人被亂推進汽車，開到火車站去。儘管如此，車站前面已聚集了一大羣人，火車在從月台上發出的一陣歡呼和歌聲中開走了。

在塞勒，人民陣綫委員會動員了市民來歡迎美國的戰士們。他們都排隊站在大街上，站滿了人行道。警察領着我們這隊伍走向小街，走進狹窄的僻巷去，那裏只有狗和迷路的貓纔看到這一個示威的行列。然而伙伴們依舊唱着歌行進。

但是要到法院去必須走進大街，羣衆都在那兒等待着。美國人一出現，羣衆中就爆發出一陣怒吼的聲音：「Vive l'Espagne! Vive les Brigades Internationales!」（西班牙萬歲！國際縱隊萬歲！）

三百人擠滿了小小的法庭，美國人從窗戶裏面可以看到法院外面的人越聚越多。法官們——三個道貌岸然的戴假髮的紳士，也發覺羣衆聚集在那裏了。他們對法庭左右上下怯生生地瞟了一眼，又瞟着窗戶外面，瞟着在他們前面像是陪審席的被告席上坐着的囚犯們。他們互相悄悄地說

着話，又向法院的職員低語着。他們都急欲開庭。

法官們毫不猶豫地同意了法律辯護人的要求，讓喬埃代表整個團體發言。他們向喬埃詢問兩個問題。

「你們是美國人嗎？」

「是的，是美國人和加拿大人。」

「你們爲什麼到法國來？」

「爲了要到西班牙去，參加政府軍對法西斯匪徒的戰爭。」

他回答的最後一句話被響徹法庭的暴風雨似的歡呼聲淹沒了。法官們揮手要求肅靜，檢察官皺着眉頭，法警喝着，恫嚇着——但人們還是繼續不斷地歡呼着。

對於事實和法律方面雙方都沒有爭辯。因此這一場審訊只包括檢察官和被告辯護人雙方的演說。美國人凝神地聽着他們的法國辯護律師所發表的演說。他所說的話他們一個字也聽不懂，可是非常明顯地，這個人是盡心竭力地在提出他的論據。他不是法庭上答辯的律師，他是用全副精神和力量對敵人鬥爭的一個反法西斯的戰士。

後來，喬埃從一家法國報紙上把他的一部分演說翻譯了出來。

「法律有種種不同，」那位律師說。「罪行也有種種不同。他們所犯的是政治的罪行——就是他們愛自由，愛民主，愛和平。我願意在這個法庭的前面向這些美國人致敬，他們離開了他們的國土、工作、家庭和朋友，去爲他們的理想而鬥爭。所以每一個忠誠的法國人都應該尊敬他們；

這些自由和民主的理想，難道跟法國都沒有關係嗎？爲了法國和人類的榮譽，我請求法庭在這案件上依法寬大處理。」

在他演說完畢以後，囚犯們都被押到休息室去，留下法官們在考慮他們的判決。辯護律師和囚犯們一道，他們都擠在他的周圍，捶着他的背喊道：「了不起！了不起！啊，真是了不起！朋友，你做的真教人滿意！」他們的誇獎使他感到非常高興，他對他們嘻嘻地笑着。他對喬埃迅速地談着話。

「辯護律師說，」喬埃報告說，「當美國領事要求把我們的護照交給他的時候，法官們完全拒絕了他的要求。他們和我們的律師抱着同樣的見解——護照是這個案件中的一部分材料，應該由法院保存的。美國領事簡直氣炸了，他急匆匆地跑開了去，並且恫嚇着說要向國務院提出這個問題。我們的律師又說——啊，孩子，真教人開心！——聽着，伙伴們，他說漁船上的那兩個法國同志已經得到緩刑判決了！每人兩個月！」

他們都歡呼了起來。辯護律師匆匆地跑出去，馬上又回來，帶來了人民陣綫委員會送給我們的禮物——香烟和糖果。十分鐘內，喬埃和辯護律師被召回到法庭上去。通常所有的囚犯們都是要被帶到法庭上去聽候判決的，但是這一次法官們顯然害怕碰到一次示威運動。

一秒鐘一秒鐘地捱過，緊張而又教人坐立不安。一會兒門打開了。喬埃滿面笑容，忽然又把臉繃起來，模仿法官的嚴肅腔調說：「爲了違犯法國法律和法國簽署的一個國際協定，因此啊，所以啊，把你們判決二十一天的監禁……再過三天就出去，伙伴們！然後再過八天離開法國！」

## 詛咒日出

我夢見了一隻啄木鳥在啄擊着波科諾山上獵帳外的死松樹的樁，醒來的時候纔發覺有人在輕輕地、連續不斷地敲打着旅館房間的門。屋子裏面已經黑下來，我纔知道我已經睡了一整天了。我一骨碌從牀上起來，一聲不響地走到門口，問道：「誰呀？」

「迪維特。」

我把門扭開，讓委員會的人進來，然後再把門鎖上。迪維特笑嘻嘻地望着我，說：「怎麼樣啦，同志？」

「很好。我睡着啦。我在洗澡盆裏躺了足足兩個鐘頭。我覺得世界上從來沒有一件東西像那一盆熱水那樣的教人舒服。」

「好啦。你覺得行了嗎？」

「當然行了。爲什麼？要我……」

「是的。今天夜裏。馬上。穿上你的衣服，讓我告訴你。」

我的手打起抖來。我挺着身上的筋肉來止住這種顫抖，勉強做出很安心而又很隨便的樣子。

我問他：「伙伴們怎樣啦？」



「很好。我剛纔離開他們。他們正在開會哩。三個人——墨菲，我想——」

「是的，我曉得你指的是哪三個人。發生什麼事啦？」

「他們今天早上忽然躲開，你知道，就在你們從監獄裏出來的那一刻。他們跑出去鬧酒，在一個咖啡店裏喝得爛醉，可是沒有錢付賬。咖啡店的人去找人民陣綫委員會，由委員會派人來把他們帶走，交給了你們的團體。所以他們召集了一個會議。唉，大家都氣得要死！」

「他們通過決議，把三個人統統開除。其中一個醉漢——年紀大些的傢伙，禿頂的……」  
「賴斯利。」

「他打算爲自己挽回局面說：『是的，伙伴們，你們說得對，我們是不配到西班牙去的。』可是喬埃却不讓他瞞混過去。好傢伙，他竟把他們開除了！這比鞭打還厲害哪！」

「你們怎樣處置他們呢？」

「委員會將要幫助他們在船上找一個工作，把他們送回美國去。在這段時期內，我們得花很多錢養活他們……」

我在繫鞋帶子，然後站了起來，期待地望着迪維特。他說：「準備停當了嗎？好，事情就是這樣：我們離開這裏，你一直跟在我的後面，離開我大約二十碼光景。我們有一個人站在公共廣場上噴水池附近的一個地方。我們到那裏以後，我便伸出我的左手來——像這樣——對準那個人指着。那個人的老婆和他在一塊。他們一看到我便要開始移動脚步。這時你便緊跟着他們。我還是照常走我的路——走出公園去，下一次我們便要在西班牙見面啦。」

我們握了握手。迪維特說：「祝福你，同志……哦，我幾乎都忘記啦，把這點東西拿下吧。」他掏出一個小紙包，說：「這兒是一點麵包、乾酪和乾魚。別聽別人的話把它丟掉啦。東西沒有多少，但你是需要的……好，我們走吧。」

街道黑黝黝的，只有煤氣燈下面的一圈搖曳不定的黃色的光亮。迪維特的脚步緩慢得真教人受不住。他在街上踟躕着，慢吞吞地移動步子，像蝸牛蠕動一樣；一會兒他停下來——教人奇怪又教人生氣——在他的鞋後跟上敲他的烟斗。一會兒他又轉過一個街角，這時我心裏突然驚慌起來，爲了害怕看不見他的背影，我就半跑半走地在他的後面緊追，險些兒完全碰到他的脊梁了。

狼狽的情形把我弄的滿臉通紅，我流着汗，摸着我的領帶，低聲地咒罵着，眼睛盯牢了一家屠宰店的招牌。上面畫着一個馬頭……這表示那兒有馬肉出賣。迪維特這時還是在我前面二十碼的地方嗎？讓他多走三步吧。現在……

我們走近公園了。我睜大了眼睛打迪維特的頭上望過去，看見一對男女正在噴水池旁邊踱來踱去。我相信他們就是迪維特說的那兩個人，因爲公園裏再沒有別的人了。可是我害怕把眼睛瞟着別處，連眨一眨眼都不敢，深恐沒看到弗蘭克的一些手勢。當迪維特走近的時候，那一對男女開始移動他們的脚步了。迪維特的兩手插在衣袋裏，離開那一對男女，折到噴水池的右邊去。然後他把兩隻手從衣袋裏掏出來，伸出他的胳膊，左手指着那一個男人，右手彎起握緊，行了一個反法西斯敬禮。我把我的手放在我的平頂帽上，希望迪維特回過頭來望一望。可是他並沒有回過頭來，而從一條小路上往右邊走去了。

那一對男女在噴水池旁邊兜了一轉，然後慢慢地走開。我就老實實地跟在他們的後面，又打我來時的那條小路走回來。我心裏想：要是有人留心望着我，我一定是露出傻頭傻腦的樣子的。我的領口太緊，我的心砰砰地跳，像剛剛賽跑過一樣。一個警察突然在一個牆角裏出現：感謝上帝！那個警察甚至對我連看也沒有看，就打我身邊過去了。

那個女人岔到僻巷裏去了，現在我只單獨跟隨着那個男人。不久我聽到我背後有腳步聲音。回過頭去看時，那個女人又走到我的後面了，大概是要使得我們不至於被人在後面釘梢，並使得我不至於迷了路吧。

我們走過了最後一盞路燈和最後幾幢房屋，此刻走上鄉間的道路了。這是一條白茫茫的公路，兩旁長着高大的白楊樹。月光從白楊的光禿的樹枝間篩下來，在公路上映出斑駁的白光。我曾經從火車的車窗裏看見過這條路——也許是和它類似的一條路。這一對男女是往西南去的。我相信他們是往西南去的，往比利牛斯山去的，往西班牙去的。

離市鎮半哩路的地方有一個農舍，過了這農舍什麼也沒有了，有的只是遼闊的平原、山脈和西班牙。要是那個男人走過這農舍，那麼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我們當然要向山脈那邊走去啦。不要朝那所農舍走去，先生。不要走進去，接着向前走吧！

可是那個男人偏偏轉過身朝那所農舍走去了。

房屋是漆黑的，但是頃刻間從一扇半掩着的門內閃出一道燈光來。那個男人又走回到場上，對我招手，於是我便飛快地向那所房屋跑去。那個男人在我進去以後把門關好，然後伸出他的手

來，說：「Eh, camarade!」（你好，同志！）他是一個高大的漢子，手硬幫幫的，手上起了許多老繭，肩胛現出下陷和僵硬的样子，這是歷年艱苦而沉重的工作造成的結果。

那個女人也溜進來了。這是一個矮小的女人，她的淺黑的可愛的臉龐由於激動而泛出了紅暈。她興奮和快樂得吃吃地笑着。她的話像冰雹一樣對我喋喋不休地講出來。我無可奈何地伸出兩隻手，說：「No parlay—Francaisi!」（不會講——法國話——）

她起初感到懊喪而又苦惱，接着又快活起來，再度嘗試了一下。這一次說的是西班牙話，但我依舊搖搖頭。於是我滿懷希望地問道：「Verstehen Sie Deutsch?」（您會說德國話嗎？）可是這樣也無濟於事。最後我們只有倚靠手勢來說話了。那個男人指着他的張開的嘴，左右擺動他的下巴，咀嚼着，然後把他的眉毛皺成一個問號。這時我纔點了點頭說：「要的，當然要的，oui, oui!」

那個女人把食物：麵包和酒，乾酪和臘腸都拿來了，他們站在一旁望着我在吃，我也向他們望着，希望從手勢上知道那個男人準備當夜就讓我動身。那人已經脫下他的便帽和大衣。可是那沒有關係；他會再穿戴上的呀。他點起了烟斗，伸直了腿很自在的躺在椅子上。可是那沒有關係；他正在休息呀。

那個男人向我招了一招手，把我引到一間小屋子裏——一間臥室裏。他指着牀，又指着我，然後把他的一隻手貼在臉上，作出睡着的樣子。我的臉突然沉下去，心裏感到非常頹喪。那位法國同志注意到我的憂鬱的樣子，極力想辦法教我高興；他用手戳了一戳牀，叫道：「Bon! Bon!

Ah, bon!」（舒服極啦！舒服極啦！啊，舒服極啦！）

我用力指着這間屋子南面的牆壁，說：「Españal Me, España. Huh?」（西班牙！我，西班牙。嗯？）那個法國人搖一搖頭，又表演一下把手貼在臉上的姿勢，指點着要我睡覺。他帶緊了門，把我一個人丟下走了。

多妙的事情！多妙的事情呀！我並不想睡覺，我已經睡了一整天了。我心裏所想的就是要到西班牙去！這簡直像腳踏車<sup>⊖</sup>的一樣；你得整個兒搭上齒輪，你得拚命地飛跑着，可是跑來跑去還是在老地方。好，現在我在這兒，在一個法國的農舍裏，翻來覆去、心亂如麻地度過一個通夜，當我可能已經到達西班牙的時候，又浪費了一天一夜。拖延，拖延，拖延哪！達賴特，親愛的好喬埃，他們那天早晨突然把他帶走了，不讓我稍微有一點機會跟他道別，眨一眨眼，點一點頭，揮一揮手，就這樣完事了，爲的什麼呢？爲的是這樣便可以使我好好地酣睡一覺。睡眠能够把人帶到什麼地方去呢？在我已經睡了一整天以後，我又怎樣再能睡着啊？

我睡着了。

醒來的時候，我看見窗帷上有一道明亮的陽光，聽到隔壁屋子裏盆碟劈劈啪啪互相碰擊的聲音。主婦把鍋盤一類東西弄出很多的聲響。這是一個文雅的暗示：同志，已經到了起牀的時候啦。

她的丈夫早已上工去了。她說：「Travail. Ah, ouï!」（工作。啊，是呀！）她在廚房裏忙來忙

⊖ 一種在圓木上安有齒輪的踏車，是從前監獄內囚犯們踩踏的。——譯者

去，這是一間明亮的房間，潔白，乾淨，發着光。這間廚房在外表上把這所房屋主婦的性格完全反映了出來。她總是忘記了我不會說法國話；她一面在工作，一面拉雜地對我談着，然後，忽然想起了似地，她大叫一聲，兩隻胳膊失望地垂了下去，作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憤憤地笑着這樣愚蠢的同志竟連一句話也不懂。

毫無辦法。我也不敢到門外去露一露臉，就這樣度日如年地捱下去。

日頭快落山的時候，那個男人下工回來了。他騎着一輛腳踏車，露出很興奮的樣子。他一進屋子就跳了一遭很別緻的舞蹈，他的脚一起一落，好像地板燙人似的。同時他瞪起他的眼睛，對我說着法國話。我一點也不懂他說什麼。最後他抓着他的頭髮，稍稍兒嚷叫了一下，又跑到場上去，把一輛腳踏車扶進屋裏，拍一拍腳踏車，指一指我，又皺起他的眉毛對我示意。他想知道我會不會騎腳踏車。我說會的。可是這樣的談話還只是一個開端。用全副精神努力了半個鐘點以後，最後纔弄明白：除非在七點鐘的時候有一個人坐在一輛機器腳踏車（「噠噠——噠噠——噠噠」）來接我，否則那個法國人和我就要騎腳踏車動身了。

我們吃了晚飯——一大塊馬肉和烤朝鮮薊，味道好得很。時針看去一動也不動，忽然已經六點三刻了。我呆呆地望着窗戶外面，豎起耳朵來聽着有沒有機器腳踏車的聲音。我想起我的剃刀、牙刷和迪維特給我的那一個小包，於是我跑去把它們拿來。那個小包放不進我的衣袋，我一個一個衣袋都試過了。突然間那個法國人來敲我的門，在門外呼喚我，我不禁慌裏慌張地急躁起來。我的兩隻手顫抖着把小包繫在我的腰帶上，抓起我的平頂帽就跑進另外一個房間去，這時正當一

輛機器腳踏車停在這所房屋旁邊的大路上。那個法國人把門打開，向那輛機器腳踏車揮了一揮手，就指點着叫我到機器腳踏車那邊去。我在門口沒耽擱多久，只够和我的主人握一握手的工夫，這時女主人也匆匆地跑來，她的兩隻手裏各拿了一只蘋果，把它們都塞進我的衣袋裏面，她用她的兩隻手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她和她的丈夫都使勁擁抱我。

他們兩人同時說着話。我只聽懂「同志」這個字眼——一遍又一遍的「同志」。於是我跑到機器腳踏車旁邊去，回過頭望着，向他們行了個敬禮。

機器腳踏車駕駛員是個只有二十來歲的年輕小伙子。他穿着一件皮短外衣和一條黑色的舊褲子，褲腳管用繩紮在腳踝骨上。他笑容滿面地向我伸出一隻油膩的手來，用手勢比畫着，叫我在後面。機器腳踏車有一個單汽缸的發動機。我真想不出：那一個小小的汽缸怎能把我們帶過比利牛斯山去呢？但是我終於坐上了。那個人用腳踩動了馬達，車子嘎噠——嘎——嘎地響起來，我們便開足了馬力飛馳而去。在黑暗中崎嶇不平的路上，我們好像一小時走上了一百哩。我抱住了那個法國人的腰，把我的臉躲在他的背後，不讓風吹我的眼睛，並且等待着車子嘩啦一聲撞壞掉。可是車身並沒有撞到什麼，過了一會兒，我才斷定我們的車子行駛的速度一小時沒有超過三十哩。於是我坐正了身子，向周圍望了一下。

我們從一些小農村裏飛駛了過去，那一個單汽缸的發動機像一部縫紉機似的發出突突的聲音。我們似乎走的是小路，而把大路岔開了，但我相信總的方向是朝西南去，朝比利牛斯山麓的塞勒市去的。到了一個小鎮上時，駕駛員停下來向當地的一個警察詢問方向。我戰戰兢兢地在一

旁聽着，不料那個警察很有禮貌地給指了路。我把眼睛望着地上，不敢正看那個警察一眼。

約莫過了半個鐘頭以後，我們駛上了一座石橋，這座橋高跨在一條狹窄的溪流上面，那兒有幾個法國人正在街燈的昏黃的光亮下面釣着魚。稍稍再往前去，我們看見了停在路上的幾輛汽車的尾燈。這時我們的機器腳踏車放慢了速度，終於停下來。駕駛員揮一揮手叫我走下車去，指着生長在路旁的那一叢灌木。於是我便飛跑過去，躲在灌木裏面，把身子緊緊地靠在地面上。我相信那些汽車都是警車。這時機器腳踏車又開動起來，一會兒又息下去，掉轉了頭，靠近我藏躲的地方停下了。

「Camarade! Ici! Ici! C'est bien! No gendarmes!」（同志！這裏！這裏！好啦！沒事啦！不是憲兵。）那些汽車開動了，我們的機器腳踏車就跟在它們的後面。過了二十分鐘光景，汽車又停下來，車燈也突然熄滅了。駕駛員說：「Allez, allez!」（走，走！）一面推我走下車去，一面指着大路右邊的田野。

我趕忙跑到田野裏去，一點也不知道究竟爲了什麼事情，只有極力服從命令。我聽到靠近左邊有脚步聲音，是原先坐在汽車裏的那些人的脚步。忽然我給一件軟綿綿的東西絆倒了，一個倫敦口音的人狠狠地罵了一聲。

「對不起，」我說。我躺在地上喘了幾分鐘的氣，然後問道：「這兒有美國人嗎？」

沒有人回答我。過了一會兒，有一個聲音問我：「你是誰呀？」

「史迪夫。剛纔從柏平雲的監獄出來的。」



「哦，我們已經聽說過你了。……我們是英國人和加拿大人。在左邊——那一堆岩石旁邊，有幾個美國人。還得好好地躺着，別做聲，呃？你要是到那邊去的話，最好是爬過去。」

我小心翼翼地朝那一堆岩石的黑影子爬了過去。我當心地問道：「這兒有美國人嗎？」

「史迪夫！」一個人影從黑暗中站起來，然後又把我拉到地上去。

這是柳伊斯。從芝加哥來的柳伊斯。柳伊斯和我並排地躺在一起，互相笑着，罵着，因為我們彼此見了面非常高興。我們說完了每一句話以後都要大笑一通，除了我們覺得想笑以外沒有任何其他原因。

黑暗中又有一個聲音輕輕地叫着：「Vamos, camaradas。」（走吧，同志們。）柳伊斯站了起來。

我問道：「那個人說的是什麼？」

「我們走吧。」

「好，可是他說的究竟是什麼？」

「那就是他說的話。他說：『我們走吧。』」我們又大笑起來。柳伊斯曾經在新墨西哥地區做過鐵路工人，所以他懂得西班牙話。這時候在我們周圍前前後後，人影都從地面上站了起來。這麼多的人使我非常吃驚。柳伊斯告訴我這一夥一共是三十人，英國人和加拿大人佔一多半，只有很少的美國人和別的國家的人。

「你看見那邊的那些燈光嗎？」柳伊斯手指着說。「那就是塞勒。他們經常帶領伙伴們直接從這座市鎮上經過，然後從一條大路上走到山裏去，可是很多人都給警察抓住了。所以現在我們

不得不藏藏躲躲。……爲了這個緣故，他們往往把伙伴們放在公共汽車裏一直開到波港去，在那兒所有的法國人都站在路旁歡呼。可是這還是勃魯姆先生動手打擊我們以前的事情。現在他和張伯倫把這一切都改變了……我相信，當你在那兒法院裏的時候，你一定會經常望着這邊的山。」

「哎呀，可把我們急死啦，」我說，「離得這麼近，可是不能走山裏過去。」

嚮導在計算人數。他說：「Vamos! Vamos!」（走吧！走吧！）我跟着他的聲音走去，纔發現我是這一系列人中站在嚮導後面的第一個人。

烏雲把月亮遮住了；我們打一片漆黑中走過，每一個人都跟着前面一個人的腳步聲、粗大的喘氣的聲音和不時發出的低聲的咒罵。我們穿過了田野，穿過了看去像是葡萄園的地方，然後又穿過另一片田野。一種私語似的聲音越來越高，最後纔辨出是河流的淙淙的聲音。一個聲音輕輕地叫道：「Tch Tch」（到這兒來！到這兒來！）嚮導便轉身向聲音那邊走去。這時雲變得稀薄了些，不然就是我的眼睛已經習慣於在黑暗中看東西；我現在可以辨認出模糊的形狀了。嚮導和等候在河邊的一個人抬起一塊二呎寬十二呎長的長木板來，把這塊木板搭在水面上，嚮導帶頭打木板上面走過去。我也不自在的地跟在後面，戰戰兢兢、左右搖擺地打奔騰的水面上走了過去。

木板的另一頭支在河流中間的一塊岩石上，第二塊木板是從對岸搭過來的。我安全地渡過了河，那個嚮導拉住我的兩隻胳膊往下按，像是要把我釘在地面上一樣，這表明了我得留在那裏等待着。有一會，一陣抑低了的喊聲和飛濺的水聲夾雜在一起，說明有人從臨時搭成的橋上落到水裏去了。柳伊斯渾身水淋淋地走出來。我問他道：「你落到水裏去了嗎？」

「稍爲有一點。我前面的那傢伙倒栽到水裏去，我把他拉上來。……朋友，我有很好的條件可以爬積雪的山頂啦！」

我們又走了半個鐘頭，然後停下，嚮導和柳伊斯一同往後面走去，由柳伊斯擔任翻譯，把話一個一個地傳給每一個人。我們要時刻和走在前面的一個人保持接觸，我們不能抽煙，不能咳嗽，也不能發出任何聲響。每當稍停的時候，每一個人要和走在他後面的一個人保持接觸，讓後面的一個人知道隊伍什麼時候開步走。

過了十分鐘以後，我們又停下了，嚮導對柳伊斯極快地低聲說着西班牙話。柳伊斯說：「把話往後面傳下去。我們現在要沿着一條水道和一道河谷的中間走去啦。緊靠着左邊走。倘若你掉在水道裏，你不過浸在水裏再爬出來，但是，要是你從懸崖上掉下去的話，那就要粉身碎骨啦。每個人都得緊靠左邊沿着閘溝走過去！」

我想起了我在監獄裏聽到的一個故事：一個往西班牙去的法國青年從懸崖上跌下去，掉在下面河裏淹死了。這兒一定就是他的葬身之地。於是我很聽話地匍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往前爬去。嚮導在閘溝的那一邊焦灼不安地等待着。看見我們安全地走過了這一個地點，他好像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烏雲迅速散開，露出朦朧的月光來；四處彷彿像白晝一樣明亮，可是當隊伍停下來的時候，三十呎開外的地方就看不見人，人都和灰濛濛的山腰融成一片了。不過，至少你可以看見腳下的地面。這時地面已經很陡地傾斜了起來；我們現在真的往山上爬去了，爬進黑暗的山壁裏面了。

地面柔軟、潮濕而又粘膩。嚮導好像在從這一塊岩石上跳到那一塊岩石上似的跳來跳去，我也嘗試着模仿他的舉動，可是馬上一脚踏空，跌得全身爬在泥裏。我似乎比別人滑得更厲害。我斷定漏子出在喬埃給我的這一雙鞋子上。這雙鞋子很好，然而却是橡膠底的，橡膠底是不適於在濕地上爬山的。別的人都得到繩底鞋（alpargatas）——一種用麻繩作底的鞋，把繩子繫在腳踝骨上，走起路來一點也不滑。

嚮導在一棵大樹下面停下來，在樹底下瞎摸了一陣子。他對柳伊斯說了些話……「那兒有一個偵察兵。現在我們不得不岔過去，側着身子打那一個狹窄的懸崖旁邊走，一直走到另一個我們能够攀登的地方。」嚮導扼要而憤激地說着。柳伊斯翻譯給我們聽：「他在痛罵那些警察。他說要不是那些該死的警察，我們就不會像一羣山羊一樣在這些懸崖旁邊轉來轉去啦。」

我們又面對着山移動起來，我們緊緊地貼在山壁上，胆戰心驚地拖着步子打懸崖峭壁旁邊走過去。這時後面有人喊着叫我們停下來，於是嚮導側着身子打他們身邊走到隊伍後面去。柳伊斯和我折轉身子往下面俯瞰。塞勒市的燈火就在下面，好像我們爬上了這一座市鎮的一架雲梯似的。

我說：「我敢說，倘若我吐一口唾沫到下面去，我可以吐中曾經審訊我們的法院。我保證剛好把唾沫吐在法官的眼睛裏。」

「我的腿已經累了。要命，兩條腿真是累啦。」

「這也難怪。我們一定已經接連爬上三四小時的山了。我一直以為我是一個很好的徒步旅行

的人，現在可嚐到滋味啦。」

柳伊斯很担心地說：「從那些燈光看去，我們根本還沒有走多遠。要是我們不在天亮以前走過去，那我們就要完蛋啦。」

「也許以後我們會走得快些。同時，不久我們就會又有勁了。」

嚮導罵着回來了。兩個人沒有在大樹旁邊轉彎，嚮導對於他們的笨拙非常生氣。他踏着硬幫幫的步子走上前去。我們走到懸崖的一頭，於是又開始往上面爬。山腰看去並不是陡峭得很厲害，可是對於人的腿、心和肺來說，却真是太陡峭了。

我們停下來休息時，一個矮胖的荷蘭同志猛然在我的身旁坐下。他的年紀較大，有四十五歲。他氣喘呼呼地哼着，滔滔不絕地講出罵人的荷蘭話。「Foss—foss,」（脚——脚）他說，「Mein Gott, mein fass,」（天哪，我的脚。）他伸出他的短小的胖腿，對他的脚揮着拳頭。

「他的兩隻腳已經弄得筋疲力盡啦，」柳伊斯咕噥着說，「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走得到。」我們大夥兒都望着那個荷蘭人。到了要動身的時候，他也只得勉強掙扎着站起來。他這次拚命站起來，似乎已經耗去了他全身的力量。走不到十碼遠，別的人已開始打他的身邊走過。一個高個兒加拿大人咕噥着說：「我們須得走慢些，不然那個老傢伙跟不上我們啦。」

柳伊斯對嚮導說了一句什麼話，於是嚮導和柳伊斯走回到荷蘭人那邊去，我跟在他們的後面。

柳伊斯說：「喂，同志。我們得在天亮以前爬過山去哪。現在是一點鐘啦——Fein Uhr,」（一點鐘。）只有四個鐘頭了，得趕快纒行。『Mach schnell, ja? Wir müssen schnell machen』（快一點，

好嗎？我們得趕快一點）『Versteh?』（懂得嗎？）』

荷蘭人對柳伊斯望了一眼，又對嚮導望了一眼。「走吧，」他說，「走吧，我試試看。」

我們又心驚胆戰地爬了一小時。這裏的樹木小些，也少些。我們經過了一塊塊柔軟的雪地，然後經過了不怎麼柔軟的雪，然後我們走在乾燥而凍結的雪上，那兒壓根兒沒有樹，只有灌木，岩石上都掩蓋了厚厚的苔蘚。在一個山脊的頂上，嚮導叫我們停下來。

「他說我們可以休息十分鐘，」柳伊斯說，「我們得再從另一個懸崖上面走過去。這兒有泉水，伙伴們。」

那個矮小的荷蘭人一步一顛地往前走着。儘管天冷，他的襯衣一直是敞開到腰部的；你在兩碼開外的地方就可以聞到從他痛苦的身上發出的汗味。他呆呆地瞪着兩隻眼，他的呼吸像是一匹馬在喘氣。他說：「不，不——我不能——」於是一搖一擺地臉朝下倒在雪裏了。

嚮導馬上跑到他的身邊，把他的磨破了的潮濕的褲腿捲了起來。他動手用雪去擦荷蘭人的腿。柳伊斯也學着他把荷蘭人的左腿揉着，按摩着；我也代替了嚮導用雪去擦他的腿。荷蘭人的小腿肚子在我的手下面就像一塊石頭一樣，他的肌肉抽着筋，像一個快被淹死的人的肌肉。我們搓着，捶着，感覺到他的肌肉開始鬆弛起來。那個荷蘭人的呼吸也改善了。他心裏舒暢一些，眼睛閉上了。

嚮導在一旁等待着，準備動身。於是我們把荷蘭人扶着站起來，很焦灼地望着他東歪西倒，眼睛迷迷忽忽、昏昏沉沉地溜來溜去。我說：「我們不能扶着他走一段路嗎？」

「非到我們走過了懸崖不可，因為這兒太窄了，你們兩人都會跌下山去的。」柳伊斯翻譯說，「他說離下一個山脊已經沒有多遠，那兒有一條路，到那時我們就能够扶着他了。」

我們便用了我們所能拼湊起來的一切德國話，打算向荷蘭人說明這一點；可是我們不知道他懂不懂得。然而，他還是跟別人一同前進了。順着懸崖望去時，我們可以看見前面的山脊。這個山脊在月光下看去並不很近。我說：「想像一下吧，他那樣大的年紀，竟然還來吃這種苦頭。我可以打賭，他在過去半生中從沒有爬過什麼山。荷蘭是沒有山的。……我知道他心裏是什麼感覺。」

沿懸崖一帶叢生着帶長刺的灌木。柳伊斯說：「看嚮導像山羊一樣跳來跳去。他在這裏確實是很自在的。岩石和灌木都是他的老朋友；那些東西不會傷害到他。」

我說：「我想它們對我可就沒有那樣熟了。」

懸崖加寬了，而且很陡地向上了，談話就此終止。一陣刺骨的寒霧朝我們的頭上襲來，裹住我們的流汗的身體。柳伊斯回過頭去鼓勵似地向荷蘭人打招呼，那個嚮導便狠狠地噓了一聲，不准他說話。懸崖走完了，地面向兩邊削下去；我們已經到達山脊的頂端了。

嚮導一停下，我們就轉過身到荷蘭人那邊去。他站着，眼睛直瞪着前面，臉上露出一種麻痺的、迷惘的神氣。沒有一會兒，他的膝頭彎起，身子往前一伸，就跌倒在地上了。

「他已經筋疲力盡啦，」柳伊斯說，「他一點氣力都沒有了。我們不能把他丟在這兒。怎麼辦呢？」他喊一聲嚮導，那個西班牙人跪在荷蘭同志旁邊，過了一會兒又突然站起身來。他從他的

腰帶上的刀鞘裏猛地抽出一把刀子來——一把加泰羅尼亞地方的刀子，像刺刀一樣長的——用這把刀砍去長在附近的一棵小樹，並把它削成竿子，然後又砍第二棵。他把這兩根竿子並排地放着，對柳伊斯說了一句話。「他要皮帶，」柳伊斯說，「他在做一個担架哩。」

同志們拿來五根皮帶。嚮導選擇了三根最結實的，把竿子紮起來，竿子的中間和兩頭都紮上皮帶。他做得很快，但是他還嫌不夠快；他時時抬起頭來向東邊的天空掃上一眼，細看一下第一道曙光有沒有從天邊露出來。他把他頭上的黑色的長圍巾用力扯下，把它舖在皮帶上面。担架做成了。忽然從黑暗中拋出一件厚絨絨衫來，掉在嚮導的腳旁邊；他裂開嘴笑了一笑，便把厚絨絨衫穿上了。我又用雪去揉荷蘭人的臉。他活動了一些，把眼睛睜開，於是我們把他抱到担架上面去。柳伊斯、我、一個加拿大人和一個倫敦人，每個人扛着担架的一角。荷蘭人覺察到自己被抬起來以後，又是哼着又是咕噥着表示抗議，並且掙扎着想坐起來；嚮導一手把他按下去，他便無力地躺下，開始哭起來。眼淚從他的圓臉蛋上面淌下，他用鼻音哼着說話，罵自己衰弱無力，並且斷斷續續地懇求把他放下，隨他自己去。

「我不行啦，」他說了又說。

担架竿在我肩膀上的重量比我預料的要輕些。我仰頭望了一望，現在天空變成青灰的顏色了，星星漸漸隱沒下去。在我們左邊的山脊下面，堆着一團平坦的、浩渺無垠的雲，像人行道一樣的光滑，也一樣的堅固似的。嚮導在等待着我們，他忽然發出噓聲：「嘶！嘶！」他用左手比劃着「警察！」，又用右手比劃着「巡邏站！」。我們繼續往前走，兩隻腳小心翼翼踏在地上，



把我們的呼嚕呼嚕的粗躁的喘氣的聲音極力壓低了下去。那根竿子朝我的肩膀上猛地戳了一下。有一隻手摸着我的胳膊，把我推到一邊。一句話不說，已經有四個新扛担架的人把担架接過去了。

嚮導輕輕地說：「Comaradas! Adelante! Adelante!」（同志們！前進！前進！）於是越走越快起來。他的聲音裏含着憂慮和急迫，他的焦灼不安傳給了大夥兒，刺激了我們，也使我們加快了。我們東倒西歪地緊跟在他的後面。這時東方的天空顯然漸漸明亮起來了。嚮導指點着說：「Dial」（是白晝啦！）他用手勢招呼他們快些走，快些，快些。我心裏在想：……太陽，暫時不要出來吧。現在離開我們吧。以前我從來沒有詛咒過日出。現在我可要詛咒了。暫時不要出來吧。只要稍爲多給我們一些黑暗，只要稍爲多給我們一些時間。

嚮導繞過一塊大圓石，走道突然變成一道狹窄的懸岩，一個扛着担架一角的高個兒加拿大人忽然大叫一聲從崖邊上掉下去。荷蘭人抱住另一邊的一個人的脖子，極力掙扎着不讓自己掉下去。我們以爲那個加拿大人一定摔死了；可是過不多久他又從崖邊爬上來，一面罵着一面排掉脖子上

的雪。但是荷蘭人再不讓人們扛着他了。他在其他兩個同志的扶持下蹶着他的短腿向前走去。

我們不能夠跑，可是我們終於跑起來，我們的呼吸像負重的馬和飛跑着的狗的喘氣的聲音，像遠遠聽到的火車頭放氣的聲音——一點也不像人類的呼吸。可是嚮導仍然在我們前面一蹦一跳地走着，招呼我們走得快些，快些。他又喊出了一句話，柳伊斯抽抽噎噎似地說：「五百——碼——還有——五百碼，孩子們！」

於是我們加快地跑起來，像是馬拉松賽跑者們在將近終點時那種無力的、動作緩慢的跑步，

我們的膝頭高高地抬起，像是兩腿累乏了的人們，腳上纏了一塊鐵，只有使盡力氣纔能把腳抬起的一樣。我的大腿上的肌肉猛烈地、控制不住地跳動着，已經這樣跳動了好幾個鐘頭；我的嘴裏有一股黏膩的酸味，喉嚨和肺都像着了火一般；血在我的耳朵裏沸騰着。然而我，我本身，似乎和這一切不相干，只在一旁冷靜地觀望着。我看到我自己正在跑，我的拳頭握緊，每當一搖一擺地踏上一大步時，我的膝頭便高高地抬起來。我看見別人也用同樣的方式在跑，甚至那荷蘭人也在跑。他已經摔開了扶着他的同志們而往前跑着，兩隻眼睛鼓着。天越來越亮了。越來越亮了。天空呈現出淡藍的顏色，綠藍的顏色，令人憎恨的藍色。

嚮導在一堆石頭旁邊停下來。他繞着石頭，摸着石頭在跳。他笑嘻嘻地，嘴裏不知喊着什麼。[Espana]（西班牙！）他在喊着，「西班牙！西班牙！」

我們也在這一堆石頭旁邊停下來，朝山坡下面俯瞰着我們前面的山谷。這個山谷看去很像另一邊——法國一邊——的山谷，但是又不像那一邊的山谷，因為這是西班牙了。我們都在眺望着西班牙。我們都站在西班牙的土地上面了。我們都在呆呆地俯瞰着西班牙，頃刻之間，唯一的聲音就是筋疲力竭的人們呼嚕呼嚕、斷斷續續的喘氣的聲音。

當我們的呼吸恢復正常的時候，還沒有一個人來得及說話，就有一個高大的威爾斯礦工走到前面來。他的鼻子弄破了，並且有一根被血浸透了的綑帶紮在他的腳踝骨上，他的腳踝骨是在夜間我們走路的時候碰在一塊石頭上弄破了的。他的臉和手都帶有煤礦工人的青色的斑點。那個威爾斯礦工說：「喂，伙伴們，這正是唱歌的好時候啦，我會一首好歌，現在正是唱一唱的時候啦。」

那個礦工的嘹亮的男高音在西班牙上空的清晨的空氣中輕快地盪漾開來：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 修道院

我們從一個遙長的，亂石嶙峋的山坡上衝了下去；我們的膝頭因為爬山而用力過度，到下山的時候就不能把我們撐住。人們屢屢跌倒下去，然後爬起來再跑，一面大笑着，因為勃魯姆和勃魯姆的警察此刻已經落在我們的後面，我們到了西班牙了。

一叢像是農莊一樣的紅屋頂的建築物高踞在山坡的一個寬濶的崖面上。建築物的外面圍了一道石牆，牆上開了一扇寬大的門，門口站了兩個年輕人，儘管兩個人的腮幫子上都堆起一捲捲烏黑的絡腮鬍子，但他們實際上是非常年輕的。他們穿着藍色的工人工作服，扛着步槍，槍上插有長而尖的刺刀，他們都是兵士。他們是真正的西班牙兵士，政府軍的兵士，志願軍呆呆地朝他們身上望了又望。

「Salud」（敬禮——）那兩個兵士喊着，把他們右手握緊的拳頭向上「甩」說：「Salud, camarades！」

aradas!」(敬禮，同志們!) 回答他們的是一片混亂的、快樂的叫喊：「Salud! Viva la republica España! Viva! Hooray!」(敬禮! 西班牙共和國萬歲! 萬歲! 烏拉!) 那兩個兵士快樂得裂開嘴角來笑着。兩顆大眼淚從荷蘭人的臉蛋上滾了下來。

那兩個兵士把一扇厚厚的橡木門打開，這扇門的手工做成的鉸鏈吱呀地響了一聲，志願軍們便蜂擁地走進一間天花板很高的房間裏。磚地的中央燃起一堆火，沒有爐子，只是在磚地上燒起火來的，烟瀰漫了整個屋子，最後纔從屋頂上的一個方洞裏透了出去。屋子很暖和，充滿了烟味、汗味和腳氣味混在一起的臭味。

我脫去了鞋，把腳放在火上擺來擺去地烤着，然後睡着了。兵士們扛進一個大銅鍋來時把我驚醒。他們用拴在屋頂上的一根鍊子把那口鍋吊在火上。後來我又睡去，醒來時聞到一股新鮮的刺鼻的香味，這是咖啡的香味。一個兵士遞給我一小杯滾燙的咖啡。他緊緊地望着我，說：

「Nordamericano?」(北美洲人嗎?)

「Si, si.」(是的，是的。)

「啊! Buena! (好!)」那一個兵士跑到另一間屋子去，回來時臉上露出眉飛色舞的樣子，一隻手藏在背後，睜大了兩隻眼睛眨着，然後猛地伸出了他的手，把手裏一罐煉乳拿給我們看。罐頭上印有鐵鎚和鐮刀的標誌。

「Crema!」(奶油!) 那個兵士得意地喊着。他的手指頭輕輕地敲着那個浮彫的標誌，說：

「Unico Sovietico, si? Si! Crema!」(蘇聯的，是吧? 是的! 奶油!)

在西班牙，凡是我的足跡所到的地方，我都看到那一個標誌，因為在蘇聯送給被圍攻的共和國的一切物品上都印有鐵鎚和鐮刀的標誌——在罐頭物品上，食品盒上，麵粉袋上，槍砲上，卡車上，坦克車上和飛機上。

我喝了加奶油的咖啡，又睡去了。

一口大鐘敲響了起來，像是學校的鐘，又像是教堂的鐘——這是在紅屋頂的農莊的場上的一口鐘。一個英國人的聲音喊着：「來，伙伴們！卡車在等着哩！」我們跌跌爬爬地走到場上，眼睛一眨一眨地對着白亮亮的耀眼的日光。在大門外面的路上看不見一輛卡車。一個兵士向另外一個方向打着手勢，指着下面一層一層沒有盡頭的台階，這些台階一直伸入峻峭的山巒內。

柳伊斯解釋說：「這個地方是屬於一個神父的。他把這裏當做消夏的別墅，你們在打瞌睡的時候我會經看了他的酒窖。好傢伙！……他有一輛馬力強大的汽車可以往上坡路駛來，我們的卡車可不成。」

巴黎的冬天還沒有過去，可是這裏由於山巒擋住了寒冷的北風，土地上已經是草色青青，美麗極了！一陣微風從草上輕輕拂過，這裏那裏，草叢中點綴着像星星一般輝映的花。在遙遠的高空，在沒有半點兒雲彩的藍天裏，一隻鷹在飛翔着，翅膀兒一動也不動的。在下面，一條白茫茫的道路在岡巒起伏的田野間彎彎曲曲地折轉過去，葡萄園、果園、草地，像是棋盤格子一樣遠遠地伸展到蔚藍的天邊。在左方，我一眼看到了海面——地中海的海面一晃一晃地閃爍着燦爛的陽

光。我再回過頭去看時，白雪皚皚的山峯不再顯得教人心驚胆怕了，從西班牙這邊看去，它們露出一副友好的庇護人的神色。

彷彿世界上所有的台階都在那一個山坡上首尾相接地堆積起來了。一條梯級有三哩長，走下這條梯級要費去三個鐘頭；當我們最後走到大路上的時候，那兒一輛卡車也沒有。於是我們等待着；一會兒一輛輕便的，歐洲式的「福特牌」，叫做「馬德福特牌」的卡車，從一團白色灰塵中轟隆隆地開來。我們一夥兒三十人蜂擁地擠進車裏，在車裏只有站的地方。當那個年輕的司機瞪排擋的時候，排擋吱呀地發出一聲討厭的叫喊。接着卡車開動，沿着陡險而曲折的道路飛馳下去。司機是一個性急的傢伙，他固執地不肯沿着公路上應走的一邊開車。也許是爲了節省車胎吧，很多時候只有兩個輪子着地。在他的擁擠不堪的乘客上面，揚起了萬丈的塵土；人們縮着頭，屏住呼吸，一面哼哼地罵着，一面用他們集體意志的力量叫車子不翻。

一座城鎮出現在我們前面了，這是費格雷鎮。這時卡車向右邊來了一個急轉彎，轉動着頭檔往一座險峻的山上駛去。一個扛着一枝長步槍的小個兒跳到大路上來站在我們的前面。在我們背後，是一扇安在石柱上面帶鐵門的大門，石柱給苔蘚蓋住，石柱的裂縫裏長滿了青草。司機把通行證拿出來給查驗。「Trienta hombres」(三十人)。於是那位警衛把手一揮，大門便嘩啦一聲打開，卡車向前滾滾地駛去，我們已經走進埋在山腰裏面的一座城市，踏在迂迴曲折的街道上了。這些街道被三十呎高的石牆掩蔽着，磚石建築物因年代悠久變成了灰白色，滋長了苔蘚。

當我們下車的時候，司機站在車後門旁邊向大夥兒裂開嘴角來笑着。他說得相當詳細，由一

個人翻譯：「他說他很抱歉他把車子開得這樣野，因為他今天要開好幾趟車子哪。別的外國同志們也正在等着他，有的人要在路旁邊等上一整天，恐怕連吃的東西都沒有。」我們對司機鼓掌歡呼，卡車便一陣旋風似地飛駛而去。

忽然有兩隻大手抓住我的肩膀，把我弄了一個團團轉。

「喬比！你這個老傢伙！」——「史迪夫！你到底達到目的啦！」

喬比的臉現出像是舊小提琴的那種深褐色。他的樣子看去是勝任、愉快、又有信心。我說：「假若我不認識你，我還會把你當做一個大兵哩。」

喬比笑了起來說道：「可不是。你也會像個兵的。一穿上了軍服就大大不同了呢。」

「喬埃跟別的伙伴們都在什麼地方？」

「他們隨時會來到。……你呀，你這傢伙比別人的運氣好啊！我在這兒已經呆了三個星期了。」

「在做些什麼事？」

「訓練大夥兒們。向左轉哪，等等。……我說，你和大夥兒一塊兒去吧。他們把你們吃的東西都安排好啦。過一會兒我來看你，我們好好談一下。」

一個矮小的、眼睛陰暗的西班牙人引導我們進入一所房屋內，走下一條很陡的螺旋梯，沿着一道寬大的走廊，從又一條石梯上走了下去。我知道我們到了一座堡壘裏面了。這時我想起了上面高大的石牆上蔽滿的青草。

水從安在走廊牆上的龍頭內噴出來。我們來了一次飛快的盥洗，排了隊等待分發盤子、刀、

叉、羹匙；燉牛肉——隨便取食的燉牛肉、麵包，一杯葡萄酒……我懶洋洋地向喬比眨着眼。

「東西够吃嗎？」

「够啦。」

「是的。飲食並不壞，只要你吃得慣橄欖油和洋葱。……他們還要給你分配床鋪哩。」他略現出沉思似地望着我。「我料想你一定很疲倦了。我料想你恐怕馬上就想睡覺了，是不是？」

「不。我可以過一會兒再睡。」我說。喬比的臉上顯而易見地高興起來。我很費勁地站起身，說：「我們到一個能够談話的地方去吧。告訴我目前遭遇的事情。」

「好的！上面就有一個咖啡館。……首先我要告訴你頂要緊的新聞。我們整個一夥兒的老朋友——紐約的比爾和艾德，我們的同鄉薩米、喬治和維克都神裏神氣地到了。」

「他們在哪兒？」

「在基地上。在阿爾巴塞特。……聽着，史迪夫，你是要到那裏去的，我猜想你就坐明天早上的火車去。喂，要是可能的話，你願意幫我一個忙嗎？把我從這兒調開！他們叫我在這兒訓練小隊。照這樣情形下去，我永遠也不會到前綫去啊！」

「你當然會去的。我們不會把你丟在後方。」

「那可好啊，」喬比得意地說。



## 敗壞風紀的分子

光陰飛逝，沒有一天的時光是够長的；因為，一個任務完成了，又冒出三個新任務來。每一個問題最終都歸結到人的身上，一個人，一個個人的身上。領導機關處理的是人的問題；軍、大隊、中隊的問題；都是個人的問題。

阿爾巴塞特鎮擠滿了從前綫上來的人，從醫院來的人，從美國來的人。他們在街上閑逛，晒太阳，跟女孩子胡調（在這方面他們特別得不到什麼成功）。由於虛榮心的促使，他們以為他們的失敗是爲了不懂得語言，於是西英字典的銷數馬上大量增加。但是還有一些事情不大對頭……他們互相訴說自己的苦惱，而且至少有一些人，他們一面訴苦，一面越來越憤恨，越來越自憐自歎了。這些人被許多人叫做「敗壞風紀的分子」。

我看見喬埃·戈登離開站在噴水池旁邊的一羣人，穿過廣場向我這邊走來。戈登是一個強硬的傢伙，從紐約市東部貧民區來的，身體結實，矮胖，一頭蓬亂的黑色鬚髮搭在他的粗糙的臉上。他的左眼戴了一個白色的眼罩；因爲一顆子彈曾經擦傷他的頰骨，把他的那一隻眼睛弄瞎了。我知道他的名望，他之所以有名望，是因爲他在前綫上出奇地英勇，因爲他強硬，因爲他每天在廣場上呆着，因爲他對任何一個話題都能用粗俗的話談個不停。但有人管他叫「敗壞風紀的

分子」。

戈登說：「喂，史迪夫，我什麼時候可以來看你？」

「什麼事？」

「我要和你談談。但不是在這裏談。我要在一個沒人撞進去的地方坐下來向你報告內情。」

「行，」我說，「我們馬上就去吧。」

我們走到我睡覺的屋子去，讓戈登坐下以後，我說：「快講下去吧。」但是戈登馬上又站起來，一面講一面在屋裏走來走去，話講得粗俗而又有力量。他的右眼也在壞下去了，他不願瞎了眼回家去。眼睛痛得厲害，日夜都在痛，一種刺骨的疼痛從他的頭腦裏穿過。他已經到醫院內法國醫生那裏去就診過好幾次，可是那個醫生只是用碎布擦一擦他的眼睛，並且說此外毫無辦法，然而那個醫生還自稱是周圍一帶頂好的眼科醫生哩。戈登當然不喜歡這個醫生，對他不信任。

「你打算要我做什麼呢？」我問道。

「巴塞羅那有一位專科醫生。我想請他給我瞧一瞧。可是這個混蛋不讓我領一個通行證到那裏去。所以我到基地來了，可是負責的人對我說：『這是醫生的職責。困難就在這裏。』他從他的衣袋裏掏出一張紙，用力朝我手裏一塞。『瞧，我把巴塞羅那那個醫生的名字，住址，一切東西都弄清楚啦。他是一個頂刮刮的醫生。』」

「明天到我這裏來，」我說。

「好，」戈登粗魯地說，「那麼，明天再見吧。」

我找到了我的譯員，立刻跑到醫院去。醫生正在他的辦公室內，是一個衣冠整潔、美貌而年輕的法國人。他戴了一副夾鼻眼鏡，眼鏡繫在一根寬大的飄帶上面，和從他的制服上表現出的軍人氣概，形成了一個奇特的對照。

關於戈登的病情我說得很詳細，並且多少有點激動，當譯員翻譯出我的話時，那個醫生斯文而謙恭地聽着。於是譯員又翻譯他的話說：「他說，『一個醫生所能做的事他都做到了。他不能更換器官。凡是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已經做到了。』他說他很抱歉。」

我摸不清譯員在說些什麼，我說：「我覺得你應該允許他轉到巴塞羅那去。」  
醫生生氣地瞪着眼，把寫字檯捶了一下，說：「我是這個醫院的醫務主任。」

「不，那不行，」我說，「戈登對你不信任，要是他不能馬上到巴塞羅那去，你就要把事情弄得越來越糟了。」

那個醫生在一張紙條上潦草地寫了幾筆。譯員覺得把他當時所說的話翻譯出來並不是怎樣恰當的事情。於是我便拿了這張紙條，繃着臉走出來。我在廣場上找遍了戈登，但是沒有能夠找到他。第二天，我和比爾正在工作的時候，戈登走進辦公室來。他把他那張嚴酷的年輕的面孔很仔細地偽裝了起來。我問他：「你幾時可以到巴塞羅那去？」

「馬上就可以去。我——只不過是，我沒有錢。」他的臉紅了。「昨天我們喝酒把錢花光了。」  
「那沒有關係，」我說。「艾德有點錢。」

戈登笑了，這是第一次我看見他的臉上露出笑容來。他轉身飛跑出去了。兩個星期以後，從

巴塞羅那寄來了一張明信片，上面寫着：

「親愛的史迪夫：一切都很順利。醫生真了不起。眼睛不再充血了。那一隻不中用的眼睛也可以看到一點光啦！致勝利的敬禮——你的喬埃·戈登。」

當他回來的時候，他的左眼上的那一個眼罩已經拿掉了。把眼罩拿開，表示他已經從一個「敗壞風紀的分子」轉變過來。

戈登事件發生幾天以後，另一個醫生來看我。他報的名字是波蘭人的名字。他講的英語有一股矯揉造作的書卷氣，好像是從書本上學來的。

「我想跟你談一談我和你們美國人在一起所得到的一些經驗。其中有一些猶太人。我呢，也是猶太人。」他笑着說，「正因為那個緣故，我能够和那些小伙子更接近些。我跟他們用意迪什語<sup>①</sup>談話。所以我能够比較仔細地研究那些小伙子。所以我想對你談一談他們。」

「好，你說下去吧。」

醫生又着他的手指，裝做一副嚴肅的神氣，很機靈地噉着嘴唇。「我已經得到一個結論，」他說，「這些年輕的猶太的小伙子不能夠當兵，因為他們極其神經過敏。」

我一時驚愕得說不出話來。醫生莊重地點着頭，說：「他們神經過敏。」然後把他的長手指頭

① 意迪什語 (Yiddish) 係德語、希伯來語和斯拉夫語的混合語言，為歐洲各國及美國的猶太人所用。——譯者

一擺，又接着說：「唉，他們神經過敏，受不住戰爭的極度緊張。他們害怕彈藥驚嚇症比別的兵士們要厲害得多。這是我研究十二個病人得到的結論。」他又沉思似地微笑着，笑裏稍帶一點謙恭。

（這時我想起了索利，他曾經被警察的棍棒打得昏倒下去，兩個鐘點以後，頭上紮着浸透鮮血的綑帶，又回來站在糾察綫上了。我想起了古德曼，他曾經站在橋上看守着我，我那時躺在那裏，血從我的頭上淌出來；那些打手們還沒有來得及把我推下河去就被古德曼趕跑，不然我的命早就完蛋了。我又想起了那個「小傢伙」在芝加哥的監獄裏遭受打手們的痛打和惡罵。這時我好像又聽到警察的狂吠：「啊！我看見你在瞅着我的槍！你想奪我的槍，是不是？你想用槍射擊我，是不是？是不是！」於是我看見在「小傢伙」的眩暈的、血跡模糊的臉上慢慢地舒展開露出牙齒的微笑；我聽到他低沉地咕嚕出來的一個「是！」字。索利，馬特，瑪麗，保爾，艾德和查理，都是猶太人，都是同志。……還說猶太人不能當兵啊！我瞪着兩隻亮晶晶的眼睛望着那個醫生，覺得我的脖子都變得粗大起來，青筋在我的額頭上砰砰地跳着。）

「醫生，你的心理學論點引起我極大的反感。你不能來到這裏並且——」說到這裏，我停止住，把話嚥下去了。「你所說的十二個病歷簡直是混賬的講法！」我叫喊起來。「你的「科學」含有納粹主義的氣味！你的臭理論簡直是混賬的理論！」

醫生亂蹦亂跳，自言自語地跑開了。我在那兒坐了很久，眼睛呆呆地望着半空，直到我眼睛裏熾熱的光輝冷却了下去。我首先想到魯比。魯比是喬埃·戈登的一個好朋友。魯比談了很多的話，他昨天曾經來到辦公室裏，他說了一大堆，這都沒有什麼奇怪，可是他的話頭很新穎；心理

學。「歸根到底，一個人總是經歷過砲火了，」他說，「他受了傷——他的腦子受了震動——應該讓他做輕鬆的工作，或者把他遣回國去，由新的人代替他上前綫。」

「我告訴你，」魯比說，「他們吃了很多苦了。儘管他們願意，他們永遠也不能成爲經得起砲火的兵士。應該讓他們做輕鬆的工作，或者遣送他們回國，叫他們在國內做他們能够做的事情。當然，你曉得，這不是就我說的。這就是戈登和——」他進一步講出幾個同志的名字，都是猶太人。

我走出去作了一番詢問。醫生是一個月以前來到阿爾巴塞特的。爲了他的委任狀，他在戰場上的經驗以及他對於使傷病者「復原」的關心，已經替他設了一個「精神病醫生」的職位。在我到達以前不久，他向委員會提出一個設立兵士療養所的計劃。

那一天晚上，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比爾和艾德。他們倆氣得比我還要厲害。艾德若有所思地說：「可不是嗎，最近就有幾個孩子對我說過——在他們所講的話裏，我覺得有些話真是奇怪透頂啦。」

「可是這些人並不完全是猶太人，」比爾說，「至少有兩個人不知那一代祖先是愛爾蘭人。賈克·奧……就是一個。」

我激動地說：「就是那個老和魯比在一起蕩來蕩去的紅頭髮的人嗎？對啦！一定是他！」

「因此這就是那個騙子『研究』的十二個病人，」比爾說，「他們是一種傳染中心。一羣疾病的傳染者，是不是？」

「一點也不錯，」我說。「那傢伙所吹的心理學的牛皮，使一些好人在精神上也垮台了。這裏

所包括的一個真正的問題，完全是一個砲彈驚嚇症的問題。」

「砲彈驚嚇症是可以存在的，」艾德遲疑不決地說。「在世界大戰中真正有一些確切的砲彈驚嚇症，很多很多。」

「這倒是實在的情形，」我說。「這是沒有疑問的。這也就是我們的朋友那個偽精神病醫生的理論的根據。這也就是使他能夠亂吹牛皮的緣故。不過，這是兵士在世界大戰中的經驗。……不是這一種戰爭，更不是這一種軍隊！」

過了一會兒，比爾又慢吞吞地說：「在那些情況下面的砲彈驚嚇症，首先是一個人對於自己不願意打的一場戰爭不知不覺地逃避開去的一種方式。」

「一點也不錯，」我說。「只要兵士們對他們所打的仗沒有真正的興趣，砲彈驚嚇症就可以發生，而且是必然發生的，這是一件科學的事實。可是在這種軍隊裏——在我們的軍隊裏，情況就不同啦。我們的伙伴曉得他們為什麼打仗。他們之所以來到這裏，因為他們要來到這裏。他們之所以來到西班牙，因為他們曉得這一場戰爭是什麼樣的一種戰爭。這是他們自己的戰爭，他們懂得，不然他們決不會來到這裏。……像那樣的伙伴們也開始談到「砲彈驚嚇症」，只是因為他們已經被偽「科學家」假造的偽科學所毒害了，再不然就是爲了別的一些造成士氣低落的原因。」

比爾突然大罵起來。「儘管有許多好醫生來到這裏，」他說，「可是也不免有這樣一個騙子來傷害我們大夥！」

「也許我們應該把這件事提出來，和一些醫生——好的醫生商量商量，」艾德建議說。

「我們須得把這個壞蛋暴露出來，狠狠地幹一下！」比爾說。

可是把那個精神病醫生暴露出來的不是比爾，不是艾德，也不是我。三天以後的一個早晨，阿爾巴塞特的空氣中震盪着一陣爆炸的聲音；替軍隊製造手榴彈的一所工廠被炸毀了。這件事做得不高明，一個鐘頭以內就弄清楚罪犯是誰了。然而他並沒有馬上被逮捕，那天深夜裏，人們跟踪着那人到「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sup>○</sup>的窠巢去，那是計劃在幾天後領導巴塞羅那暴動的托洛茨基匪幫的一個特務和破壞者的組織。

那天夜裏被捕的「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的陰謀者之一，供出有那個波蘭精神病醫生參加在內。

在醫生被捕的消息傳出去以後，魯比是最早來看我的一個人。「相信我，史迪夫，我從沒有真的被那傢伙的鬼話欺騙住，」他說。他滿臉通紅，眼睛裏帶有忸怩不安的神情。「我——唉，他媽的，我猜想我也多少有點受了迷惑。可是我——我們無論如何總得拿出力量來才成。你曉得會怎樣……瞧吧，我會在前綫上把我真正要講的話做出來。大夥兒都會這樣的。」

○ 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原文是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通常縮寫為 P.O.U.M.，是西班牙托洛茨基匪幫的一個組織，專門破壞人民陣綫，破壞西班牙反法西斯勢力的團結。——譯者



## 通天塔<sup>①</sup>

當佛朗哥對西班牙人民發動戰爭的時候，世界上每個角落的人民都到這裏來加入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他們自個兒來，結伴兒來，或者十人一隊、二十人一隊地來到。他們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什麼東西也沒有攜帶。他們都是反法西斯主義者。除此以外，他們在一切方面都是不同的，都是各式各樣的，正如他們所來自的各國那樣的不同。在戰爭的全部過程中，國際縱隊的人數總計有一萬五千人到兩萬人。阿爾巴塞特是一座約有一萬五千人的城市，它已經變成基地和訓練中心。國際縱隊的最初幾個大隊，就是從阿爾巴塞特開上去參加馬德里的保衛戰的。

比爾和哈利兩人看見我都很高興。他們從卡車裏爬出來，動作很不靈活，像是兩腿累乏的人，他們把拳頭朝我的背上亂捶，一面在罵我。

① 通天塔，係從原文The Tower of Babel意譯。Babel是古代巴比倫的首都，傳說中有人欲在該城建一可以通天的高塔，後來上帝見他們這樣大膽而懲罰他們，使他們語言混亂而中止工作。見舊約創世紀第十一章。通常以通天塔喻空想的計劃，這裏含有國際縱隊因語言混亂而遭受困難的意思。——譯者

「現在情況怎樣？」我問道。哈利回答說：「我們的任務是要在通天塔內匆匆編成一支軍隊，你懂不懂得我的意思？無論你要看什麼地方，看到以後都會教你頭痛。」

「最大的問題是領導人的問題，」比爾說。「你瞧，我們大部分同志都在雅拉瑪，在馬德里城外。他們已經在那裏打了三次大仗——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七日，四月五日。麥里曼和托普遜兩人都是在二十七日受傷的。史考脫陣亡了，此外還傷亡了幾十人。帕克斯和另外三十人被俘。這對士氣發生了不好的影響。他們甚至還舉行了一個剩餘者的會議去選舉軍官呢。政治委員不能夠應付這種局面。」

「是這樣——？」

「是的，局面就是這樣。現在，總司令部要我們在一起商量，決定如何分配領導力量、提議任命。」

「聽起來倒很對。」

「當然很對，」哈利說，「可是此刻我們就沒有充分的情報，來根據這些情報行事。我們不曉得這兒有多少美國人，記錄是沒有的。我們不曉得受傷的人在什麼地方，他們的傷勢多重，他們需要什麼治療，得到什麼治療。我們的一羣伙伴們分散在各處，他們開救護車，駕駛坦克，在化學實驗室工作，做醫院技術人員。」

「還有一件事情，」哈利接着說，「我們有一支部隊在南薩科爾多巴城，跟我們完全隔絕了。應該有人到那裏去看一看他們在做什麼纔好。」

「是的，由於來到的人越來越多，我們必須以領導人員供給新的部隊。一件合理的事情，就是選拔在火綫上經過考驗的人們，把他們送到軍官學校裏受特別訓練。可是在我們了解他們、知道他們適於做什麼工作以前，我們是不能分配給他們工作的。……你明白整個情況了，」他說，「現在我們的建議是：我們這些人都不要馬上到前綫去擔負長期的任務——當然，除非是戰局發生變化。除了緊急事件以外，我們都在這兒花費十天的工夫。這樣我們也許會了解我們應該怎樣做了。」

「對的，」我說。

比爾提到的「通天塔」這個字眼，到第二天早上我參加基地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時就顯出意義來了。這種會議定期舉行，傳達國際縱隊的決議。軍官們按照語言分成許多小組，每一小組對着一個譯員。發言的人和十來個譯員同時說話，每一小組有一種語言，房間裏充滿了難以形容的嘈雜。

要是主要發言的人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或者西班牙人，情形已經够糟的了，雖然大多數譯員都可以翻譯其中任何一種語言。可是如果主要發言的人碰巧是，比方說，一個羅馬尼亞人，那麼必須首先把他的演說譯成西班牙語言，各國的譯員們纔能聽懂。

一個人正在縱隊司令部裏等着要見我。這一個人將近三十歲，身材肥胖，膚色微黑，說話的聲音很粗魯，態度嚴厲到野蠻的程度。

「我叫賈克，」他說，「是正在亞爾曼薩受訓的美國砲兵中隊的副指揮員。」他接着說，「我說的是：在編制上它應該要成爲一個砲兵中隊。我們正在設法把它組織成爲一個砲兵中隊。我現在被派到這裏來領取我們做這件事情所必需的東西。」

「什麼東西？」

「一切東西。」賈克把兩手攤開作了一個手勢。「喂，你知道我們現在有了些什麼東西嗎？我們已經有三尊大砲了。把它們叫做大砲罷了。實際上是從博物館裏拿出來的。它們是克虜伯兵工廠在一八七〇年製造的。這三尊大砲有七呎高，就只是安放在一副直徑六呎長的木輪上面的一個長長的大筒罷了。你用一隻手把螺旋鑽在砲銃後面一鑽，就可以把砲身抬高。你抓住了砲架的尾巴就可以轉動它，把整個兒砲身子轉來轉去。你壓根兒就不要瞄準它，它是沒有什麼照尺的。當你發砲的時候，連砲帶架子要跳到半空裏三呎高，然後往後一坐，一種斜面的東西便會攔住了它；那就是後坐的機件。」

賈克從他的衣袋裏掏出一張摺疊的紙——一張單子。「我們需要測遠器，」他說，「以及望遠鏡。我們還是軍官哩——哼，連手槍都沒有。我們需要一輛牽引車來拖這些東西——把這些怪物拖來拖去。他們要我們利用屬於訓練學校的卡車，可是三次倒有兩次找不到的……軍用電話機。」他按照着單子唸下去，「聯接觀測哨和砲位之間的電綫、滑尺、羅盤針……像食物、衣服等等事情，我也不提了。」

「我要去跟國際縱隊司令部商量這一個問題，看看他們能夠給你什麼東西。你知道我來這裏

不久，還不能對你說得很清楚，」我說。

「那麼什麼時候你跟他們商量這一個問題呢？」

「就是現在。」我拿起電話筒來。司令員正在忙碌着，他要到第二天早上纔能會見我。賈克很倔強地說：「得不到一個答覆，我是不回到砲兵中隊去的。我要留在這裏等到明天。」

電話鈴響了。我接了電話。電話裏面說：「我是國際縱隊醫院的戴爾哲醫生。我想和美國部隊的政委談幾句話。」

「他到鄉下去啦，出了什麼事嗎，醫生？」

「出了很大的事！很大的事！昨天晚上，先生，你們部隊的兩個人丟掉了一輛卡車和價值六千丕塞他<sup>①</sup>的食物！」

「這兩個人是誰？」

「邁克和喬治。」

「他們此刻在哪兒？」

「在這裏。被捕啦。我已經檢舉他們玩忽政府財產和玩忽職守。我要審問他們。歡迎你來旁聽——因為是你們的機關推薦他們，說他們可靠的。真可靠呀！」

你不能怪那位醫生發脾氣。他費了很大的勁纔替醫院弄來一輛卡車，卡車比鑽石還要稀少。

① 丕塞他(peseta)係西班牙幣名。——譯者

現在他又得到政府那裏去要求另一輛卡車了，那麼他將要用什麼話對政府講呢？政府會對他說，「兩三天以前我們剛給你一輛卡車。怎麼搞的呢？……丟掉了！誰把它丟掉的？……國際縱隊的人，真的嗎？兩個美國人？……」啊，妙得很。普里托是陸軍部長，他對國際縱隊原來就沒有好感，這樣一件小事情就會給他一個發脾氣的機會啦。

邁克和喬治這兩個卑劣而害臊的人站在我的對面。我問他們：「你們怎樣把一輛卡車弄丟的？」

他們駕駛了這輛卡車到巴塞羅那去買供應品——替醫院買食品雜貨。邁克是司機，喬治是採買。在回到阿爾巴塞特的路上，他們停下來買點東西吃。當他們回來時，卡車不見了。

「那麼你們一定是不想法看守就把車子丟下了，」我說。「你們曉得，第五縱隊<sup>①</sup>破壞掉一輛卡車來是多麼容易，一個搗亂的人偷起一輛卡車來是多麼容易。你們曉得，卡車是多麼珍貴的東西。」他們兩人一句話也不說了。我又接着說：「我們得找幾個比你們會照顧車子的同志。你們準備到訓練營去吧。」

「你要爲了這件事情把我派到前綫去嗎？」喬治說。

「可是同志，你正是爲了上前綫才來到西班牙的呀，是不是？」

「好啊，上帝，」喬治回答說。「我還以爲你的任務是替我們辯護。却不料你不但替我們辯

① 第五縱隊是西班牙內戰期間，佛朗哥率領四個縱隊進攻馬德里時，他埋伏在城內的特務便衣隊。爲別於正規軍的四個縱隊故稱爲第五縱隊。從此以後成了法西斯派往敵國潛伏，從事情報及破壞工作間諜的泛稱。——譯者

護，反而和起訴人站在一邊了。」

邁克至少還是有點骨氣的人。「住嘴！」他惡狠狠地對喬治說。「不要裝蒜！」他用一雙失望的眼睛望着我。

戴爾哲醫生說：「你覺得應該怎樣處置他們？我們不能把他們留在這兒，特別是因為他們一想到要上前綫就非常不高興似的。」

「馬上把他們送到訓練營去。」

「應該這樣，」醫生點了點頭說。

每一個美國人都自信他可以駕駛和修理一輛汽車，一輛卡車，一切東西。許多美國人都被選拔出來担任卡車和救護車的司機。比美國人先來到的法國人設立了國際縱隊的最初的修理廠和車輛配件廠——這些工廠是「新」的修理零件的來源。

十多個美國人被派到修理廠去。馬上就發生了一些埋怨——埋怨有些修理人員「不曉得怎樣經營這些工廠，做出的一切事情都落後」。

他們向領導方面提出他們的控訴和他們的小小的爭吵，非常激烈地歷數他們的牢騷。他們埋怨法國人、英國人、比利時人。小小的事情會釀成麻煩透頂的嚴重的局勢。往往會有這樣的話：

「你瞧，那一個主持訓練學校的冒牌少校，我老實告訴你，他不過是一個混賬的機會主義者罷了！他揀出了這些傢伙們，叫他們來指揮我們的部隊，他們的用意是好的，可是他媽的他們就是不懂得怎樣辦事！所以我們經常跑到那個少校那裏去，而他却老是付之一笑。他覺得這樣來收拾

我們使他開心極了！」

這樣一直繼續到半夜一兩點鐘的時候。可是你常常不能很快地作決定，因為很可能總有些事不對勁。當人們這樣激動的時候，負責的人們就不能不多多地「聽着」。

有些指摘是真的，有些是假的，你必須判斷得正確，並且決定適當的做法。真是傷透腦筋！

## 南 綫

喬埃·達賴特從法國來到，他希望馬上把他派到前綫去。可是他却被派了訓練營的工作。他被派到科爾多巴一綫去訪問孤立無援的英國人、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的一個中隊，他們留在那裏失去聯系了。

他坐在一輛敞車上走了一天半。然後司機停下來，指着一片曠野外面的一叢橄欖樹林。他說：「醫院就在那些樹底下，至少我知道最近是在那裏的。其餘的路人家會告訴你。到那裏問巴斯基醫生就行啦。」

橄欖樹長得很大，在西班牙東南部，橄欖樹長得比其他的地方都大些。在一棵橄欖樹下面，有一間活動房屋，帳篷排列在別的橄欖樹下面，担架放在帳篷裏面，人們躺在担架上，蓋着毛毯，一動也不動。



「巴斯基醫生正在動手術哩，」一個面孔漂亮的護士對喬埃說。「在那裏，在『外科手術車』裏面。」她向那個活動房屋點了點頭。「你不能進去，不過你可以從窗戶外面朝裏望一望，如果你願意的話。」

喬埃朝手術台上望去。一個人躺在台子上，小肚子剖開了一個很大的口子，一個戴着白色口罩的人正在檢查他的腸子。他把閃閃發光的腸子放在手指頭上飛快地滑來滑去，像一個水手在檢查一根繩子一樣。他抬起頭來朝喬埃望了一眼，他的眼睛在口罩上面皺在一起，笑嘻嘻地望着喬埃兩隻睜得很大的眼睛和鬆弛的下巴。喬埃以前從沒有見過這樣事情。醫生發現一個洞孔以後，就拿綫把它縫起來，然後繼續檢查下去。

喬埃聽到空氣中搏動着一種嗡嗡的聲音，他馬上轉過頭去，就看見在他剛纔走過的田野上有兩處黑土往上噴射開花。他以前從沒碰到過轟炸，可是他知道怎樣來應付這種場面，匍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這時又落下了幾顆炸彈，最近的一顆離醫院帳篷只有一百碼。沒有一個人從外科手術車裏露出頭來。不久飛機的嗡嗡的聲音遠遠地消失了。於是喬埃站起身來，揮去他制服上的塵土和小樹枝，再朝窗戶裏面望去。巴斯基醫生已經做完手術，正在把刀口縫上。

他從手術車走出來，揩着他的滿臉大汗。「真熱哪，」他說。「你是——？……哦，是的。認識你非常高興。」他抬頭向天空望了望。「他媽的，我們又得移動啦，」他沉着地說。「他們昨天幾乎把我們炸到，炸彈就落在那邊的溝裏，所以我們來到這裏，現在他們又發現到我們啦。我們還得搬到什麼地方去呢？」他用手齊在眼睛上遮住太陽，仔細查看周圍的地區。

「我們往後面移動得遠些，可以不可以呢？」喬埃建議說。

「不。我們倒願意那樣做，可是倘若我們移動得稍爲遠些，這些在肚子上受傷的人們就要淌血淌死了。要挽救他們的生命，我們就得趕快處理他們……護士！」

醫生和護士們詳細商量了一番；往基地的醫院移動，哪些傷員支持得住，哪些傷員支持不住。巴斯基醫生本人的敏捷而有效率，替整個野戰醫院樹立了一種風氣。不久，把外科手術車從橄欖樹林中開出來，開到半哩路遠的一叢濃密的樹蔭下。那位外科醫生轉過身來向喬埃說：

「我馬上還要去替另一個人動手術。你要到前綫去嗎？請你在這兒附近呆到晚上，讓我帶你到那裏去，你一個人去可能不容易找到地方。此外，我還想親自看一看那些伙伴們。」

傍晚，他們坐在醫生的小汽車裏出發。車開了十分鐘以後，他把車燈關了。「還有一哩路，」他說。他把車門打開，把身子彎到車門外面去，想把朦朧不清的路綫看得清楚些。

喬埃自言自語地說：「前綫。我到了離前綫、離法西斯軍隊的戰綫一哩路以內的地方啦。」可是他還不大相信，因爲沒有槍砲的聲音，沒有步槍劈劈啪啪的聲音，沒有機關槍卡嗒卡嗒的聲音，沒有大砲的閃光和怒吼。他豎起了耳朵凝神細聽，只聽到蟋蟀的唧唧的鳴聲。他很不安地朝巴斯基醫生瞟了一眼，想問一問這種毫無火藥氣的沉寂是什麼理由。醫生是一個興致勃勃的人，態度和善，但不大歡喜說話。喬埃不好意思提出他的問題。

醫生朝着那些山巒的輪廓點了點頭，深藍色的晚天把山脈的輪廓非常鮮明地映照了出來。「那一條山脈，」他說，「就在山頂上——那就是法西斯軍隊所在的地方。」停一會他又接上說：「現在

這兒沒有多大活動了，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沉寂的戰綫」。一個半月以來，敵人一直想從這裏突破，可是被堵住了，就在這兒——在我們後面二十五公里的地方被全部打退回去。」

他把汽車停住，他們下了車，然後徒步往前走去。喬埃這時沉默起來，實際上有一種思想引起了他的肅然起敬，因為他知道他正走在被攻克的土地上，在這塊土地上曾經進行過戰鬥，它曾經被法西斯匪徒佔領過，又被政府軍收復了，而在這些軍隊中間就有美國人，就有他的同志們。他們曾經看到法西斯匪徒們從這塊土地上逃走，逃到他們前面的黑黝黝的山上去。這種思想有點教人興奮；他感覺到他的心膨脹起來，他的皮膚上起着雞皮疙瘩。

「這是我們的救護站，」巴斯基醫生說。

一個帳篷設在一個陡斜的堤上，篷頂上掩蓋着樹枝和青草。在土堤的前面出現了一個人影子。「晚安，醫生。」「晚安，醫生。喬埃，這是戈朗德醫生。他照管全隊的醫務。……千萬不要點火柴。我們不能把這個地方暴露出來。安排一個地方是極其困難的。」

這個帳篷是作為挖到山腰裏面的一個大洞的進口。洞裏面點起了一根蠟燭，用一塊鐵片遮着。地上平放了營牀用的二十五個担架，還有一些担架靠牆堆着。

「今天只做了兩個手術，」戈朗德說。「你最好能够替我找一些讀物……我也需要電池。昨天晚上，我們的電僅够把那個人的手術做完，」他對巴斯基說；可是喬埃感覺他受到察看，正在被人仔細打量着。當他到達前綫，看到了戰壕，看到了真正的火綫（雖然沒有槍砲聲）以後，這種感受更深。一條淺淺的壕溝彎曲曲地盤繞在橄欖樹的中間，沿着壕溝，零零落落出現幾個朦朧

的人影，他們的臉就是一些白色的點子。他希望他能夠看見他們的面孔，但他們却把他看得很清楚。他心裏仍然抱着不願意發問的那種古怪的念頭。他在這些老戰士中間是一個新兵，在一羣專家的中間是一個外行。

最後他們找到了那位嚮導正在尋找的人，中隊的政治委員瓊尼，於是一切都很順利了。瓊尼是從揚斯頓來的，他是一個老前輩——不是在年齡方面，而是在經驗方面。

「我聽說你來這裏了，」瓊尼說。「今天半夜裏有一個會。除了站崗的以外全中隊的人都出席。你可以跟大夥兒談一談。」

會議馬上變成了一個問答的會議，喬埃是答覆問題的人。大夥兒都想知道本國的消息。產業工會聯合會怎樣了？底特律的汽車工人中間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小煉鋼廠」怎樣？紐約運輸工人怎樣？在問話裏面也夾雜着英國人的聲音，英國工人對美國新興的強大的勞工運動也是非常關心的。

還有，「不干涉政策」怎麼樣了？我們還能够在美國購買供應品嗎？

此外，我們還要在科爾多巴呆多久？爲什麼單是我們一個中隊死守在這裏呢？爲什麼我們不往別處移動，和英美兩國其他的部隊會合在一起呢？

會議結束的時候，喬埃疲乏得連骨頭都酸痛了；可是一到了夜晚，戰壕內的生活似乎又活躍了起來。瓊尼說：「喂，還有另一個會議，我希望你也參加。我和大隊政治委員爲一件事發生了爭論。我們要把這個問題談個清楚。」

爭論發生在瓊尼所做的一件事情上，他把一個兵士帶回到救護站去，要把他的一顆腫脹的牙拔掉。這件事情激怒了大隊政治委員，因為他的這種行動是違反縱隊的規章的。喬埃眼睛一眨一眨地聽着譯員把瓊尼的話翻譯給政治委員聽，又把政治委員的話翻譯給瓊尼聽。只要涉及縱隊的規章的問題，他就一言不發。可是馬上大隊的政治委員就憤憤地指摘說：這是美國人傲慢自大的又一個例子，從相信美國人優於其他民族這個見解上產生的。他說：否則的話，瓊尼就不敢公然自作主張違反規定的紀律了。

喬埃激烈地說道：「你真是小題大做啦。」聽了這句話以後，大隊的政治委員變得寬大起來，他願意把這件事情放下不提了。

但喬埃並不是這樣容易滿足的。一個對於像拔牙這樣的小事都能够造成爭執的政治委員，無論如何不能算是一個好政治委員。關於這位年輕的政治委員的事情，此外他也知道了一些，使他充分相信他的懷疑是正確的。這個人的工作做得不好。

在曙色朦朧的時候，瓊尼捏動喬埃的胳膊把他喚醒了：「喬埃！你瞧那裏！在山頂那邊。」

喬埃望了一望說：「我看見那兒有東西在移動。」

「喂，戴上我的望遠鏡看一看。那是人們在走動。」

附近一個地方放出步槍的槍聲。從法西斯軍隊的戰壕裏回了一陣機關槍，然後一切重又沉寂起來，可是喬埃已經聽到槍聲了。他已經看到法西斯軍隊，看到受傷的人，受到轟炸了。

喬埃把他在南綫發現的事情提出報告，要求調查那個匈牙利政治委員，並建議把美國的這個

中隊立刻調走。

## 林肯大隊

法西斯飛機丟下的一顆炸彈命中了教堂的拱形屋頂，在圓屋頂上造成一個參差不齊的大窟窿，弄得滿地都是碎磚斷瓦。在瓦礫遍地的周圍，一些黑壓壓的人影擠在一起，靜靜地躺在那裏。這些人影是正在沉睡的林肯大隊的戰士們。星星和一鉤新月從炸彈炸成的窟窿裏往下面窺視着。

有人從教堂的黑暗處朝我身邊走來。我說：「你能告訴我隊部在哪兒嗎？」

「我是奧列佛，大隊的副官。……你是史迪夫嗎？唉，真該死，我甚至連你在西班牙也不曉得！」

「老實說，我也沒想到在這兒碰見你。這是多麼小的一個世界啊，」我說。我們兩人在黑暗中站立了一會兒，然後我說道：「你可知道喬埃也在這兒哩。現在我們可以組織一個校友會了——芝加哥偵探局一九三〇年班。」我倆都笑起來。

我們走進一間屋子去。一張橡木桌上點起了一枝蠟燭，有兩個人坐在桌子旁邊，報紙攤在他們的面前，另外有兩個人在牆邊的地板上睡着了。

奧列佛介紹說：「同志們，這是新政治委員。」他說話的聲音鎮靜而從容，眼睛一動也不動；

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我還沒有來得及提出異議，奧列佛就喊醒了那兩個正在睡覺的人。他們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在燭光下眨着眼。一個叫做彭斯，是位詩人兼新聞記者，現任大隊的愛爾蘭中隊隊長；一個叫做波普·柯瓦爾斯基，托姆·蒙尼機關槍中隊隊長。我知道波普。他是大隊裏年紀最大的人，現年五十四歲，二十年以前，他曾經參加美國遠征軍在阿爾根森林<sup>⊖</sup>作過戰。他有一張圓圓的紅臉，頭上堆滿了亂蓬蓬的花白頭髮。

他們說，他們很高興會到我。「我預計在雅拉瑪會碰到你們，」我說，「當我離開阿爾巴塞特的時候，謠傳你們終於退出來休息了。可是謠言總是很多的，我不相信謠言。」

這時大家一句話也不說，奧列佛只是望着我。「波普同志，」他鄭重地說，「你最好把大夥兒召集在一起，讓史迪夫同志對他們講講話。」

他們臉上都露出期望的神色。我說：「爲什麼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呢？」我覺得他們安心下去，都熱烈地表示同意。

波普·柯瓦爾斯基說：「如果是那樣，那麼請原諒我，我還想睡一下。」他笑嘻嘻地望着我。「在國內的時候，你知道，我牀上的一切東西非照一定的樣子鋪設不可。墊子定要這樣放，枕頭定要這樣厚，還有被子。現在，你瞧我的枕頭！」他舉起從那個破屋頂上掉下的一塊磚，把它擦了一擦，吹去上面的灰。「當然我從來也不把我的鋼盔拿掉，我枕在這一個枕頭上睡得像一個嬰兒

⊖ 法國東北部森林地區，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派遣的遠征軍曾於一九一八年參加此處的戰役。——譯者

那樣的甜！」他格格地笑着說，然後往地板上一滾，把他的毛毯蓋到他的粗壯的肩膀上去。

只要我呆在屋子裏，就會有人覺得應該和我談一談。他們都是累乏了的人，昨晚是他們在戰場裏最後一個晚上，一定通夜都沒合眼。「要是不礙事的話，我想到外面散散步，」我說。「坐了一整天的車子，現在我想伸伸腿了。」

我走到教堂的院子去。院子對面有一個露天廚灶，廚灶下面還有火光在那兒一閃一閃。六個人圍在火旁邊蹲着。我在不遠的地方停下，聽一個人正在談話，火光照見了他的帶有傷痕的、紅潤的臉。

「要是他們那樣做的話，就會容易得像從雞窩裏捉雞一樣，」他說。「甚至一位將軍也會同樣地知道。老實說，按照那一個計劃，我們早已把法西斯匪徒趕跑了。你以為麥里曼少校不知道嗎？告訴你，我在那裏和他的距離不會比我現在這樣的距離還遠。我聽他在電話中和那些將領們講話；我聽他對他們解釋，我聽他罵起他們來——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年輕人！可是這沒有用處。我們不得不前進，於是我們前進了，但全綫上別的地方沒有一個人動一動，簡直可以說是每一挺機關槍都對準了這一個大隊，沒有人支援我們的右翼，也沒有人支援我們的左翼。一個人也沒有。我問你：砲隊在哪裏？坦克在哪裏？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可是的確確有人知道，知道爲什麼把我們送出去無緣無故地給人屠殺。錯誤嗎？也許。倘若你要問我，那麼他媽的這樣的錯誤多得哪，而且從這些錯誤上面得到益處的也只有佛朗哥一個人——上帝爛掉他那顆骯髒的心！」



我沉思地走着。我知道那個人說的是二月二十七日進攻的事情，在那一次進攻中麥里曼受傷了。林肯大隊在那次進攻中死傷了一百二十七人。那是二月二十七日的事情。現在三月和四月都已經過去了。在我無意聽到的談話中，最教我苦惱的是：在兩個月以後，二月二十七日進攻的事情還在人們嘴裏談着，辯論着。不過也許（我想）我太看重那個人講的話了。也許只是他一個人在喋喋不休地炫耀自己。一個自以為本領賽似將軍的兵士。我猜想每一個部隊裏都有這樣的人。

「我們要受檢閱啦！」奧列佛說。「在一個領袖面前舉行閱兵。這樣的事在我們這裏還是第一遭呢。這是留在前綫上的一個好處。」他對我露出牙齒來笑着。

在教堂裏，在外面樹下，戰士們忙着準備受檢閱——擦槍，整理裝備，縫上脫落的鈕扣，補衣服上的破縫，擦皮鞋。有幾個人熱烈地在工作。可是大多數人都氣鼓鼓的，即使還沒有露骨地表現出他們的愁眉不展。

奧列佛大聲地說：「傑里！把鬍子刮掉，好不好？他媽的，瞧你就像從馬戲場裏逃出來的一個傢伙。」

傑里不開心地望着他。「得啦，得啦，」他說。「我前天纔修的臉。」他又補充一句，「我的皮膚够柔嫩啦。」

我向傑里打量了一番。「他們並不像你所講的那樣，很喜歡這個檢閱啊，」我說。

「是的。我猜想，他們覺得在這兒當一個戰士光靠穿制服是不够的，」奧列佛說。我感覺奧列佛

和他們抱有同樣的見解。奧列佛說：「好吧，我頂好把我自己的金屬之類的東西擦亮吧。等會見。」

我跟在大隊後面向閱兵場行進。同志們雖然沒有受過真正的訓練，但他們走得步伐整齊，插上刺刀的步槍非常有節奏地擺來擺去。他們一面行進，一面唱着歌，阿爾卡拉德恩納列的人民在街道上，在窗戶裏面向他們鼓掌歡呼。我想：這一大隊並不顯得特別輝煌，但是看去很够格。

他們站在曠野裏立正着，一個軍官騎在馬上沿着隊伍走下去檢閱他們。這個軍官騎一匹有光澤的精神抖擻的馬，他的制服又漂亮又合身。他片刻也不下馬，從隊伍走回原處時勒住了他的馬，然後向戰士們發表了一篇演說。他講的是外國話，聲音是尖銳的，斷斷續續的，站在他身旁地面上的一個譯員把他講的話連續翻譯出來。我站的地方離開他們太遠，聽不清楚譯員在說什麼。

回到被炸毀的教堂去的路上，我想聽一聽戰士們的批評，可是一句話也沒有聽到。他們悶悶不樂，一言不發地行進着。我想我知道這是什麼緣故。這種表演看去似乎是假的。這位軍官騎在馬上，硬幫幫地像煞一副軍人氣派。而這些戰士們——他們的耳朵上還留着雅拉瑪地方的泥土，屁股露在褲子外面。他們和這軍官之間的距離太遠了。檢閱並未對紀律有所幫助。這樣一個軍官對這些戰士們能够提出什麼要求來呢？他們中間能有什麼聯系呢？沒有。這檢閱分明是一個錯誤。這一種表演根本就不應該嘗試。

這個軍官，像他這一類的在西班牙並不多，可是也有一些。他們不是出於一種堅強的政治信念來到這裏的。他們不完全是投機分子，但也不是真正的反法西斯戰士。可是不幸共和國缺乏一

些具有軍事知識的人們，因而非常高興接待他們，把國家所能拿出的最好的東西都給了他們，對他們懷着一種幾乎近於乞憐的尊敬心。有些是努力在幹的忠實的人們，有些是叛徒，在他們的謀叛行爲被揭露並得到證實以前，已經喪失許多生命了。

在教堂裏面，奧列佛走上了耶穌像下面的一座講壇。耶穌像的一隻胳膊已經被法西斯軍隊的炸彈炸去了。奧列佛把我簡單地介紹了一下，然後走下講壇去，由我代替了他的地位。我不喜歡站在講壇上；站在高出衆人之上的地方，使我感到很不舒服。這樣我等於坐在一匹滑溜溜的有光澤的戰馬上面。當我開始講話的時候，我看見了一隻擦得發亮的馬靴，那一位軍官來了，他站在教堂的最後面，一面聽着，一面用他的馬鞭不耐煩地輕輕敲打着他的馬靴。我極力不去想到那個軍官，把我的思想全部貫注在站在我面前的那些戰士們身上。

這一天是五一勞動節，我就用五一勞動節作爲我的題目。我首先報告國內事件，特別說到國內勞工運動的進展，產業工會聯合會在煉鋼業、汽車業和橡膠業方面獲得的巨大勝利，以及這些勝利帶來的進一步勝利的希望。

他們特別關切地聽着關於援助西班牙的情況，而對美國的中立感到特別痛心。

在我談話的過程中，至此爲止，林肯大隊的人們都聽得很愉快，有時候甚至鼓掌喝采。可是現在我轉到大隊本身上面了。我指出：國際縱隊在人數上面並不十分重要。幾千人對於戰爭的勝敗無論怎樣是不會發生多大影響的。那麼國際縱隊的重要性是在什麼地方呢？首先，我們的參加會使西班牙人相信並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擁護中立政策，那種政策在這種情況中是幫助希特勒和

佛朗哥的；其次，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榜樣幫助組織一支有紀律的軍隊。作爲反法西斯戰士們，我們有義務盡一切努力做出一個榜樣——其中之一就是要有紀律……

這時從人羣中發出貓叫似的噓聲，後排有一個人喊出普通士兵的一個口號：「多射擊，少敬禮！」我向他們笑着，一面笑一面在斟酌：要不要把這點說個清楚呢？頂好不要再講下去啦，尤其是在早上的檢閱以後。於是我很快地結束了我的談話。

奧列佛馬上站起來，說：「六點鐘集合。把裝備全部弄好。每人都到這裏。我們今晚就開拔。」他講完以後很快就溜開，我跟着他走到祭壇後面的一個房間裏面去。奧列佛有點古怪地露出牙齒來笑着說：「講得好。」

「他們不喜歡關於紀律的談話。」

「有幾個……在這個部隊裏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大兵思想。這簡直像一個病症一樣。可是一旦他們曉得他們今夜要到什麼地方去，他們就會表現出紀律來啦。」

「到什麼地方去？」

「回到前綫去。雅拉瑪——那個被我們叫做家鄉的地方。」

「不會吧！」我嚇了一跳。「才過了一天就去嗎？」

「當然囉。不要問我爲什麼。也許替我們換班的西班牙小伙子們出了毛病。他們是徵募來的新兵——只是些年輕的小伙子們，可是，現在志願上前綫的，正是這些年輕的小伙子們。他們的用意是好的……大量成年人都不在軍隊裏面，然而徵兵却是一個骯髒字眼兒。要是你談到徵兵，

你就是一個共產黨員。」

「不過他們能接受這個嗎？我說的是回到前綫上去。」

「嘿，他們會接受的。實際上這是一種寬慰。雅拉瑪的的確確像家一樣；戰壕比這個地方舒服得多，不像這裏透風！」

## 在雅拉瑪的戰壕裏

那一天下午我必須到馬德里去，所以我沒有和大隊一塊兒回到他們稱之為家的地方。第二天清早，我就搭上了一輛卡車，一直坐到莫拉塔村。莫拉塔村在雅拉瑪河的一條淺淺的河谷內，這一條河谷約有十來哩寬；在河谷的那邊是一條迤長的山脈，在早晨的耀眼的陽光之下現出一片白茫茫的顏色，橄欖樹林和麥田點綴在山脈的中間。

卡車司機指着那一條山脈。「就在那裏，」他說，「法西斯匪徒們就在那一邊。他們望不到這兒的山谷。我們的戰綫在這一邊，就在山頂下面。你只要沿着這條路走上二哩就行了，不會迷路的。」

我開始走起路來，心裏非常激動。上前綫時的感覺真是教人萬分興奮啊。

我追上了一個西班牙兵士，他正在很自在地沿着到前綫的路信步走去，他帶着兩隻活的小

雞，雞腿吊在他的步槍的槍銃上擺來擺去。我們兩人互相笑了一下，然後一道兒走起路來。根據他的許多手勢，我知道這兩隻小雞不是準備燉來吃的。「Huevos—huevos。」（雞蛋——雞蛋。）這兩隻小母雞要在前綫上活着，替牠們的當兵的主人生蛋。

在大路旁邊的田裏，農民正在幹活，照料他們的莊稼，這個情景也給戰爭帶來了一種古怪的本國風味。對於從山頂上發出的時斷時續的稀疏的砲聲，農民們抱着漠不關心的態度。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法西斯匪徒們不能望到山脈的這一邊，不能看到農民們，不能直接用槍射擊他們。要是偶然有一個人中了槍彈，這也只能說是個意外事件。而這時却是應該照料莊稼的時候。所以莊稼是種在前綫的步槍射程以內的。

我遇見兩個美國人抬着一個波狀鐵皮罐子。「就在那裏，」他們對我說，「在那三個人站的地方。那些樹下面的戰壕就是隊部。」

在戰壕裏面，一個人把身子彎在一架軍用電話機上，喊着：「聽着！聽着！喂！」嘴裏夾雜着詈罵的聲音；另一個人用他的兩個食指熟練地敲着一架打字機；第三個人仰臥在一具手提留聲機旁邊，從留聲機裏顛微微地飄送出「暮暮朝朝」的歌曲。奧列佛靠牆坐着，兩隻腳伸到「房間」裏面去；他正在填寫一份報告。

戰壕有一個波狀鐵皮的屋頂，上面蓋着樹枝，不讓天上的偵察機發現。外面沒有一件東西可以洩露出那裏面進行的任何事情，然而裏面的空氣寒冷而又潮濕，顯得非常活躍。我想起國內販私酒的窩窟——裏面做許多買賣，外面什麼東西也看不出來。

電話員失望地喊道：「喂，真該死！」坐在打字機旁的人說：「趕快些。不然我們就得不到這一星期的薪水單了！」

「沒有薪水單有什麼關係呢？」躺在留聲機旁的人問道。「住在這個鬼洞裏，錢橫豎沒有一點用處。」

奧列佛的眼睛朝那個說話的人身上一瞟。「沒有關係，喬埃，」他說。「也許這些天內你會睡到彭尼薩西姆去，那麼你就可以把你的錢好好地用掉啦。」彭尼薩西姆是地中海上一所後方醫院。這時留聲機裏面播出的歌曲在一陣吱吱喳喳的漸次微弱的聲音裏停下了。開留聲機的華倫把唱片翻轉過來，扭緊發條，又把唱針放在唱片的最外邊。於是其他兩個人便嚷起來。「暮暮朝朝，你就是這個人……」「聽着，你——喂，喂！嗨！我又接通啦。華倫，把留聲機關掉吧！喂！……算了，別關啦，纔又斷啦。喂，聽着，聽着……」

奧列佛從戰壕內鑽出來，站在那兒朝莫拉塔村方向望着山谷那邊，那是山腰旁邊的一堆白色的房屋。他望了一望錶：就快到九點鐘了。他又盯牢了時針。當長針走到十二上的時候，從山脈的那一邊發出三次沉悶的爆炸聲，接着三個烟柱從莫拉塔村直昇到半天空去。在你聽到爆炸的聲音以前，你先看到炸彈的爆炸。馬上又轟隆——轟隆——轟隆地響了一陣。在砲聲中間，你可以聽到步槍子彈的聲音從頭上呼呼地飛過。到九點一刻的時候，砲火停了，村莊裏面也不再冒出一團一團的烟了。

分毫也不差。每天法西斯軍隊的排砲總是從九點到九點一刻轟擊莫拉塔村。在八點五十五分

的時候，村民們就躲避出去；從村莊中經過的汽車就停在路上；然後砲轟開始，繼續下去，停止了；汽車又開動了，村民們又回來恢復他們的生活，又有二十三小時零四十五分鐘不受戰爭的傷害。有一次，有兩匹騾子被炸死了。磚房被炸去了少許。美國人相信這是德國的排砲轟炸的；只有德國軍官們纔能做出這樣一定的常規。

奧列佛站在我的身邊。「那是我們的鬧鐘，」他說。「你可以根據它來對你的錶。……我們此刻可以到戰壕上去逛一逛啦。」

在山坡下面，有一羣人正在挖戰壕。「這一道戰壕要用來做連結我們前綫和大隊部的交通壕。這一道鋸齒形的戰壕約有三百五十碼長，而寬得足夠通過一個担架，遇到砲轟和襲擊的時候是不會有危險的。……這些傢伙，」他大聲地說，「都在加班挖戰壕，因為他們在馬德里逗留的時間超過規定的假期了。」

我們走進了一個橄欖樹林。每一棵樹的附近都挖了一個六呎深的洞，洞大得足夠容納一兩個人。洞上蓋着架在樹幹上的樹枝，還搭拉着較小的枝子，整個的洞都覆上了青草和葉子。「值班的人們夜間就睡在這裏。除了槍彈直接命中以外，他們受不到任何傷害，」奧列佛解釋說。「這些洞都很好，不過下雨的時候就要積滿了水。……伙伴們靠近了樹挖洞，因為樹根可以使地面不致於崩陷下去。」

一個戰壕一開始只有一點痕跡，漸漸加深變成了溝渠，然後越過越深，直到牆壁比一個高個子的頭還要高些，又和另一個戰壕成直角交叉在一起，這時我們到了火綫上啦。正對着我們的前



面，一個人站在夾在戰壕兩壁中間的一個台階上，從兩個沙袋中間的夾縫裏偷望着無人地帶。他的步槍放在夾縫裏，用他的臉支着。我極想看一看法西斯軍隊的戰綫和兩軍中間的無人地帶，但我遲疑不決地不願要求那個兵士站到一邊去。我希望我能够消除掉作爲一個旅行家的感覺。

沿着戰壕每隔十碼就有一個人在站崗，別的人們躺在他們從後面牆壁上挖成的壕洞內——他們在混時間、睡覺、讀書、寫信、清理裝備、談話。除了步槍和機關槍的偶發的聲音以外，氣氛非常寧靜，幾乎到了教人慵懶的地步。可是在這裏子彈呼嘯的聲音和噼啪的聲音要頻繁些，並且偶而有子彈落在沙袋上時那種轟隆一聲的劇烈的響動。奧列佛笑嘻嘻地望着我。「你聽到的子彈不會打到你的身上，」他說。「頂糟糕的倒是他媽的迫擊砲。迫擊砲有彈性作用，從砲口出來時沒有聲音，會給你一個冷不防。」

在戰壕內一個彎進去的地方的外面貼了一張通告，上面寫着：「禁止入內，這是狙擊兵查理的地方。」狙擊兵查理很快地打了兩槍，轉過身來朝我們眨了眨眼。「剛好打中了一個，」他報告說，不大教人信服似的。他是一個高大的、身體結實的漢子，年紀有四十多歲了，一叢濃密的鬍鬚鬚曲下來掩住了他的嘴。馬上他又開始了他的口頭禪。「我需要的是他們的一副蔡司瞄準鏡，」他說。「要是我有了他們的一副瞄準鏡，那就方便多啦。那樣他們的戰壕就會像近在眼前一樣，他們身上的汗毛我都能够數得清楚。可就是他們離開我太遠，拼命睜大了眼睛望着他們，望久了真叫我眼痛。一副蔡司瞄準鏡——」

「你這個地方倒不錯，」我說。戰壕裏牆壁上的泥土都墊平了，查理的隨身用具井井有條地

放在一個夾在牆壁內的架子上。查理是加拿大的一個伐木工人，獨身的漢子。整潔已經變成他的習慣。他笑吟吟地望着我們。

「一點也不錯，」他說。「來看一看。我有一個小小的窺孔，看見了嗎？敵人連這個小洞在什麼地方也不會知道。我也不把我的槍挪動一下。我在夜晚間走出戰壕，把前面的地上洒了水，用草和樹葉子蓋在上面，所以我放槍的時候就不會攪起一陣灰塵——只是清脆的一響，敵人不會知道這槍聲是從什麼地方去的。」

「巧妙得很。」我說。「那樣可真不錯。」

「當然不錯呀！」他吃吃地笑起來。「什麼事都有竅門，就像人家說的一樣。……我還要給你看一看別的東西。你看見我背後的那一堆土嗎？你可知道那是做什麼用處的？我站在窺孔後面時，敵人不會知道我在這兒。爲什麼呢？因爲我不讓青天在我背後露出來，不然的話，一旦我站在窺孔後面，敵人就看到窺孔變成黑洞洞的了。我經常把這個秘訣告訴大夥兒。」他吐了一口唾沫。「可是他媽的他們就是不聽。因此禮拜六那天艾德就碰上啦。敵人瞄準了等着他，一到那個洞口變黑敵人就放槍，險些兒把他的耳朵打掉。有許多預防的辦法不用，偏讓一些好伙伴們給敵人幹掉，這真是一樁罪行。我知道什麼叫做塹壕戰。可是他們總不聽我。」

我從窺孔中望出去，第一次看到了無人地帶。這裏的山頂差不多像高原一樣平坦，從林肯大隊的戰壕微微地傾斜到上面去。斜坡上彈痕纍纍，到處凸凹不平，被子彈打得像篩子一樣的橄欖樹分佈在這山坡上。在五百碼開外的地方，一道不整齊的土墩匍伏在田野上面，那便是法西斯軍

隊的陣綫。我出神地望着。狙擊兵查理在我後面說：「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吧。我要是有一副蔡司的好瞄準鏡該多好啊！」

## 橄欖樹

到夜晚我依舊覺得不滿足。我在戰壕裏呆了一整天了，可是我還沒有失去一個旅行家的感覺。

我對奧列佛說：「我想在戰壕裏蹣跚蹣跚。我回來會認得路的。」

「口令是『*¡nuestra victoria!*』（我們的勝利）。」奧列佛說。

「*¡nuestra victoria!*」

上弦月撒下一片蒼白色的朦朧的光亮，它所遮掩的東西比它照見的東西還要多些。我差不多馬上就受到了盤查，有人喊道：「口令！」

「*¡nuestra victoria!*」

「過去。」那個哨兵走上前來偷偷地看一看我，便驚訝地說：「怎麼，是新的滑稽明星<sup>⊙</sup>！你

⊙ 英語「滑稽明星」(Comic-star)和「政委」(Commissar)發音相近。這裏是哨兵弄錯了。——譯者

爲什麼在這樣深夜裏還逛來逛去？還是你起得太早了嗎？

「哦，不過散一散步。我且問你：你叫什麼名字？」

那個哨兵把他的步槍換到左手裏，把他的右手心放在褲腿上擦了一擦。「我是前托姆·蒙尼機關槍中隊的軍曹魯比·里昂特。」

「怎麼說是以前的軍曹？」

「真造孽，」魯比說。「真是造孽。在馬德里多耽擱了一天，在這兒就被禁閉了兩個月。——

我到馬德里去，在那兒過得很愉快，可是遲五分鐘沒有趕上車子，那些混蛋們不等着我，回來以後，他們就把我降了級。所以現在我是一個敗壞風紀的分子啦。」

「喂，抽一根香烟吧。……除此以外，一切事情都怎麼樣呢？」

「哦，還不是平平常常的老一套，」那個以前的軍曹對燃着的火柴瞟了一眼，密切地望着我說：「你喜歡不喜歡今晚的伙食？」

這個問話似乎別有用意，因此我就謹慎地說：「我吃過比這好些的伙食。」

「你當然吃過！告訴你，這次戰爭中的罪惡，就是他們扔給我們吃的蹩腳伙食。」他走近一步說。「你聽着，他們並不是沒有做好伙食的材料，可是廚房裏的人們簡直是些笨蛋！甚至連水開了也不曉得。就像那一天，我們得到送來的半隻羊，上好的肉，我親眼看見的，真混蛋，他們竟把它丟到太陽下面去晒，弄到太陽把肉晒乾得直豎起來，肉裏的蛆多得把肉都帶走了！這也是我親眼看見的。一個廚子還拿了個套索在後面追呢。……」

我笑起來，魯比也和我一道兒笑起來。「賈基·希拉做廚子的時候，我們倒吃得很好。」他接着說。「賈基是墨西哥北部頂好的廚子。」

「後來他怎樣了呢？」

「他生氣不幹了。所以，現在凡是出了亂子的，他們就讓他們做廚子來懲罰他們。哼，就像我說的——」

過了一會兒，當我往戰壕那邊移動的時候，那個以前的軍曹在後面喊我說：「喂，你什麼時候纔去睡一會兒啊？」

我在戰壕裏躊躇了一兩個鐘頭，同志們把他們腦子裏所想的事情都告訴了我。那些同志們都只現出朦朧的影子，身子不成樣地裹在由毛毯臨時做成的中間挖了一個洞的大衣裏面。也許因為是在夜間，也許是爲了別的一些緣故，總之他們都在講話，也用不着我發問。陌生的感覺已經從我身上消失了。

我站在射擊的腳台上一個加利福尼亞的小伙子旁邊，從胸牆上瞭望無人地帶。現在月亮已經沉下去了，可是星星還是亮晶晶的，明亮得足以照出從背後天空映襯出來的一些山巒的黝黑的輪廓。那個加利福尼亞人說：「你可知道，我們國內也有好些地方像這裏。比方說，加利福尼亞就是。你到過加利福尼亞嗎？」

「沒有。」

「要是你到過那裏，你就懂得我的意思啦。在聖約雅昆流域周圍山腳下的那些地方。我猜想

再往南去也是那樣，不過我從來沒有到過那裏。……你看到那棵橄欖樹嗎？」

橄欖樹呈現出一種瘦削的、盤根錯節的形狀，比黑黝黝的佈滿星斗的天空還要黑些。子彈已經把小樹枝打掉，把大樹枝打壞了，所以橄欖樹已經失去它所具有的那種勻稱和莊嚴之美了；這分明已不是一棵橄欖樹，而只是被戰爭毀壞的一棵樹。

「是的。」

「那就是本恩送命的地方。就在那一棵樹下。我們正在進攻，他突然跌倒在他後面的地上了，我對他喊着。那時我正在另一邊不到十呎的地方。我喊着說：『你沒有什麼不好嗎，本恩？』他回頭對我望了一望，笑了一笑，並且也喊着說：『很好，我們衝上前去吧！』他又站了起來，走了兩步，便突然摔倒了。他向前跌了一個倒栽葱，就死去了。」那個小伙子歎了一口長氣，說：「隨後我便幫着把他抬回來。就在那一棵樹底下。」

那小伙子說話的聲音太單調了。他極力抑制他的聲音，把說話的腔調弄得板板地一點變化也沒有。那小伙子說：「我站在這裏，望着那一棵橄欖樹。想起來是很奇怪的。好像我可以看見本恩在走路——我說的是從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開始，一個很小的小孩，走到學校去，走回家去，這兒玩玩，那兒玩玩，後來長大了，走到做工的地方去，走到人們可以到的一切地方去——你知道嗎？一個人一生走多少哩路啊！——不說旅行，且說在日常生活中的行走罷。一定够多的。而這一棵樹一直在這兒生長着，就是這一棵樹。這一棵樹一定老了，橄欖樹要活很長、很長的壽命。而本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在另一個世界走來走去，他永遠也不會再想到西班牙了。你

知道我的意思吧？他每走一步就離那棵樹更近一步，不過他不知道罷了。也沒有人會知道。我想到那一棵樹，想到本恩，我不知道——唉，我不懂得。」

他不知道正在等待着他走到最後躺下去的是哪一塊小小的地方，是哪一棵樹。這就是他不知道的地方；他不願意說出來。可是這個問題老在他腦子裏打轉，每當他看見他的朋友死去的那個地方時，這個問題在他腦子裏就擴大一點。

「你認識本恩已很久啦，是不是？」

「是的。我們倆一同去上學。我們倆做什麼事情都在一起。我們倆一道兒來到西班牙。我們一道兒參加一九三四年的罷工——你是知道的，就在舊金山的碼頭上。那一天，在林岡山上，警察在我們背後追趕着我們——他媽的，那一天警察全部人馬都到齊啦，他們準備來一次大屠殺。當時真是一片混亂。他們準備馬上把我們趕進海灣去——他們就是這樣想的。可是他們辦不到。他們倒真的槍殺了一些人，可是他們卻不會把我們任何人趕跑。那一天，要不是虧了本恩，我幾乎把這一條命送掉。你真該看看那個場面。有一個彪形大漢，這人真是十足的暴徒，他手裏拿了一根一碼長的棍子朝我頭上打來，你知道，那時我正在忙着對付另一個傢伙，一時措手不及，他已經把他的棍子舉起來了，朋友，我真希望你能够看到過他的那一副面孔，他簡直像狼在嗥叫。於是本恩縱身一跳，一拳就把他揍倒——他一拳剛好打到他的耳門下面，那傢伙便倒下去了，砰地一聲，他躺在地上直挺挺地死去了。朋友，本恩真能揍。他——」

那個小伙子突然沉默起來，他把身子倚在胸牆上，目不轉睛地望着黑暗處。「那是什麼？」

他小聲地說。「你看見了什麼沒有？」

「沒有。」

我們兩人凝神地望着，可是並沒有看到什麼。一會兒那個小伙子若有所思地說：「橄欖樹是和平的樹啊！我猜想人們在種植任何果樹以前就種它了，在人類歷史以前。」

「所有這些年來，它都是年復一年地結着果子——後來法西斯匪徒來到，就把它打壞了。」

「也許你以為那棵樹死了。嘿，它可沒有死。儘管有那麼多的子彈打在上面，它還是活着的，而且現在就長出青枝綠葉來。等到我們把法西斯匪徒消滅以後，它還是要照它原樣結果子啊！」

## 帶槍的廚子

我很合理地說：「可是難道你們不能說服希拉，叫他重新擔任廚子的工作嗎？要是你們有人和他談一談的話——」

「嘿，談一談！」魯比喊出聲來說。「我們都談得嘴乾啦。」他提高嗓子模仿賈基的話：「廚房裏沒有我的事。我有一桿俄國的好槍，我來到這裏是用槍打法西斯軍隊的。我是留在前線上的！在廚房裏怎能打法西斯軍隊呢？滾他媽的廚房！」魯比啐了一口唾沫。「真是一個固執的小伙子。」



他一心只想用他媽的那桿俄國槍打法西斯匪徒，沒有一件事可以改變他的念頭。」

「好吧，」我說，「我們不妨用另一個辦法對他試一試。聽着，同志們，今天晚上，假使我們——」

我們十幾個戰士圍攏在一起，計劃用一個辦法叫我們的同志來上我們的圈套。

賈基是機關槍手們排隊領伙食時站在前面的第一個人。他從燉鍋裏舀出一點，把盤子舉到鼻子跟前聞了一聞，然後發出作嘔的聲音。「發臭了！」他喊道。於是他滔滔不絕地罵起來。他背後的一個人把一片麵包浸在燉鍋內，然後嚐了一下，說了一句話，便厭惡地走開了。

「你能指望什麼呢？」魯比說。「沒有人能夠用他們送給我們的這種臭肉做出任何好菜來。」

「賈基能夠！」米勒熱烈地說。「我們部隊裏有他媽的世界上頂好的廚師，我們還得吃這樣倒霉的東西！」

賈基在那兒聽見了，他把燉菜裝滿了一盤，然後獨自走過去坐下，假裝着沒有聽見。賈基的兩隻眼睛瞪着盤子，臉上露出陰鬱的神色。談話又在繼續下去，聲音越來越高了。現在已經不是在做戲，小伙子們都激動起來。實在，倘若廚房裏送來的壞菜毒害了他們的肚子，他們怎能再和法西斯匪徒打仗呢？

我說：「我們要在廚房裏來一個徹底的整頓。它將不再是一個處罰人的地方了。我們要把我們所能有的最好的同志放在那個位置上；這將是一個榮譽的位置。說起來，我們伙伴們的健康和

生命都要靠一個好廚房，老實說，我們只要把我們最好的弟兄放在那裏就行啦！……大家說，誰去好呢？」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賈基！我們推薦賈基·希拉！」

「我不去廚房！」賈基說。「我要去打法西斯匪徒！我再也不去廚房了。」

大夥兒熱烈地談論起來。賈基的臉抽動着。「我不能跟像他們給我的那些幫手們在一起工作，」他說。「每個人都是傻瓜，都是懶漢。廚房裏有很多吃力的活，他們可不願做。這些人都不中用。」

「你可以挑你自己的幫手，」我告訴他。

賈基舐一舐嘴唇，眼睛一眨一亮的。「可是等到打大仗的時候，我非離開廚房不可！」他大聲地說。「我有一枝上好的俄國步槍，我得要使用它。」大家都知道賈基說的話是當真的，因此都不說什麼了。

不到一會賈基就說：「我要德普塞，他也是個好廚子。東尼是做咖啡的能手，我也要他。」

大個子喬埃會切肉。單是這幾個人就行啦。」他對一夥兒向他喝采的人瞪了眼看着，就裂開嘴角笑起來。於是小賈基走到廚房去了，把他那枝上好的俄國槍扛在背後。他片刻也不離開他的槍，每當廚房裏有什麼事叫他不如意的時候，他便要抓起他的槍，說他不幹啦，他要去打法西斯軍隊啦。在廚房裏他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要是把食物送給大夥兒的一輛卡車到遲了的話，他就要大發脾氣。

有一天，賈基提出了一個要求，他說：除非建築一條通到前綫的新公路，讓食物送到前綫不至於過遲，他決不再在廚房裏呆一天。他說：要是費一個鐘頭纔能經過這些山把食物送到前綫去，食物就不可能還會是熱的了；即使是頂好的食物，冷了也是不行的。雖然我們沒有時間，但這件事情還得要設法處理。他依舊留在廚房裏，直到大戰門來到的時候。

那是一件事情，可是我們這兒有成千椿事情哩。有些事情可以辦到，有些事情却不能辦到。我盡力去做我能够辦到的事情。我學着做。埋怨要是合理的，我就設法去把它解決；埋怨要不合理，我就不去管它。只要可能，我就鼓勵大夥兒自己想辦法，像說服賈基擔任廚房的工作一樣。在這類情況下，任務是建議，是鼓勵，是免除官樣文章，發揮伙伴們的主動力。

同時，還得打仗，而打仗却不光是做廚子和作政治討論的事情。

這也是屬於鋤頭和鐵鏟工作的事情。

「用槍砲佔領的地方，必須用鏟子守住。」大隊的參謀約翰遜少校不斷重複軍事上的一個老規律。這是一個很合時宜的口號。問題是要叫使用槍砲和鐵鏟的人們相信它，並且按照它行事。他們已經用他們的槍砲佔領了這土地，這是不錯的，可是土地是鐵硬的，乾燥的，往往又是亂石嶙峋，而他們對約翰遜少校的口號所給予的答覆是：「我們不能把整個西班牙都挖通啊！」

這不是把他們排起隊來，命令他們挖戰壕的問題。這也不是用挖戰壕作爲一種懲罰——比方說，作爲對請假逾期的懲罰——的問題。我知道這一點。我知道他們是會挖戰壕的，假若他們願

意挖，假若他們認爲這件事重要，假若他們了解爲什麼挖戰壕對於打勝仗是必要的。

大隊司令部開了會，詳細地討論了這一個問題。

雙方的陣綫大致是沿着山脈平行的，在多數地方，山脈的細長的山峯橫互在敵我兩軍的陣綫之間，所以林肯大隊不能看清楚敵軍的戰壕。這本來是一種危險的局面，使突然的進襲或突然的空襲成爲可能。因此，我們的目的便是要把兩軍的陣綫之間的地面看得比較清楚些。要做到這點，除了來一次進攻以外就只有把林肯大隊的陣綫往前推進一點，使它們離法西斯軍隊近些。

這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在離前綫約有十五碼的地方正對着山頂挖上若干道縱排的戰壕，然後再在最前綫挖上一道橫排的戰壕，和那些戰壕成爲直角——換句話說，就是挖一連串丁字形的戰壕，用橫木把它們連在一起。

這就是說需要大大地挖起戰壕來，這件事只能放在夜間做，並且要極端謹慎，以免引起敵人的砲火。

我把大夥兒召集起來，每次聚集了一批人，在黃昏裏潦草地畫着圖解，說：「這裏是我們，這裏是他們，這裏是山脈。你們要知道，那個山脈是整個陣地的關鍵，是馬德里的關鍵。只要敵人前進五十碼，到達山頂，他們對於整個山谷，公路和鐵道就會一覽無餘了。在這種情況下，五十碼就等於十哩，對不對？」

大家都咕噥着表示同意。於是我就根據這一點來說明關於丁字形戰壕的計劃，強調戰壕應該有兩條戰綫，應該有一道後備的戰壕，以防第一條戰壕被敵人佔領。我堅持必須避免兩軍之間觀

測不到的地點。他們都完全了解到這一點，他們都是站過崗的。

挖丁字形戰壕的工作繼續了好幾個星期。這是一件艱苦的工作，但他們懂得爲什麼要挖這些戰壕，他們懂得這個計劃的意義，因此他們也就堅持下去了。因爲專心在有用的工作上面，部隊的士氣也提高起來。在小事情上面發的牢騷也少些，關於替我們的死者建立紀念碑的談話也少些了。

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是在新戰綫上建立機關槍陣地。在建造最初的戰綫時，一般的傾向是要把陣地建築得堅固些；但是這樣做去就要把它們弄得非常顯眼。林肯大隊的人從法西斯軍隊俘虜的嘴裏知道敵人看得見我們的機關槍陣地。所以建築新戰壕有一項重大任務，就是要使陣地既堅固又看不出。一旦安置機關槍以後，就發出嚴格的命令，根本不准在白天放槍，以免暴露我們的陣地。

正在這個時候，林肯大隊得到一個好機會。傳來一個消息說：我們要有機會試驗一種新式的反坦克砲，作爲摧毀機關槍陣地的一種武器。這事情倒不錯。但它需要細心的準備工作。首先它需要確切地知道法西斯軍隊的機關槍陣地的所在。

夜間的偵察兵派遣出去了，他們的任務是要一直走到法西斯軍隊的鐵絲網邊。法西斯軍隊有很多的鐵絲網和鐵樁，我們什麼也沒有，可是法西斯軍隊把他們的鐵絲網放得離他們的戰壕太近——離戰壕二十五碼或三十碼以內。偵察兵靠在鐵絲網上，注視着，聽着，當一挺機關槍發射出子彈的時候，他們就細心地記下槍聲的方位。有時候他們碰到一個法西斯偵察兵或者流動部

隊，就要發生衝突，並且突然響起手榴彈的爆炸聲。要回到自己的防綫來有時候也會成爲一個問題；已經傳過了話：「偵察兵出去了——別開槍！」可是有的哨兵總要神經緊張，他以爲向他奔來的是前來襲擊的法西斯軍隊的兵士，而不是我們自己的偵察兵，於是便朝天開一槍，發出警報。經常有很多的刺激，這對士氣也是有好處的。

在雙方的戰壕的中間，有一輛燒燬了的破舊的坦克，那是早期進攻的一個紀念物。一天早晨，天快亮的時候，一個戰士躲在那輛坦克裏面。那不是理想中的一個好地方，金屬已經失去它的堅韌性，一顆步槍子彈很容易把它射穿，而炎熱的太陽却把這個破爛東西晒成了一個烤麵包的爐子。可是他依舊整天呆在那裏，林肯大隊的人在他背後來一個牽制行動，故意吸引敵人的砲火。到傍晚的時候，這位觀測員把法西斯軍隊的機關槍陣地清楚地勾劃出來了。

這一次關於反坦克砲的消息不像多數別的消息，它已經證明了是實在的。砲隊——美國的砲隊——開到了，帶了三尊大砲，這三尊砲：乾淨、小巧、致命。到傍晚的時候，林肯大隊的人就動手拆毀他們戰壕的胸牆，建築砲兵陣地，並幫助砲兵把大砲安放在它們的陣地上。

天剛亮，我們就開了砲。大砲極其經濟和敏捷地命中了法西斯軍隊的每一挺機關槍。三分鐘以後，一切都完事了，又急忙把大砲拉回到安全地方去。

自然，法西斯軍隊又弄來了一些機關槍。然而他們有好幾個星期都是胆戰心驚的。

## 夜間圖書館

我把我的司令部駐紮在「圖書館」內，這是從堅硬的黃土上挖成的一個洞，上面蓋着帆布。這個洞離我們的戰壕不過五十碼，被用作圖書館、俱樂部和娛樂室。這裏面放着稀少的書報，還有象棋、乒乓球和網球拍子。在這裏負責的是一個身體太弱、不可能擔任繁重的工作的人，但是他又不願離開前綫。「打仗我是行的，」他堅持說。「我做不了鋤頭和鐵鏟的事兒，可是我却會使一桿步槍。」他對他的圖書館工作勤奮負責，極力設法使書報保持流通。他讓我用一卷「工人日報」當枕頭用。

帕特·米德到我這兒來。他說：「工人同志，我要來向你訴苦啦。」帕特是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會員，在我們這個部隊裏面他大概是僅有的一個會員，他自己也有點意識到這一層。他的帽子上佩帶了一個圓形的小徽章，稱呼每一個人「工人同志」，在他的政治信仰方面多少表現出狂妄的樣子。

「好，你說吧，」我說。

「我沒有收到『產業工人報』，這個報沒有寄到。這是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報紙啊。」他鄭重地說，「我猜想在後方基地有些傢伙故意把報紙扣下啦。」

「我想不致於，」我說。「大概只是因為郵政局辦事糟糕的緣故。當我離開基地的時候，郵局正在改組，郵務現在應該改善了。再過幾天看看，要是你的報紙還不能寄到的話，請告訴我。」

一大捆報紙寄到了。這時帕特高興起來。他一交了班便伸直了身子很舒服地躺在圖書館的外面，開始讀着報。

但是，當他讀報的時候，他的快樂漸漸消失了。他嘴裏咕噥着。一會兒他亂罵起來，把報紙揉成一團，跟着把它們拿走了。

夜間，圖書館是沒有燈光的。不但沒有燈光，就連一枝蠟燭也沒有。可是人們依舊聚攏在那裏，在黑暗裏斜躺着，閒談着。他們把這叫做「胡扯」，叫做「吹牛」。這一晚上帕特進來時，圖書館管理員立刻歡迎他，說：「帕特，你今天收到一些報紙，為什麼不拿來讓別人看一看呢？」

帕特說：「啊，我不知道把報紙弄到哪兒去了。這是誰的腳呀？還有一個人可以坐下的地方嗎？」

「到這兒來，」奧列佛說。

圖書館管理員不讓他藉故把話題扯開，接着就說：「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你不知道報紙在什麼地方嗎？你並沒有把它們丟掉，是不是？真是活作孽，帕特，報紙這樣的稀少——」

「管他媽的！」帕特憤憤地說，他這一句話帶來的沉默，須得由他自己來打破了。「這些報紙橫豎對我們沒有什麼好處，」他說。「我不曉得到底爲了什麼，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對我們的支持並不比以前好些。我們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會員在這裏不過兩三個人，國內的同志們好像不知



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似的。嘿，那一份報紙——」他罵着說。「上面有一篇文章，說我們打仗的目的是替資本家大老闆們守住西班牙。」

「他們把我們跟佛朗哥混在一起啦，」奧列佛說。

「寫一封信給他們，帕特，」魯比建議說。「對他們說：他們都很愚蠢。」

帕特自己批評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報紙是一回事情，但是如果魯比要來批評，那又是另一回事情了。帕特說：「不錯，不過我自己對於這次戰爭中的許多事情也不喜歡呀。你要問我為什麼不喜歡，那麼我就可以告訴你，因為西班牙政府裏面滲入的資本家太多啦！」

「第五縱隊，」魯比說。「政府應該把他們查出來，槍斃掉。」

「一旦捉到他們，政府就會馬上把他們槍斃，」奧列佛說。

「可是政府做得不够快。」

「這也不單是第五縱隊的問題，」帕特說。「我說的是另一些人。那些人或許不是真正的賣國賊。他們也許真正擁護政府。但是他們為什麼要擁護政府呢？當然是因為他們可以從這上面得到好處。一旦戰爭結束，他們就要伸出兩隻手來奪取眼前的每一件東西啦。這就是教我感到苦惱的事情。」

我說：「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可以贏得戰爭，但要喪失革命嗎？」

馬上大夥兒沉默起來，他們都認識西班牙托洛茨基匪幫的口號，他們從長期的經驗中知道托洛茨基匪幫所能做出來的只有謊話和出賣。但是帕特却執拗地說：「是的，史迪夫，你看一看吧，

這就叫做革命嗎？從這一件事情上面到底能得到什麼結果呢？我們不要求為社會主義而作戰，甚至共產黨員也不作這樣的要求。實際上他們也認為我們不是為社會主義而作戰的。拿阿采納這類人做個例子吧。你不能說像那樣的人要求實行社會主義，或者要求類此的任何東西。」

「是的，」我表示同意說，「我並不是預言家。然而却有一些顯明的事實，誰都可以看得見的。」我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把烟斗裏裝滿了烟，人們都在一旁等着，這時法西斯陣綫那邊的機關槍簡短地響了一發，司令部戰壕內的留聲機正在唱着：「……我不曉得你在哪一方，你的近況怎樣，你是不是也很寂寞淒涼。」

「拿西班牙工業方面的情形來作個比方吧。工廠、礦山、鐵路、自來水、銀行等等。這一切一向是私人所有的。佛朗哥發動了戰爭以後，那些老闆們都怎麼樣了呢？」

「他們跑掉啦，」帕特馬上說。「他們跑到佛朗哥那邊去啦。」

「許多重要的經理們都和他們一道跑啦，」奧列佛接着說。

「確實的，」我說。「他們拋棄了他們的工廠，跑到佛朗哥那邊去啦。好吧，讓他們跑吧。可是工廠必須繼續開工，鐵路、銀行，等等都必須繼續舉辦。政府必須使它們繼續營業，以便抵禦佛朗哥的進攻。所以政府把它們接收過來。這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否則不經過鬥爭就要讓給佛朗哥了。」

「只要老闆們依舊留在工作崗位上，依舊對國家效忠，政府並沒有接收任何東西，」奧列佛說。

「一點也不錯。政府接收被老闆們丟棄的東西。請注意，政府不得不接收過來的，是最大的工廠，最大的礦山，最大的田莊。繼續效忠國家的多半是小商人們——店主們，工匠們等等，沒有像汝恩·馬奇這一類的傢伙。……好，這些巨頭們都變成了叛徒，跑到佛朗哥那邊去啦。可是，當佛朗哥被打敗而跑掉的時候，這些傢伙們還到哪裏去呢？」

「和佛朗哥一道——不管他到哪裏，」奧列佛說。

「我希望他們跑到墳墓裏去，」魯比說。

「當然他們是要和佛朗哥在一道的！他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他們已經把他們自己捆在佛朗哥的身上啦；不管怎樣，他們也是掙扎不掉的。你能想像他們還會跑回到這裏來，要求被他們打過的政府把他們的財產交還給他們嗎？當然是不會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啦，」魯比說。「甚至在佛朗哥失敗以後，政府還必須繼續開辦這些大工業。」

「政府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們不能把那些工業交還給原來的老闆們，那樣做簡直是荒謬的。製造一個新的老闆階級嗎？怎樣製造呢？根據什麼呢？而且爲什麼要那樣做呢？……」我說。「戰爭逼迫政府把西班牙工業的主要部門收歸國有。戰後政府沒有辦法放手不管，顧不得有人『願意』這樣或者不願意這樣。」

奧列佛吃吃地笑了起來，他說：「而且那也是一種奇怪的事情。倘若法西斯匪徒不動手，也許不會發生多大的變化。汝恩·馬奇和那一羣人仍舊會保持他們的財產，保持他們的收入和漂亮

的房子。可是法西斯匪徒不會不動手的。他們永遠不會放手不管的。他們勢必繼續不斷地伸出手來，掠奪的東西越來越多，偷竊、屠殺、搶劫，什麼都幹。法西斯主義不會靜止不動的；它勢必擴張，不然就要滅亡。他們極力阻止進步，要把時鐘的針扭轉回去。他們不這樣做還好，這樣做就逼得人民更要往前大踏一步。」

這時壕塹裏有點騷動，有的人擦起火柴，慢慢走動着；有的人打呵欠；有的人摸到門口去，碰着擺在中央的桌子。談話結束了。「怎麼樣，帕特？」我問道。「那樣能夠回答你的問題嗎？」

「是的，大多數問題已經回答了，我想……可是，管理這些工業的依舊是政府，工人得到什麼保證，日子能夠過得比在資本家大老闆下面好些呢？政府！政府是什麼？說穿了不過是警察呀！那些戴着勳章的警察光是把棍棒打在窮工人的頭上！請問，有哪個警察不是工人的敵人！」

魯比說道：「帕特，你真是傻瓜。警察不是政府。警察是工具，是武力——」

「你有一桿槍，」奧列佛說，「可是槍不是你……這些日子裏，要在這裏做一個警察，你就非得首先上前綫不可。」

「被你說到要點啦，」托姆·蒙尼機關槍中隊的隊長西德熱烈地說。「在以前的西班牙，政府只是一小撮有錢的工業家和地主們。他們僱了警察，警察遵守他們的命令。可是在今天，這是一個人民的政府，一個民主的政府，警察是人民的一部分，從他們保衛人民的這件事上，他們已經證明了他們的忠誠了。你不覺得一個政府跟另一個政府，或者一國的警察部隊跟另一國的警察部隊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我想還是會有不同的。」

「你說得對啦，」魯比說。「真的，我就知道這樣的警察，我曾經在阿爾巴塞特的咖啡店裏碰到過一個。他的脖子上被馬刀砍了一個八吋長的傷口。……比方說，有一個離鄉地主回來了，看見他的田地都被分給了農民，他便要到警察那裏去，要警察把那些農民趕跑，把他的田地要回來。喂，你想那位地主先生會碰到什麼情形呢？」

查理說話的聲音從戰壕的後面發出來。他說：「史迪夫，你說把工業收歸國有。我覺得完全是對的。這就是社會主義嗎？」

「不是的。始終效忠政府的老闆照樣經營他們的實業，不成問題，他們還是可以繼續經營下去的。不過，聽我說，重工業、銀行、礦山、鐵路，都要歸人民政府來經營，在我看來，那是走向社會主義前進了一大步……」

## 巴塞羅那的五月四日

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匆匆地過去了。在北方，在巴斯克鄉間和阿斯都里亞，法西斯軍隊發動了進攻，政府方面的防軍戰鬥着，退却着，又戰到最後一噸炸藥，射出最後一粒子彈，然後他們死去。卡巴勒羅政府只拿出很少的一點力量援助北方的戰綫。……雅拉瑪的人們開始聽到謠言了，

聽到了關於巴塞羅那的一些謠言。巴塞羅那是一個工業城市，一個港口。在巴塞羅那，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力量是很強大的，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托洛茨基派叛徒們的「政黨」的中心。

巴塞羅那出了麻煩，那兒是一團糟。

波布·明納到雅拉瑪來了。他是在黃昏時候到達的，疲倦不堪，滿身塵土，可是却得意洋洋地露出非常興奮的樣子。他要把大夥兒都召集在一起，快點集合起來，人越多越好。

「同志們，」波布說，「過去這幾天發生了一些事情，大隊裏人人都應該知道。」

「卡巴勒羅政府已經垮台了。儒安·尼格林博士正在根據一個真正要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綱領組織一個新內閣。」

「因為巴塞羅那發生了一次反革命暴動，卡巴勒羅內閣被迫辭職。暴動在五月四日被鎮壓下去，死去了八百人，受傷的有三千人。暴動是在佛朗哥第五縱隊和意大利以及納粹的密探的指揮之下，由托洛茨基派的「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中間的「過激分子們」所發動的。卡巴勒羅政府不願採取必要的措置，及早加以防止。」

「這些人打算給政府一個毀滅性的打擊，阻止加泰羅尼亞把它所有的力量貢獻給戰爭。可是這一種企圖失敗了，暴動被堅決地鎮壓了下去，因為它得不到加泰羅尼亞人民的支持。結果是把一黨的叛徒肅清了。」

「你知道，卡巴勒羅一開始就採取了一種錯誤的政策。他用「自由主義」做幌子，到處阻撓

和破壞着戰爭努力。我們都曉得這種自由主義者……我們的西班牙同志們已經在跟他鬥爭，使盡他們的力量把他引導到正確的方向去，同時和社會黨中他所領導的一派保持工作關係，維護人民陣綫。

「巴塞羅那事變就是那樣地結束了。現在人民對於卡巴勒羅所犯的全部錯誤都已經家喻戶曉了。

「幾星期以前，卡巴勒羅政府裏面的烏利布同志問他，蘇聯船隻在巴塞羅那卸下的武器送到哪一條戰綫上去。卡巴勒羅回答說：「那是一個軍事秘密。你可以放心，作爲一個總司令，我是知道把武器送到什麼地方去的。」

「可是自從暴動發生以後，就證明了卡巴勒羅的朋友們手裏扣留着蘇聯運來的新式機關槍，甚至還有坦克和大砲，偏讓我們的戰士們用破舊不堪的裝備去打仗。除了「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在暴動時使用的、被叛徒偷去用來反對政府的以外，大量的這類武器都藏在巴塞羅那的地下室裏和倉庫裏。托洛茨基派喊出「我們可以贏得戰爭，但要喪失革命」的口號，他們用這種口號去引誘無政府主義者的「過激分子們」。

「現在，罪犯已經抓到，烏利布要求把叛徒們作爲共和國的公敵加以審訊。卡巴勒羅的回答是：他們不是法西斯分子，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哲學」，因此，我們不能用這樣嚴厲的方式對待他們，「因爲西班牙是一個民主國家！」

波布把話打住，端詳了一下他面前那些人們的聚精會神的面孔。「塞涅·卡巴勒羅是一個「自

由主義者」。他是一個可以寬赦國事犯的自由主義者。」他說下去。

「好啊，這一下子可打開葫蘆啦。共產黨員，共和黨人，甚至內閣內卡巴勒羅自己的社會黨的兩個黨員也投票反對他的這個立場。他自己的黨，他自己的工會也都斥責他！」

「尼格林的政綱號召加強後方，清除第五縱隊，宣佈「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為非法，加緊徵兵，增加軍事物資的生產，使全國各階層都為戰爭獻出全部力量——建立一枝真正的現代軍隊，一枝擁有後備兵、能夠採取攻勢行動的軍隊。」

他眉飛色舞地揮起了他的緊握的拳頭，說：「同志們，我們這兒有下面的幾個口號，我把它們按照下面的次序排列起來：

「第一，打勝仗！」

「第二，打勝仗！」

「第三，打勝仗！」

大多數伙伴們都和他一道見喊出了第三個口號。他說完以後，我便把他拉到一邊去，問道：「喬埃此刻在哪兒？他此刻在做什麼事？」

「他在塔拉森納。他是新的加拿大大隊的政治委員，在那兒訓練軍隊。麥里曼是大隊長，波布·湯姆遜是他的副官，記得嗎？他們兩人都是在雅拉瑪受過傷的。真是了不起，兩個傢伙真有種……喬埃堅決要求到前綫上來。他簡直快要哭喊出來，懇求我們別派他擔任訓練工作。」

「他適於做這件事情，」我說。



「是的……喂，史迪夫，剛纔我沒有提到一件事情，但是你應該知道，這樣到了一定的時間，你就可以告訴別人。不久可能來一次進攻。但這次是我們担任進攻，不同以往啦！」

我不住地點頭聽着。

「喂，所有最好的部隊都要從戰綫上抽出來，休息一會兒，重新裝備一下，準備新的戰鬥。……」他說，「所以我猜想林肯大隊的人將有一次你們正在等待的休假。」

## 在村莊裏

塔如納河被山上沖洗下來的泥土變成黃澄澄的顏色，穿過一道淺淺的山谷，伊班涅茲村蜿蜒曲折地匍伏在山腰的中間，高出河面以上。要到達村莊的廣場，就必須爬上一百層的高高的石級，這些石級都有幾百年之久了。卡車就停在這些石級下面。林肯大隊的人爬出了卡車，把裝備揹在肩膀上，亂做一團地衝上石級去。

廣場的一邊是教堂，教堂的古老的牆壁已經現出裂痕，叢生着苔蘚。教堂的對面有一所商店，商店的隔壁便是一所兩層樓的漂亮房子，在廣場中央有一個石槽，小驢子就等候在那裏，在石槽和石級頂的中間，豎立了一根旗桿。共和國的國旗掛在旗桿上，在六月的炎熱的太陽下現出軟綿綿的樣子。

伊班涅茲村的人民都聚攏在廣場的周圍，來歡迎對萬惡的法西斯匪徒作戰、在戰場裏過了一百一十六天以後到他們村子裏來休息的外國戰士們。村裏人並不多，他們都是婦女、兒童、少年和老年人，在他們中間歷根兒就沒有少壯的男人。當美國人在廣場上出現的時候，人們騷動起來，嘴裏在咕囁着，婦女們把她們的孩子舉起來讓他們看看，旗桿旁邊有一個跛子興奮地走來走去，他的嘴唇上下移動，不知在嚙咕些什麼。

大隊長喊道：「同志們，站隊！他們要對我們說話哩。立正！」

林肯大隊的人很安靜地排起隊來，朝那個跛子瞪了眼睛望着。他戴了一頂黑色的禮帽，穿一件藍襯衫和一條黑褲子，把一條黑色的圍巾圍在腰間。他算是穿了他最漂亮的衣服了。他不住地流汗，他說話的聲音像是有意在咕囁着。

他說：「我們的村莊是一個古老的小村莊。我們只有一家商店和一家麵粉廠。我們都是農民。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一切力量了。我們送了一百三十一個人去參軍，其中有我們的教員；他現在是個政治委員，所以過去一年來我們的學校都是停閉着的，雖然上面答應過派一位女教師來這裏教學。教會的情形也是一樣。在法西斯匪徒開始對我們進攻的那一天，我們的神父就離開我們到法西斯軍隊那邊去，因此從這一天起教堂也停閉了——」

很明顯的，他已忘記了他所準備好的演說，一個字也記不起來了。於是他停頓了一下，拚命地咽口水，用袖管去抹他出汗的臉，呆呆地望着這些美國人。

「我是村長，」他說，又停頓了一下，搜索着他曾經計劃得很周到的演說裏面的零零碎碎的句

子。唔，這都是他在熔爐旁邊工作的時候計劃好了的，他已經把他的思想安排妥當，可是那些思想現在却像鳥一般地飛走了。他是村長，伊班涅茲村的榮譽寄託在他身上。他把他的雙手向這些美國人一伸，用一種流暢而嘹亮的音調說：

「你們從遠方來到我們這裏，我們把你們當做我們的兒子，我們的弟兄和同志一樣來接待。我們知道你們是多麼需要休息啊！你們來到這裏，真使我們感到榮幸。我們已經為你們騰出了麵粉廠的一部分房子來，我們這兒的婦女昨天一整夜都在工作，用麵粉袋做褥子，在裏面填滿了草，我們盼望這些褥子能夠讓你們睡得舒服些，因為這是我們能夠做到的頂好的東西了。……我們大家都歡迎你們到這裏來。……」

「Viva los Americanos!」（美國人民萬歲！）村民喊叫了出來。

「Viva la Republica Española!」（西班牙共和國萬歲！）我們大夥兒一齊喊出了這個口號來答覆他們。

伊班涅茲的老百姓喊出「Viva!」林肯大隊的人也喊出了「Viva!」

淋浴車正在等待着，還準備好了乾淨的衣服。

可是接着却發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軍曹海斯和幾個伙伴們偶然到一個老太婆開的小酒店裏去。那個老太婆興奮到極點，快活得喘不過氣來，非常熱切地招待他們。可是她有的只是茴香酒；酒店裏沒有別的飲料。他們對茴香酒懷疑地望着，然後抿了一口，這是一種淡酒，一點沒有味。但是他們的興致都很好。他們現在

身上都乾淨了，又有了錢，幾個月來，他們第一次聽不到砲火的聲音。他們再不必擔憂在他們背後落下一顆迫擊砲砲彈，或者一顆爆裂的子彈從窺孔中颯的一聲穿過來。……他們渴望着烈性的酒，一面張開嘴巴，把茴香酒呷了下去。

迫擊砲是靠著彈簧的作用射出砲彈的，砲彈會一聲不響地落在你的身上。伙伴們知道迫擊砲的性能，可是他們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茴香酒。酒輕易地咽下肚去了。也不過是一種淡酒。……他們就變成醉眼朦朧了。有人說出別人不喜歡聽的話，接着便把酒瓶在空中摔來摔去，一場毆鬥於是開始……

海斯一班的班長彭斯費去了一些時間纔把毆鬥制止住，把醉漢們拖出那個被打得稀爛的酒店。

大隊隊本部的人員都聚攏在一起，他們眼睛裏冒火，感到羞恥和憤怒。這件事情使這一個大隊、使整個國際縱隊都失去了體面。在雅拉瑪犧牲的人們曾經用他們的生命換來了友好和了解，西班牙人民紀念他們，感激他們。然而要教人民了解戰爭的全部意義却有很大的困難，因為他們中間能够閱讀的人非常少，當然他們還不能充分了解國際縱隊的任務。但是我們決不能讓他們把國際縱隊看成是一羣冒險家們，是酗酒滋事的傭兵。……那九個人，他們已經辜負了他們在雅拉瑪犧牲的同志們。他們必須受到懲罰，必須把他們作為懲一警百的榜樣，叫村民知道國際縱隊決不寬恕他們的這種行爲。

九個犯罪的人都排列在廣場上站着，對着大隊的戰士們和在一旁注視着的老百姓。

這是我的工作。我不喜歡這一樁工作，可是我不得不去做。軍曹海斯是一個老資格，在歷次工人鬥爭中的一位老戰士。他的兩條腿已經站不穩了，但他心裏明白眼前發生的事情，當他聽我對同志們報告他的可恥的行爲時，他的眼淚從臉蛋上滾下來了。

「……所以我們建議，」我下結論說，「把這些人放在禁閉室裏禁閉五天。」我向隊伍上下打量了一番，說道：「大家都同意嗎？」

整個大隊的人都同意了。沒有一個人有不同的意見。那九個人都離開隊伍到禁閉室裏去了，禁閉室在廣場的對面，是把一所舊庫房匆忙地臨時改成的。

大隊都贊同這一個判決了，我這樣自言自語地說，可是我却感到不安。我感覺到大隊部已經造成了一個錯誤，在恥辱和憤怒的激動之下做得過於嚴厲了。那一天晚上，我聽到伙伴們咕噥着說出怨言來，因此我的不安越發厲害了。我聽到魯比在說：「停發他們兩個月的薪水也可以！取消馬德里的休假等等都可以！可是，在我們經歷了許多艱難困苦以後，在我們的第一次休假時就把他們放在監牢裏關閉五天——唉，太過分啦！這是不公平的。」

第二天拂曉，大隊部的軍官們被敲門的聲音驚醒，我睡的地方離門口最近，便睡眼惺忪地，跌跌絆絆地走去開了門。門外站着村裏的五個人。他們扛着他們的工具，他們的草耙和鐮刀，嘴裏滿是惶恐不安的道歉的話，說道：「我們來這裏把隊長，政委喚醒了，心裏非常抱歉，可是我們得到田裏做活去，我們要對你們說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毫沒有軍人氣概、頭髮蓬鬆、穿着短袴和內衣的大隊部人員們都向那些村民們眨巴着眼。

他們的發言人說：「我們是全村推舉出來的一個代表團。……我們認爲你們比我們更清楚怎樣去管理軍隊，可是在昨晚的會議以後，那個哭泣的人和你們關在禁閉室的其他幾個人使我們感到深深的不安。他們都在戰壕裏過了這麼久，他們不會損害了任何人。他們只是喝酒喝得過量了些——茴香酒是一種靠不住的酒——因此——」他把頭低下去，呆呆地望着他手裏的帽子。「所以，先生們，我們以全村人的名義來向你們請求，我們請求你們對這些人別太嚴厲啦。」

那個人說完以後，代表團好像都鬆了一口氣，含着微笑走開了。隊部的人員們半信半疑地望着我，我望着你，都把香烟點起來。

奧列佛說：「哎呀，真想不到！我們倒覺得我們作這樣的表示一部分是爲了他們的利益。……好，那麼現在怎麼辦呢？」

隊部的人第一次在一個問題上意見分歧起來。辯論非常激烈。有人認爲既然已經作了決定，就應該照樣執行，不然的話，假使現在把指揮部的軍事決定撤銷，人們對軍事決定就不會尊重了。

奧列佛代表傾向於取消以前的決定的一羣人。他質問道：「難道我們就不能承認錯誤嗎？我們承認了錯誤，大夥兒更會尊敬我們！我知道茴香酒這東西，它捉弄每一個人……此外，在大夥兒經歷了那麼多艱難困苦以後，要期望人們不沾一點酒，簡直是一件愚蠢的事情。這個決定已經達到目的了，它已經告訴大家我們把這種行爲看得多麼嚴重。我提議馬上把這個決定撤銷！」

這個提議通過了，另外加上一點補充：起草一篇關於採取這種行動的聲明。

禁閉室並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地方，茴香酒已經使他們嘔吐了。但是海斯決心不離開這裏。

「史迪夫，你叫我丟了臉，」他說。「像我這樣一個老革命，怎麼還能有臉見人呢？你沒有權利這樣對待我。我決不願出去，除非你召集一個全村人民大會，告訴他們你把我們當做罪犯是錯誤的。」

可是別人都走出了禁閉室，也把這個年紀大的傢伙一道兒拖走了。

對着整個大隊的人承認自己的錯誤不是舒服的事情，但是我寧願這樣做。「同志們，」我說，

「昨天我們作了一個輕率的決定，沒有考慮到這是在長期緊張生活以後的第一個休息的日子。我們現在決定撤銷判決了。然而我們却願意用這個例子作為一個懲一警百的榜樣，讓大夥兒知道對於凡是損害我們和這兒人民的關係的任何行動，我們都看得多麼嚴重。」

大夥兒喝了一陣采，我也對他們笑嘻嘻的。不安的感覺消失了。

我望着他們紛紛散開到河邊去，到改成棒球場的一個打穀場去，到兵營去清理、檢查和整頓他們的裝備。

我發現在跟伊班涅茲人民做朋友的人們中間問題最少，在由於語言困難而讓自己和鄉村生活完全隔絕的人們中間問題最多。後一種人一旦在游泳和打球玩得膩了以後，除了轉過來聊天跟喝酒以外便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了。他們覺得厭煩，坐立不安，而他們的肚子裏的牢騷跟着便越來越多了。

但是大多數伙伴們都不願語言的障礙，在和村民們做朋友方面表現出驚人的能力。他們不單

是友好的客人，而且許多人和村裏的人打成一片，參加他們的工作，和他們一同討論問題。差不多全隊的人都出動協助收割大麥，但是一天以後，就不中用了，由於用鐮刀收割莊稼的那種不習慣的勞動，使得他們兩腿發麻，手上都起了水泡，並且浪費了許多大麥和麥稈，因此那些農民們不得不用極委婉的言語請求他們不要再費力做下去。

他們在河邊樹叢裏替孩子們安排的野餐，是比較成功的一件事情。那些在佛朗哥統治了這些年以後到今天依然活着的伊班涅茲的少年們，一定還會出神地想起那一個日子。他們把獎品發給每一個孩子，玩了許多對西班牙兒童是新穎的遊戲，並且準備了大量的食物；最後，有着長長的鬚髮和一雙大眼睛的小瑪利亞被大家推選為大隊的情人——這是一件了不起的特殊的榮譽。

比孩子們更喜歡野餐的，只有林肯大隊的被戰爭鍛鍊得堅強無比的那些老戰士們。朱立葉是拋棄了教書的生涯來到西班牙的一個人，他在這兒重新開辦了一個學校，馬上就有了六十名兒童入學。

但是，在國際友好的事業上沒有人比巴克醫生和他的一夥做得更多了。他們在三天內就把醫務所開辦起來，日夜忙個不休。最初的一個病人是躊躇而又害怕的——一個父親把他的兒子帶來，一年多以前，這個兒子被一塊破玻璃嵌進了他的眼睛了。巴克醫生很順利地做好了這個手術。第二天早晨，門口便排列了一大羣村民們，以後每一天早晨排列的人羣越來越多。於是把急救人員找來擔任診療工作，他們在戰壕內已經工作過度，可是在這裏的工作更是加倍的勞苦。他們首先得到的報酬，就是人民的大量深切的感激；在伊班涅茲的歷史上，以前從來沒有過一個醫



生。要是一個商人或者一個神父需要一位醫生的話，他就到馬德里去，剩下來的病人們或者死去，或者不醫自愈。

因此，醫務人員們和他們喜愛的那些人們大量地吃着雞蛋、牛奶、乾酪和牛油；這些珍貴的物品都是心懷感激的病人們所贈送的禮物；贈送東西的人們很少直接把東西送來，只是把它們放在一些奇怪的地方，這是爲了他們不好意思把東西公開拿出來的緣故。

伊班涅茲有一些漂亮的女孩子，每一個女孩子很快地就有一個軍人追求她。求愛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因爲每個女孩子都有一個母親或者祖母，那個女孩子到哪裏，她的祖母也到哪裏。這束縛了美國人的作風，可是他們照樣堅持下去。

「使我厭煩的倒不是洛舊的祖母，」一個傢伙滿不樂意地說。「我倒不在乎她釘在後面……我只希望他們把那個小驢子偶而放在家裏過一天！」

機關槍手萊伊·斯蒂爾，除了值勤以外，人們是從來看不見他的。他深深地、嚴重地陷入了戀愛的網裏，甚至輪到他到馬德里休假的時候他都不願去休假，寧願留在伊班涅茲陪伴他的英妮斯。在伊班涅茲的所有的女孩子中間，英妮斯是最美麗的一個，看來她也深深地愛上了萊伊，跟萊伊對她一樣。祖母對萊伊也不成爲一個問題；因爲英妮斯的母親和她的弟弟也把他當做他們家庭中的一員。萊伊快活極了。他的生活過得非常美好。

靠着所有這一切的方式以及其他的方式，林肯大隊的人們在人民中間紮了根；在這樣情形之下，他們真正成爲西班牙人民的一部分了。

光是自由是不够的。要盡量利用休息時期，要防止無聊的感覺和精神上一般的鬆懈，就得組織一些活動。因此就有了中隊間的循環棒球賽，有娛樂節目，有從阿爾巴塞特帶來的電影，有從馬德里請來的表演者，有游泳競賽。此外，並設有關於軍事問題、戰術和武器使用法的講習班。軍事指揮部也非常忙碌。部隊徹底改了組，並且加以補充。新的軍官也從塔拉森納地方的訓練學校來到了。差不多整整一個新的中隊的海員都加入了林肯大隊。

六月的日子溜走了……

## 一種破產的理論

一個年輕的西班牙人向我瞪着眼睛，一面繼續在拉鋸子鋸着一根大木頭柱子，那根柱子是伊班涅茲教堂裏支持伴奏風琴的樓廂的兩根柱子之一。

我吃了一驚地叫喊起來說：「你這傢伙，停住！」柱子的下半截已經被鋸通了。「你要把風琴弄得整個兒摔下來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我說着便把身子擋在那個西班牙人和柱子的中間。我看到他打了一根紅黑色領帶，那是無政府黨的標記。這是大隊裏面西班牙中隊的一個傢伙，那一個中隊包括了帶有各種政治色彩的人們。

那傢伙對我咆哮起來，說：「就是你們共產黨員保護它們——神父的走狗，死豬，西班牙的死

對頭！教堂是一切罪犯裏面頂大的一個罪犯！除非把教堂毀滅掉——」

「這一座教堂是屬於伊班涅茲人民的。爲什麼一心要破壞它呢？」

「廚房需要木柴。柱子可以做木柴。」

他願意讓他的中隊去審問他，而不願意被放在大隊前面來審問他。審問是在教堂內舉行的。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後，大夥兒一致譴責他的行動；於是他被降了級，並且被剝奪了一切的權利。那傢伙聽到就連他的中隊裏幾個無政府黨的同志們都發言反對他，他感到又吃驚又懊惱。

柱子又被釘在原來的地方了，賈基·希拉做了漿糊把鋸子鋸成的缺口補上，並且在外面漆上了一層漆。教堂的柱子的事件就這樣結束了。

在伊班涅茲的農民中間，也跟西班牙的其他地方一樣，有兩個組織：一個是由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組成的無政府黨工會（CNT），一個是由社會黨員和共產黨員佔優勢的激進派工會（UGT）。這兩個團體經常舉行會議，大隊應它們的邀請，選出兩個代表團參加它們的會議，每個代表團包括五個人。

事後，代表團比較雙方的記錄。在那兩個團體中間，正在醞釀着一場衝突。無政府黨工團的領袖們因爲大量農民都拋棄他們的組織而加入激進派工會，感到非常憤慨。然而無政府黨工會不探討這種轉變的原因並設法加以改正，反而對對方的工會施行猛烈的攻擊和責難。

然而真正的原因是很明顯的。原因在無政府黨工團的土地政策上。它要馬上使所有的土地和資源集體化，必要時甚至要使用武力。激進派工會的政策是確認農民對小塊土地的所有權，只把

逃往佛朗哥那邊去的地主們的大地產接收過來實行集體耕種，而在農民願意的時候纔擴大集體的  
原則。

因此，林肯大隊的戰士們發覺到他們立刻捲入了正在西班牙全國進行着的一場政治鬥爭裏面，這場鬥爭基本上是兩種理論之間、是無政府黨的原則和共產黨的原則之間的一種鬥爭。這種鬥爭伸入了西班牙生活的每一方面，也伸入了軍隊裏面。

兩天之內，整個大隊都在激烈地辯論着這個問題。

帕特·雷德說道：「無政府黨工會集團的意見是對的。你經營一個大農場比你經營許多小農場要便宜些，也要好些。回頭看一看我們美國的西部吧。在大農場上，每個工人每畝地的生產量，比一些小農場要多，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事實的確如此！在一個大農場上，你使用拖拉機，在許多小農場上，你使用鐵鍬。現在激進派工會擁護一種小農經濟，那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反動的。那是退後一步，我們決不能支持它！」

「你對大農場的看法完全是對的，帕特，」洛烏說。洛烏是從布魯克林地方來的一個小伙子，他原來是一個電氣匠，在沒有來到西班牙以前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一條牛，可是他對土地問題有過一番研究。「這不是大農場是不是最好、集體耕種是不是最好的一個問題。問題是：怎樣纔能使農民們參加集體農莊？」

「把它創辦起來，這樣不就行了嗎？你自己也說會成功的，而且已經證明了。」

「要是伊班涅茲的農民們不願嘗試，你就派遣一小隊兵士強迫他們做去，是不是？」

「嗯，那倒是不必要的，一旦他們懂得了好處——」

「可不是！可是他們怎樣纔能懂得好處呢？人們除了根據自己的經驗以外，怎樣纔會知道呢？一旦他們親眼看到集體農莊好些，他們就會相信集體化了。這些人正在集體耕種以前屬於地主的大菓樹園和大葡萄園。可是他們保有他們自己的小塊土地、農具和牲口，隨心所欲地去耕作。無政府黨工會要逼迫他們把所有的土地、農具和牲口都馬上集體化起來，可是他們還不樂意這樣做。讓他們首先從菓樹園的經驗上知道好處，然後讓他們自願地組織他們的集體農莊吧！」

「不管怎麼樣，」他倔強地說，「西班牙需要食糧。集體農莊出產的食糧比許多小塊田地出產的食糧要多些。你要讓人民餓着，而你却等來等去地等着許多農民下決心嗎？」

「你又回過頭來把目標當做辯論的題目啦，」洛烏說，「那是不待爭論的。集體農莊是好的，這一點我們意見都一致的。問題是達到目標的方法。」

洛烏說：「佛朗哥所反對的西班牙革命是民主的革命。民主對農民的意義是什麼呢？那就意味着農民掌握他自己的土地！把吸血蟲地主們除掉！讓農民的孩子們能夠上學，使他們有一切上學的機會！讓農民有投票權，讓他投的票也算數。……然而最重要的却是土地。倘若你逼迫他拋棄他的土地，他便要因此而恨你！你可以談論集體農莊，談得你舌敝唇焦，可是他依舊要恨你。」

我說：「匈牙利的教訓也說明了我們正在討論的問題！」人們的眼睛都轉過來望着我。

「匈牙利是怎麼一回事？」

「好，這裏就有一個例子。革命政府用武力創辦了國營農場。這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情。當時

是馬上不加思索地就莽幹一場。結果農民們深感苦惱，不願支持政府，於是替反革命打開了一條路，發生了白色恐怖，屠殺了成千成萬的人。革命被淹沒在血泊裏面了，因為它不知道怎樣去贏得農民的支持，所以農民們反而站在敵人方面來反對政府。」

洛烏高興了起來，帕特也舉起了雙手。「對的，那麼我們怎麼辦呢？加入激進派工會一邊去，不管別人怎樣，好不好？」

「不。在我看來，我們須得完全站在局外，」我說。「我們不能站在任何一邊。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討論和學習。」

無政府黨——西班牙的工團主義者的悲劇就在這裏。他們有歷時八十年的學說，有被他們重視的原則，他們便根據這些原則擬訂他們的計劃，爲了這些計劃他們遭遇到監禁和死亡——他們的哲學的整體已經在事實面前破產了，被短短的幾個月的事件摧毀殆盡了。

無政府黨排斥關於國家權力的見解，他們頌揚一種個人自由的烏托邦觀念。但是在反抗法西斯的戰爭中，個人是一籌莫展的。因此就必須建立一個政府來表現他們的意志。事實逼迫無政府黨參加這一個政府。

軍隊是被當做一種壓迫工具的，因此，他們堅持認爲一切軍隊都是壓迫人民的，而拒絕把軍隊當做一個民主的武器。但是一支軍隊正在進攻西班牙，也只是一支軍隊纔能抵抗這種進攻。於是他們不得不承認有軍隊的必要。

「好，」他們說，「那麼我們非得有一支軍隊才好。不過還是有一支志願軍吧。」

然而志願軍沒有後備兵，不能打長期的仗。無政府主義者們要麼就拋棄他們的理論，要麼就堅持這種理論。那些面臨着事變還在堅持這種理論的人們，便乾脆走上了叛變的道路。

他們痛恨威權，也痛恨紀律。他們也把這種原則帶到軍隊裏面去。前進、進攻和撤退的命令都必須討論並予以表決。共產黨員認為必須用民主的方式按照功績來選舉領袖人物，必須給與領袖人物以任命的權力，並且必須服從他的決定，這樣纔表現出民主，而這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却是一劑毒藥。

在經濟方面，工團主義者堅持他們的見解，認為工會是經濟管理機構的基層組織。這表示他們對國家的反對。在加泰羅尼亞，工團主義者的工會經營工廠。他們對於戰爭這個最重要的中心的事實置之不顧。他們經營工廠是「爲了這些工廠的工人的利益」。他們繼續製造輸出物品，而不替對法西斯軍隊作戰的軍隊製造物品。在巴塞羅那製造貨車和汽車的西班牙——瑞士工廠，他們規定了每天一班六小時的工作制度，主張三班制的共產黨員們都被槍決了。

在所有這些事情上面，無政府黨都受到腦筋混亂的社會黨員卡巴勒羅的保護。

在伊班涅茲，一個傢伙鋸教堂的柱子，要是他如願以償的話，全村人都要責備林肯大隊的人們了。在巴塞羅那和別處，他的無政府黨的同志們對他們所憎惡的教堂力圖發起一次撲滅運動。

這樣做去的唯一的效果，只是破壞西班牙人民反佛朗哥的統一戰綫，只是把他們分成天主教和非天主教的兩個敵對集團。無政府黨不能辨別出天主教會是大部分西班牙人民都虔誠信奉的一個宗

教團體，而天主教教權集團是在金融上、工業上和農業上的一個龐大的寡頭。他們的理論不允許他們有辨別能力。

所有這一切都是有利於托洛茨基分子們、徹頭徹尾的叛徒們、納粹和黑衫黨法西斯主義的特務們。他們的組織便是「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意見適合「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的反革命的陰謀，就像手套適合手一樣。在一九三六年，「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是一個合法的政黨，用下面的口號競選，他們說：「人民陣綫政府是與資產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綫，」又說：「人民陣綫是蘇聯的傀儡。」這些口號的用意是爭取無政府黨與工團主義者（它們和「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的理論是完全一致的），並且巧妙地計劃切斷他們對人民陣綫的支持，製造一個讓佛朗哥可以進軍的缺口。

後來，當「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被宣佈為非法的時候，無政府黨工會便庇護他們。當他們被捕的時候，他們掏出一張無政府黨的證件，便得到無政府黨工會的保護。「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是無政府黨工會和整個西班牙的一個爛瘡，無政府黨工會可以暗藏這個爛瘡，因為無政府黨工會信守無政府主義的理論。

那些無政府黨工會的人們，就說他們是工人和正直的人吧，就說他們心懷好意吧，可是事實上，一種錯誤的理論已使他們成了叛徒們的工具。

在伊班涅茲的時候，我曾經把這些事情思索過，和人們討論過，總是想到這樣一個問題：爲什麼呢？爲什麼他們要死抱住已經一再證明虛妄的理論呢？在已經得到教訓的時候，爲什麼他們



還要等待着打擊落在西班牙的頭上，落在他們自己的頭上呢？

只能有一個答案。

因為他們不吸取國際工人運動的教訓。他們死抱住久已被歷史證明為錯誤的一種破產的理論。

他們，以及整個西班牙，都付出了鮮血作為代價。

## 怪人

「怪人」，這是他在柏平雲監獄的美國同志們給他起的綽號，他參加了林肯大隊西班牙中隊以後，馬上就成爲他們中間的英雄了，他們都聽他的話。他講過他的故鄉阿斯都里亞一九三四年起義時的轟轟烈烈的故事。

「這算不上戰爭，」他總是這樣說。「啊，在那些日子裏，你不得不整天像蛇一樣爬在地上，不讓敵人看見，天黑時你站起來，看見那些開心的西班牙軍官們在抽雪茄烟哩，於是你把一顆手榴彈扔了過去，喊道：Arriba Mamosi（高高地舉起手來！）而那些仍舊活着的傢伙們便走出來啦，他們的面孔蒼白，嚇得滿身發抖，屁股像蛇一樣的扭動，哼，還是些有教養的紳士們哩，那些胆小的小狗！呸！我對他們啐了一口！」

他可以在十五步開外的地方扔一把俄國刺刀去劈開一根細竹竿。他說：「我喜歡這種俄國刺刀，又長又有分量，用起來挺穩當。」他告訴大夥兒怎樣用炸藥、幾根舊電纜、幾塊馬蹄鐵和幾根長釘去做一顆阿斯都里亞式的手榴彈。他對敵人喊話說：「當心，法西斯匪徒！頂好還是回家去陪伴你的老婆吧，要不，多半你要在家裏丟下一個漂亮的寡婦啦！」他拉得一手很好的手風琴；他喜歡唱阿斯都里亞民歌。他熱愛生活。

他像一隻好鬥的公雞一樣——好勝、好炫耀自己、好吹牛、鋼鐵般的勇敢。儘管他抱着這樣無憂無慮的態度，但他却有深切的階級覺悟，他懷着一種深刻而熾熱的憤怒去憎恨法西斯匪徒。

當大隊在伊班涅茲休息的時候，政府來了一個號召，要求久在前綫的每一個部隊推舉戰士去參加法西斯戰綫後方的游擊隊。「怪人」——他的真名字是何塞——便是不可避免地從林肯大隊中選擇出來的人物。

當我把這個新任命告訴他時，我感覺到簡直要哭出來了，他所得到的這一種榮譽竟使他受到那樣深切的感動，因為人人都知道游擊隊戰士是從西班牙軍隊裏面最健壯、最幹練、最機警、最可靠的人們中間嚴格地挑選出來的。「同志，」他說，「你不是開我的玩笑吧？你不是在戲弄我吧？」

「不。這不是玩笑。這是我們一件頂重大的任務，也是頂危險的任務。你願意擔任這件工作嗎？」

何塞拍一拍他的寬大的胸膛。「難道你還要問『怪人』是不是願意嗎？該做什麼，告訴我好

啦——需要做些什麼事？」

「你到馬德里以後就會有人告訴你。這個美國同志也被派擔任同樣工作；他將要跟你一道去。記住，別對任何人漏出一句話，把你的嘴封上。……再會了，何塞，祝你勝利。」

何塞去了。他被裹在一團深沉的神秘中，也為這一種神秘感到光榮。跟他一道去的是一個美國人，他的「美國佬同志」，那是一個西班牙血統的布魯克林人，說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話。他在馬戲團裏練過把式，有一身驚人的好本領。

在馬德里，一個委員會審查了各大隊推選出來的人。從所有這些人中間又挑選出二十二個人來。委員會通知這二十二個人說，他們可以離開，一小時後向委員會報到；只有何塞一個人奉命留在辦公室。他偏促不安地在走廊上踱來踱去，把香烟點起，又把它捏滅，淌了滿頭大汗，深怕他被剔除掉。

他被召喚進去。政治委員對他說：「何塞同志，我們認為：把這些戰士的生命託付一個人，讓他充當他們的領袖而受到共和國的信任，這樣的職務，你是最合適的人選啦！」

「Yo — commandante! Pero — pero —」（我——司令官！不過——不過——）他感動得連說話都結結巴巴起來。「我不知道爲什麼你們同志們真的認爲我——不過，就這樣吧。你們要我怎樣做呢？」

「首先，叫你的戰士們把這些表填上，你也填一張。然後讓他們穿上科爾多巴省農民的衣服。領取帶有肩腋下槍套的自動手槍。這兒有一張證明書，你可以憑這張證明書從軍械庫或軍需

庫裏領取你們需要的東西。今晚上發給你們一筆法西斯錢幣，並且有一輛卡車把你們帶到巴索布朗柯附近的一個崗哨上。那一個地區的司令員將要給你詳細的命令，供給你們馬匹和別種裝備……現在，你能把這個命令重說一遍嗎？」

何塞能够而且真的把這個命令照樣說了一遍，像留聲機一樣地，他連最後的抑揚頓挫都記得分毫不差。「何塞從來不把任何事情寫下來，」看到那些軍官們都在驚訝地盯着他，他便這樣解釋說。「他把這兒的一切事情都記住了。」

戰士們已經在外面集合起來。政治委員和何塞一同走出去和他們見面，政委宣佈選定了何塞來領導他們。「因為他是阿斯都里亞的子弟，一個保衛自由的老戰士，而且對游擊戰很有經驗，所以我們相信他會實現我們的期望，保持阿斯都里亞人民的光榮傳統。」

大夥兒都歡呼起來。何塞的面孔漲得通紅，不安地幌動着身子，極力抑止住想要昂首闊步的那種衝動。「同志們，眼前放着的工作得做……首先，我需要一位助手來管理記錄和一切瑣事。」

Chicos（同志們），你們推選誰？」

美國佬同志當選了。何塞說：「喂，Chico，首先把這些表格填好。每一張都校對一下，要弄得一點遺漏都沒有。然後馬上到軍械庫去。我在那兒跟你碰頭。」

「唔，何塞，等一等！你還沒有把你的表格填好呢。」

何塞暴躁起來。「Madre de dios（聖母在上），你不是我的副官嗎？何塞沒有空哪！你替我填一填吧……你還得把我的手風琴帶到軍械庫來。」

他走到人行道上停下，打量着停在馬路旁邊的機器腳踏車，於是他邁開步子走向最大最漂亮的一輛。「Chico」他對司機說，「馬上開到軍械庫去。」

「對不起，同志，這是專替軍官們服務的。」

何塞笑了一笑。他朝那個人的脊梁上一拍，慢慢地，但是很嚴肅地把他的證明書掏出來，遞到那個人的鼻子跟前。慢慢地，他大踏步跨上機器腳踏車。「Chico」他說，「我是軍官，我，『怪人』。開到軍械庫去！」

「當你走近那座橋的時候，」巴索布朗柯地區的司令員說，「你會看見一個轉轍手的棚子，號頭是第八。我們的那位同志從正午到夜晚都在那兒值班。那位同志有一大撮灰白鬍子，是個矮胖個兒，年紀約莫有五十歲。」

「你說：『天氣真好啊。』把這句話說上兩遍。然後向他要一根火柴。他說：『當然可以，』於是掏出兩枝紙烟，遞一枝給你。可是他不要把他的那一枝燃着。你說：『謝謝你，我有雪茄，你願意抽一枝嗎？』他說，『好，』便把他的紙烟放進褲子插袋裏，把你的雪茄接過去。然後他告訴你他的姓名，蒙特，你也告訴他你的姓名，把我的名字夾在中間。這以後，雙方就都明白了……你把這個命令背一遍給我聽！」

這一支隊伍等了兩天，在這兩天內，配置了裝備，試驗了馬匹，用自動步槍和兩挺輕機關槍演習打靶，學習阿斯都里亞式的扔手榴彈。在一切事情上，何塞都是領袖，都是老師。他不像以

前那樣的張牙舞爪了，他身上沉重的担子使他的態度變得比較溫和起來，他有了耐心，不怕麻煩，能够驚人地注意到一切瑣碎的事情，事事都要做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他們爲他們準備破壞的一座橋梁建造了一個小小的粗糙的模型，演習了怎樣埋伏炸藥。每人都練習配裝炸藥，拉斷引線等等。每人都派定專門任務，並練習這一項工作。

在晚上，何塞和美國佬同志在鎮上最好的咖啡館中度過：唱歌、喝酒、跟女孩子們跳舞、和在座的每一個人交際。他從咖啡館內取得了許多詳細的情報：關於鄉間的、關於山道關隘的、關於從他所要破壞的鐵路橋梁上經過的各個路綫的。

到了第三天，命令下來了。何塞把那個文件往桌上一扔，大聲喊着把美國佬同志叫來。「命令在桌子上。你把它讀一遍。」

美國佬同志讀了，吹了一陣口哨。

「你都記得了嗎？你知道，這個文件是必須燒掉的。」

「我想我記住了。」

「想！那不行……大聲唸一遍！……再唸一遍！……現在背給我聽。」美國佬同志盡了最大

努力，何塞又替他更正了一些遺漏的地方，接着說：「現在把那些農民衣服拿來，我們要通知 Chicos 一下。」

何塞帶着命令走出去。美國佬同志聽見他把大夥兒都召集起來。「Chicos，我們接到一道命令，現在讓我唸給你們聽。是這樣的……」

但是那一份命令依舊在桌子上放着，何塞錯拿了另外一張紙。美國佬同志抓住那份命令就一股勁跑到門口，對着「怪人」張開嘴準備大聲叫他。

「……朝鎮西十二公里地的一座鐵橋前進。我們要炸毀的那一列火車，在××日夜間快到十點鐘的時候就要駛近那一座橋梁……」

美國佬同志睜大了兩隻眼睛，呆呆地望着他手裏面的那張紙。何塞一字不差地在重說着那道命令。他一本正經地拿在手裏的那張紙，實際上是美國佬同志所準備的報告。

美國佬同志慢慢地閉攏了他的嘴。原來「怪人」是不識字的呀。可是，如果一位指揮員有着照像機一般的記憶力，而他的身邊又有一個能幹的副官，他還識字幹嘛呢？

火車的汽笛聲從遙遠的山谷裏傳送過來了。何塞放好了最後一包炸藥。「喂，用鏟子鏟。先堆上灰，要使它保持乾燥。……然後撒土。土多撒些。往上倒吧，Chicos——上面的重量越大，炸藥就爆炸得越高！」

火車越來越近的時候，鐵橋的架子顫動不停，這是從塞維爾開到馬德里前綫去的供應火車。何塞撿起了引綫，兩手輪換地拿着，跟着引綫一直走到一叢灌木裏。四十碼了，四十秒了。雪茄烟蒂燒得通紅了。「跑！快跑，庇德羅！」引綫發出尖銳的嘶嘶的聲音。

他們都跑開了。

引綫拉開的時候，火車頭和四輛車廂在橋上，其餘的車廂都翻到河裏去了。這一系列車上有裝

汽油的車皮。不多久，整個田野映得一片通紅，像被巨大的探照燈照射着似的。這時大夥兒必須像蛇一樣把肚皮貼緊在地上爬，必須把馬拋棄，必須經過一條遙長而迂迴的路繞回到政府軍的防綫去——這條路綫是何塞在咖啡店聊天的時候聽到的。

他把他的馬，他的裝備都丟了。尤其是他損失了一個人，一位優秀的同志。「怪人」悲痛他的失敗，再也勸解不消。他覺得一個指揮員的職責是要照料他的戰士們，但是當火車駛近的時候，他却忘記了預先告訴庇德羅躲在鐵橋的東邊。啊，真是糟糕，那簡直是犯罪，他怎麼可以這樣粗心呢？

甚至司令部對他大事讚揚，也完全寬慰不了他。

「你對共和國作了重大的貢獻，」司令員說。

「可是我們把我們的馬都丟光啦，」何塞說。

「是的，那很糟糕——不過這些事情是在意料中的。」

「可是我們失去了庇德羅，要是我給他一個正確的指示，他現在還會活着的。」

「我們希望你以後一切都要小心，從這次錯誤上取得教訓，訓練你自己和你的戰士們；我們珍貴每一個人，我們對於一個好同志的犧牲當然是很難過的。可是你已經做了一項頂好的工作，這項工作需要胆量、毅力和主動。我們不可能希望我們沒有損失。何塞，繼續好好地幹下去吧，可是你得從你的經驗上接受教訓。」



這是「怪人」指揮下的第一件功勞，但却不是最後的一件。

現在，下面的故事一部分是美國佬同志說出來的，一部分是隔了很久從一個西班牙同志的嘴裏說出來的。那位西班牙同志有一個時期，爲了一個目的，曾經穿上法西斯軍隊的制服，充當某一個法西斯上校的傳令兵。

這個故事是從發給何塞的一個命令開頭的，下面便是故事的內容：

在瑪拉加城被意大利侵略者佔領以後，共和國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領袖們都做了俘虜。由於他們喬裝成普通的士兵，他們逃脫了被處死刑的幾百名俘虜的那種命運。

據接到的情報說：這些人都被關在科爾多巴附近的一所監牢裏，他們的生命已處在危險的狀態。

「因此，命令你組織一個小隊，穿上法西斯官兵的制服。你們裝作押運囚犯到監牢那邊去。到達監牢時，你們便把衛兵看住，放掉所有的囚犯，告訴他們怎樣纔能到達我們的陣地。你必須設法替那些同志們把馬匹準備好，現在把他們的姓名和照片一併交給你，你務必不惜一切使他們能够安全脫險。你得做出爲完成這一個任務所必需的一切計劃和安排。」

何塞和其他六個人穿了法西斯制服和拿了法西斯錢幣，練習法西斯敬禮，模倣法西斯匪徒的傲慢態度，並學了幾首法西斯的歌。他們得到一切必要的知識，足以冒充法西斯騎兵巡邏隊了。

在他們的引人注目的制服裏面，都穿着帆布馬甲，馬甲上帶了十五排子彈夾，供他們所攜帶的毛瑟槍（駁殼槍）使用。毛瑟槍放在木頭槍殼裏，這些木殼又可以扣在毛瑟槍托上，這樣手槍

就變成了手提機關槍。然而穿上帆布馬甲是非常熱的。他們騎在馬上，流着汗進入了科爾多巴城。

他們在人行道上的一個咖啡攤前面躊躇着，朝過路的女人們擠眉弄眼。快到傍晚的時候，何塞到了一個事先指定的地方，說了並且做了某一些事情，從那裏一個人的嘴裏，他知道大約在六點半鐘光景要有幾名囚犯被送到監獄裏去。同時他也知道了值班的衛兵的人數。

太陽快要西沉了，何塞又跟他的伙伴們慢慢兒出了城，沿着通往監獄的一條大路走去，到一個山頭上等待着。

一輛菲亞特牌的卡車放着低排擋緩緩駛來了。何塞喊道：「喂，Chico，把車停下。」

司機停了車，行了個禮。一個軍曹坐在他旁邊的座位上，問道：「哦，什麼事？」

「我們的車子拋錨啦。請讓我們搭一下你們的車吧。」

兩名囚犯坐在卡車的頂裏邊。何塞咆哮着向他們喊叫了一聲：「赤黨狗子！」他遞給軍曹一根香烟。「Chicos，今晚的口令是什麼？」他並不專門問某一個人。「我忘了問啦。」

「Fusil。」軍曹恭恭敬敬地說。「步槍。」

他們把軍曹和司機的屍體藏在路旁以後，美國佬同志便開起車來，何塞本人把監獄裏將要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囚犯們。快到監獄門口的時候，何塞安下了三個伙伴作爲後衛。

到了監獄門口時，何塞和其他人拔出毛瑟槍從卡車上跳下來，一面大罵「赤黨」。何塞背朝着大門在台階上倒退着走上去，用他的手槍恫嚇着兩個人。大門開了。一個中尉從門裏走出來。

「死不要命的囚犯們，」何塞對他說。「把其他衛兵們統統都喊來。這些囚犯在路上要逃跑。我不得不槍斃了一個。」

中尉吹了一聲哨子。「跟我進來，上尉。」

這一座監獄原先是一所橄欖油製煉廠。他們都走進了辦公室。正對入口處的牆上有一扇新裝的鐵門；一個牆拐上放了一張寫字台和一個電話機。鐵門開了，進來了十個帶着步槍的士兵。他們面對着囚犯們排成一行站着，何塞走到寫字台後面的一個地方。

「我要每一個人把這些赤黨看個仔細。這裏還有別人嗎？大夥兒都得要能夠認得他們纔成。」

「沒有別人啦，官長。」

「舉起手來！」

法西斯士兵們一下子嚇軟了，他們張大了嘴呆呆地望着他們的槍枝被「怪人」的伙伴們奪去，被囚犯們奪去。他們馬上被解除了武裝。何塞割斷了電話纜。「手銬在那裏！」他喊道。「把他們用鏈子拴在鐵門上。統統拴起來！」

他跑下通往牢房的走廊，喊道：「同志們！『怪人』代表共和國來歡迎你們！走出來吧！你們自由啦！共和國萬歲！打倒佛朗哥！」

監獄裏有三十人左右。何塞喊出四個人的名字，這四個人是共和國特別希望救出的。可是只有三個人答應。一個人說：「利卡多死啦。利卡多是被你拴起來的那個中尉昨天打死的。」

在院子裏，美國佬同志搗毀了卡車裏面的配電盤，割破了輪胎。他們準備離開了。可是何塞

逗留了一下。他對那些法西斯士兵們講了一番話：「兵士們，共和國對你們是同情的。你們受了佛朗哥的欺騙，你們是那些殺人犯的犧牲品。……可是你，我的勇敢的中尉，你把我們的忠實同志們打死——『怪人』今天要獎勵你的英勇啦！」

他舉起了他的毛瑟槍。但他對那個中尉還算仁慈，他並沒有把槍彈射進他的肚子。他一槍打進了他的腦袋裏去。

只要他們能夠走到藏着他們的馬匹的那個小山峽，剩下的事就好辦了。然而要走到那一個小山峽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囚犯們都已衰弱不堪，他們一路上不斷地跌倒又爬起來，別人不得不一半兒攙着、一半兒背着他們，沿着嶮峻的亂石嶙峋的山路上走去。黑夜漸漸地消逝了。天上露出幾道灰白色的曙光。山頂上一道參差不齊的黑色的輪廓從灰白色的天空映襯了出來，何塞從那一道輪廓上認出了一個路標。路不太遠了。再過半個鐘頭就可以到了。

在他們背後遙遠的山路上，隱隱地傳來了馬蹄的聲音，這聲音非常微弱，可是給何塞聽了出來。他對美國佬同志喊道：「騎兵來啦！快些把你的馬甲脫下來。」

美國佬同志說：「等一等。讓我把這位同志扶到那一堆樹叢裏躲下。」他以為隊長的意思是要他們兩個人都留下來攔擊快要來到的巡邏隊。可是何塞的意思不是這樣。他忿忿地罵了他一聲「老婆子」。「趕來的也不過是一個巡邏隊，你以為『怪人』還要幫手嗎？走你的！把這些同志們扶到馬上去，跟他們一道兒走到我們的戰綫那邊。這是命令，你得服從！」

美國佬同志走開以後，何塞擦了擦眼水，便走到山路上面一塊大石頭後邊蹲下。他目不轉睛

地從石頭後邊偷偷地望過去，留意着第一個騎兵來到。他想動手解開繫在皮帶下面靠在他的肚皮上的那顆手榴彈，但是馬上他又改變了主意，仍舊把手榴彈放在原處。他把他跟美國佬同志兩人的子彈夾擺得端端正正，讓毛瑟槍的木殼把槍扣緊，這樣就把手槍弄成自動射擊的了。

騎兵巡邏隊一共十個人。何塞的第一梭子彈射出後，就有兩個人倒下馬去，他相信他還射中了另外一個人。別的騎兵們都下了馬躲到石頭堆裏去。子彈的碎片開始從遮蔽何塞的大圓石那邊飛過來。

過了很久，大概有一個鐘頭光景，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只有斷續的槍聲從山谷裏傳出回聲，只有從他周圍的石頭中間一閃一閃飛出的子彈發出狂嘯的聲音，而他的毛瑟槍已經燙手了。他身邊的一堆子彈越來越少，他胳膊肘下面狼藉滿地的子彈空殼越來越多。突然間，他發現他已經在射最後一發子彈了，而法西斯敵人那邊越來越猛烈的火力使他依舊俯伏在地上。「怪人」知道他有逃走的希望了。他把毛瑟槍放在一邊，把刺刀拿在手裏。他的眼睛繼續盯着前面。

他的後肩上中了兩顆子彈，刺刀從他的手裏掉下。幾個聲音在他背後粗暴地叫喊着：「Manos arribos!」（舉起手來！）

他搖搖晃晃地跪在地上，一隻手舉在空中，另一隻手叉住腰。一個法西斯軍官從石頭上跳過，朝他身上撲來，拔出一枝左輪手槍瞄準了「怪人」的頭。

「站起來，赤黨！你的部隊在哪兒？」

「怪人」命令我留在這兒。」

「他在哪兒？」

「此刻他已經爬過山去——那個雜種。他只管把我一個人丟下啦——讓我送死——」

「你跟他在一起有多久了？」

「這是我第一次出差。」

「誰把情報供給他的？他是怎樣通過的？」

何塞露出一排牙齒來笑了一笑，這是狡猾的農民的傻笑。「嘿！要是我把這些事情告訴了你，那麼你就要殺我啦。」

好多皮靴踢他的腰，踢他的受傷的肩膀。他把身子彎得摺在一起，哼哼唧唧地喊叫起來。那個中尉大聲說：「行啦！住手！我們奉到的命令是要把所有游擊隊員們活捉回去。」

何塞使勁站起來。中尉對他傻笑着說：「沒有關係，老傢伙。我們把你帶到司令部去。你要好好地對待上校，上校也會好好地對待你。嗯？」

子彈穿通了他的肩膀，因為出血不止，他的身體弄得非常衰弱，襯衣和褲子都被血浸透了。

「給我一根繃帶！」他喘着氣說。「我出血出得要死啦！」法西斯兵士一面謾罵着一面拿出一根繃帶，何塞把繃帶抓在手裏，從襯衣下面塞進去，放到創口上，又用他的左手扶起他的右胳膊，把右手放進內衣的開口處，這樣他的腰帶就成爲一根吊腕帶了。「不能動彈啦——我的胳膊，」他解釋說。「這隻胳膊已經死去啦。」

上校的司令部設在一所漂亮的鄉間別墅裏，在樹蔭掩映的小山上。

中尉由於俘擄到一個敵人而得意洋洋。「官長，我們抓到『怪人』的一個手下了。」

「啊！到底給捉住了一個！也應該的了，你們這些傻瓜。」上校把腰探在作為他的寫字台的一張彫花的橡木桌上，瞪了眼對何塞望着。「你從他嘴裏探聽到了什麼消息？」

「很少，官長。這個人可不好對付。」他對上校狠命地眨了一眼。「他一定要我們把他帶到你跟前來，官長。要是你好好地對待他，他也會好好地對待你。我們已經商量定啦。」

何塞迷迷糊糊地對上校苦笑着，彎着他的膝頭；那很容易，他的膝頭已經軟得像菓子凍做成的了。屋子裏盡是校官們、副官們和衛兵們，把他弄得暈頭暈腦的。再拖幾分鐘，何塞。只是幾分鐘就行了。何塞開口了，他說：「官長，給我一點水喝。可憐可憐我——給我一點水喝吧！」

衛兵對上校瞟了一眼，上校點了點頭。何塞拚命地一口一口喝下去。「所以，」上校慢吞吞地說，「儘管你犯了這麼大的罪，你還是想活下去的。你這個蠢貨，不信神的狗！那麼你講吧。你倒不如老老實實地講。」

「要是我講出來了，」何塞說。「我怎麼知道我不會殺掉我呢？」

「你難道還懷疑一個西班牙軍官的話嗎？」上校站了起來，向前邁上一步，攤開一隻手對何塞劈臉就是一個耳光。「講吧，媽的！」

這一耳光把何塞打得搖搖擺擺地往前一撲。他用他的左胳膊向上校抓去，設法站穩。這隻胳膊就攔住了上校脖子，緊緊地扼住上校，拚命用他的身子抵住上校的身子；何塞的右手拿住繫在腰間的那顆手榴彈的信管的環子。

他把信管一拉，感覺到已經拉開了。

「我講！」他喊叫說。「我把『怪人』的口信告訴你！」

手榴彈爆炸了開來，聲音非常輕微。它是緊緊地夾在法西斯上校和「怪人」兩個人的身體中間的。

## 我們進攻

法西斯戰綫像一隻半握的手從東南方伸在馬德里的咽喉的周圍，從兩側包圍着這一座城市。這一隻手攔住了所有的公路和鐵路，只有一條路是例外；所有的供應品都經過這條路送到這座被圍攻的城市來。

支隊政治委員巴勃羅在一個農家的白粉牆上用木炭畫出一隻手的輪廓，把一根蠟燭拿到近前，照着這一隻手。

「這裏，在手腕上，大拇指下面，就是布隆尼提；在布隆尼提外面是羅曼尼洛斯高地。那些高地控制法西斯的供應綫。如果把這些高地佔領，並且據守着，就要把這隻手從手腕間切斷了；那麼法西斯軍隊就要被迫後退二十哩。馬德里就不再在砲火之下了。

「用切斷這個凸出部分的方法解除馬德里所受的壓力，是我們進攻的第一個目的。第二個也



許更大的一個目的，是逼迫佛朗哥把飛機、坦克和大砲等從那裏撤走，以解除我們北方所受的威脅。要是我們的計劃實現了，對於我們的阿斯都里亞和巴斯克的同志們，我們就能够在戰爭中給與第一次實際的支援。佛朗哥便不得不拉出他的意大利縱隊，他的德國飛機和坦克，來迎接我們的進攻。

「我們已經集合了五萬人投入這一次戰役，這五萬人都是我們最優良的戰士。李斯特支隊，莫德斯托支隊，一共五個國際縱隊。這是共和國所要採取的第一個攻勢。政府裏面有人反對這個計劃，但是尼格林總理駁斥了他們。他保證給與我們計劃這一次攻勢的同志們一切可能的援助，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和供應品。」

「你們要曉得，」他鄭重地接着說，「西班牙的前途多半要看我們進行這次戰役的好壞。」

他進一步作更詳細的敘述。在部隊開到進攻的陣地以前，一切都絕對保守秘密；除了夜晚以外不得移動。

「每一個人都必須了解進攻的計劃和目的。每一個人，指揮員們和政治委員們必須密切合作。要是指揮員受了傷，政治委員就代替他指揮一切。每一個政治委員都必須立刻準備好他的接替的人。……給你們縱隊的詳細命令稍遲一點發下來。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林肯大隊在七月二日突然間離開伊班涅茲了，教堂的鐘聲響後，村莊裏的人們都跑出來送別他們，很多婦女都哭了。萊伊·斯蒂爾的面孔非常可怕，他不敢朝他的英妮斯望一眼。說來奇怪，

我對萊伊的面孔記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些。他們就這樣離開了，在歡呼、眼淚和握緊拳頭的敬禮的中間離開了。暫時他們乘坐卡車，但是以後他們就步行前進。他們行進了兩天，在馬德里周圍繞了個大彎路，到達馬德里以北，選擇了一條迂迴的道路，他們走的那些路有些似乎是爲了這個目的新近建築的。路上擠滿了軍隊、大砲、卡車和坦克，都往前緩開去。在白天，路是空蕩蕩的，大隊到了夜晚纔移動。

這個戰役將是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這是法西斯軍隊事先不知道的一次軍事行動。部隊都是秘密地、靜悄悄地集合起來的。

在七月四日夜晚，快到半夜的時候，命令傳下來了。奧列佛把命令拿給我看。他的手微微地顫抖着，他的臉上露出他所感覺到的緊張；奧列佛是一個嚴肅的人，他非常認真地負起他的責任。大夥兒喜歡他，信賴他，把他叫做他們的「奧列佛同志」。

命令中要縱隊在上午兩點鐘向砲兵陣地移動，六點半鐘到達陣地，那是進攻開始的時候。

路上擠滿了軍隊、卡車和坦克。天漆黑。在以前的西班牙，從來沒有感覺到像這樣大批軍隊的移動，大夥兒越來越焦慮着我們會到達遲了。不安的心情越來越沉重。眼睛在黑暗裏睜得發痛，下巴也爲了咬緊牙齒而感到疼痛。人人都非常焦急。沒有一個人高聲談話，有的只是緊張地低語。

到了六點半鐘的時候，砲聲轟轟地響起來，這時一團霧靄從瓜達拉馬山谷裏消散了，一片寬廣的起伏不平的平原在下面伸展了開去。林肯大隊的人還在一哩路開外。他們來遲了，但是砲火已經使他們的不安平息了下來。他們大聲地咒罵着，屏住呼吸，慌忙地向前跑去，像是深怕戰鬥

在他們到達以前就會結束了似的。

縱隊的作戰部長納桑少校站在掩蔽砲兵陣地的一個山脊的峯頂下面。他鎮定地笑着，舉起他的手杖來向我們行了一個敬禮。「啊，史迪夫，老朋友。你的戰士們在這兒歇一會兒，做後備部隊。望一望下邊的場面，好看不好看，嗯？」

山谷像一幅攤開的大地圖，遠處有四個村莊，像玩具一樣散佈在上面。從山脊上扇形地展開了四個縱隊，每一個縱隊向着每一座村莊前進，像四個巨大的手指頭似的伸出去抓法西斯軍隊。飛機在頭上飛翔，那是我們的飛機。獅子鼻子的查托斯式飛機。成列的坦克轟隆隆地滾下山去，消失在橄欖樹叢裏，然後又在樹叢的那一面重新出現，移動得非常迅速。

「奎讓納，」納桑少校指着遙遠的右方一個村莊說。「隔壁是布隆尼提，在三哩路開外。正對着我們前面的是加拿大新鎮；過了加拿大新鎮，在河的對面，便是羅曼尼洛斯高地。你知道，那是要害。一旦把那些高地拿下，我們就要使馬德里公路處在砲火下面，在馬德里前面的法西斯軍隊就要掉進口袋裏了。那便是我們隊伍前進的地方。第十五縱隊到那些高地去。……巴迪洛鎮就在極左邊。」

那些村莊消失在被砲彈攪起的一陣蘑菇形的灰沙和烟霧裏了。一團團的砲火和烟霧在整個平原上開了花。飛機飛在奎讓納的上空；突然間，火焰和烟像一根龐大的柱子似地往天空冒上去，空氣也在震盪。炸彈炸中一個汽油庫了。坦克遠遠地像是兇猛的甲蟲一樣朝巴迪洛爬去，搖搖擺擺地向市鎮那邊衝去，坦克上面的砲火的吼聲，在排砲的聲音和自動步槍的非常猛烈的嘎嘎的聲

音中間，聽來只是依稀可辨。

納桑興高采烈地說：「我要向前推進啦，好運氣，老伙伴，再見！」他得意洋洋地啣着烟斗，拄着手杖，沉着而有信心地，大搖大擺地走上前去。

林肯大隊的人們躺在山上，注視着，咒罵着，奇怪着。華盛頓大隊就在加拿大新鎮周圍火焰和烟塵中間的某一個地方，華盛頓大隊裏大多數伙伴都是我在柏平雲監獄內認識的——沃伊科夫，弗里德曼，蒂尼，其他一切人。他們都是了不起的青年，優秀的同志。

通訊員來到的時候，我看了一看我的錶：八點半。我彎下腰去看通訊員送給奧列佛的通知。我們要前進，要填上加拿大新鎮後面華盛頓大隊和英國大隊中間的一個缺口。

我們向山下移動，朝着充滿令人憎恨的火焰、烟霧和灰塵的山谷前進。

這座山非常陡，你一步一步往下走，總覺得走不到下面去，走下一個山谷，又走上一個山脊，好像依然在很高的地方。一會兒有人經過這裏上山來了，担架兵抬着第一批受傷的人——血浸透了帆布，不禁教人身上打起寒顫來——你不曉得那是誰，他受傷很重嗎？許多人都受傷了嗎？我們會成功嗎？

從山上看下去，地面彷彿是很平坦的，實際上它却交織着溝壑和窪地。一旦到了平原上，我們就直奔這些窪地，去躲避此刻開始在我們頭上噼噼啪啪地響着的子彈。那個村莊座落在山上，四周的地面都向山上傾斜了去，房屋的厚磚牆把法西斯軍隊保護得很安全，他們把機關槍安在教堂的鐘樓上，控制着村莊周圍的地面。另外的機關槍也很巧妙地安放在村莊的外緣。

林肯大隊的戰士們爬到陣地上去，他們匍匐着向前爬去，把肚皮緊緊地貼在地面上，都感到土地鐵硬、給太陽晒得燙人。他們離市鎮有四百碼左右，步兵中隊正在前進，機關槍架起，發出掩護步兵前進的砲火。他們開始掘壕防守起來。這不是一樁容易事，因為地面是這樣硬，硬得你不能用鋼盔劃出一個凹痕。他們用手挖，用鏟子掘，一面流着汗，而火一般的太陽又無情地射在他們身上，法西斯軍隊的槍彈從他們頭上颼颼地飛過。並不是所有的槍彈都從頭上飛過，有些就碰到身上了。戰士們伏在一小堆一小堆鬆鬆的泥土後面，對法西斯軍隊的戰壕回槍射擊。

到了他們進入陣地，走進戰壕，並且佈置停營的時候，天已經晚了，他們都感到了疲倦、飢餓和口渴。

奧列佛和我在靠近步兵綫的地方設立了指揮所，然後我走回去查看機關槍陣地。機關槍陣地已經很好地安置起來，萊伊·斯蒂爾在路中央的後面有一個掩護得很好的地點，僅僅槍銃從路上面伸出來，他和魯比輪換着開機關槍。整個機關槍中隊都間隔地安設在魯比那挺機關槍的右邊。第三挺機關槍——道格·羅雅奇。第四挺機關槍——老頭兒森茨頓，然後是中隊長西德。然後是來自布魯克林的羅伊，他獨自兒守住第五挺機關槍。他們共同釘牢了法西斯軍隊，用不着把自己的機關槍打得發熱就把敵人壓住了。

我在每一個機關槍手旁邊都停留一下，校準法西斯戰綫的目標，然後回到指揮所去，可是奧列佛不在那裏了。在副官往前面去的時候，他和我是要留在指揮所的。後來我纔曉得副官失了踪，所以奧列佛往前面去代替他，但他走到了山脈那邊的一個地方，直到黃昏的時候纔能够脫身

出來，因此就留下我一個人担任指揮。

在這場戰爭中讓我來担任指揮，來負責林肯大隊，想起來真有點滑稽。但是我斷定事情都是安排得井井有條了。我們已經在一個良好的陣地——一種堅強的構造中妥善地安置了下來。太陽快西沉了，担架兵正在把受傷的人們運回，晚飯馬上就要送來。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我的心裏湧現出一種感覺，就是我們白天的任務已經完成，夜裏安安穩穩地呆着，等到早晨去掃蕩鎮上。這不是一種有意識的想法，只是一種感覺罷了。到了通訊員把命令送給我的時候，我纔真正意識到這一點。

我讀了這一個命令，把它交給我的助手「紅」。他吼起來，心裏一慌，就大發脾氣。

「真是活見鬼！」他說。「我們都搞得好好的。要是再嘗試別的事情，一定會弄得一團糟的。伙伴們都累啦。……」

可是事情擺在面前，都寫得明明白白，而總司令部是應該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他們要趕快把加拿大新鎮拿下，要馬上，而不是明天早晨。我轉過身去望着通訊員。「告訴彭斯，一旦總攻擊開始，我們就開上前去。每人都準備好！」他對達夫說：「你最好告訴機關槍中隊的西德預備好。叫他的全部機關槍發揮充分的火力掩護前進。」

通報還沒有到達那兒，我們就聽到從華盛頓大隊對面的左邊發出猛烈砲火聲和叫喊聲。季米特洛夫大隊已經發動進攻了。就在這時候，包圍那一座市鎮的另外七個大隊也加入了。林肯大隊的戰士們呼喊著前進，我跟他們一同奔去。在我的前面有沙袋。我從沙袋上一躍而過，跳進了一

個戰壕，又跳進了一個護身壕，然後爬上了村鎮的一條街道。

街上一些人朝我走來，他們都高高地舉起了他們的雙手，越來越多。都是法西斯匪徒。都是法西斯戰俘。

我們已經佔領了這座村鎮，俘擄了法西斯戰俘。

（後面的縱隊司令部裏是一片怨語和咒罵。原來並沒有打算叫第十五縱隊進攻加拿大新鎮，而是打算叫另一個部隊去進攻的。計劃是要第十五縱隊繞過那一個村鎮，直奔極端重要的羅曼尼洛斯高地，當法西斯軍隊還沒有能夠組織防禦的時候，在最初一次突擊中去佔領那些高地。一天已經浪費掉了，並且無可補償地損失了一些人。）

第十五縱隊的人絲毫不曉得這一件事情。他們已經英勇而巧妙地戰鬥過，他們已經執行了給與他們的命令——要是命令錯誤了，這是由於無心的過失或者更糟的事情造成的結果，但他們並不知道。到黑夜的時候，他們已經牢固地據有了這一座村鎮，雖然這裏那裏，一堆堆孤立的法西斯軍隊從他們的據點上徹夜繼續不斷地放出亂槍來。

法西斯軍隊的防空壕內藏有大量食物、罐頭、大量的像紅辣椒似的臘腸。

人人在拂曉就起來。他們沿着街道，從這一家到那一家；他們在每一家門口都喊着叫老百姓出來。

英國人心裏燃燒着猛烈的憤怒。在頭一天傍晚，就在最後進攻以前，一羣婦孺從村鎮上朝他們走來。這一羣婦孺中也有幾個男人，他們都不戴帽子，手舉着。中隊政治委員喬治·布朗讓他們

們走上前來。他跟別的七個英國人站在一塊，望着那些人走近。當他們走得相當近的時候，那些法西斯匪徒們躲在婦孺後面突然把手榴彈扔來。布朗當時死去，別的人都受了傷。

在早晨，派回去清理屍首的人們，發現我們的陣亡者有三十人左右。樣子看去非常古怪。他們好像是在進攻時撲倒的。把他們翻過來看，他們的身子僵硬得直挺挺的，變成趴在地上的姿勢，臉歪着。其中有一個是喬治·阿米台吉，加拿大的伐木工人。他經歷過世界大戰，自信不會陣亡的。

季米特洛夫大隊遭受了慘重的損失——死去了六十人，受傷一百五十人。

下半年，法西斯軍隊開始砲轟加拿大新鎮。林肯大隊遷到鎮外一個菓樹園裏去。菓樹園裏有一個大倉房，他們把一批戰俘關在那裏面。人們對戰俘們都很好奇，常常有一批人圍着倉房的牆縫聚攏來，眯着眼朝裏面偷看。大隊在菓樹園內重新改編，分派新人代替那些死傷的人們。

這件事做完以後，他們又開拔出去，朝着羅曼尼洛斯高地前進。

他們前去進攻那些高地。

## 戰鬥中的人們

戰鬥猛烈地進行了三個星期。進攻的浪潮湧向高地，在山頂下面膠結了幾天，又往後退了一



點。一直到戰爭結束時，戰綫保持着沒有變化。

進攻高地的第三天，一清早出現了八輛小型蘇聯坦克，濺着淺河裏的水駛來，朝着山上法西斯軍隊的機關槍陣地奔去，從沿岸的蘆葦裏站起了三千人，跟在坦克後面跑去，他們歡呼着，高喊着。法西斯匪徒在這次進攻的面前逃跑了。

這種情形像一次獵狐一樣。法西斯匪徒空着手朝山上拚命地跑去，美國人和西班牙人在他們後面窮追，時時停下來放幾槍。他們快樂極了，他們已經突破法西斯戰綫，像一把熱燙的刀子切開牛油，因為佛朗哥的軍隊從來沒有夢想到政府軍隊能夠繼續進攻，能夠渡過瓜達拉馬河。

但是，步兵還沒有跑到半山上，坦克就已經翻過了山，法西斯的機關槍手在坦克後面織成了密集的火網。可是沒有足夠的坦克來掩護這樣寬廣的戰綫；縱隊的左翼被山頂上的火力堵住了，所以第十五縱隊不能繼續前進。他們開始掘壕防守起來。他們離山頂只有九百碼，半哩地。他們差一點兒就會成功了。真的，只要再努力一把，只要再試驗一次。

第二天早晨就努力起來了。法西斯軍隊發動了反攻，被打退回去，大隊看到了機會，馬上便加以利用。他們沒有作多大的準備就拚命追趕退却的法西斯軍隊。他們估計，要是他們能夠爬上山頭，在那裏據守一會兒的話，隨便哪一方面的部隊都會到達山頭的。

然而機關槍火力又阻止了他們。他們又只好退回到他們的起點去。

我是跟着左翼一同前進的，奧列佛是跟着右翼一同前進的。那個副官第二次又失蹤了。進攻停頓在一片橄欖樹地裏，在我們曾經離開的一個較低的山脊上。我右翼副官受了傷，

「他在哪兒？傷勢很重嗎？」

「傷口在肚皮上。……担架兵把他馬上抬走啦。他不肯走，不斷地叫他們不要在他身上浪費時間。他用兩隻手扶着他的肚子。」

一兩個鐘頭以後，担架兵回來了，其中一個担架兵報告說：「他已經死了。……我們把他抬回到大約一哩路的地方，他說：『我再也聽不到槍聲了——我們已經走得很遠了嗎？』我們告訴他：『哦，是的。我們走得很遠啦。』他不斷要水喝。一會兒他說：『抬我沒有用，伙伴們，我完啦。把我放下吧。』」

「他說：『告訴同志們繼續把仗打下去。』」

「我們就把他埋在那兒。我們把他的名字寫在他的鋼盔上。我們寫上他大約有三十四歲了。你說對不對？大約是三十四歲嗎？」

那個担架兵激動地說：「天哪，他真是一個好人！」

奧列佛曾經在美國軍隊裏服役了六年。他有才能，非常勇敢，然而因為他是黑人，所以離開軍隊的時候依舊是一個兵士，但是在西班牙，在六個月以內，他就做了上尉級的大隊長了。過去他是一個建築工人，在芝加哥的南城非常積極地爲保衛言論自由和黑人的權利而鬥爭。他的老實的態度曾經使他跟大夥兒很接近，現在他的死亡使他跟他們中間的聯繫更加緊了。大家都在討論他的誠實、可靠、自我犧牲的一切品質。他的品格是人人榜樣。奧列佛在芝加哥反共隊的手裏遭受毒打以來已經七年了，那時他們把他打得皮開肉破，企圖殺害他。雖然我們美國的法西斯匪

徒沒有能够把他殺死，希特勒的朋友們却把他殺死了。有一天，美國的工人階級將要正確地承認這個英勇的黑人共產黨員在保衛自由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

我們從低地退到最初發動進攻的地方，一個較低的山脊的頂上。柯克遜和李德已經把電話修理好。不久，縱隊的電話來了。「史迪夫，你的副官在這兒，他說林肯大隊的戰綫已經被打垮啦。」

「什麼？他在後方，在離戰場一哩半路的地方究竟做什麼事啊？我們正在據守着和我們以前據守的同一個陣地哪。」

司令員問道：「你能守住戰綫嗎？」

「我想是可以的，只要支隊能够守住在我們極左方的戰綫。」

「這樣你便不需要增援了嗎？」

「現在不需要。」

「好。橫豎我們是沒有援軍給你們的。……」

「聽着，把那個混蛋的副官送回到這兒來，或者——」

「你跟他講，他在這兒。」

那個副官的聲音很懇切。「喂，史迪夫。」

「你在後方幹嗎？」

「史迪夫，你知道，我們的陣地不安全——」

「前綫上沒有一個陣地是安全的！快給我滾回來！」我把耳機砰地一聲放下，對它瞪了眼望着，氣咻咻的。

太陽快落下去了。我在戰綫上來回走着，和中隊長們檢查所有的陣地，並作夜間的佈置。我很擔憂坦克的進攻，雖然我嘴裏沒有說。我們前方的地面上沒有圓石也沒有樹木，只有矮樹叢和青草。這是坦克進攻的一個理想的地方。我打電話給縱隊，納桑少校接了電話。

「我們可以有一個反坦克砲隊嗎？這地面對於坦克的進攻是很合理的。要是法西斯匪徒有絲毫常識，他們就會在這兒使用他們的坦克。」

「明天我們將有三尊反坦克砲。此刻我送一些防禦坦克的手榴彈和步槍子彈給你。……美國同志們的情形怎樣？」

「很好。你呢？」

「哦，我受傷啦。一顆子彈從下面打穿了我的靴後跟。走起路來一癩一癩地非常厲害。必須弄一雙繩鞋，呃？好，再會吧！」

「再會。」

我不曉得這個人說話的聲音爲什麼聽起來這樣教人愉快！

一個鐘頭以後，副官回來了，他於是馬上派遣通訊員去召集中隊長們和小隊長們。我那時正在外面防綫上，聽着法西斯軍隊方面一些隱約的轟隆轟隆的聲音。到了開會的時候，我才回到大隊的指揮所來。

副官興高采烈，挺有勁兒的。「伙計們，你們可知道奧列佛受傷啦！」

大家都激動地望着他。他們在戰鬥時看不見他，橫豎命令已經發出了，橫豎這個撞離職守的人對情況一點也不曉得。

布拉德萊上尉很溫和地問他：「副官同志，你不知道事情正在進行的情況，怎麼能夠發佈命令呢？」

副官趾高氣揚地說：「難道我不是大隊的副官嗎？」

「不，」我說，「你不是的，等到我們進一步調查過你以後再說。你向縱隊報告去吧。把你的手槍留在這兒。」

那個被解除職務的副官行了一個生硬的敬禮，向後一轉，走開了。他是一個很適於軍事生活的人；他曾經在尼加拉瓜的美國海軍中服役過，爲了他的軍事上的知識和經驗，大隊過去歡迎他參加了進來。他對政治倒真是不了解，也沒有興趣；他是一個兵油子，引導他參加政府軍而沒有參加法西斯軍隊的，只是一種機會罷了。但是關於軍事方面他懂得很多，而這類人是很稀少的。

這時電話來了。縱隊長說：「我們聽說奧列佛今早犧牲了。派你担任大隊長。」

最初三天，我們頭上只出現過寥寥幾架法西斯軍隊的飛機。不久，法西斯軍隊的飛機便蜂擁飛來了，在數量上以二十與一之比超過了政府軍的飛機，因此我們的飛機便被從天空趕走。我們這次進攻的第二個目的是要吸引法西斯軍隊的飛機離開北方的戰綫，這一個目的已經證明非常令

人滿意。林肯大隊的人都是掘土挖壕的老手，壕溝挖得深，因此在敵機不斷轟炸之下倒也相當地安全。

在第十一日早晨，飛機向林肯大隊傾瀉了一百顆炸彈。然後輕型飛機飛來，又丟下了手榴彈，並用機關槍掃射了一番。

在戰綫後面，在一叢安全的樹林裏面，放着兩尊反坦克砲。飛機並沒有發現到它們。當敵機飛走的時候，人們從他們的「狐狸洞」裏爬出來，熱切地偷看着法西斯戰綫。

電話來了。「敵人的八輛坦克開下了山——小型的——後面至少有一營步兵。」這時一挺機關槍和幾枝步槍開了火。反坦克砲手也準備好了。

坦克開近了。它們已經來到不到五百碼的地方，沒有任何掩護。兩尊反坦克砲同時發射，領先的一輛坦克就着了火。再來一次同時發射；另外一輛坦克便往旁邊一歪，猛烈地打起圓圈轉來，轉了又轉。別的坦克都奔到一個小土墩後面躲避着。但這也不能掩護住它們；土墩不夠高。

一輛坦克的尾巴露出，躲不掉人們的眼睛；它在片刻以後就爆炸了。剩下的坦克相信它們已經陷入反坦克砲的火網，逕直奔到山頭上去。只有一輛坦克漏了網。

在反法西斯的步兵們看來，簡直沒有一種景象比看到一輛法西斯坦克被摧毀還要好看了。在望着這種景象的時候，我想起了一個老戰士說過的話：「你會愛那些反坦克砲的。」

當坦克掉頭逃走的時候，步兵停下，猝然撲倒在地上。他們離林肯大隊的人大約有五百碼。

過了一會兒，軍官們站起來，下令他們的士兵前進。這時政府軍停住了砲火。法西斯軍隊便信心倍增地繼續前進，他們現在確信他們的空襲已經把對方的戰線打垮了。他們毫無警戒，他們跑着，喊着，相信他們遭遇不到抵抗。

我躺在萊伊·斯蒂爾的機關槍旁邊。「看去像有四百人的樣子，」他說。他說話的聲音很低，緊張極了。

「我再讓他們前進二十五碼，」萊伊精神抖擻地說，流着汗，一絲淡淡的微笑浮上他的嘴角。「沉着氣，小伙子們。……行啦，動手！」

萊伊能夠用他的槍打出調子來。「修面和剪髮，七角五分錢。」那便是他的調調兒。六挺機關槍對捲來的法西斯人潮投出致命的火力。手持步槍的戰士們奉命對遠在山坡上的敵人發射，同時機關槍手不停地掃射那些朝山溝這邊跑來、逼近我們戰線的敵人們。

萊伊咒罵着，「我在這兒什麼都看不見。」他跳起來，他從陣地上把槍舉起往前就跑，和他一夥兒的戰士們帶着彈藥跟在後面。過了一會兒，他的調調兒開始了：「修面和剪髮，七角五分錢。」萊伊是這次戰役中的英雄。他是大隊裏一個最優秀的機關槍手，在雅拉瑪，他的機關槍是唯一沒有發生故障、不打格輪而一直繼續不斷地掃射着的一挺槍。

林肯大隊就這樣報了雅拉瑪之仇。

在戰鬥的初期，我回去把地面上查看一下，去看一看運輸彈藥的卡車能夠開到離前線多近的

地方。在下面的河牀裏，我發現史密斯坐在一塊岩石上面，淌着汗呢罵着，望着壓在細包下面的六頭騾子。騾子刷刷地搖着牠們的尾巴，朝史密斯呆呆地望着。

「我不曉得怎麼辦纔好，」他絕望地說。「我的受過訓練的騾子被炸彈炸死啦。所以我八下裏找來找去，纔發現這幾頭騾子，把牠們組織起來。可是有什麼辦法呢，牠們既不會說英語，也不會說別的話，我不能叫牠們走動起來。要是我跑到後面去用力鞭打牠們，領頭的騾子就嚇得跑到山底下去了。要是我到前面去牽着牠們，那麼整羣騾子就索性一動也不動。瞧，這裏做的是一大批美國好烟，巧克力糖，各種彈藥，還有幾雙鞋子，大尺寸的。妙啊，大夥兒看見了多麼高興！」

「我來幫助你，」我說。

我使喚帶頭的一頭騾子。我把我所知道的對付騾子的手段都嘗試過了，可是騾子一動也不動。

我找到了一根棍子，於是我爬到騾子背上去，把盛鞋子的寶貴的囊袋裹在我的膝頭上。我一面喊着，一面用棍子痛打那一頭騾子。史密斯爬到最後一頭騾子的背上，也模倣我的辦法。於是那些騾子沿着乾枯的河床慢吞吞地前進了。

我們來到一個山谷，據我的估計，這個山谷應該是通到林肯大隊的陣地去的，可是一個偵察兵阻止了我們。他堅持說我們走錯了路，這一條路要把我們引到法西斯軍隊的戰線去。他非常自信，因此我便被他說服了。我走向那傢伙在幾分鐘以前指點的山谷，又轉個彎朝上面走去。



突然間，空中充滿了機關槍子彈，我們已經到了法西斯軍隊完全看得見的地方了。

我手裏有三頭騾子的牽繩。我騎的一頭騾子在屁股上面中了一顆槍彈，開始猛烈地跳起來；我便從騾子背上跳下，打算把所有的騾子牽回到山谷去。馱着一囊袋鞋子的那一頭騾子跑走了，另一頭騾子中了一顆子彈跌下山谷去。我拚命地爭奪其他兩頭騾子；我們非常需要它們負載的彈藥，必得不要丟掉纜好。

敵人剛一開槍，史密斯就帶着兩頭騾子轉回去了。我也帶着我的那兩頭騾子和他一道。我們從山峽的邊沿上偷偷地望過去，馱着鞋子的那頭騾子正在蕩來蕩去地走過一片空地，朝法西斯戰綫那邊走去。這時法西斯軍隊已經停止開槍，他們正在注視着那頭騾子，猜想牠替他們帶去了什麼禮物。

我用我的手槍放了兩槍，可是那沒有用，只有使那頭騾子走得快些。

我奔回山溝去。碰巧那個「識」路的人手裏拿了一支步槍坐在那裏。我奪過步槍，又爬到岸上。那頭騾子足足在三百碼開外的地方，但牠沒有跑得了。我轉過身去對那個「識」路的人說：「我很想把你逮捕起來，」後來就這樣算了。

那天夜裏，我組織了一夥人去搜尋那頭騾子身上馱的鞋子。「你別騙我，」魯比狠狠地說。

「你不是去找鞋的。你是要去把那頭混賬的騾子拖回來，這樣你就可以用牠來給我們燉了吃啦。」我們到底把鞋子找到了。是那個「識」路的人把鞋子拿回來的。

最糟糕的事情是缺水。水從來是不夠的，而大多數時候是根本一滴水也沒有。戰鬥開始三四

天以後，河道就乾枯了。有時候糟糕到人們不能行動，不能用腦子想事情，不知道他們周圍正在進行的一切事情。在那些天當中，要是有一天法西斯軍隊來個進攻，那就要糟糕透頂了。沒有一件事情像口渴那樣磨折得教人難受。你不曉得你在哪兒，也不曉得你在做什麼事情。

好萊塢的羅賓斯醫生發現了一點不能喝的臭水。他忙得像一條狗一樣，組織了他所需要的人員，製成了能够喝的水。然後他把水裝在水槽車上，開到前綫上去。他曉得水是很珍貴的，他一點也不粗心大意。

一架法西斯軍隊的飛機飛臨上空，丟下一顆炸彈來，把卡車的後部一骨腦兒炸去了。羅賓斯醫生那樣辛苦地為大家弄好的水都流到大路上去，但是他一點也不曉得這件事情，因為炸彈已經把他炸死了。

美國人靜靜地、一言不發地躺着，眼睛迷迷糊糊，舌頭感覺到膨脹。西班牙人滾來滾去，抓着喉嚨大叫：「Madre mia-agua-agua！」（我的娘——水呀——水呀！）

我們挖了又挖，沙土繼續不斷地從河牀的兩邊陷下去，而太陽又是一種磨難，使你看不見東西，沒有感覺，也不能想什麼。你只是去挖土。我們挖了八呎或者十呎深的時候，水冒了出來，成爲一個淺淺的小池子，可是，每個人剛喝下五六口，水就乾枯了。

水有死驢子的味道，可是這究竟是水呀！

弗里德曼率領華盛頓大隊的他的一排人去進攻加拿大新鎮的戰壕，在戰鬥的第一天就陣亡

了。沃伊科夫也陣亡了，蒂尼受了傷。就在第一天上，林肯大隊有十二個人陣亡，華盛頓大隊有二十八個人陣亡。

當比爾從基地來到的時候，我們談論我們的死者和傷者，懷着一份沉重的心情坐着，在想着我們同志的犧牲，他們是英雄地戰鬥了的，英雄地犧牲了的。但也有少數人可恥地臨陣脫逃了。

人們管他叫麥克。我曉得麥克這個人。他曾經在基地呆過一個時期，在那兒鬧了一個大亂子，審訊以後，命令他到前綫來。他抗議這個判決，作了一個有意逃避命令的詭辯：「派一個人到前綫去不是一種懲罰，而是一種榮譽。任何反法西斯戰士都把到前綫去當做值得驕傲的事情。倘若我做錯了事，我就應該受懲罰，而不是被派到光榮的位置上去。」

同志們沒有被他的這些話打動。他被派到伊班涅茲村的林肯大隊來，並和他們一同到了布隆尼提。

所以，當比爾問到麥克的時候，我聳了一聳肩。「他是怎麼搞的？」他說。「我自從戰鬥開始以後就沒有看見過他。」

「躲掉了嗎？」比爾罵道。「我真想不到他真有這樣胆子敢跑掉。」

「大夥兒們說，當我們動身下山到加拿大新鎮去的時候，他跟他們是在一塊兒的。此後就沒有人看見過他。他甚至也不等待聽到槍聲就跑了。」

賈基·希拉果然不說假話，他在大戰發生的時候就擺脫了廚房。他把他的俄國好槍托在手裏，跟大隊的人一道參加了戰鬥。他隸屬於一個機關槍小隊。

他的槍安置在一個低山脊的後面。右邊是在砲火下面的約有二十碼寬的一片空地。天快黑的時候，一個人走來，手裏拿着幾罐頭的食物。但是他不能夠走過這一片空地。

賈基說：「我去把它拿來。」大夥兒喊他說，「等一等，賈基！等天黑了再去！」但他終於走出去，陷入火網裏面，被一顆子彈射穿頭腦了。在戰爭的時候，人們埋葬他們的死者是不大費力的。但是在七月十一日這一天，當黑夜降臨的時候，賈基的同志們只好把他放進一個淺淺的墳墓裏，把他們的鋼盔脫下，站在那裏表示哀悼。

在兩個大隊合併的那個晚上，命令來了，要我們開往巴迪洛新鎮，法西斯軍隊正在那兒猛烈反攻，使我們進攻的全部收穫都受到危險。沒有卡車。路綫穿過一道乾枯的河牀。

揣着全副行囊在柔軟的沙地上前進不是容易的。沙土滲進他們的鞋子裏，把他們腳上的皮都磨掉了。有些人脫去鞋子，試驗赤着腳走路，可是腳上流血不止。他們不能走快，但是又不得不走快，他們必須在天亮以前到達陣地。

機關槍手們糟糕透頂了。魯比，萊伊·斯蒂爾，道格·羅雅奇和森茨頓在某一個地方「組織了」一匹馬。當我發現的時候，我把他們痛罵了一頓。「你們不知道在共和國的軍隊裏決不能做這種事——偷馬嗎？」

他們感覺很慚愧。他們說：「好，史迪夫同志，我們決不再做這種事了。」

大家都已遵照了規矩，於是一齊繼續前進，把那匹馬也帶了一道。

到了日出的時候，我們到達公路上的一座橋（這橋在通往巴迪洛的公路上），然後離開了河，

沿着公路走了兩公里。我們已經走到法西斯軍隊完全望得見的地方。法西斯軍隊發現我們以後便開始砲轟起來。馬上我們奉令在一條彎彎曲曲的幽深的山谷裏造成一個預備障地。我們沿着山谷散開，開始挖起戰壕，但是在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挖好的時候，大砲便開始認真地轟過來，第一批飛機也飛臨上空了。

飛機像浪潮似地整天繼續不斷地飛來，丟下了重型的和輕型的炸彈，並且俯衝下來用機關槍掃射。它們用燃燒彈把附近的一個麥田燃着了，着了火的麥穗的刺鼻的氣味和火藥的氣味混合在一起。

從早上九點鐘到晚上六點鐘，大砲以每分鐘十二發砲彈的密度固定不移地發射到我們的陣地上。

但是最糟糕的是炸彈。

大地在顫抖，在繼續不斷地猛烈地震動着，整個樹木連根拔起，碎片在空中飛着，震盪的風聲像一陣暴風一樣。誰也不可能相信除了自己以外還有其他任何人在活着；誰也不可能相信自己能够在這種地獄般的地方活得很久。在一秒鐘間歇的當兒，你聽一聽有沒有什麼聲音，有沒有喊叫，有沒有人聲，結果什麼聲音都沒有。接着就有一顆砲彈爆炸開來，同時你聽到馬達的怒吼和炸彈的嚎叫，於是你周圍的土地又被炸裂成碎土了。

在所有這些事情上，只有一個聊以自慰的念頭：只要砲彈的發射和炸彈的轟炸還在繼續下去，法西斯軍隊的步兵就不會進攻。我希望轟炸停下來，可是我心裏在想：要是轟炸真的停下的

話，事情怕要變得更糟了。

快到黃昏的時候，飛機飛走了，砲轟也突然停止了。米勒中尉、通訊員和我爬出了我們用作掩蔽的一棵大橡樹的樹根下面所挖的一個壕洞。這棵樹曾經被一顆砲彈直接命中，炸斷的樹幹和樹枝覆滿在洞口上面。我們朝山谷的上下偷偷地望過去，這裏那裏，都有什麼東西在騷動，並且聽到有人說話的聲音——

一個西班牙通訊員溜進山谷來。「指揮官，指揮官，我們遭到攻擊啦！快些把你們剩下的戰士派出去！」

還有什麼人可以派遣嗎？我沿着壕溝的邊緣跑去。「喂，同志們，你們都安全嗎？多少人受了傷？鼓起勁來，我們要上前迎擊敵人啦！我們損失了多少人？」

這是戰爭中的奇蹟。在山谷內的七百人中，那一天只犧牲了一個人。他的神經壞了；他跳起來跑開，炸彈的碎片就落到他的身上。有三個人受傷，其中一個人後來在醫院裏死去。

西班牙同志們整天注視着那些砲火在躺着美國人的洞穴上面閃亮着。他們也相信不可能有許多人——甚至任何人——能活下來。但他們又懷着驚訝和喜悅的心情望着美國戰士開到前線上。美國人越來越多。西班牙同志們歡呼了起來，有的人甚至哭了，緊握着他們美國同志們的手。

至於美國人呢，他們曾經到了死亡的關頭，而現在他們發現自己還在活着，並且沒有受傷；這種實感像烈性的酒似地燃燒在他們的血液中。他們都還活着，他們都很好。他們都擠進戰壕

裏，擠在他們同志的身邊了。

有一個西班牙人開始唱起國際歌來。整個戰線都接着唱下去，用兩種語言吼着。他們一面唱歌，一面對從曠野上爬過來的法西斯軍隊開槍。

吃了一驚的法西斯軍隊停止前進了，動搖起來，退却了。

基地需要一個人訓練機關槍手，於是林肯大隊就提出萊伊·斯蒂爾去擔任這項工作。這就使得魯比·里昂特抱怨起來。自從瓊尼·波爾斯受傷以後，魯比就是機關槍中隊的代理政治委員了。「他是我們最得力的一把手啊！」魯比歎氣說。「他不但會使機關槍，他也會修理機關槍。你們爲什麼一定要把我們最得力的一個人拖走呢？」

「就是爲了這個，」我告訴他。「我們不能讓後方變成一個垃圾堆。新入伍的伙伴們得要學習，主持訓練工作的人越好，訓練工作就做得越好。」

大隊一組織起來的時候，萊伊就和林肯大隊的人一同作戰，他從來沒有受過傷。在他加入大隊以前，有人向我警告過關於萊伊這個人。他是「敗壞風紀的、一個專愛發牢騷的人，經常埋怨，反對政治委員」等等。他是一個愛發牢騷的人，這是事實。他像一條小公牛一樣反抗許多事情；當軍械工匠們把機關槍修理得一塌糊塗的時候，他就跟他們大吵起來。萊伊確是一個傲慢的傢伙，態度「生硬」，滿嘴盛氣凌人的水手們的粗話，他攻擊起人來很厲害，無論用舌頭或者用拳頭。

命令是從布隆尼提戰鬥的中途來到的，要萊伊到塔拉森納去報到，到訓練學校去。「喂，」他

對我說，「派定我經過伊班涅茲村，好不好？我在那兒有些東西想帶走。」他眨了一眼。

「當然可以，」我說。「你到那裏，要是看到英妮斯的話，別忘了代我向她問好。」我們倆都很開心地笑着，我捶着萊伊的背，罵着他，然後萊伊走來走去地向大夥兒一一告了別。他就像到了伊班涅茲一樣，英妮斯正在那兒等着，他太快樂了，一點兒也不知道小心；太粗心大意了！

法西斯的狙擊兵一槍射穿了他的胸膛，他在還沒有倒下地以前就死去了。

這真是命運的安排，他就埋在他的最要好的水手朋友哈利·希尼斯的附近，希尼斯是一星期以前在同一座山的山坡上陣亡的。

我躺在大隊指揮部的地上，懶散地聽着附近一夥兒在談話。夜晚是談話的時間。白天是神經緊張地警戒着的時間，是鬥爭的時間，是提防着死亡和不幸的時間；但是一到夜晚，戰綫又活躍了起來。食物送來了，鐵鋤和鏟子行動起來了，作報告，排解牢騷，處理生活上的事情，然後，在半夜左右，當工作結束的時候，每個人輕鬆了，或者睡覺，或者隨便聊天。

我躺在那裏聽柯克遜敘述他的計劃，他計劃建造一道橫亙直布羅陀海峽的水閘，以便利地中海的水力。他說：從機械工程的觀點上說，這一種水閘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它會把電力供給全部歐洲和非洲。它會使現在是荒地的無數平方哩的沙漠能夠適於耕種。它會無可估量地增加世界上工業和農業的財富。

「阻撓這個計劃實現的不是機械工程的問題，」柯克遜說，「而是政治制度。」

大夥兒非常感到興趣。他們提問題，熱烈地討論着。他們是在戰鬥中間的兵士，但他們都捲



入了關於科學和政治的討論。柯克遜很喜歡被他稱爲論爭的這些談話，每次一有工夫他就來一個新的論爭。

不久這一羣人散開了，只有柯克遜和帕特·米德兩個人還留下。帕特說：「約翰，告訴史迪夫，你是怎樣參加這個運動的？」

「難道有什麼奇怪的事情嗎，帕特？」我問道。

「正是有點兒奇怪，」他格格地笑起來。「說下去吧，柯克遜。」

柯克遜也格格地笑起來。「我已經把它推論出來啦，」他說。「實際上，引我參加的是物理學上的問題。……你真的要聽一聽嗎？」

「只要你肯告訴我。」

柯克遜又笑了起來，把他的長腿伸直在壕洞的地上。「嗯，我碰到了這麼一個問題。那時我在做我的博士論文，於是——」

「問題是什麼呀？」帕特說。

「說來話長，可是跟物理學有關係。……總之，我不能找出解答來。我到處亂翻，讀遍了我能够找到的一切書。在一本書上，我無意中發現在一個參考書目錄中有列寧的一部書，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這件事情使我吃了一驚。我知道一點關於布爾什維克的事情，我不喜歡布爾什維克，而列寧是布爾什維克的領袖。這裏便有列寧的一本討論哲學的書，而且跟科學也有關係。我的驕傲受

到了打擊。列寧對這個題目能够有什麼貢獻呢？

「好，結果是我不得不把它找出來。這種思想不斷在我心裏盤算着。我設法從圖書館裏去找這本書，可是在那兒找不到。圖書館員告訴我一家小書店，在那裏可能找得到那本書。」

「我記得我到那裏去的情形。深怕被人看見，在沒有跨進那家書店的門以前，我就回過頭去向兩邊張望一下。書店裏面的姑娘把那本書遞給了我，我把錢放下。我感覺到好像我在妓院裏被捉到的一樣。當她問我願不願意把我的名字和地址留下時，我說一聲「不！」，馬上便奪門而出了……」

「讀着這本書時使我感到極大的震驚。對於這個使我感到迷惑的問題，列寧已經指出了解答的方法。他做到了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們沒有做到的事情。」

「何以一個政治家對於我自己的科學領域能够非常內行呢？我想一定是那個人的個人的天才。我又把他的著作多讀了一些。我發現這不只是天才的問題；這是對我完全陌生的一種新方法。」

「所以——」他笑嘻嘻地攤開他的手。「一旦我體會到這一點，就只有一條路展開在我的面前了。於是我去找共產黨。」他突然變得很窘的樣子。「不去才真是傻子呢。」他粗魯地說。

是的，路是很多的。一條路是通過煤礦、造船廠、糾察綫、失業和飢餓，而警察的棍棒又敲打你的頭腦，使你感覺到有些事情不對，這一個問題在你腦子裏越來越擴大：「我應該怎麼辦呢？我們要怎樣做纔能够糾正它呢？」然後，找出答案來，試驗它，用你自己的經驗、用你所知道的一切和它比較，發現它是真實的，正確的。然後，你加入了黨。那是一條路。另外還有一條

路，是柯克遜的路，學生、教員、知識分子、科學家，追求答案，而在列寧的著作中找到了它。

柯克遜說：「史迪夫，我今天接到我爸爸的一封信。他是威斯康星州的一個牧師。我很願意你讀一讀。」

這封信裏首先談了一些私人的事情。接着是：「親愛的孩子，我要你知道，我對政府軍方面是完全同情的。確實，我並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認為必須到西班牙去，手裏拿着步槍作戰。但是不要誤解我，我不是說你不應該去。你已得到結論，認為這樣做是對的，你已得到我的深切的讚揚了。你的勇敢，你對你的理想的忠誠，是令人感動的。」

柯克遜說：「那封信很值得我驕傲。」他的眼睛裏充滿了眼淚，想到了那封信和他的父親。

「你有權利驕傲。我們部隊裏任何一個人都會對那樣一封信感到驕傲。」  
一年以後，他犧牲了。硬心腸的矮個兒帕特，像麻栗樹一樣硬的他是反對柯克遜的政治見解的，但是當他聽到柯克遜死去的時候，他也忍不住他的眼淚了。

## 對士兵仁慈的上校

法西斯軍隊集中了大批的飛機和大砲，轉過來進攻我們了，政府軍被迫退却——退到瓜達拉馬河，並且退到河的這邊來。一天傍晚，法西斯軍隊佔領了河牀好幾處地段。那是一個對他們不

利的地位，這裏的地面比政府軍據守的地面要低些。在邏輯上說，他們第二天早晨須加緊進攻，佔領俯瞰河牀的高地。

就在同一天傍晚，命令下來，要換林肯——華盛頓大隊去休息。

大隊有一個沿着一條山脊的好陣地，但是在我們的右翼和同一條戰綫上的附近一個部隊之間有一個一哩寬的缺口。要是法西斯部隊進入那一個缺口，大隊的陣地就守不住了。那一個缺口必須填上。

一個新的西班牙縱隊開上來。縱隊的兩個大隊填上缺口，其他兩個大隊換林肯——華盛頓大隊的班。

他們天黑了很久纔開到。史密斯中尉、哈蘭和我一同去見縱隊長，並向他說明局勢。我們在深夜一點鐘左右纔找到他。他的兵士都在橄欖樹的掩蔽下到處睡着了。

馬上我就問道：「同志，我猜想已經把哨兵佈上了崗啦。」

「不，我的軍隊走了一整天了。他們太累，我想我應該讓他們睡覺。」

「是的，同志，我知道。」我回答說。「不過在你們和法西斯戰綫中間沒有什麼遮蔽啊。我實在認為我應該提起你的注意。」

上校的聲音裏面帶有生氣的腔調。「戰士們太累啦。不能指望他們馬上去挖戰壕。」

「同志，我曉得你是怎麼個想法。」我幾乎抗辯起來。「法西斯軍隊完全看得見你們哪！」上校用他的疲倦的、執拗的眼色瞪着我，很顯然的，對於這件事他是不願有什麼安排了。美

國人很着急，他們走回他們的指揮所去，打算打電話給縱隊，可是電綫不通，被砲火打斷了。

機關槍中隊隊長哈蘭中尉說：他有四挺機關槍可以利用，他建議把它們放在離西班牙縱隊後方四百碼的地方。史密斯和我都同意這個意見。我建議說：「除非法西斯軍隊突破西班牙同志的戰綫，否則切不要動一下。可是倘若戰綫被敵人突破的話，就用機關槍掃射他們。不過務必當心不要射到我們自己人的身上。」

他們沒有告訴上校就做這種事情，這並不是輕舉妄動。然而這不單是這一個新縱隊的問題，要是他們被打垮，給法西斯軍隊突破那個缺口的話，大量美國人和西班牙人都要在這上面付出代價。

在上午五點半鐘，拂曉的時候，糟糕的情況發生了。法西斯軍隊開始用機關槍朝兩千人掃射過來，這兩千人是在完全看得見的地方，沒有狐狸洞也沒有任何一種掩蔽。這個新縱隊在彈雨之下醒過來，自然陷入了一片驚慌。

上校和他的其他的軍官們，有的軍官還騎在馬上，都向那些士兵叫喊着，用他們的手槍朝他們的逃兵的頭頂上面射過去，但是一翼已經崩潰，逃跑了。

然後我們的兩挺機關槍也從逃兵的頭上掃射過去。這陣掃射在那些驚慌的士兵們身上產生了顯著的效果。驚慌停止了，他們開始掘壕據守起來，事實上他們建立了一直守到戰爭結束時候的一道戰綫。

這一仗打過以後，上校來找我了。他滿嘴的感激和道歉，可是我絲毫不被他打動。我坐在一

塊石頭上，背靠著一顆橄欖樹，抬起頭來望着上校。「一定要把這件事報告支隊部，」我忿忿地說。「整個戰綫都會被你弄垮了的。」

上校把頭掉轉到一邊。「我曉得……不過請你告訴我……這些機關槍是誰的？是支隊部放在那裏的嗎？」

「問哈蘭去好了，他會告訴你的。」

上校的眼睛裏充滿了眼淚。

死去大約三十人，受傷一百人，這都是那個新縱隊爲了上校的仁慈所付出的代價。

## 奉令撤退

在生活的中間，我們受到死亡的威脅，在最悲慘的時候，却又發生了意外的轉機。

過了三個星期以後，戰綫安定了下來，大隊調離戰綫，被送回後方休息。我們要回到伊班涅茲村去。那正是大夥兒所希望的，一切安排好了，先派一個騎機器腳踏車的人去告訴伊班涅茲村的村民：他們的朋友們，美國人，正在回來的路上了。

替班的大隊到遲了。我們沒有能够在上一夜離開，因而剛走出戰壕太陽就照在大隊人的身上了。這是一件教人担心的事情。我們正在開拔，要是現在被敵人發覺，那真要倒霉透頂了。

前往卡車守候的地方還走了不到一個鐘頭的路，飛機出現了，高高地、懶洋洋地飛着。戰士們憂慮地望着飛機，他們的肌肉都在打顫。以前飛機從來也沒有使人這樣地感到威脅。大夥兒經過三個星期的繼續不斷的戰鬥以後，已經筋疲力盡，現在又急忙躲進凹地，溝渠，洞穴去。

高射砲開始發射。高射砲離飛機太遠，沒有什麼用處，可是照樣把砲彈發射出去。我緊靠在地面上，從我的眼角裏看見一團團白烟在天空開了花。砲彈離飛機太遠了，可是人們聽了砲聲總會覺得安心的。

現在飛機又飛得低了，沿着杳無人跡的彎曲的大路飛着。第一批炸彈丟下來，大約落在前面一百五十碼遠的地方。我開始計算着——一——二——三——四——五——又一陣震撼大地的吼聲，落在我後面二百碼遠的地方。

一會兒，大路上又是人頭簇簇。全隊更迅速地向前移動着。空襲已經把他們鬆懈的力量重新鼓舞起來。

在前面的樹底下，我們看見從偽裝了的廚房裏冒出了烟，看見高射砲手們走來走去。燉驢子肉的香味從靜寂的空氣裏飄散了開去。照料軍隊回到後方的納桑少校從田野上慢慢兒走過來。

「史迪夫，老朋友！歡迎你回來啦。來，美國佬同志，喝一點酒吧。這是我替你留下來的。一種英國酒。」

他莊嚴地舉起一只錫酒杯，豎起一條眉毛來對着我。「祝福我們的縱隊新政治委員。乾一杯，老兄！」

「你說——我嗎？」

「是的。你不久就會得到正式通知了，我可以向你保證——一點也不假！」

馬達聲音嗡嗡地響起來。我們伸直了脖子偷望着天空。「飛機就在那裏——從山上飛過來了。啊，糟糕——最好找一地方躲避一下，嗯？牆那邊有一個壕溝。」

我們像鹿一樣跑去。高射砲開砲了，所有的五尊高射砲同時發射，可是飛機飛得很低。炸彈的轟隆的響聲從灌木那邊傳來，一會兒飛機就飛到頭頂上。納桑喊道：「臥倒！」於是我鑽進土裏去。我的手槍套就在我的身子下面。要是我能把手槍套拉出來，我的屁股真的會低得多哩。我正用力拉我的手槍套時，忽然轟隆一下猛烈的響聲把我震得耳聾眼花。炸彈好像就是在我的身旁炸開了似的。但我却安然無事。

納桑在叫喊。「我被炸中啦！史迪夫！」我跑到納桑跟前，把他的襯衫撕開。他的胸口上有三吋深的傷口，只有些微的血滲出來；最初我認爲這只是擦傷，但是納桑的臉却痛苦地皺在一起，傷一定是很重的。我瘋狂地喊叫急救，馬上就有兩個人跑來，這時納桑已經不能說話了。他抓着他的軍官皮帶，把它拉下來遞給了我，做出一種姿勢來，意思是說：「把它拿去吧——我的命沒有啦！」

這時又飛來了一批敵機。急救人員動手捆紮納桑的傷口。在幾百碼遠的樹下停了一輛救護車。我朝那輛汽車飛也似地跑去，正在跑的時候，我很開心地看見兩架法西斯轟炸機在天空打着螺旋轉，尾巴後面冒出煙來。高射砲已經打中了它們。別的飛機都四散奔逃了。另一架飛機在半



空中爆炸——機身炸得粉碎地散開，剩下的部分突然向天空一衝，然後筆直地掉下來，變成不成樣子的一堆。救護車周圍的西班牙人都站起來，吆喝着，歡呼着。他們一點也不注意我。我把担架弄到手以後便走回來了。

我們把納桑放到担架上抬着跑回到救護車那邊去。其他的人也加入了，其中有加蘭德中尉在內。我們把担架推進車子裏面，四下裏去找司機。一個袖子上佩帶紅十字臂章的西班牙少校朝我們這邊跑來，叫喊着提出抗議。

「停下！你們不能把我的救護車開走！停下，我說的！」

「開走，加蘭德，」我說。我又轉過去對那位少校說：「一個人受傷了，一個縱隊的軍官。」那個少校激動得不願聽我講下去，他是一個很威風的人，一嘴的灰白鬍子。加蘭德已經發動了汽車馬達，那個少校便往汽車踏板上跳去，猛然停住，懷疑地瞪着我的自動手槍的槍口。

馬達轟轟地響起來，加蘭德把救護車從這裏開走了。其他的美國人也一聲不響地溜走。那個少校和我互相瞪着眼。他的手、頭、跟那神氣十足的范·戴克式的小鬍子，又是驚訝又是憤怒地顫抖個不止。他突然轉過身去，吆喝着一羣急匆匆地朝我們這邊趕來的西班牙兵士。

我開始感覺到我自己惹出事來了。我想最好是以後來解決這件事情，要過好一陣子纔成，現在最好是撤退。於是我從田野間飛跑過去，從一道石牆上輕輕跳過，落到膝深的水溝裏面。我蹣跚着水爬出水溝，跑到一叢灌木下面，又拔步跑起來。我覺得自己像是被警察追趕的一個小孩子，荒唐、可笑、而又感到恥辱。

我又回到大隊裏面了，心裏真感覺到無限愉快。

我找到一個帳篷，便走進去坐下，一面搔着我的頭。

好傢伙！真糟糕得够瞧。對一個西班牙少校拔出槍來啦！

我打電話給縱隊司令部，報告了納桑少校傷重的消息。我並且報告了我曾經偷了一輛救護車把他送到醫院裏去。

縱隊說：「那沒有關係——救護車不久就要回來啦。」

「是的，可是他們會來追趕我。聽我說，這傢伙還是一個少校哩——」

「哦，那好啦。我們來照管這件事得啦！」

所以我就把一個衛兵放在司令部外邊，吩咐不准讓任何陌生人進來，我悄悄地躲着，等待加蘭德把救護車開回。醫院裏送信來了，說醫院方面正在替納桑動手術。

加蘭德跨在一輛卡車的尾板上回來了。

「救護車弄到哪裏去了？」我很鎮定地問他。

「我把它丟在醫院裏啦。他媽的我不願再找麻煩了，」加蘭德表現出義正詞嚴的憤慨的樣子。

「聽着，」我說，「你騎上那輛機器腳踏車，把車子從這裏開去。把救護車開回來！把它開回來！」

加蘭德不高興地駕着機器腳踏車走了。他極力把救護車開到靠近他最初把它開走的那個樹

叢，把汽車喇叭按得挺響，便從車上跳下。他穿過田野，跳過了石牆和水溝，甚至比我原先跑得還要快些。

不久以後，矮子少校率領一個西班牙巡邏隊在美國營帳旁邊出現了。這裏的每個人都變成了啞叭。「一個傢伙，穿着一件小山羊皮的夾克和一條咖啡色褲子，佩戴一枝手槍，看見了嗎？」  
「啊，沒有。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那樣的一個人。」

少校和他的巡邏隊又走開了。

天快黑的時候，我打電話到醫院去。醫院的人對我說：「納桑少校嗎？我很難過；他死啦，大約纔只十分鐘以前。」

這句話是朝我心窩打一拳。納桑這個人，善良、聰明、能幹、愉快而又活潑。他在猛烈的砲火下高高興興地信步走來走去，揮舞着他的可笑的小手杖，嘴裏的烟斗翹起，形成了一個三角形，從容地抽着烟——納桑在跟前的時候，即使最沒有經驗的新兵也是不用害怕的。納桑是這樣的鎮定、有把握，因此他使得每一個人也都同樣地感到鎮定而有把握。爲了要做出那一種榜樣，他知道他的態度在沒有經過訓練的和受過一半訓練的士兵的身上發生的效果，因此他曾經冒過極大的危險，好幾百次以凜然不可侵犯的態度把自己置身在危險裏面。現在死亡已經找到了他，在一個炸彈碎片造成的不幸的橫禍中——一個單純的、不能預知的、倒霉的意外事件。

我傷心得很。在這個悲劇的面前，我不得不去結束我所惹起的一場喜劇，跟那位西班牙少校把事情了結清楚。我把一條幸運牌香烟夾在我的夾克裏面，這只是預防萬一，於是喊了兩個伙伴

和大隊的譯員來，動身到西班牙營帳那邊去了。

「少校同志，」我說，「我對於過去發生的事情很抱歉。我要——」

「你到別處解釋去吧，」少校冷冷地說。「非調查你的行爲不可。」他激動起來。「這種行動在人民軍裏是不能容忍的，先生！」

「沒有關係，」我說。「我那樣做的理由，因爲受傷的是納桑少校，我們縱隊的軍官。」

「納桑！」少校猛地嚇了一跳。「那個高個兒，拿着手杖，啣着烟斗的嗎？啊，糟糕！他怎樣啦？」

「他死啦。他在開刀不久以後就死去啦。」

「啊，糟糕！」少校又叫起來。「啊，慘哪！納桑少校！要是我事先知道——爲什麼你早不告訴我，同志？那位納桑，他——」

我們談了一會兒關於納桑的事情。要在那一件事情剛過去就馬上把香烟送給他，這似乎是一件不大禮貌的事情。我在第二天纔派通訊員把香烟送去。

大夥兒在一塊大石頭下面替納桑挖了一座墳墓，一個曾經當過刻石匠的小伙子弄到了一個鏨子，他花去一整天和一部分夜晚，替英國的喬治·納桑少校刻了碑文。

大隊列隊前往參加葬禮。那位西班牙少校站在我的旁邊，眼淚從他的臉上滾到尖鬍子裏面去。

在納桑少校中彈那一天的傍晚，我跟那位西班牙少校和好以後回來，到縱隊司令部去。當我走近營帳的時候，一個通訊員駕着機器腳踏車從田野那邊飛馳而來，車輪的後面揚起白茫茫的

灰塵。

「納桑少校在哪兒？」

他們把情形告訴了他，然後說：「另外一位中校在指揮這一個縱隊。」

「那末，這就給他吧。」

中校讀了這個急件，他的臉變得蒼白起來。通訊員催促說：「請你簽字吧，官長。」

他咕噥着簽了字，甚至在他還沒有轉向站在他旁邊的那些軍官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曉得什麼事情臨到頭上了。他沉重地說：「我們奉令撤退了。到奎讓納。馬上。」

他們早已曉得這回事情，不過一聽說，就都驚訝得喘起氣來，有人低聲地咒罵着。到奎讓納是十四公里，他們已經走了六個多鐘頭，打了三個星期的仗——啊，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樣一種事情原是不應該發生的，甚至在西班牙也不應該。

馬上召集了一個軍官會議，包括一切指揮員和政治委員的一個會議，人們都擠進營帳來了。

黃澄澄的暗淡的燭光在他們愁苦的臉上投下濃厚的影子。中校很不自然地說：「現在我接到支隊司令部的命令，要我們立刻開回到奎讓納去，那兒正在進行決戰。西班牙幾個支隊差不多被包圍了——現在正處在最危險的局勢中。我們是可以及時轉移戰局的最近的一支部隊。」

他在等待着，眼睛從這個人的臉上望到那個人的臉上，一個接着一個地望着；他們也都在等待着，沒有人願意首先說話。甲大隊的隊長打破了沉默：「我決不能把這個命令發給戰士們。他們一定是不願回去的。至少現在不願意。」他伸出他的手猛烈地做了一個短短的手勢。「天啊，石

頭裏擠不出血來呀！」

中校聽着，他的臉上露出神秘莫測的神氣。他把他的頭突然朝着另外一個人——乙大隊的政治委員扭過去。「那末你呢？」

他是一個代理政治委員，幹這個工作還是初次。他慢慢地回答着。「他不曉得，」譯員說。「他不能確信有沒有力量叫大夥兒接受。」

丙大隊的政治委員面容嚴肅地說：「我們已經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我們不再是一個戰鬥單位啦。」

丁大隊的政治委員同意他的意見。他說，他的戰士們不願接受命令。

然後輪到我了。在別人說話的時候，我已經有了機會用腦子想過一下。我說：「要是把這個命令對戰士們解釋一番，我想，儘管他們已經筋疲力竭，他們還是願意回去的。」

甲大隊的隊長瞪了眼望着我，他的眼睛裏充滿憤慨。「史迪夫，你在講什麼？你知道得頂清楚，你的戰士們是和別人一樣的不願意回去的！」

「對！那末你打算怎麼辦呢？我們的任務是在必要時去做非常的事情。這是非常的時期呀！」

中校使勁拍着桌子。「那末該怎麼辦呢？」

「讓我們先從美國人開頭，」我說，「把命令解釋給他們聽。」

大夥兒集合起來，星光下朦朦朧朧地密層層的一堆人，都擠在一塊平板石頭的周圍，平板石

頭上站着中校跟其他的人。中校宣讀命令。沒有一個人說一句話，但是你可以感覺到從羣衆中湧起了亂糟糟的憤怒的浪潮。中校讀完以後，望着大夥兒們。「我要讓你們的政治委員向你們進一步說明這件事情，」他說。

我爬到那塊石頭上去。我看不見他們的臉，這使我很掃興；要是能夠看見他們的臉，事情總會容易辦些。從羣衆的後面唧唧咕咕地發出一陣怨言來，有人喊道：「哎呀，史迪夫，你別跟我們談到回去的事情吧！」

「喂，伙伴們，你們已經聽到命令了，」我說。「我剩下的氣力也不比你們多啊！要是我們單根據我們的體力來判斷這一個命令，我們都會同意這一個命令是不可能執行的。可是同志們，這裏還有其他因素我們必須考慮進去。首先，你們願意在這個營帳裏看見明早的太陽出來，曉得有三千個西班牙同志被法西斯軍隊包圍，我們離開他們只有十四公里，而不前往援助他們嗎？」

我把我的話停頓了一下，不是等待回答，而是要讓我的話深入他們心裏。「第二，我們目前是走在一個山峽的半路上。在這兒無險可守。要是我們不往西進軍十四公里，守住高地，通往山峽的路依舊是洞開着的，這樣法西斯軍隊就會突破我們的戰綫，而我們便不得不退後十五公里左右——那是我們可以立腳的一個僅有的地方。所以我們就得選擇一下：或者今夜行軍十四公里去援助我們的西班牙同志，或者明天奔跑十五公里，能不能在那兒把敵人擋住，我們還不知道。」於是我在一種深沉的寂靜中等待着，一個聲音從黑暗裏發出了。「你說得對。」我辨出這一個

聲音：一個從紐約來的藝術家保爾·布洛克的聲音。

別人沒有一個說話，可是沒有奚落的聲音了。於是作了決定。

我們又到別的大隊裏去兜了一個圈子，也碰到同樣的情形。甚至體力最壞的大隊，也整隊準備開拔了。

軍隊開拔了。在我們走到離大路不到五百碼的光景，另外一輛機器腳踏車飛馳而來，帶來了新的命令：「西班牙同志們自己已經解圍，並且轉移了戰局。第十五縱隊仍然留在原來的陣地不動。」

但是我們已經執行了開回防綫的命令。我們已經準備前去了。這是主要的事情。每個人不僅感到很愉快，而且感到驕傲。

第二天，開來了幾輛卡車，把大隊帶到伊班涅茲去。我沒有跟他們一道走。我奉命前往塔拉森納，到訓練營去報告關於布隆尼提的攻勢和從這一次攻勢中得到的教訓。我把包着萊伊·斯蒂爾的錶和別的小東西的手帕交給魯比·里昂特。

「魯比，你得把這些東西帶給英妮斯，並且告訴她關於萊伊的事情。」

魯比嚇得朝我瞪着眼。「啊，天啊，史迪夫……好，行。我就這樣做去。可是這真是一件苦差事啦。」

我相信的確會是這樣的。

塔拉森納訓練學校看去像是舊日西部電影院一樣。建築物完全是圓木頭做成的，是帶樹皮的



松樹木頭做成的，鋪成了糧食倉的樣子。裂縫用泥土來填塞。長長的圓木頭的兵營和教室分佈在松樹的中間，躲避飛機的空中偵察。

我作了關於布隆尼提攻勢的報告。我所強調的幾點如下：

缺乏交通工具。戰士們是徒步加入戰鬥的；戰鬥開始的時候他們已筋疲力竭了。

缺乏後備部隊。担任先鋒的突擊部隊在佔領新陣地以後，不得不鞏固那些陣地，並抵禦敵人的反攻，而不能撤退下來重新配備，準備作進一步的進攻，結果很快地失去了動力，使進攻弛緩下去，讓法西斯軍隊集結起來，增加抵抗。

坦克跟步兵缺乏適當的合作。坦克跑得太快了，步兵跟不上。這樣，法西斯軍隊就能够在我們的坦克過去以後用機關槍來掃射我們的步兵。

指揮部跟前缺乏適當的接觸，無論是什麼原因。由於誤解或是把命令搞錯的緣故，第十五縱隊進攻了加拿大新鎮而沒有繞過它，結果在進攻的有決定性的開端浪費了一天。

在一些更重大的缺乏中，例如缺乏飛機、坦克、大砲，缺乏一切供應品等，沒有什麼可說的。那些事情責任在政府方面，而不在這些戰士方面。問題是在巴黎、倫敦和華盛頓決定的，不是在馬德里決定的，更不是塔拉森納決定的。政府軍的問題是怎樣盡可能使用可以利用的物資。

西班牙共產黨的烏利布在馬德里演說時總結局勢。他說：這次攻勢已經成功地吸引敵人的大批武力離開了北方，包括三百架飛機在內。我們的成功也就達到了那樣的一個程度。

這一次攻勢的第二個目的是切斷在馬德里的凸出部分，這一個目的並沒有成功。

在進攻開始以前不久，要是運載大量大砲和二百架飛機的蘇聯運輸艦沒有被擊沉在地中海的話，無疑地，這次攻勢會要成功得多。在計劃進攻的時候，他們是指望這些物資的，因而這種損失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他們並且指望卡車裝運軍隊，這些卡車也沒有來到。原因是：陸軍部長普列托的辦公室內的阻撓。這一件事實，加上巴塞羅那的「某些政治分子」的抗拒，把這次攻勢大大地削弱了。

然而這次進攻是不能單用軍事上的術語來予以評價的。它已經有了一個重要得多的遠大的政治效果。

他把布隆尼提和雅拉瑪戰役作一比較。他說：雅拉瑪戰役是臨時造成的，是用一切可用的兵力和方法來倉卒應戰的。像最初階段的許多戰役一樣，那一次戰役主要是守勢。

布隆尼提戰役是攻勢。這一次戰役是計劃好的，組織好的。這是由一軍作戰的一個戰役，不是由個別的部隊在分散的指揮之下作戰的，而是在統一的指揮之下作戰的。

就成功的程度而論，這已經向西班牙人民證明了他們的力量正在不斷增強，已經強大得足夠在戰爭中擊敗法西斯軍隊。

因此，布隆尼提戰役是前進的一步，接近目標的一步。

然而布隆尼提戰役是主要由共產黨部隊構成的一軍人作戰的。

尼格林總理曾經批准這一次戰役，並給與全力的支持。

可是戰爭並非單是可以由共產黨打勝的，也並非單是可以由其他任何一個政黨或團體打勝的，對於這件事情沒有人比共產黨知道得更清楚。這是西班牙人民的戰爭，全體人民的戰爭，只有真正的人民的軍隊，在統一的指揮之下的共和國的軍隊，纔會獲得勝利。

建立這樣的軍隊並不容易。最初，政府軍包括了分散的志願軍大隊，他們在他們自己獨立的領導之下在他們家鄉城鎮的周圍作戰。把這些小集團集成爲一支軍隊，由支隊和軍團而不再由中隊和大隊組成；灌輸紀律和組織的意識；克服偏見、政治上的宗派主義、地方的猜忌和惰性；簡單的一句話，組織西班牙共和國的全國的軍隊——任務就是這樣。

## 亞拉岡前綫

醫院設在一片寬廣的高原上，一個沒有屏障的可以望得見的地方。我們遠遠地從指揮部的汽車裏就可以看得見它。在對着我們的一個屋頂上，照耀出一個油漆的巨大的紅十字。

我看見以後便驚叫了出來；這簡直是奇怪而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爲這一所政府軍的醫院分明是在招引法西斯轟炸機的轟炸啊。波布·麥里曼——第十五國際縱隊的參謀長麥里曼少校——笑了。

「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和無政府黨醫院，」他解釋說。「他們已經得到佛朗哥的保證，

說是不會轟炸這所醫院。他們說，他們絕對相信佛朗哥會尊重紅十字。……附帶地說一說，在過去六個月內，那一所醫院收容了兩個傷員，不多不少，兩個。可是醫院的工作人員是齊備的，設備也是完全的。……他媽的整個前綫都是那樣。」

後來，我和布拉德萊上尉到他們接防西班牙軍隊的前綫去。依照一切軍隊的慣例，原來防軍的軍官們應該出來迎接接防部隊的軍官們，對他們說明形勢——指出危險地帶、供水處，報告關於敵方形勢和習慣的一切情報，等等。但是這些軍官們什麼也不說明。他們顯然抱着敵意，絲毫不掩藏他們的敵意。指揮官和別人一樣佩帶着無政府黨的紅黑兩色的徽章，說起話來冷言熱語。他只是急於要走開。

指揮官呆板地行了一個敬禮，然後大踏步走向交通車去。是呀，他們有一輛交通車，這一個無政府黨大隊，也不顧汽油和車輛的缺乏了。車頂上高高地堆着被褥、手提皮箱、一具留聲機、一個網球網子、兩個酒桶、籃子和包裹。不是軍用卡車，而是一輛家庭野餐用的汽車。

大隊的軍需官和我一道乘車回到縱隊司令部去。我們路過一個農家住宅，這一個農家住宅就在路邊，比我們看見的大多數農家住宅都要大些。「到那兒停一會吧，」軍需說。「我預測我們可以跟那傢伙要一些蔬菜，也許甚至還有雞蛋呢。」

那個農民並不高興見我們，在我看來，我們碰到的每一個人似乎都同樣繃着臉。他是一個老年人，嘴是緊緊抿着的。他不高興地聽着軍需官在講話。

「我什麼都沒有，」他說。

「可是大爺，你的菜園裏蔬菜滿滿的哪。……你曉得，不是當今天的口糧，而是當幾天的口糧。我要把你能够拿得出的蔬菜統統買去。」

老頭兒的眼睛發出光來。「你有錢嗎？我不要票據——這種票據我是曉得的。只要現款。」

「你自己親眼看一看。」

他從洛烏拿出來的一疊紙丕塞他裏拿了一張，仔細地看來看去，然後輕蔑地遞回去，彷彿在說：

「你把那也叫做錢嗎？」

「這是錢——西班牙合法的政府發的錢！」

「哦，是的，政府！」

洛烏朝我瞅了一眼。無政府黨在這兒活動得也很厲害哪。洛烏說：「也許他寧願要法西斯錢幣。也許他寧願看見法西斯軍隊勝利。我應該對他說嗎？」

「不，」我說。「那不會解決任何事情。」

那個農民朝法西斯軍隊的戰綫望着，說：「我們在這兒跟他們處得很好。從沒有過戰鬥，一切都是平平安安的。……眼前情勢就要改變了。爲什麼你們不能隨我們去呢？在馬德里打你們的仗吧。法西斯軍隊不管我們，我們也不管他們！」

「法西斯軍隊也不管你們嗎，嗯？」我問。

「啊，我反對他們，我是忠於政府的，不過——這兒的指揮官，他也是一個反法西斯的，無

政府黨工會的會員，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的黨員，可是他告訴我，他曾經跟法西斯軍官們在一塊兒喝茶，他們跟其他人一樣，一點也不像你們報紙上說成的那種魔鬼。……此外，我親眼看見過我們大隊中的一個足球隊和他們的一個足球隊在一塊兒踢足球。足球賽就在薩拉哥薩城外一個田野裏舉行，雙方都有很多人到場參觀，也沒有惹起什麼麻煩，一點麻煩也沒有。當他們那方面輸了球的時候，他們就非常有禮貌地替我們歡呼。」

「Buenos dias, compañero.」(再見，朋友。)我說。「走吧，洛烏。」

我們拔步回到車上去了。

爲什麼選擇亞拉岡戰綫作爲第三個步驟，作爲政府軍在八月底發動的新攻勢呢？在這些插話中就存在着一個理由。攻勢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把昏睡了幾個月的亞拉岡喚醒起來。這是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戰爭，是整個西班牙，而不單是馬德里、阿斯都里亞和其他幾省的反法西斯戰爭。整個西班牙都得被吸收到戰爭裏面去，要打勝仗，除此以外是沒有別的辦法的。

還有別的理由。薩拉哥薩是一個重鎮，是通往北方的鎖鑰。這是對佛朗哥關係重大的一個中心地帶。要是把這個城市佔領，法西斯軍隊的全部北方戰場都要被削弱了。

政府充分體會到：緊接着布隆尼提勝利以後，採取一個新的攻勢，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布隆尼提戰役對國際局勢已經發生有力的影響。倘若政府軍能夠憑着多次的勝利來證明它的強大，就使人有一切理由相信「不干涉」政策會粉碎無餘，西班牙會得到允許購買它所極端需要的供應品和物資。

最後，這一個攻勢還有進一步的軍事上的理由。聽說法西斯軍隊正在準備進攻馬德里。政府希望在別處首先予敵人以打擊，在法西斯軍隊的攻勢發動以前使它瓦解，逼迫它使用武器和後備力量來保衛薩拉哥薩。

爲了所有這一切的考慮，政府正在迅速行動，準備亞拉岡攻勢。在亞拉岡戰綫上，第一次出現了真正的人民軍，由代表各種不同政見、代表西班牙的各地的單位所組成的共和國軍隊。在這兒，無政府黨的大隊和社會黨員、共產黨員並肩作戰，都歸縱隊的軍官們指揮，這些軍官們可能隸屬任何政黨，也可能不隸屬任何政黨。

在這個軍隊中，林肯——華盛頓大隊在人數方面當然成爲渺不足道的一部分了。所有的國際縱隊合在一起，也只是集合起來的部隊的一個小部分。在布隆尼提，國際縱隊構成進攻部隊的五分之一；在這兒他們只有二十分之一，或者更少些。

計劃是沿西北方經過厄布羅河流域的鐵路向着離出發點約二十哩的薩拉哥薩推進。那兒的鄉間地勢高，土壤貧瘠，一片平坦的平原被峻峻的山和谿谷弄得起伏不平。戰綫並不是連綿不斷的一條綫的戰壕，而是一連串的「據點」——防衛森嚴的山和村鎮，中間什麼都沒有。

鐵路綫上的一座城鎮——昆托，便是這樣的一個據點。昆托以西十二哩是同樣防禦堅強的一座城鎮——貝爾其特。佔領昆托是第十五縱隊的第一個任務。縱隊在進攻開始的前四天開上去，接防了前綫，準備進攻。

進攻將從一個中心點亞薩拉地方開始，隊伍如同在布隆尼提時那樣地展開，不過繞過了法西斯軍隊的據點，形成一個更廣闊的包圍圈。第十五縱隊向昆托推進，莫德斯托縱隊向厄布羅河上游推進，李斯特縱隊向美迪納推進，深入法西斯軍隊佔領地帶十二哩，另外一支軍隊向西朝貝爾其特推進。河以北有其他部隊向賓納移動。

昆托要在三天內佔領下來，以便打開通往薩拉哥薩的大道。這一座城鎮防務堅強，此外，在附近的一個叫做普爾布勒爾的山上還駐有一支龐大的法西斯軍隊，在那兒深溝高壘，武裝齊備。在八月二十三日早晨，太陽剛上昇的時候，砲兵開了砲，進攻開始了。這一次我們已經有了一些坦克。它們飛奔向前，切斷了法西斯軍隊的後路，把他們堵在厄布羅河岸。

### 「我的媽媽」。

這不是一部軍事史，也根本不是什麼歷史。昆托在兩天內就到了手，其他也不用多說了。但是佔領的是那座城鎮，而不是那控制昆托城鎮的圓錐形的普爾布勒爾山峯；佔領普爾布勒爾又費去了一天的時間，並且喪失了很多的生命。



山很陡，山的進口可恨一點掩蔽處都沒有，山頂上架了很多挺機關槍。大砲和坦克猛轟這座山，可是不能敵機關槍沉寂下去。法西斯軍隊的機關槍掩體建築得太好了。英國大隊試着衝上山去，因為他們得到情報，說敵人的防禦很弱。這個情報是錯誤的。第二天下午，西班牙大隊又從另一角試着衝上山去，也被機關槍攔住了。

那一天傍晚，哨兵帶來法西斯軍隊的一個矮小的軍曹，他笑嘻嘻的，做了俘虜很高興。他站在波布·麥里曼面前。

「他跟另外二十九個人，」哨兵說。「他們剛纔舉着手走過來的。」

「他們派我們到河邊取水，」那個軍曹說。「我是隊長。所以我就把他們帶到這兒來。」

「你在法西斯軍隊裏面做什麼工作？」

「我是一個觀測員兼繪圖員。」

「他們怎麼會派你去取水的？」

「我是自動請求取水的。我估計這是我逃走的一個機會。」

「你爲什麼要參加法西斯軍隊？」

「被徵入伍的。有什麼辦法呢？不是應徵，就是被槍決。」

「我曉得啦。……山上有多少軍隊？」

「約莫有一千人。二百人受了傷，四十五個人死去。昨天飛機把所有的砲兵都炸死，大砲也不能發生作用了。……告訴我，那是你們的飛機嗎？」

「不是的。他們炸了你們，是因爲他們猜想我們已經佔領了那座山。聽着，我們還要問你問題哩。士氣怎樣？」

「軍官昨天槍決了六個士兵。這不是說明了一切嗎？……今天，我們聽了好多次廣播，說是有支援兵正在開來，要我們不惜一切堅持到底。可是沒有水。那是主要的困難——沒有水。」

「那是你們軍官最担心的事情嗎？」

「是的。除那以外，還有你們的坦克和飛機；他們的反坦克砲和高射砲都光啦。」

「你說你是一個繪圖員，那末把山上全部陣地畫成一個草圖吧。把火藥庫，無線電台，指揮部，機關槍陣地，一切一切，都用記號標出來。」

地圖畫好以後，他叫那個軍曹出去，把另一個俘虜喊進來，他再根據他的說法把那個軍曹供給的情報核對一遍。一切都是符合的。於是麥里曼打電話給坦克指揮部、砲兵指揮部和其他單位，把命令下給他們。

太陽出來的時候，進攻開始了。七輛坦克迎着射不到人身上的卡搭卡搭的機關槍火力，從山的很陡的側面爬了上去。當坦克前進的時候，一個行列從昆托的城門內出現，離那座山有一哩左右。這是在押着打平原上走過去的一千名法西斯軍隊的俘虜，山上的守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這些人排成很長的一列，讓普爾布勒爾山上的法西斯軍隊得到更深刻的印象。……而坦克依然在前進着。坦克上發出的一顆砲彈落在山上的火藥庫內爆炸，地都震動起來，一道黑烟上昇到蔚藍的天空。

砲火猛烈極了。突然間，山頂上的戰壕內冒出人來，胳膊高高地舉起，手裏搖着白旗。政府軍的各中隊歡聲震地地從各方面衝上山去，接受他們的投降。

在法西斯軍隊的指揮所前面，一個俄國白衛軍官和一個德國軍官用手槍對準自己的腦袋，把槍機一扳。

波布·麥里曼站在城門外面的路旁邊，望着城裏人川流不息地沿着公路到後方去。林肯——華盛頓大隊西班牙中隊的佩普和他站在一起，佩普是昆托的當地人。人民急急忙忙地打他們兩人身邊經過，有的人帶着包袱行李，有的人趕着馬車或者推着手推車，上面裝了他們的傢私。大多數是婦孺，也有一些老年人，也有幾個人年紀不大。有的人很快樂，有的人哭哭啼啼，有的人帶了一副昏昏沉沉的神色。

佩普用胳膊肘輕輕地推了他一下。「那裏一個穿咖啡色大衣的，他曾經叫人把我們的教員抓去……那一個走起路來一癱一拐的，他是一個壞蛋、一個可怕的法西斯分子……那裏一個下巴發青的是貢察列斯，他率領匪徒們毆打並刺傷我們激進派工會的主席……啊，那裏又有一個流氓，儒安·莫——，他是親佛朗哥分子中間最壞的一個……」

佩普指出來的那些人都被從行列裏面拉出來，並加以監視。佩普真是沒有說話的必要，他只消站在難民們看得見的地方就行了。波布可以親眼看到那些人看見了他時那一種震動，臉上露出那種驚慌的樣子。

不久，他就覺察到佩普說到某些人時非常明確，說到另一些人時又非常含糊。說到這一個人，

「他做過如此這般的事」；說到另一個人，「他是法西斯分子」。波布心裏懷疑佩普同志是在利用這一個機會報私人的宿怨。

「這個費南德，」波布突然說。「他究竟幹下了什麼事情？」

「他呀——哦——是的，他是法西斯分子，就是這樣。」

「說謊！」費南德對那個青年喊着說。「因為有一次他像一隻蠢豬一樣跌倒在我店裏一堆瓶子上，把瓶子統統打碎了，我就揍了他一頓！指揮官先生，別聽他的！我不是一個法西斯分子，比起——」

突然間，佩普已經不在聽着。只聽得一聲尖銳的叫喊：「Madre! Madre mia!」（媽媽！我的媽媽呀！）他已衝進行列裏面，抱住了一個矮小的披着黑圍巾的女人，那個女人臉上帶着還沒有到年紀就突然變老的一個人的憔悴的神色。她半信半疑地、呆呆地望着她的孩子，突然放聲大哭，兩隻手亂摸着他的臉。

他把她帶到波布的面前，母子兩人都在哭泣。佩普簡直說不出話來。「我的媽媽，」他喘着氣說。「她當做我死了啦。我也當做她死了啦。啊，天哪——」

「佩普，」波布說，「聽我講。我們給你三星期假期的許可證，讓你把你的媽媽帶到安全地方去。」

「同志！萬分的感謝！」

「可是你得先對我講一句實話。費南德是一個法西斯分子嗎？」

「費南德。可能的……當然，除了法西斯分子以外沒有一個人會把一個年輕人打得這樣厲害——要是我被他的門檻絆倒了，有什麼辦法呢？」

「我曉得啦。那末其餘的那些人情形怎樣呢？」

「洛佩斯——貢察列斯——德爾·卡姆波——魯易斯——是的，確實的。其他的人們——誰曉得呢？」

他把他的許可證抓在手裏走開了去，一面跟他的意外相逢的母親與高采烈地叙着家常。波布笑嘻嘻地望着他們，轉過身去對衛兵們說：「讓西班牙同志們去審問俘虜吧。」

## 不投降，就消滅它！

在後方的巴塞羅那，無政府黨報紙已經宣佈無政府黨大隊佔領貝爾其特了。

不幸貝爾其特根本沒有被任何大隊佔領，無論如何，還沒有被佔領。

拿破崙一度打算佔領貝爾其特，他失敗了。幾位政府軍的指揮員也嘗試過，也被納粹工兵以傳統的德國徹底性所建築的堅強的防禦工事阻止住了。他們前進了一點點，前進，死亡，再前進；他們突破了好多道防綫，可是仍然有很多道防綫。敵人頑強地守住這一座城市。這一座城市是堅固的。

貝爾其特不能攻下，可是又必須攻下。這裏有幾個原因。巴塞羅那的人相信這一座城市已經攻下了；現在要告訴巴塞羅那方面沒有佔領這一座城市，對巴塞羅那方面的士氣就會產生不好的後果；巴塞羅那是西班牙的工業中心，士氣一波動，供軍隊用的槍砲、卡車、軍需品、鞋和衣服等的生產也隨着變動。這是在政治方面的原因。

軍事方面的考慮當然也是同樣要緊的。大部分攻擊部隊已經深入法西斯軍隊的境內。貝爾其特在這些攻擊部隊的後面，只要它還在法西斯軍隊的手裏，就成爲一個有力的威脅。就積極方面來說，貝爾其特座落在直通薩拉哥薩的一條路上。把這座城市佔領以後，就會打開一條進攻的新路綫。

狙擊兵查理，魯比·里昂特，躺在貝爾其特城牆下淺淺的戰壕內的所有的喬埃們和比爾們，艾德們和狄克們，都決不會清楚這些問題。他們只知道，一個人如果高出地面六吋，法西斯軍隊的槍彈就會穿過他的身上。他們知道，戰壕是直的，而不是鋸齒形的，所以在左邊房屋裏面的狙擊兵就能對戰壕筆直地射擊過來。他們知道太陽甚至在一大早就非常炎熱，在他們前面的又是一個悠長的、不幸的日子，而他們却貼緊在地面上，連肌肉也不敢動一動。

他們是夜間開進戰壕的，這不是一道預備好的戰壕，而是在和城腳構成角度的一道淺溝。頭一天晚上，俯瞰這道壕溝的房屋是空的，但是法西斯軍隊又在黑暗中走回來，安置了機關槍，在俯瞰着壕溝的窗戶裏面佈下了狙擊兵。

第一道亮光引來了密集的砲火。希克斯正在指揮着林肯——華盛頓大隊。他向縱隊部報告新的

局勢，隊部設在後面一哩路遠的一個俯瞰着這座城市的高地上。

那時我正在值班。我聽了報告，做了記錄，便走到反坦克砲隊去。

小小的砲又有光澤又好看。可以像步槍一樣地瞄準，射出的砲彈速度很快，所以砲彈成直綫向上飛行兩哩路而不會掉下，砲手們把它叫做「平射彈道」。砲身很輕，三輛卡車就會把包括三尊砲的整整一個砲隊連人帶配備都運走了。

「這些反坦克砲是在蘇聯製造的，在西班牙雙方使用的武器中，這些砲要算是頂好的了，」砲隊的指揮員、一個叫做史賴特的英國人得意洋洋地說。「落幾顆砲彈到左邊那兒一些房屋的窗戶裏，好不好？」我問他。我畫了一幅草圖，指點着哪些房子跟哪些窗戶。

砲隊指揮員說：「好的。」他看見我盯着一尊砲。「想試一下嗎？」

我從一塊毛玻璃板上望過去，這一塊毛玻璃板像是照像機上的檢像鏡一樣，上面畫着標綫。

我把曲柄一轉，玻璃板便移動，突然間房屋便近在眼前了。標綫落在一扇窗戶上。我看見屋裏邊有人在走動，並且看見了一挺機關槍的光滑的槍筒。

大砲轟的一聲巨響，窗戶內便瀰漫了火燄和白烟，接着就聽到爆炸的聲音。

在砲口下面的地上鋪上一塊濕帆布，所以砲口發砲時就不會攪起一陣灰塵，免得敵方的觀測員發現出來。我記得狙擊兵查理也使用過同樣的方法。

我走回司令部去。大砲在我的背後不斷地轟着，有條不紊地掃蕩着安置機關槍陣地的那一排房屋。

波布正在對着電話機叫喊。「你一定得這樣！」波布吼着。「我說你一定得這樣，聽見了沒有？」

他砰的一聲把耳機摔到吊鈎上去，一面呆望着我。「希克斯說他不能往前面去。史迪夫，我們倆中間得有一個人前去，把事情安排一下。」我對波布望了一望，因為在雅拉瑪時受的傷，他的右胳膊依然掛在吊腕帶裏面。我說：「我去。」

大隊的指揮所是在一面乾涸的河牀上臨時匆匆掘成的一個塹壕裏。希克斯的脾氣跟波布一樣壞。「你們這些傢伙究竟是怎麼搞的？」他對我喊叫說。「你們把我們當成什麼？往前面去——我們怎麼能夠往前面去呀？那一個市鎮上豎起密密層層的機關槍，像狗背上的毛一樣的密，而你們却要派步兵去攻打他們！你們要叫整個一大隊人都去送死嗎？砲隊在哪兒？」

「我不曉得，」我說。「但是我確實曉得伙伴們不能留在原來的地方。反坦克砲不能整天呆在那兒替我們轟擊窗戶裏面的狙擊兵。他們馬上就要開回去，而且——」

「我不曉得你們要我們做什麼。派小伙子們去擋機關槍彈，這簡直是謀殺的行爲，我倒想知道誰想出的這個慘劇，全部的事情都是拙劣透頂，一個錯誤接着一個錯誤——」

他是個勇敢、誠實、而又仁慈的人。想讓他指揮下的戰士們死在一場孤立無援的、絕望的、對掩護得很好的機關槍陣地的進攻中，這是他所痛恨的。他知道大隊不能開到前面去。他正在思量着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

但是，除了什麼事可以做的問題以外，總是有什麼事必須做的問題。大夥兒決不能留在那個



戰場裏，像池塘裏面的鴨子一樣給人一個個地打死。已經佔領的地方必須守住，而且，即使不必守，在沒有遮蓋的土地上後退時總比在進攻時所喪失的生命還要多些。在退却中是沒有安全的。

所以大隊必須向前推進。

我跟希克斯的談話並沒有什麼結果。我離開了塹壕，從河牀上走了一段路程，小心地窺視着那一座市鎮。在鎮內的右邊是一所教堂，這兒也和其他各處一樣，法西斯軍隊已經把這教堂當做抵抗的中心。他們在教堂裏建築了工事，把機關槍設在鐘樓裏，然後把政府軍稱為不信神的布爾什維克和無神論者們，因為他們在進攻教堂。

這一所教堂看去非常堅固，是石頭建築的。教堂離市鎮的北邊並不很遠，可是在它周圍的建築物却替它擋住了正面的砲火。反坦克砲不斷地轟擊那些機關槍陣地，可是機關槍總是越來越多。

要佔領這座市鎮，就得先佔領那一所教堂。每一個人一開頭就了解到這一點。

我想我倒不妨到教堂的周圍去看一看。於是我帶了兩三個伙伴跟我一道，我們便向市鎮的那一邊走去。

我們發現了通往市鎮的一條乾涸的溝。這一條溝靠近一所磚瓦建造的工廠——橄欖油製造廠。這一所工廠隔街正對着那一所教堂。

我們不知道工廠裏面是什麼，可是看去裏面很靜寂。我們派人回去多找些人，多拿些手榴彈來。於是來了十二個人，把亞拉岡戰役開始以前發下的輕機關槍也帶來了兩挺。

我們把一切安排好了，一聲信號，便把手榴彈從工廠的窗戶裏丟了進去，等了一會兒爆炸以後，從手榴彈炸開的小裂口中衝進去。裏面一個人也沒有。這使我們覺得詫異。我們立刻把機關槍架起，控制着通往城邊工廠各個大門的進路。

我們在市鎮上有了一個立腳點。我們站穩了下來。

我走出去看見市鎮的別的地方也開起火來了。布拉德萊上尉和二十九位戰士在猛烈的砲火下從東面進攻一條街道。他們佔領了堵塞着街道的一個防禦物，並且加以據守。這兒是狙擊兵查理受傷的地方。另一路從西面發動的進攻也在準備中，這一路進攻的部隊也是預定要進入市鎮的。貝爾其特正在崩潰中，但是離佔領這一座市鎮還很遙遠哩。教堂是一個主要的關鍵。街道像車輪的幅條一樣從教堂後面的空地上分佈出去，法西斯軍隊只要守住教堂，他們就控制了街道。

林肯—華盛頓大隊的大部分都轉移到壕溝去，又轉移到教堂旁邊的工廠裏去。工廠變成了大隊隊部和進攻的基地。

因為我們不能從街道上通過，我們就開始從房屋內穿過去。像西班牙所有的市鎮一樣，這兒的房屋都是建築得牆挨着牆靠在一起的。戰士們開始搗通了牆，從這一所房屋穿到那一所房屋。他們已經在昆托學會了巷戰，他們現在都是巷戰的老手了。他們都曉得怎樣做。

貝爾其特已經被圍了幾天，時間緊迫得很。進攻的一方越來越感到疲倦，傷亡人數不斷增加，而薩拉哥薩的法西斯軍隊派出一支解圍的援兵，正在用全力向前推進。我們已經在城外佈上了哨崗，不斷提防法西斯援兵來到把政府軍堵在城牆腳下。

這一座市鎮是投降或是解圍，只是幾個鐘頭的事情。

達夫·多蘭一直到那時都是我的助手，他弄到了一輛宣傳車，裏面裝有留聲機、擴音器和擴聲器。且不管他是從哪裏弄來的吧，他就把它開到作爲法西斯軍隊抵抗中心的教堂的附近。他匆匆地起草了一篇演說，交給一個西班牙伙伴放到擴音器面前去讀它；演辭響徹了法西斯陣地的那一邊。「法西斯兵士們，你們中間的西班牙人，聽着！」擴聲器大聲地喊着說。「你們的長官們對你們說謊。昆托落在共和國的手裏，你們不會有援兵了。從薩拉哥薩派來的援兵已經在美迪納被擊潰了。在貝爾其特，你們不會有援兵，有的只是死亡！」

「你們爲什麼要替法西斯匪徒打仗呢？法西斯匪徒奪去了你們的土地，壓迫你們，剝削你們，使你們窮困。……而共和國却把土地分給農民，帶來了自由和民主。」

「法西斯匪徒是人民的敵人。你們站在他們的一邊，就是對你們自己的兄弟們作戰，對西班牙人民作戰。我們這一邊是爲西班牙人民作戰的。我們這一邊是西班牙的人民。」

「跑到我們這邊來，就會活着。要是你們不過來，我們一聲攻擊，你們就會統統被消滅掉。我們已經把你們包圍得水洩不通，所以你們沒有一個人能夠漏網。此刻我們的砲正在瞄準你們，要把你們炸成齏粉。」

「把武器放下，跨過障礙物，一個一個地跑到這邊來。」

「凡是跑過來的人都會保全性命。」

擴聲器裏面的聲音使法西斯軍隊的槍砲沉寂起來，聲音停止了，接着是一段悠長的可怕的沉

寂。沒有什麼動靜。過了很久、很久的時間沒有什麼動靜。

一個法西斯兵士從障礙物上爬過來。他的肩膀上受了傷，需要醫治。人們趕緊把他送到邊夫·多蘭的跟前。「那邊的士氣怎麼樣？」多蘭問道。

「不好。擴聲器裏面的演說——大夥兒都在談論。他們都願意不顧一切，只是害怕軍官，這種害怕的心理束縛了他們，只要有一絲兒不對勁，軍官們就會把他們槍決。但是，已經死傷了很多人，教堂和地下室內差不多住滿了傷兵。好多人的胳膊上和腿上都放了三四天的止血器，因此生了壞疽，開刀也不可能了。啊，那兒真是糟糕得要命！」

「如果真是這樣，你能够回去帶一批人到我們陣地這邊來嗎？」

那個俘虜一點也不喜歡這個意見。回去嗎？這是一樁冒險的事情。「如果你們的人不對我開槍，那邊的人也會開槍的。要是軍官們發現了——」

「這一切我都曉得，可是這是我們給你的唯一的選擇。從這所房子裏回來，回來時把你的步槍從沙袋上偷偷地塞過來。」

那個俘虜從防禦物的一個裂口上爬了過去，在黑黝黝的街道上消失了。多蘭把機關槍架起，控制着這一條街道。然後他流着汗等待着。一個鐘頭過去了，又一個鐘頭過去了，約莫到了半夜的時候，街上障礙物那邊有一陣騷動、雜沓的聲音。一枝步槍的槍托從障礙物上偷偷地塞過來。

一個鐘頭以內，幾百名法西斯兵士投降了。法西斯軍隊抵抗的主力已經崩潰，不需要第二天早晨以生命和鮮血的代價來一次全面進攻了。

軍官們發覺到他們被遺棄，便不顧死活地來一次最後的突圍，企圖乘機逃走。可是這一次突圍的結果，有的人死去，有的人受了傷，有的人被俘。第二天，幾個死守到底的人也被從房子裏清除掉。

貝爾其特是我們的了。

我回到工廠裏去。我覺得非常愉快。我已很久沒有睡覺了，可是覺得精神很好。一切進行得都很不錯。

我在工廠裏看到達夫·多蘭。達夫不曉得在喊叫什麼，我便朝他跟前走去。

「史迪夫，當心，他媽的！」我一溜眼看見工廠牆壁上的高高的窗戶，從窗戶上面露出的教堂的鐘樓，就在這時，突然一件東西猛烈地打在我的臉蛋上，同時一陣怕人的劇烈的痛苦穿進我的大腿，又鑽到我的肚子裏面，痛得我彎着身子倒在地板上；我不顧一切的痛苦滾到磚牆旁邊去，以免再中槍彈。

我的一部分腦子在忍受着痛苦，可是另一部分腦子在冷靜地考慮這件事情。你已中彈了。你已中彈了，而且兩次。這是從教堂的鐘樓上射出的兩顆子彈呢？還是只有一顆？

我考慮了這個問題。我是中了兩顆子彈呢？還是被一顆子彈射中了兩次？我不能夠斷定。我永遠也不能斷定。這時，人們的手在我的身上迅速地移動着，把我的衣服撕破，按緊我的傷口不讓它出血。這些一定是人們的手，但是當我睜開眼時，我只能看見在一間昏昏沉沉的屋子裏人影憧憧地走來走去。我一定是一下子出了大量的血，纔忽然間變得這樣頭昏眼花的。

我感覺到自己已經被抬到一個担架上，然後我又睜开了我的眼睛，看見達夫·多蘭的臉浮在

我的面前。我對那張臉笑了一笑。至少我是打算這樣笑的。

「你放心，史迪夫，我們會把他們都幹掉的。」達夫果真實現了他的諾言。

## 白被單

「我此刻是在哪兒呀？」我朝這間燈光黯淡的大屋子裏面四下裏張望了一番。我的嘴唇枯焦，舌頭感覺到像舊皮鞋的皮一樣的乾燥。一切東西上都飄散出醜的氣息。一個人在呻吟，在呼喊著求救。

我抬起眼睛，看見了一長排矮矮的鐵牀，至少有五十張，牀上都是傷兵。我隱約地聽見了一聲砲響，因此我斷定我是在離前綫不遠的一所野戰醫院裏。我知道在前綫附近只有一所醫院，是收容頭部和腹部受傷的人的。其他部分受傷的人都得送到較遠的後方去。那末我在這兒做什麼呢？

就我所知，我受的傷並不很重。也許我在來到醫院的途中又中了一彈，一想到這裏我就不禁吃驚起來。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從被單下面伸過去摸一摸我的身上。於是 I 想起我是被史特勞斯醫生送到這一所醫院裏來的。當時所有的救護車都開走了。

受傷的人們的叫喊聲越來越高，越來越多。我靠在冷冰冰的鐵牀架上坐起來，望着病房內長長的兩排受傷的人。有幾個人沒有一點活着的跡象。被單拉在病人的臉上。我數一數有九張病牀一點動靜也沒有，暗黑色的毯子被拿開了。我纔知道所有這些人都已死去。我注意到甚至未曾把

他們從病房裏抬出去，只是用一張白被單蓋着罷了。

一個護士匆匆地打我的身邊經過。我問她：「這裏有美國人嗎？」「哦，有，」她說，「Mucho, Mucho Americano,」<sup>①</sup>她指着屋子的那一頭。

幾個受傷的人剛纔被抬進來，還放在担架上呢。他們的繃帶都給血浸透了。

我睜大了眼睛朝門口望去，認出躺在担架上的大個兒就是「狙擊兵查理」。

查理朝着我會心地瞅了一眼，說：「我中了一彈，可是我會好的。」他舉起用繃帶紮着的斷了的左胳膊，繃帶上已給滲透了血。「子彈打在這個地方。」他輕輕地從担架上抬起身來，說：「可是我的這隻胳膊還是好的哩，」說着他抬起右手，把它握成一個拳頭。

我也拾起了我的手。查理朝枕頭上猛的一落，胳膊從担架旁邊沉重地搭拉在地板上。護士用手勢招呼一個醫生到查理的担架跟前。他們在他身上忙了一會兒，可是並沒有打算脫去他的衣服，也沒有打算把他從走廊上搬到病房裏去。我很擔心，想着這個「狙擊兵」的傷勢大概很嚴重了。醫生朝周圍望了一下，慢慢地把一張白被單朝查理的臉上拉去。我坐起來，望着將要發生什麼事情，當醫生拿起白被單的時候，他突然轉過身去，避免看見查理的屍體。

和我隔開三張牀的一個人開始呻吟起來。他說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話，可是說話的聲音聽去倒很熟悉。我把身子一抬起來看時，使我吃了一驚，原來這人就是中隊政治委員保爾·布洛克，不

① 這裏寫的是用西班牙腔說的英語，意思是「很多，很多美國人」。——譯者

久以前，在我中彈的時候他還幫忙抬着我哩。保爾的眼睛是睜開的，可是他已經不認得我了。他正在流着汗，拚命地喘着氣。護士和醫生來到，按一按他的脈搏，開始在他身上忙起來。醫生帶一副憂愁的神色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氧氣罩，可是我們却沒有一個。」保爾恢復了一會兒知覺，認出我來了。他向我要水喝，「水，史迪夫。」他抓緊了我的手，甚至在又失去了知覺以後，他也是把我的手抓得緊緊的。他喘着氣，又鬆開了他的手。他再也不能恢復知覺了。他也跟另外十個人一樣被蓋上了白被單。

我在這兒看到的一切，比我一生中經歷的任何事情都要不幸些。同志們的死去是一件教人難以忍受的事情。但是戰士們在前綫上犧牲的時候，在我的心理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影響。我知道這是爲什麼緣故。在戰爭中，就是在死亡的時候，戰鬥還得進行下去，但是在戰爭的時間以外，情形就截然不同了。躺在醫院裏面，看見戰士們像蒼蠅一樣受難和死亡，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打算把我的思想從死去的同志們的身上轉移開去，可是越想這樣做，我就越發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們生前的情景。

## 戰鬥沒有停止

佔領貝爾其特以後，政府軍歡欣鼓舞起來。不幸的是，他們指望從美國、英國和法國方面得



到的主要援助却沒有來到，永遠沒有來到。法英兩國政府投降了法西斯主義，走上更加遲就希特勒的道路。不但它們不跟本國的法西斯分子鬥爭，它們的槍頭反而留着對付要求援助西班牙政府軍的左派和民主陣營。

至於美國，羅斯福的演說被人聽起來感到極大的興趣，並把那些演說解釋成爲對政府軍友好的表示。美國駐西班牙大使克勞德·鮑爾斯公開表示對西班牙政府軍的同情。然而政府軍從美國得到的最多也不過是同情。同情是不能打勝仗的。

美國有勢力的天主教教權集團宣佈擁護佛朗哥。

一切親法西斯和親納粹的團體，銀衫黨<sup>①</sup>，黑色軍團<sup>②</sup>——一切反勞工的團體都同樣地擁護佛朗哥。

以戴斯委員會<sup>③</sup>爲首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內的反動分子們，組織了強大的院外集團。

布里特們，伯爾勒們和羅斯福政府的鄧恩<sup>④</sup>等，對於援助西班牙共和國的每一個行動都極力加以阻撓。羅斯福屈服了，讓了步，去遷就那反動的一小撮人。他遵從了鄧恩們、伯爾勒們、布

① ① 「銀衫黨」(Silver Shirts)和「黑色軍團」(Black Legion)都是美國的反動團體，做美國反動政府的幫兇，專門迫害工人階級、黑人和進步人士，其性質有類於三K黨。

② 戴斯委員會(The Dies Committee)，即美國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該會於一九三八年六月成立，其第一任主席爲馬丁·戴斯(Martin Dies)，故名。

③ 布里特(Bullitt)、伯爾勒(Berle)、鄧恩(Dunn)三人，是羅斯福政府時代的外交官，三個人都是反蘇反共的角色，其中尤以布里特臭名昭著，他曾經來過中國，公開支持蔣匪幫反動政權。

里特們和天主教教權集團的意旨。不久他任命了一個美國駐梵蒂岡的代表，美國鋼鐵公司的老闆梅隆·泰勒。

只有蘇聯和墨西哥支持西班牙政府軍——甚至冒着完全孤立的危險去支持它。

希特勒抓住這個機會，運送了更多的軍隊和物資到佛朗哥那邊去，耀武揚威地對國際聯盟所設立的「中立」委員會置之不理。

政府軍在這種以寡敵眾的劣勢中作戰，把戰爭進行了一年半以上。剩下的美國人也差不多抵抗到底。他們戰鬥着，據守着，希望援助會從他們的本國來到。戰爭變成了一場爭取時間的戰爭，一種拖延的行動，使民主軍隊有時間得到支援。但是必需的援助並沒有來到。甚至以前來到的少量的物資，不久也完全斷絕了。事件迅速地演變到政府軍方面不可避免的失敗。希特勒在全世界進軍的舞台已經佈置好了。

共和西班牙的失敗造成了慕尼黑會議，造成了進軍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法國和英國，造成了珍珠港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

法國、英國和美國政府出賣共和西班牙的行動，並沒有把它們自己從希特勒的暴力下挽救出來。勃魯姆們和達拉第們活到親身坐在希特勒的監獄內，而千百萬無辜的人民却被放在希特勒的毒氣室內毒死。

雖然對佛朗哥的有組織的軍事抵抗已經停止了，但是在阿斯都里亞山裏，戰鬥依然在繼續中，零散的游擊隊在那兒奮戰了多年。今天，在地下，在城市，在鄉間，戰鬥繼續在進行着，在許多

工廠和市鎮裏爆發了開來！而且，在一九五一年，全世界都看到了巴塞羅那和其他許多城市的總罷工了。民衛團（Guardia Civil）、長槍黨的野蠻的獸行，並沒有把抵抗嚇倒下去，它在西班牙千萬個人家燃燒了起來。一九五二年的年底，又有加泰拉地方的二十六位工會運動者的審訊案，羅培茲·雷蒙多就是其中的一個。佛朗哥當局要求把他判處死刑或者二十年的徒刑。全世界的憤怒的叫喊逼迫法西斯法庭把雷蒙多減到四年的徒刑。是的，戰鬥繼續在進行着，頑強地、沉靜地、英勇地，以驚人的代價進行着。

站在政府軍方面作戰的一些人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他們知道國際法西斯主義所策劃的未來的戰爭是可以制止的。西班牙人民嘗試過，在以寡敵衆的劣勢之下戰鬥過，並且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在那兒作戰的美國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將近二千人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在這本書的中間，你曾經碰到過他們裏面的幾十人，無疑地，你想知道他們的遭遇。下面是一小部分名單：喬埃·達賴特，達夫·多蘭，波布·麥里曼，賈克·李德，迪維特·派克，約翰·柯克遜，魯比·里昂特，伊爾溫·凱思，密爾頓·赫恩頓和毛利·羅德曼，都犧牲了。名單很長，我們只好在這兒停住。

一九三〇年三月，你在芝加哥警察局碰到的一小羣人中，喬埃·達賴特，奧列佛·勞，和當時只有十四歲的尼爾斯·克扎爾的兒子，也都犧牲了。

有些人還活着回到美國。許多人在美國軍隊中作過戰。起初，軍隊歧視他們，不把他們派到國

外去。他們不信任這些「早熟的反法西斯分子們」。靠着有很多美國人參加的一個運動，那個政策纔改變了，許多在西班牙作戰過的老戰士在對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戰爭中都變成了英雄人物。赫爾曼·波哲爾，在太平洋戰場上被他的指揮官叫做「一人的軍隊」，就犧牲在那兒。喬埃·戈登在運輸供應品到英國去時犧牲在北大西洋。羅伯特·湯普遜爲了他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英勇的行動而得到功勳優異的十字勳章。約翰·凱茨自動參加傘兵，在諾曼第登陸的那一天降落法國。凱茨和湯普遜跟美國共產黨的其他九位領袖都被美國政府根據史密斯的「思想統制」法案判處了長期徒刑。其他的西班牙老戰士，像索爾·威爾曼，伊爾溫·魏思曼，都是史密斯法案所迫害的人，正面臨着長期徒刑。巴斯基醫生直到今天還爲了保衛民主對佛朗哥進行鬥爭。他曾經受了六個月徒刑，因爲他不肯把仍然在西班牙援助西班牙政府軍流亡者的那些人的名字供給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好萊塢九人案」中的阿爾瓦·伯西，爲了反對「思想統制」而坐了一年的牢。

一九三〇年你在芝加哥碰到的那個「小家伙」沒有到西班牙去，但是在美國軍隊裏呆了三年，他正在勇敢地參加今天的鬥爭。仍然活着的那些西班牙的老戰士們大多數人就是這樣的。他們正在把他們當時戰鬥的口號「不讓他們通過」改成了「不讓華爾街通過」。

他們，和其他美國人民一道，正在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那一個政策是支持搖搖欲墜的佛朗哥政權，和那個「屠戶」秘密訂約，換取西班牙的原子彈空軍基地。當時是佛朗哥和希特勒，今天佛朗哥和五角大樓。爲了美國人民的利益，爲了世界和平的事業，爲了停止朝鮮戰爭，爲了西班牙的解放，林肯大隊將要繼續戰鬥下去。

## 譯者後記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人民陣綫在大選中勝利後不久，法西斯頭子佛朗哥便糾合了西班牙的一切反動勢力，對西班牙人民發動瘋狂的進攻。仗着德意法西斯強盜的公開支持和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暗中庇護，經過了將近三年的殘酷戰爭，佛朗哥終於在西班牙人民的血泊中登上了法西斯獨裁的寶座。

歲月悠悠，西班牙內戰離開現在已經有十多年了，然而它在全世界人民的心裏是記憶猶新的，因為這是當時國際間一件驚心動魄的大事，是籠罩着歐洲以至全世界的一片陰霾。全世界人民從此更加看清了侵略者的猙獰面目，看清了英美法帝國主義者和德意法西斯強盜是沆瀣一氣，狼狽爲奸的。昔日鼓勵希特勒墨索里尼去幫助佛朗哥奪取政權的人，也就是今天幫助佛朗哥繼續維持法西斯統治的人。昔日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今天的美英法帝國主義者，他們中間是息息相通，沒有差別的。這一冷酷的現實，全世界人民再清楚也不過了。

在西班牙內戰中，英美法三個帝國主義國家藉口所謂「不干涉政策」，以達到暗中幫助法西斯勢力的目的。只有蘇聯在當時的國際聯盟中大聲疾呼，並以實際行動援助西班牙政府，但由於地理上的懸隔，運輸不便，因而受到了許多限制。而在另一方面，德意法西斯強盜却毫無阻礙地以

大量軍火和人力援助佛朗哥的叛軍，最後竟派遣軍隊直接參戰，遂造成了強弱懸殊之勢，這是西班牙政府終於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失敗的另一個原因，由於當時的共和政府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而是在工人階級支持下的資產階級執政的政府。資產階級動搖成性，事前既疏於防範，不能毅然肅清政府及軍隊中的法西斯分子，事後又不敢放手發動羣衆，堅決執行人民陣綫的綱領，甚至還有求得叛軍諒解的企圖。

最後，在西班牙工人階級中間專門從事分裂活動的，有無政府黨和它的工會，以及一個暗藏的法西斯特務匪幫——托洛茨基匪幫的政黨，即所謂「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黨」。無政府黨的上層反動分子後來都投奔到佛朗哥法西斯一邊去，它的下層羣衆也逐漸脫離該黨的領導，和共產黨聯合起來；托洛茨基匪幫的政黨也因為陰謀的暴露而被禁止。儘管如此，這些匪幫在當時反佛朗哥法西斯的陣綫上是起了一定的破壞作用的。

西班牙真正工人階級的強大的政黨——西班牙共產黨，在這次戰爭中受到了血與火的鍛鍊。它領導西班牙人民對法西斯匪徒進行殊死的鬥爭。在各處戰鬥的前綫，在保衛馬德里的戰爭中，他們表現了無比的英勇。他們動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去遏止法西斯的凶鋒。在首都馬德里危如累卵的時候，城內人民萬衆一心，甚至老弱婦孺，也都拿起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去對抗法西斯軍隊的砲火。這一切都和共產黨的領導分不開的。

戰事發生以後，各國工人階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從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裏發出了保衛馬德里的

呼聲。他們不但以金錢物資援助西班牙人民，並且組織了馳名全世界的國際縱隊，突破重重障礙，到西班牙境內和政府軍並肩對法西斯匪徒作戰。

美國工人階級也在美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了志願軍。他們組織了林肯大隊和華盛頓大隊，構成國際縱隊第十五縱隊。這本書寫的是林肯大隊參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的經過。從這裏可以看出：美國工人階級和他們的黨——美國共產黨——爲了支援西班牙的階級弟兄，怎樣突破美國反動派的壓迫和法國反動派的阻撓，而冒險犯難地潛入西班牙境內。同時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各國工人階級怎樣充分地體現了國際工人階級團結的精神。他們不分種族國別，親密地站在一起，爲保衛西班牙人民的每一寸土地毫無吝惜地獻出了他們的生命。這本書裏所寫的一些可泣可歌的故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上將留下永不磨滅的一頁。

作者史迪夫·奈爾遜是美國傑出的共產黨領袖。一九五二年七月，他和其他五位美共領袖因爲要求停止朝鮮戰爭而被美國反動當局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在美國及全世界人民的憤怒抗議之下，纔於一九五三年二月間以二萬美元的保證金取得保釋。後經反動的史密斯法案的審訊，同年八月又被橫加五年徒刑再度入獄。同時在審訊中企圖將他的第二筆保證金從兩萬元增加到四萬元，經過美國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抗議和奈爾遜的上訴，美國法庭不得不把這筆保證金從四萬元削減到兩萬五千元。由於這場鬥爭的結果，奈爾遜在同年九月又再度取保釋放。